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秘书处

Distr.: General
24 May 2006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2006 年实质性会议

2006 年 7 月 3 日至 28 日，日内瓦

2006 年世界经济和社会概览：
增长和发展情况趋异



经社部

联合国秘书处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经社部）在经济、社会和环境领域的全球政策与国家行动之间起着重要的桥梁作用。该部的工作主要涉及三个相互关联的领域：（一）汇编、制作和分析范围广泛的经济、社会和环境数据与信息，供联合国会员国在审查共同问题和评价政策抉择时加以使用；（二）促进会员国在许多政府间机构内就采取何种联合行动方针对付现有或新出现的全球挑战进行谈判；（三）就把联合国各次会议和首脑会议制定的政策框架转化为国家一级方案的方式方法向有关政府提供咨询意见，并且通过技术援助协助国家能力建设。

前 言

我们的世界已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富有，不过，在国家内部和国与国之间，仍然存在着严重的不平等。与世界最穷国之一——塞拉利昂的普通公民的平均年收入相比，世界首富国卢森堡的人平均年收入是其的一百多倍。生活水平方面如此巨大的差距应当引起极大的关注，因为它们反映出了生活机会方面的严重不平等。这种现象要求在国家和国际一级制定强有力的对策，以便所有国家都能够实现千年发展目标和其他商定的发展目标。

各国的不平等趋势各不相同。1950 和 1960 年代，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出现了强劲、持续的增长，几乎各部门都是如此。不过，1980 年代以来，出现了趋异性不断扩大的趋势。有限的几个国家——大多数位于亚洲——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并从更多开放的全球市场中获益；与此同时，另外一些发展中国家却面临着经济不稳定的状况，人类福祉方面的收益也非常少。全球化进程并没有缩小穷国和富国之间的收入差距。相反，和《概览》所强调的一样，世界市场的运作方式是促使出现全球收入不平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例如，较富裕的国家往往能够以更优惠的条件进入资本市场，它们可以吸引更多的外国直接投资，在适应全球商品市场的变化时，它们也要比穷国更加灵活。

执行《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各项原则的同时，我们必须减少全球不平等。这方面的努力可以促进发展和稳定，并帮助避免经济和社会危机、甚至是政局动荡。我促请各会员国和国际社会更多地关注这一问题，以便此类国家和人民能够充分发挥其全部潜能。我推荐全世界的人都来学习本《概览》中的各项分析和建议。



KOFI A. ANNAN

秘书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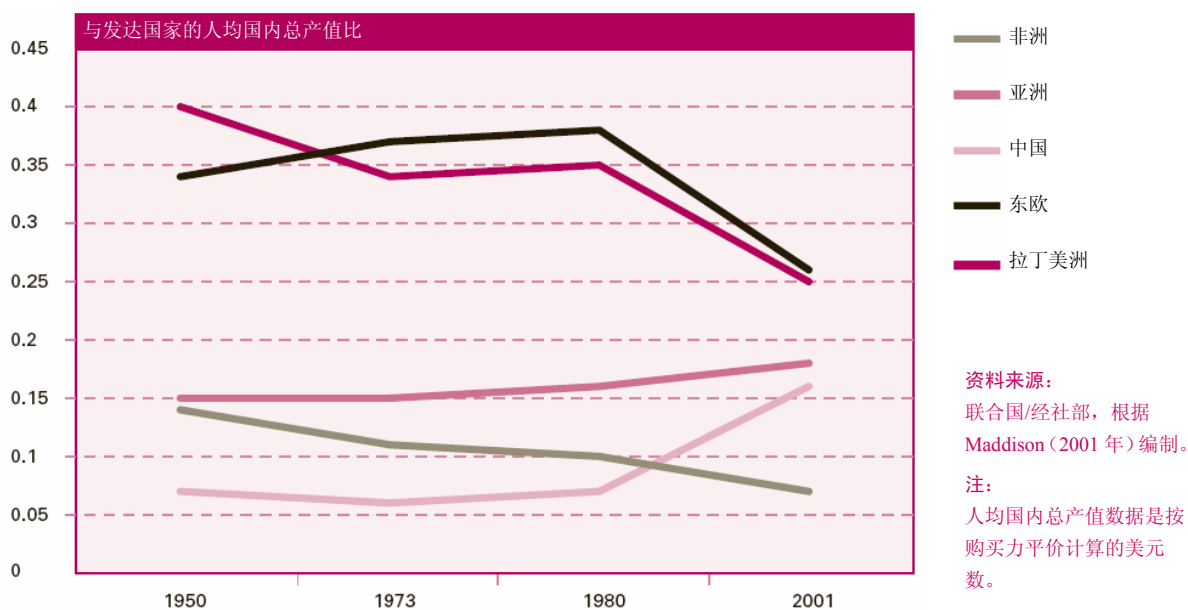
概 览

以多种尺度衡量，全球收入不平等的现象都非常严重，并处于不断加剧中

以多种尺度衡量，全球收入不平等的现象都非常严重，并处于不断加剧中。1950年，一个普通埃塞俄比亚人的收入比一个欧洲人或美国人的低16倍。半个世纪以后，埃塞俄比亚人又穷了35倍。世界上大多数最穷的国家正在以多少类似的程度落在后面。主要原因是在过去50年里，工业化国家的收入水平稳步增长，而许多发展中国家却没能做到这一点，过去25年里尤其如此。只有少数几个发展中国家在近几十年中以持续速度增长，但最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包括了中国和印度这两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考虑到仅仅这两个国家就占到了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全球的不平等程度正在开始下降。不过，如果不计入这两个国家，我们会发现，国际收入不平等现象正在原本就已很严重的程度上继续加剧（见图O.1）。

图 O.1

1950–2001 年特定发展中区域和中国相对于发达国家的人均国内总产值



有一种传统经济观点解释了在一个更为一体化的世界经济中，各国之间的收入差别是如何随时间而改变的，上述变化与该传统经济观点大相径庭。在1980和1990年代，有一种观点认为，给予全球市场更多的空间将缩小穷国和富国之间的收入差距。实际上，尽管在全球范围内，各国都已向全球市场开放了其贸易和金融体系，但是，收入趋同只是发生在少数国家，许多其他国家并没有出现这种情况。

不平等是个问题

《2006年世界经济和社会概览》着重于各国间收入差距的原因和影响。高度的收入不平等在许多国家内部也十分普遍。这之所以成为问题，不仅仅是因为这象征着不公正，还因为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机会不平等使得经济潜力未被利用，从而更加难以实现千年发展目标。不过，这里我们关注的是不断加剧的国家间的不平等。全球收入不平等的大约70%的原因是各国之间的收入有差别。尽管这并不能降低各国内部不均衡的重要程度，但是，有一点非常明显，即享有较高生活水准的概率在很大程度上似乎取决于个人的居住地点。

世界市场远未达到公平，有若干条件都不利于缩小各国之间的收入差距。富国拥有更多的“禀赋”，这些禀赋使得它们能够以更优惠的条件进入资本市场，并使它们能更好地抵御全球商品市场的变化。全球投资者通常更看好拥有更多财富和更佳人力资本、基础设施和体制的国家，因为这可确保较低的投资风险。穷国的经济和出口结构多样化程度较低，这使得它们在商品价格变化和国际金融市场的冲击面前更为脆弱。发展中国家在制定全球市场规则的谈判进程中的影响力也较弱。发展筹资问题国际会议达成的《蒙特雷共识》（联合国，2002年a）认识到了这一弱点，它明确要求国际社会改善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决策中的参与情况。不过，在这方面的进展十分有限。

全球不均衡扩大反过来可能会损害到增长本身。获得稳定的国际资金来源机会减少以及在国际贸易中谈判地位较弱，将使得穷国的一些经济潜力利用不足，这应当被看作是整个世界经济的福利损失。较低的增长还会进一步阻碍消除贫穷的努力。有些时候，情况显示，缺少扶贫措施和国内高度不平等还会引发冲突和社会不稳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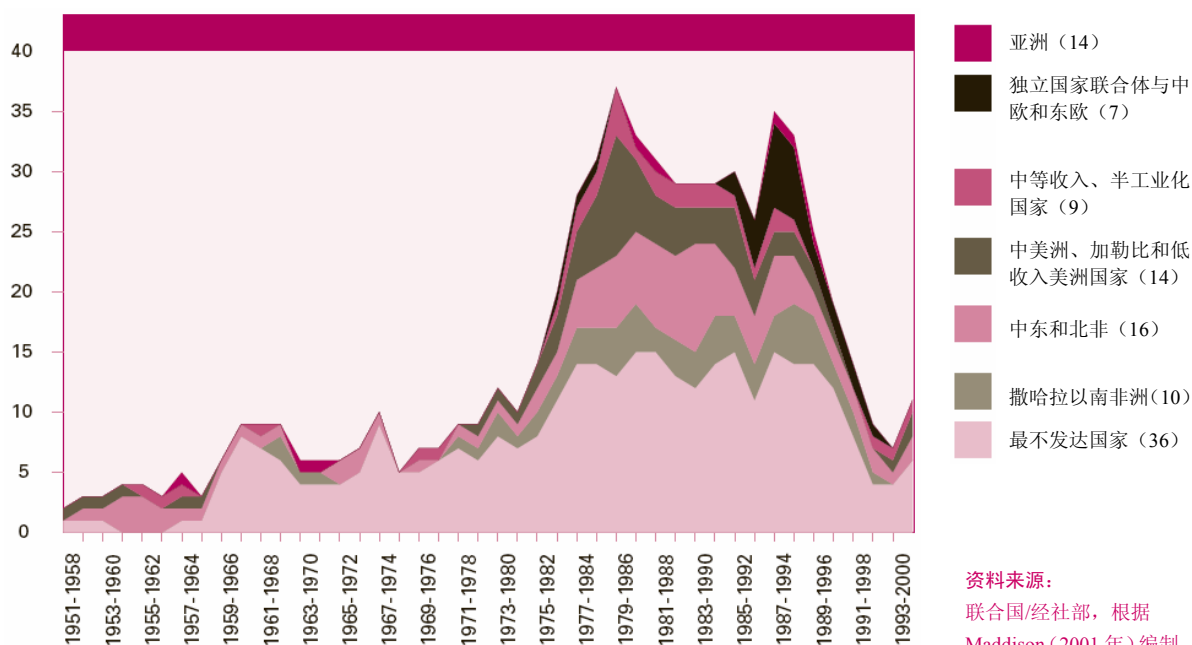
忽视大量国家发展缓慢，就意味着忽视了世界收入不平等加剧的一个主要源头。要想纠正这一状况，就必须在国内和国际一级做出政策努力。

经济增长格局各异

国家间不平等加剧是几十年来经济绩效不同的结果。一般来说，工业化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在 1960 年就已经非常之大，而且自那以后一直在持续扩大。不过，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的增长情况也相差很大。1980 年以后，在某种程度上，由于大多发生在东亚的经济持续增长的少数成功案例，发展中国家间不断扩大的收入不均衡也变得十分突出。在世界其他地区，更多的国家遭遇到增长崩溃，对生活状况造成了持久的影响。在过去 25 年中，增长崩溃的数量增加，成功增长的事例频数却有所减少。1960 和 1970 年代，在抽样调查的 106 个发展中国家中，近 50 个国家有过一个或多个较长时期的持续高人均收入增长，每年都超过 2%（见图 O.2）。但是，自 1980 年以来，只有 20 个发展中国家出现过持续增长期。相反，不少于 40 个发展中国家经历了增长崩溃，即五年或五年以上人均收入无增长或有所下降。这种增长失败的情况大多发生在最不发达国家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在此前的几十年中，增长崩溃很少发生，只影响了不到 10 个国家。

图 O.2

1951-2000 年发展中国家的增长崩溃



当然，发展中国家最近表现的很好。实际上，当前趋势表明，2004-2006年期间，发展中国家会出现相当普遍的增长，自1960年代末和1970年代初以来，这种情况还从未出现过。在这三年中，发展中国家的人均收入将平均以每年4%以上的速度增长，最不发达国家的情况会更好。这一近期表现是否预示着一个长期趋势，尚待确定。其背后的一些主要因素包括高商品价格、低利率和不断增加的官方发展援助以及对最穷国的债务减免等因素的共同作用。由于这些有利条件不会永久存在，强劲增长是否能够持续，关键将取决于发展中国家是否能够将当前有利时机的红利投资于长期经济发展利益。

对于增长成功和失败的确切原因，经济学家并没有结论性的答案。最近的研究再次发现了经济增长的复杂性。最近形成了一个共识，即寻找答案时不应当仅仅注重经济因素，还应当考虑到各国的历史和体制背景。分析应当着重考察影响增长的制约因素，如动员充足的国内或外国资金方面的限制、较低的人力资本水平和技术能力、治理结构薄弱、监管市场或提供公益物和社会服务的机构运行不佳等。国家不同，这些制约因素的重要性和相关性也各不相同。本报告试图提出自己在一个“发现过程”得出的结论，其方式特别包括考察全球市场的运作如何影响增长源和发展中国家用以克服这些制约因素的国内决策空间。发展方面的成功既取决于各国为创造有活力的增长源而做出的努力，也取决于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

生产率提高和结构改革

发达国家的生产率提高主要依赖于技术创新。不过，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增长和发展对推动技术创新的依赖性较小，它更多地依靠转变生产结构，以便将增长和发展转向具有更高生产率的活动。这种结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通过采用和改进现有技术、替代进口、进入世界制成品和服务市场以及快速积累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来实现。只有很少发展中国家能够开展独创性的研究和开发工作。

由于生产率提高较快，工业部门对总体生产增长的贡献通常会更大；工业部门生产率的提高则是因为规模扩大带来回报增加，而且，技术进步和边干边学也可以提高生产率。其更大的活力也来自于其通过原材料加工和半工业投入，将不同经济部门进行更大的纵向整合的能力。现代服务部门也是生产率提高的一个来源，它对实现工业化至关重要。随着国际服务贸易的增长，现代服务也为出口发展提供了新的机会。

更广泛来看，活跃的结构改革不仅仅涉及到了工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增长。从根本上说，它需要有不断创造新型高效率活动的的能力。它还需要加强经济体内部的经济联系，换句话说，即整合国内经济。国内经济的整合程度会影响到一个国家是否能够从国际贸易和投资中获益，而且还会影响到在所有主要经济部门提高生产率的能力。

过去 40 年中的结构改革格局表明，这种有活力的变革是高速增长东亚和南亚经济的一个显著特征。特别是在非洲，结构改革相对较少的经济体已经落在了后面。实际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中等收入国家以及中东欧、中东国家和前苏联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长期增长缓慢均与非工业化过程有关。在这些国家，增长主要集中在生产率较低的服务部门，农业和工业的增长几乎停滞。相比之下，东亚和南亚的高速增长则一直伴随着农业重要性的快速下降以及工业和服务部门的强劲扩张。

这些高速增长的经济体的劳动生产率也在持续提高，其劳动力从低生产率部门转移到了包括现代服务部门在内的高生产率部门。在低增长区域，就业人员向服务部门的转移更为明显。不过与亚洲相比，撒哈拉以南非洲、拉丁美洲和前苏联的服务部门的生产率一直在不断下降，这是因为由于其他经济部门不能创造就业，许多工人都在非正式服务活动中寻求就业。

国际贸易、外国直接投资和不平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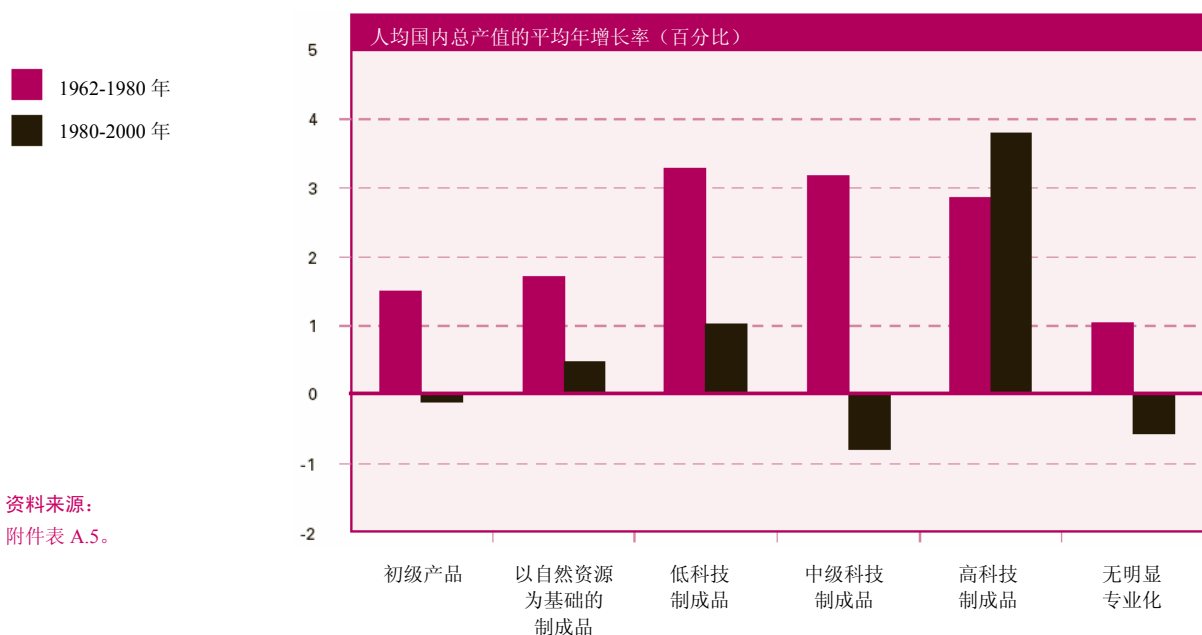
问题不只是出口多少，还在于出口什么

日益与世界经济一体化，似乎加剧了各国经济增长业绩的差异。贸易可以刺激经济增长，但最重要的是，问题不在于各国出口多少，而在于出口什么。只有具备比较有活力的出口结构，贸易才能促进整体经济加速增长（见图 O.3）。人们认为，这种结构所包括的出口组合使各国不仅能够参与有较大增长潜力的产品（最常见的是具有高需求收入弹性的高科技产品）的世界市场，而且可以帮助加强出口部门与国内经济其他部门的生产联系，并为更大量的服务和产品创造更高的增加值。东亚国家就是以这种方式使其经济多样化的，从其结构调整格局可以明显看出这一点。经济增长速度较慢的发展中国家依赖的是增值较少的出口活动，这些活动置身的环境则是一体化程度不高的国内经济。其中的许多国家仍然严重依赖初级商品出口，而且已经丧失了在世

界贸易中的一些市场份额。此外，它们还遭受到了不利贸易的较大冲击。初级商品价格比其他出口产品的价格更具波动性，1980 至 2003 年间，非石油商品出口的进出口货价比率下降了几近 40%。最近，商品价格回升，但这仅仅从某种程度上抵消了下降幅度。截至 2005 年年底，按实际价格计算，非燃料商品的平均价格仍然低于 1980 年的水平。

图 O.3

1962-2000 年按主要出口商品类别分列的各国贸易专门化和经济增长



对许多发展中国家而言，实现多样化，出口高科技产品或许不能一蹴而就。低收入国家通常缺乏足够的基础制造能力、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也缺乏发展这种有活力出口活动的国际贸易能力。不过，这些国家在世界初级商品市场上确实有一定的竞争力，因此，它们应该制订行业战略，使出口多样化，进而使其包括经过加工的自然资源产品和轻工业制成品。

外国直接投资可以促进增长，但前提是加强国内的经济联系

外国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直接取决于这种投资在加强经济的国内联系方面发挥的作用。1980 年代以来，外国直接投资的增长速度超过了世界产出

和贸易的增长速度。除其他方面外，促成这种趋势的因素包括：形成了制造业国际生产网络和现代服务业、取消了资本流动限制以及发展中国家开展了私有化进程。发展中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的年平均流入量增加了 10 倍。但是，多数（三分之二以上）外国直接投资仍然集中在发达国家。此外，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也很集中，其中的 80% 以上流入了包括中国和印度在内的仅仅十来个国家（主要是中等收入国家）。

外国直接投资带来资金和技术，因此，大大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长期经济增长。然而，很显然，收入较高以及市场、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较发达的国家吸引了大多数外国直接投资。从这个意义上说，外国直接投资似乎对经济增长趋异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此外，外国直接投资大幅度增加的国家的经济增长力度并不一定都会有所加强。1980 年代至 1990 年代期间，与其国内总产值相比，所有主要拉丁美洲国家和一些较大非洲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额都有了较大幅度的增加；然而，总投资率却停滞不前或者有所下降。此外，非洲的外国直接投资集中于采矿活动，由于很少有其他联系，对就业的影响也很小，这类投资并未惠及其他经济部门。

本报告的结论是，为了使国家从外国直接投资中受益，各国的国内公司和机构必须具备必要的吸收能力和技术能力。那些大量投资建设本国基础设施、人力资本和创业能力的国家（例如新加坡和爱尔兰）在发挥流入的外国直接投资的杠杆作用方面也最为成功。反过来，如果以重大税务奖励措施或扭曲贸易政策（例如纺织品和成衣配额）来吸引外国直接投资，而没有同时建设本地能力，没有使外国分公司与地方公司发展联系，那么，外国直接投资的长期惠益的余地将非常有限。

以贸易和投资政策促发展

在最近几十年里，贸易自由化是主要政策趋势。在世界的多数地区，这都促进了出口量的增加，但并不一定会提高经济增长率。一些国家有能力实现生产结构的多样化并对其做出变动，以使之包括生产率较高的活动，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率都有了较明显的提高。促使经济和出口更加多样化是一项重大挑战。发展中国家既需要制订积极的国内政策，也需要创造比较有利的贸易环境。

第一，发展中国家政府有理由制订积极的生产部门发展战略。成功地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多数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都曾采用过积极的工业政策来

支持经济多样化，并促进经济技术升级。在发展中国家当中，获得成功的国家所采取的出口带动经济增长战略都综合了以下措施：制订支持性宏观经济政策（见下文）、有选择地保护新兴工业、提供出口补贴、制订定向信贷计划、制订当地含量规则、进行大量人力资本投资并与多国公司结成战略联盟。支助措施往往明确地与具体出口业绩标准挂钩。在多边贸易协定范围内，实施这种积极的生产部门发展政策的空间已有所缩小，但并没有完全消失。关税及贸易总协定（总协定）和多边贸易谈判乌拉圭回合向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提供了特别待遇和差别待遇。但是，在实践中，除最贫穷国家外，发展中国家必须实施与发达国家相同的规则，只是执行期较长、保护程度较高而已。

第二，发展中国家将需要一个较好的多边贸易环境。对发展中国家而言，较好的贸易机会应包括：改善其农产品和轻工业制成品出口的市场准入、发达国家市场减少对农业生产的国内支助，尤其是消除扭曲贸易的农产品国内和出口补贴。较好的贸易机会还意味着增加参与世界服务市场的机会，包括参与需要低技能劳工流动的服务市场的机会。最不发达国家进入工业国家市场时，免关税和无配额是非常必要的。此外，所有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在适应较自由贸易秩序过程中失去贸易优惠的国家——都需要获得援助，以找到办法，解决进行调整以适应这个秩序的成本问题。

第三，发展中国家还需要较大空间，以采取旨在建设供应能力的政策。必须具备这种能力，才能在全球市场获得成功，同时，这种能力也鼓励进行积极的经济结构变革。对最穷国而言，它们需要的政策空间所受到的限制要略小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一些规则会促使为出口市场生产的抢手原料多样化，更重要的，它们还会促使制造业和服务业的产品多样化。所有发展中国家都必须比以往更加重视这些规则。此外，它们还需要更加关注各项政策，其中，这些政策应有利于在这些行业与国内其他活动之间建立联系，而且，更广而言，这些政策应鼓励国内市场整合。这可能需要制订特别措施，以扶植新兴出口行业。此外，还需要更大空间，使关于知识产权的协定更侧重发展。因此，根据多边贸易协定对发展中国家特别待遇和差别待遇的界定，我们应当更加关注这些问题。更广泛地说，正如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贸发会议）在2004年6月第十一届会议上通过的《圣保罗共识》（TD/412号文件，第二部分）所强调的那样，必须使国家政策空间与国际规章制度和承诺取得适当的平衡。

波动的私人资本流动和具有顺周期性的宏观经济政策不利于经济增长

流向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具有波动性

在过去 40 年里，没有任何证据表明，私人的、非外国直接投资的资金流动总能促进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和经济增长。毫无疑问，这类资金流动并不是促使国际收入不平等减少的驱动力。1970 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但主要是中等收入国家——获得了较多的短期和长期私人融资，不过，这种资金流动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最贫穷国家的边缘化。与此同时，事实证明，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商业银行借贷和其他证券投资具有很大的顺周期性。经济扩张时期，比较容易获得外部融资，其成本也较低；经济处于下降趋势时，外部融资紧缩，成本也有所增加。因此，私人外部融资助长了经济波动，在 1980 年代和 1990 年代，相关私人资本流动的激增和突然停止是严重金融危机的一个促因。经济波动造成了更大的不确定性，对长期投资和经济增长产生了负面影响。货币和银行系统危机的代价非常高，根据一些估算，这些危机使发展中国家的收入降低了 25% 甚至更多。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挑战是，减少对易波动短期资金流动的依赖，创造条件，确保将长期私人融资导向生产性投资。

宏观经济的稳定性和政策的灵活性对经济增长至关重要

宏观经济稳定对经济长期增长绩效的影响很大。我们必须从比较广义的角度理解宏观经济稳定，它不仅需要保持物价稳定和可持续的财政收支平衡，还需要避免经济活动和就业的大起大落，并进一步维持可持续的国外账户，避免汇率定值过高。发展中国家频频发生金融危机，这表明，除其他外，宏观经济稳定还要求国内金融部门监管有序、银行体系保持稳健的资产负债表、外债结构合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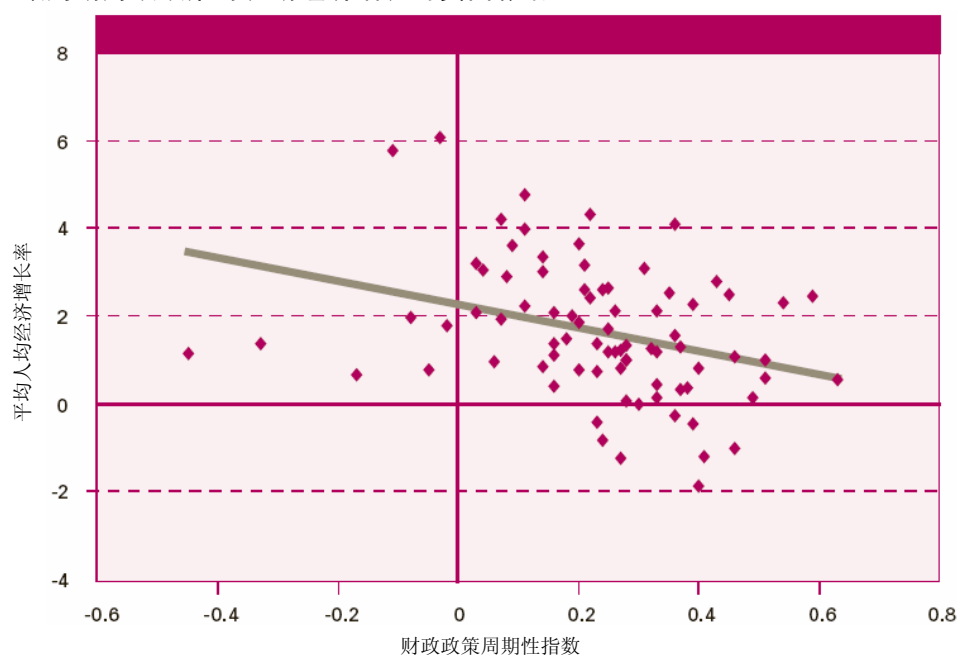
1960 年代，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都很强劲，宏观经济环境也比较稳定。在此后的几十年里，东亚经济体高速增长，其所达到的经济稳定性要远远高于经济增长缓慢许多的拉丁美洲和非洲国家。宏观经济稳定与经济增长相辅相成。除其他外，强劲和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增强了对国内和外国公共债务的持

续承受能力，从而使得更容易增强宏观经济的稳定性。反过来，广义上更大的稳定性可以减少投资的不确定性，从而有利于较高的长期经济增长率。

1980年代以来，许多发展中国家执行的稳定政策都强调了降低通货膨胀和恢复财政平衡的目标。虽然缓和通货膨胀和实施审慎财政作为明智的宏观经济政策目标无可厚非，但令人担心的是，在实践中，各国可能会因为强调这些目标而忽略了宏观经济稳定的其他层面。尤其是，物价稳定的代价往往是汇率升值和无法承受的外债负担。此外，在过去二十年里，发展中世界许多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都具有高度的顺周期性。在经济减缓时期，这种政策态势会导致经济增长率和就业率降低，代价将尤其高昂。

本报告的分析显示，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的财政政策态势具有高度的顺周期性，而且，导致采取这种政策的原因往往是资本流动波动产生的顺周期效果。在东亚，财政政策对商业周期或者是中性的、或者是反周期性的。在对许多发展中国家进行抽样衡量后发现，顺周期财政行为与长期经济增长之间呈现很大的负相关性（见图 O.4）。因此，为反周期宏观经济调整政策创造空间将有利于经济增长，这样也可以促进收入趋同。与发达国家相比，这对发展中国家更重要。发展程度越低，宏观经济的波动性往往就越大，这尤其是因为面对外部冲击时，发展中国家更易受到伤害。

图 O.4
顺周期财政政策对长期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



资料来源：
联合国/经社部根据以下来源提供的数据编制：
Kaminsky、Reinhart 和 Végh（2004 年）以及世界银行 2005 年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
注：
该指数是财政政策周期性的加权平均指标，这些指标包括发展中国家的公共支出、税率变化的替代数字和商业周期期间的支出变化。正数表示较高的顺周期性，负数表示反周期程度。以下资料提供了其他详细信息，Kaminsky、Reinhart 和 Végh（2004 年）。

反周期的宏观经济政策需要 更大空间

对许多发展中国家政府而言，实施反周期的宏观经济政策的空间非常有限，因为与其所面临的外部冲击的规模相比，其可动用的财政资源和外汇资源往往都比较少。通过采取国际行动来减轻私人资本流动的波动性的影响（见下文）可以进一步帮助增加必要的政策空间。不过，在国家一级，政府也可以采取措施，通过改进宏观经济决策的体制框架来增加实施反周期政策的空间。

第一，对财政政策而言，比较恰当的体制环境是，在财政审慎和财政灵活之间取得平衡，以确保政策信誉和财政可持续性。制订不受经济增长率短期波动影响的财政目标（所谓的结构性预算规则）可以有效地加强反周期政策态势。一些发展中国家，例如智利，已经成功地实施了这类财政规则。此外，设立财政稳定基金——例如，以初级产品出口生产为基础的基金——有助于使不稳定税收产生的收入在一段时期内保持均匀。世界各地采用这种基金的经验各不相同。这类基金决不是万灵丹，需要谨慎管理。不过，财政稳定基金可以成为一种有效工具，通过保护促进经济增长的长期基础设施和人力发展公共投资，解决跨期财政支出权衡问题；在外部冲击和经济下滑使得税收减少的时期里，基金也可以发挥这一作用。

第二，应该保留一定的酌处权。1980年代以来，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政府舍弃了有酌处权的宏观经济政策安排，而改用按规则办事的安排。促成这种变化的原因是，人们认为，后者可以避免政策产生的宏观经济不稳定。例如，约20个经济体将紧盯通货膨胀率作为货币政策的框架。根据这种货币制度，有独立地位的中央银行通过公开宣布许可的通货膨胀程度，承诺维持物价稳定。这种政策安排有若干优势，包括可能会提高中央银行的政策透明度和信用。但与此同时，片面关注严格通货膨胀目标的货币政策也使得宏观经济稳定不利于就业和经济增长目标。在一段时期内，在经济未遇到重大冲击时，以规则为基础的政策可能可以很好地发挥作用。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结构会有所改变，受外部冲击影响的脆弱程度也将改变。例如，金融冲击造成的影响可能会超过贸易条件冲击造成的影响。在这种不断变化的形势下，预定的政策规则可能会不太切合实际，或者是显得太过僵硬。此外，一个经济体所面临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从不以同样的形式或同样的强烈程度出现，因

此，总是需要一定的酌处政策空间，以便进行调整，从而尽量减少宏观经济损失。

第三，宏观经济政策应该与其他经济决策领域很好地结合起来。在这方面，制订具有竞争力的实效汇率似乎很关键。例如，在经济迅速增长的东亚经济体中，宏观经济政策是范围更广的发展战略的一部分，它直接促进了经济的长期增长。这些经济体的财政政策把发展支出放在了优先位置，其中包括教育、卫生和基础设施投资以及为出口行业提供补贴和信贷担保。货币政策须与金融和工业政策相协调，其中包括定向和补贴信贷计划以及管理利率，以直接影响投资和储蓄，不过，人们认为，具有竞争力的汇率是鼓励出口和出口多样化的关键。相比之下，1980年代以来，许多拉丁美洲和非洲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关注的都是范围很狭窄的短期稳定目标，在许多情况下，这都会导致汇率定值过高。

减少金融不稳定性的国际政策

多边金融机构的一项主要挑战是帮助发展中国家减少资金流动波动的不良影响，并提供反周期金融机制，以抵消私人资本固有的顺周期游动。有若干措施可供选择，以遏制顺周期资本流动，从而为可持续增长创造更良好的环境。

第一类措施包括采用某些金融工具，以减少货币的错配，并将发展中国家的偿债义务与支付能力挂钩（例如，通过发行同国内总产值或商品挂钩的债券）。同时，还可采用由多边发展银行和出口信贷机构提供的反周期公共贷款担保机制。第三类办法是支持发展中国家政府加强监管框架，以遏制短期资本流入的波动性，并建立健全国内私营和公共金融部门体制。

另外，应继续将多边监督（主要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货币基金组织）监督）作为防范危机工作的核心。人们认为，在国际一级加强提供应急融资以应对外来冲击对缓解不合理的调整负担和减少大量储备金余额成本至关重要。对中等收入和低收入国家而言，合理的机制应包括提供流动性，以应付出口收入波动，特别是商品价格不稳定或自然灾害引起的波动。应为在资本项目危机中获取官方国际清偿力提供便利，而且国家对官方国际清偿力的大量潜在需求有可能会超过按货币基金成员配额设定的正常贷款限度，因此官方国际清偿力的额度也应与这些需求相称。

对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的投资是 经济发展所必需的

从某种程度上讲，观察到的经济增长差异是由各国在基础设施和人类发展方面的公共投资和支出差距造成的。

需要改善基础设施

基础设施达到足够高的水平，是确保公司生产率的一项必要条件。如果一个经济体没有电话、电力和公路网络，那是难以想象的。从本质上说，基础设施的特点是具有不可分割性，各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必须达到一个基本或起码的水平（例如，起码的公路网络），才能推动整个经济体的生产率的增长。要建设起码的基础设施，各国需要进行长期持续的大量公共投资。拉丁美洲和撒哈拉以南非洲未能做到这一点，正是它们落后于持续进行基础设施投资的东亚国家的原因之一。东亚国家在提高有形基础设施的质量和扩大其覆盖范围方面进行了更多的投资。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自 1980 年代以来，由于财政紧缩加剧，拉丁美洲国家在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有减无增。这致使出现了基础设施质量和可用性方面的巨大差距。自 1960 年代以来，拉丁美洲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公路密度几乎没有增长，东亚则增长了两倍。另外，东亚的电话线路数量分别是拉丁美洲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两倍和十多倍。

经验证据显示，1980 年代和 1990 年代期间，东亚和拉丁美洲国家之间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有三分之一是基础设施发展落后造成。证据还表明，公共和私营投资之间的互补非常重要。当政府削减对基础设施或私有基础设施服务业的投资时，私营投资者没能填补由此产生的缺口。对于许多拉丁美洲和非洲国家而言，这一结果同这类私有化方案的最初预想相去甚远。

人类发展是经济增长的必要充分条件

实证研究表明，如果发展中国家能提高人类发展水平，它们就能赶上发达国家。当然，经济增长与人类发展之间的关系是十分复杂的。各国在人类福祉指标如预期寿命和教育程度方面存在着极大的差距。不过，与人均收入的改善情况相比，世界各国在健康和教育改善成果方面的趋同似乎更加明显。本报告掌握的证据表明，具有成功经济增长业绩的国家都在经济持续增长进程

之初便实现了较高的人类发展水平，而且随着平均收入的增加，教育和卫生也得到了大幅改善。不过与此相反，并非所有人类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都能实现长期的高经济增长率。

当然，人类发展本身就是一项目标，联合国各次大型会议和首脑会议已将其纳入全球议程。然而，它似乎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必要非充分条件。必须消除经济增长和体制变革方面的其他限制因素，才能为提高公众受教育水平创造机会。在这方面，能动地创造适当的生产性就业机会也是重要环节之一。

为基础设施和人类发展领域的长期投资创造财政空间

提高人类发展水平、改善基础设施的质量需要充分、持续的公共支出。基础设施开发需要大规模投资，其回收期也比较长。教育和健康的改善也需要长期努力，需要各项社会服务的长期发展和供资。良好的基础设施、较高的教育水平和健康水平会带来重要的社会效益，因此，政府必须发挥其核心作用，确保社会在上述各领域进行充分投资。正如上文所述，采取反周期财政政策有助于政府顺利地维持当前充分的支出和公共投资水平，也有助于确保在经济下滑时期，政府不会不当地削减教育、卫生和基础设施方面的支出。

在基础设施和人类发展方面存在重大差距的国家必须大幅增加其在上述领域的财政支出空间。许多国家都可以扩大其财政支出空间，方法包括更好地瞄准各社会部门内的优先领域，以提高教育和卫生领域的公共支出的效率；提高公共方案的成本效益等。在基础设施方面，改善筹资计划并打击签订基础设施工程合同中的腐败现象，会有助于减少成本。然而，即使上述手段可以提高公共支出的效率，资源也可能会不够充足。因此，加强税基非常必要，政府收入较低的国家尤其如此。对最贫穷国家而言，它们显然需要获得大量的额外资源，以进行必要的投资。须有更多的发展援助，而且须用这些援助来支持基础设施和人类发展方面的投资。

增加援助并提高援助效力

1961年大会宣布设立第一个联合国发展十年时，人们认为，若想实现既定的增长目标，就必须加强动员内部和外部资源的力度。当时人们还认为，必须将这些资源中的大部分配置给基础设施和人类发展领域，以克服发展瓶颈。对克服

此类发展限制因素和向发展中国家施加“大的推动”而言，增加援助是关键。在这种情况下，提出了将发达国家国民总收入的 0.7% 作为官方发展援助的目标。在接下来的数十年当中，许多国家都没有实现上述援助转移目标，而且，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的许多成员国承诺的援助也下降到了这一目标的三分之一。2002 年，在墨西哥蒙特雷举行的发展筹资问题国际会议上，国际社会重申，捐助国必须做出具体努力，实现将国民总收入的 0.7% 作为官方发展援助的目标，并将千年发展目标作为具体标准，用来评估官方发展援助的效益。因此，援助重新回到了发展辩论的中心，并（同 1960 年代早期一样）重新提出了进行“大力推动”的提议。援助也重新出现增长势头，现在，减免最贫穷国家债务的活动也与这些援助相辅相成。

国际发展援助的效益究竟如何，是一个争议很大的问题。有人认为，援助并没有支持经济的增长和投资，也没有起到多大的减贫作用。与此相反，本报告认为有大量的证据支持这样一种观点，即援助有助于经济的长期发展。因此，在过去 40 年当中，官方发展援助在遏制造成各国收入差距的趋势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然而，由于援助转移的规模仍然有限，官方发展援助在减少国际收入不均衡方面的作用即使发挥到最大程度，也是十分微薄的。

上述情况支持了重新提出的、通过援助给予发展中国家“大力推动”的主张。在这方面，可以将千年发展目标看作是一套明确的指标，它要求提供大量的投资，以使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达到起码的门槛水平。开展有援助和目标明确的方案可以使最贫穷国家的经济以较快速度增长。采用这一办法的前提是，不仅必须充分了解如何结合各国具体国情有效输送此类资源，而且，接受国政府也必须具有行政能力去管理资源流动，确保收入和生产率累积增长。因此，施政结构的改善情况（特别是预算过程透明度、建立高质量公务员队伍以及改善社会服务交付等方面的情况）必须成为进一步发展援助需求评估的内容之一。然而，在当地一级真正行之有效的办法因国而异，因此，在援助和贷款上附加外部规定的施政条件（捐助机构近来的常用做法）可能并不能产生提高公共服务质量的预期效果。

体制和善政

人们现已广泛认识到，体制和施政结构与经济增长有重大关系，它们也是全球收入失衡日益扩大的原因。不过，近几年对体制和结构重要性的大量研究日益清楚地表明，我们很难确定应该建立什么样的“优质”体制和施政结构，

才能支持经济的持续增长进程。体制和施政结构的质量似乎同具体国家和具体环境有着本质的关联。对决策者而言，关键是要知道，通过对现有体制和施政结构进行哪怕是轻微的、有重点的改革，能否切实创造新的经济机会。

通观经济史和体制变革，哪怕只是在非常具体的领域中建立更有效的体制框架，都可以消除限制增长的因素。中国在1970年代晚期进行的农村体制改革就为目前中国经济的成功播下了种子。1978年，中国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允许以家庭为单位长期承包集体所有的土地，并获得土地使用权。反过来，农民必须按照集体的生产定额上交预定比例的产量，剩余的产品则可以在自由市场上出售或按议价卖给政府。越南也实行了土地改革方案，向佃农转让部分土地产权，以消除农业生产率增长的限制因素。与此相比，为达到同一目标，韩国和中国台湾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不久便向农户转让了全部土地所有权。在所有这些改革之后，都出现了农业产量的大幅增长，从而为工业发展奠定了基础。

改革成功的意义超出了农村和农业体制改革的范围。通过逐步建立公私有别的体制，实现生产结构多样化，并在金融部门采用新的监管框架，同时采取一些补偿措施，以减少改革的社会和经济成本，有些国家，如毛里求斯和一些东亚国家，都成功地融入了全球贸易和金融体系。

从上述实例中可以得出三项重要结论。第一，有若干种的施政体制改革可以有效地消除束缚经济增长的因素。上述案例取得成功的决定性因素主要在于：相关体制改革合理地适应了各国的主要社会和经济制度。第二，中国和越南进行的相对有限的改革表明，加快经济增长并不一定要求立刻进行大规模的、全面的体制改革。如果能够意识到已开始的变革将持续下去，而且也启动了实际改革的又一进程，那么，即使只是一个小小的体制改革，也可以取得意义深远的成果。第三，体制改革并不仅仅是创造市场（进而赋予产权）。它还要求建立市场正常运作所需的体制和管制框架，提供公益服务并确保规则的公平性（确保收入公平）。另外，它还要形成共识并防范社会冲突。

第三项结论主要涉及到了审查许多贫穷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经济增长失败的原因进而得出的教训。这些国家体制上的弱点和国内冲突是重要原因，但必须结合其基本经济状况加以分析。与农业和制成品出口国相比，矿产出口国出现经济增长失败和内部冲突的概率最高。然而，并不能因此便得出结论认为，经济增长失败和冲突是依赖自然资源获得收入的直接结果。这其中

肯定还有其他因素在起作用，如社会契约效力微弱以及国家能力萎缩等。但是，矿产资源丰富且易被劫掠以及毒品泛滥，确实会促成内战和内部冲突的发生和长期持续。开采自然资源可在短期内获得大量财富，这些财富会恶化社会不平等和政治冲突，包括恶化中央政府和资源所在地利益之间或是一国不同区域之间的分歧。如果在资源开采之初未能建立起强有力的体制以解决上述问题，那么，一旦大家觉得财富分配不公，就可能会爆发暴力冲突，而且一般情况下，社会内部已有的分歧也会进一步恶化。本报告的一项重要研究结论就是，如果各国建立了能够处理和化解冲突的强有力体制，那么，它就可以避免这种“自然资源的诅咒”。

施政改革政策的影响

虽然进行施政改革必然举步维艰，但是，本分析同时表示，没有理由悲观地认为，一些国家将继续深陷于低增长的泥潭，而无法摆脱阻碍其经济增长的体制枷锁。即使开始时体制不够完善，也绝对可能实现经济增长，关键是，在这种情况下，一国政府自身必须确实承诺进行变革，以消除经济持续增长的体制障碍。因此，施政改革要求建立民间机构认为合法的有效公共体制。国际合作会有所帮助，但是也只有支持符合具体国情且逐步推行的国内进程时，才会有帮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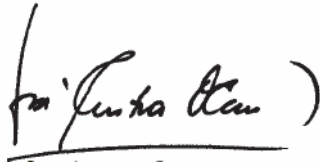
对国际社会而言，这一结论尤其适合于刚刚摆脱冲突的国家，以及那些“失败的国家”。在大多数情况下，最重要的问题是要扶助恢复经济活动，这通常指恢复农业部门，因为雄厚的农业基础通常对接下来的经济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农业得到发展，会促进对农业的进一步投资并提高农民收入，进而使农民对其他经济部门产品的需求增加。农业部门的繁荣也表明，经济增长的果实确实得到了分享，因而有助于建立一个稳定公平的社会。经济增长会创造出一定的机会，借此，我们可以调整体制、改善施政，进而形成良性循环。

全球不平等、安全与国际 发展议程

在全球经济日益一体化的今天，一国的经济增长业绩取决于其地理国界内外的诸多因素。国际贸易和资金增加有助于改善经济业绩。不过，国内经济一体化水平低、实行顺周期宏观经济政策、基础设施和人类发展水平低以及体

制薄弱的国家都较少有机会从不断扩大的世界市场中受益。这些国家起步时的诸多弱点使它们在低增长的道路上停滞不前，结果就变得更加落后。这些是导致趋异、因而也是导致全球不平等日益加剧的根本原因，此外，它们还使上述国家更加难以摆脱贫穷并增强抵御全球冲击的能力。反过来，这种情况会促使全球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并有可能增加冲突的风险。与此相反，那些能够推动经济的外部 and 内部一体化、采取反周期宏观经济政策、人力资本和基础设施实力雄厚、体制强有力的国家则更有能力从加强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获益，从而赶上发达国家。

因此，全球不平等日益加剧的问题会严重影响到联合国发展议程的执行情况。不平等会使千年发展目标和国际社会商定的其他发展目标更加难以实现，全球安全也会受到影响。因此，如果无法扭转全球不平等日益加剧的趋势，它将给人类发展造成许多不良后果。



José Antonio Ocampo

主管经济和社会事务副秘书长

2006年5月

目 录

前言	iii
概览	v
目录	xxiii
解释性说明	xxix
第一章 1960-2005 年的增长和发展趋势	1
经济增长趋异模式	4
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巨大鸿沟	4
增长成功和增长崩溃集中在某段时间发生	12
增长成功和增长崩溃的地理集中性	15
增长趋异和人类发展	20
不平等的长期存在及其对世界发展的影响	23
第二章 结构变化与经济增长	33
经济增长要求结构改革	34
1970-2003 年的增长模式和结构变化	36
投资模式和结构改革	41
就业、生产率和结构改革	47
结论	55
附录：关于分解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和就业人口比率的技术说明	57
第三章 贸易一体化引起了更大的趋异性吗？	59
国际贸易对增长趋异性的促动作用	60
全球市场活力和商品出口结构的变化	63
商品贸易、专业化模式和增长	67
服务出口的专业化模式和增长	72
外国直接投资和趋同性-趋异性困境	79
外国直接投资流量的趋势和存量	80

对加工业的外国直接投资：国际生产网络及增长	84
外国直接投资能否导致发展中国家较快速度的经济增长？	86
生产部门的发展政策、多样化和出口增长	88
创立动态比较优势：政策和结果	91
外向型经济、贸易自由化和增长	92
当今有没有生产部门发展政策的空间？	95
实现更大趋同性的道路	98
附件：数据和方法	101
第四章 宏观经济政策与增长差异	105
宏观经济稳定和增长差异	107
通货膨胀与增长	108
宏观经济失衡与增长	111
金融发展、增长与宏观经济稳定	113
对发展中国家稳定和增长的外部限制	118
发展中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周期性	124
基础设施和人的发展方面的公共投资	131
有形基础设施与增长	131
人力资本投资中的差距	134
官方发展援助、增长与发展	136
概述和政策影响	140
宏观经济稳定性和政策灵活性对增长的重要性	140
宏观经济政策和国家发展战略	141
减轻金融变动性的国际政策	142
投资于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	143
提高援助及其有效性	144
第五章 施政、体制和增长趋异	145
体制、施政和经济增长	146
施政结构和经济增长的变化	149
新比较经济学	150
对施政措施和跨国分析的批评	151

施政结构的类型.....	153
施政成功转型的国家.....	155
土地改革.....	155
贸易政策改革.....	157
渐进式措施：中国.....	159
经济增长失败的原因.....	162
过去 50 年里增长的失败：概览.....	162
增长失败在体制方面的原因.....	164
施政、内乱和冲突管理.....	166
结论.....	168
附件	
统计表.....	171
书目.....	195

方框

方框一.1	一些关键概念的定义	7
方框一.2	哪个国家是世界经济增长引擎重要么?	25
方框二.1	转型期经济体投资的增减	44
方框二.2	亚洲的生产率增长和结构改革	52
方框三.1	初级商品市场和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工业制成品市场能否成为有活力的市场? ...	65
方框三.2	国际劳动力移民和经济增长	72
方框三.3	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出口: 南亚飞雁	77
方框四.1	对汇率政策的挑战	122
方框四.2	为博茨瓦纳的出色表现打下基础的灵活的宏观经济政策	129
方框四.3	援助的有效性与经济增长: 援助事项的类型	138
方框五.1	最初的显著趋异以及大西洋贸易的重要性	147

图

图一.1	1960年、1980年和2001年的世界收入不平等状况	9
图一.2	1950-2001年发展中国家和经合组织成员国的人均国内总产值增长情况	10
图一.3	1951-2000年按区域或同类国家数目分列的人均国内总产值持续扩展或收缩 情况	11
图一.4	1951-2003年106个发展中国家的人均国内总产值增长情况	14
图一.5	1900-2005年非石油商品和发展中国家制成品的贸易条件	14
图一.6	1960年、1980年和2000年164个国家人均国内总产值的地理分布	18
图一.7	2002年收入水平与预期寿命之间的关系	22
图一.8	1960-2003年收入趋同与婴儿死亡率下降之间的关系	23
图一.9	1963-2001年全球经济、中国、美利坚合众国和发展中国家集团(不包括中国) 的产出增长率	24
图一.10	1980年、1990年和2004年按区域分列的商品出口多样化	28
图一.11	1970和2003年区域外国直接投资流量在世界外国直接投资总额中所占的 份额	29
图二.1	1970-2003年按特定区域和国家类别分列的工业部门、公用事业和服务部门以 及农业的经济增长和结构改革	38

图二.2	1970-2003 年按特定区域和国家类别分列的农业、采矿和制造业以及公用事业和服务部门的人均产出年增长率	39
图二.3	1960-2003 年特定时期和区域的平均投资率	43
图二.4	1970-2004 年人均投资增长率和人均国内总产值增长率的波动情况：投资波动对经济绩效的影响	45
图二.5	1970-2003 年按特定区域和国家类别分列的人均投资年增长率与农业和工业占总产出份额的变化	46
图二.6	1970 和 2003 年大韩民国部门投资占固定资产形成总值的百分比份额	47
图二.7	1991 年至 2003-2004 年按特定区域和国家类别分列的农业、工业和服务部门为创造就业机会所做的贡献	49
图二.8	1991 至 2003-2004 年某些国家和地区劳动生产率年增长率	50
图二.9	1991 年至 2003-2004 年按特定区域和国家类别分列的工业部门、公用事业、建筑和服务部门以及农业部门为整个经济部门劳动生产率增长所做的贡献	51
图二.10	1991 至 2003-2004 年按特定区域和国家类别分列的劳动生产率年增长率和就业人口比率的年百分比变化	54
图三.1.	1962 年至 2000 年期间发展中国家出口价值占发达国家出口价值的比例，按商品种类列示	64
图三.2	1962-2000 年按发展中国家所在地区或国家集团列示的发展中国家某些种类的非石油出口占总地区出口的份额	66
图三.3	1962-2000 年期间 105 个发展中国家相对于贸易专业化的人均国内总产值增长	67
图三.4	1980-2003 年世界服务贸易出口额，按部门列示	75
图三.5	1980-2004 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	81
图四.1	1961-2003 年特定区域的通货膨胀率中位数	109
图四.2	1961-2003 年按区域和时期列示的通货膨胀水平和增长表现	110
图四.3	宏观经济平衡：亚洲一级新兴工业化经济体，1979-2002 年；东南亚，1979-2002 年；半工业化国家，1976-2002 年；以及撒南非洲，1980-2002 年	112
图四.4	2003 年特定国家和地区金融市场资本化和储蓄率	115
图四.5	1989-2005 年发展中经济体国内债券市场的成长（未偿总额）	117
图四.6	1960-2003 年发展中国家财政政策的周期性与经济增长	127
图四.7	拉丁美洲：1980-2001 年原始赤字和基础设施方面的公共投资	132

图四.8	拉丁美洲和东亚 2000 年的学校教育年数以及 1960 年至 2000 年教育水平的变化.....	135
------	--	-----

表

表一.1	1820 至 2001 年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大分化	5
表一.2	1960-2001 年国际不平等的锡尔系数分解	16
表一.3	1960-2001 年发展中国家不平等的锡尔系数分解	16
表二.1	1960-2003 年按特定区域和国家类别分列的人均投资水平	42
表三.1.	1965 年至 1970 年、1980 年至 1985 年和 1995 年至 2000 年期间世界商品贸易中的产品份额，按产品种类列示	64
表三.2	1962-2000 年期间发展中国家人均国内总产值增长水平，按主要出口专业化模式列示	68
表四.1	1960-2003 年按区域分列的产量和通货膨胀波动情况	107
表四.2	1960-2003 年某些国家和地区财政政策的周期性与经济增长	125
表四.3	1960-1995 年电话主线利用率以及道路和铁路的密度：发展中地区与发达国家两个关键的基础设施指数数值之比	133
表五.1	1950-2001 年实际人均收入在至少七个连续年度中下降的国家	163

解释性说明

报告全文的表格用到了下列符号：

- 两点 (..) 表示没有数据或未单独报告数据。
- 破折号 (——) 表示数量为零或可忽略不计。
- 连接号 (-) 表示该项不适用。
- 负号 (-) 除另有说明外，表示亏损或减少。
- 圆点 (.) 用来表示小数点。
- 斜线 (/) 用于年份之间，表示收获年度或财政年度，如 1990/91。
- 连字符 (-) 用于年份之间，如 1990-1991，表示所涉全部时期，包括首年和末年。
- “元” (\$) 指美元，除非另有说明。
- “十亿” 指 10 亿。
- “吨” 指公吨，除非另有说明。
- 年增长率或年度变化率指年复合率，除非另有说明。
- 由于四舍五入，表格中的各项数字和百分数的和不一定等于总数。

报告用到了下列缩略语

国际清算银行	国际清算银行
独联体	独立国家联合体
发援会	发展援助委员会（经合组织）
欧洲复兴开发银行	欧洲复兴开发银行
欧洲经委会	欧洲经济委员会
拉加经委会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
出口加工区	出口加工区
欧盟	欧洲联盟
外国直接投资	外国直接投资
总协定	关税及贸易总协定

国内总产值	国内总产值
固定资产形成总值	固定资产形成总值
国民总收入	国民总收入
高科技	高科技
信息和通信技术	信息和通信技术
劳工组织	国际劳工组织
货币基金组织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综合生产网络	综合生产网络
伦敦银行同业拆放利率	伦敦银行同业拆放利率
低科技	低科技
合并与收购	合并与收购
中级科技	中级科技
北美贸协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国家经济研究局	国家经济研究局（柬埔寨、马萨诸塞）
以自然资源为基础	以自然资源为基础
官方发展援助	官方发展援助
经合组织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欧佩克	石油输出国组织
初级产品	初级产品
购买力平价	购买力平价
研究和发展	研究和发展
国贸分类	标准国际贸易分类
贸发会议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经社部	联合国秘书处经济和社会事务部
工发组织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
世界总产值	世界总产值
发展经济学所	世界发展经济学研究所（联合国大学）

本出版物所用名称和所示材料不代表联合国秘书处任何国家、领土、城市、地区或其当局的法律地位方面、或是在其边境或边界的界定方面的任何意见。

报告中用到的“国家”一词有时也指领土或地区。

为方便分析，本文用到了下列国家分组和小组：

发达经济体（发达市场经济国家）：

欧洲联盟、冰岛、挪威、瑞士、加拿大、美利坚合众国、澳大利亚、日本、新西兰。

主要发达经济体（七国集团）：

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

欧洲联盟（欧盟）：

奥地利、比利时、塞浦路斯、捷克共和国、丹麦、爱沙尼亚、芬兰、法国、德国、希腊、匈牙利、爱尔兰、意大利、拉脱维亚、立陶宛、卢森堡、马耳他、荷兰、波兰、葡萄牙、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西班牙、瑞典、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欧盟十国：

塞浦路斯、捷克共和国、爱沙尼亚、匈牙利、拉脱维亚、立陶宛、马耳他、波兰、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

欧盟八国：

欧盟十国中的所有国家，不包括塞浦路斯和马耳他。

转型期经济体：

东南欧：

阿尔巴尼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保加利亚、克罗地亚、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和黑山、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

独立国家联合体（独联体）：

亚美尼亚、阿塞拜疆、白俄罗斯、格鲁吉亚、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摩尔多瓦共和国、俄罗斯联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克兰、乌兹别克斯坦。

燃料净出口国：

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联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

燃料净进口国：

独联体的所有其他国家。

发展中经济体：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非洲、亚洲和太平洋（不包括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和亚洲的独联体成员国）。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小组：

南美洲：

阿根廷、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巴拉圭、秘鲁、乌拉圭、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

墨西哥和中美洲：

哥斯达黎加、萨尔瓦多、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巴拿马、墨西哥。

加勒比：

巴巴多斯、古巴、多米尼加共和国、圭亚那、海地、牙买加、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非洲小组：

北非：

阿尔及利亚、埃及、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摩洛哥、突尼斯。撒哈拉以南非洲，不包括尼日利亚和南非（通常简称为“撒哈拉以南非洲”）：

尼日利亚和南非以外的所有其他非洲国家。

亚洲和太平洋小组：

西亚：

巴林、伊拉克、以色列、约旦、科威特、黎巴嫩、阿曼、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土耳其、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也门。

东亚和南亚：

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所有其他发展中经济体（除另有规定外，包括中国）。该小组还可被细分为：

南亚：

孟加拉国、印度、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尼泊尔、巴基斯坦、斯里兰卡。

东亚：

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所有其他发展中经济体。

为了第二、第三和第四章（题为“宏观经济的失调和增长”的部分）中的特殊分析，发展中国家被划分成了下列各小组：

亚洲：

一级新兴工业化经济体：

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a、大韩民国、新加坡、中国台湾。

东南亚：

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越南。

南亚：

孟加拉国^b、印度、蒙古^a、巴基斯坦、斯里兰卡。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阿根廷、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墨西哥、乌拉圭、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

中低收入拉丁美洲国家：

玻利维亚、厄瓜多尔、秘鲁、巴拉圭。^a

中美洲和加勒比：

哥斯达黎加、古巴^a、多米尼加共和国、萨尔瓦多、危地马拉、洪都拉斯^a、牙买加、尼加拉瓜^a、巴拿马^a、特立尼达和多巴哥。^a

独立国家联合体（独联体）：

俄罗斯联邦、乌克兰。

中欧和东欧：

阿尔巴尼亚^a、保加利亚、捷克共和国、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斯洛伐克。

撒哈拉以南非洲：

喀麦隆、刚果^a、科特迪瓦、埃塞俄比亚、加蓬^a、加纳、肯尼亚、毛里求斯^a、莫桑比克、尼日利亚、塞舌尔^a、乌干达、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津巴布韦。

中东和北非：

阿尔及利亚、巴林^a、埃及、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伊拉克、以色列^a、约旦、科威特^a、黎巴嫩^a、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a、摩洛哥、阿曼^a、沙特阿拉伯、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突尼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a、也门。

半工业化国家：

阿根廷、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墨西哥、南非、土耳其、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

未被纳入各区域分组的最不发达国家：

阿富汗、安哥拉、贝宁、布基纳法索、布隆迪、柬埔寨、中非共和国、乍得、刚果民主共和国^b、吉布提、赤道几内亚、冈比亚、几内亚、几内亚比绍、海地、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利比里亚、马达加斯加、马拉维、马里、毛里塔尼亚、缅甸、尼泊尔、尼日尔、卢旺达、塞内加尔、塞拉利昂、索马里、苏丹、多哥、赞比亚。

文章和表格中的国家小组名称只是为了统计或分析之便，不一定代表对特定国家或地区在发展进程中所处阶段的判断。

^a 第三章的分析增加了该国。

^b 由于缺少数据，第三章未考虑到该国。

第一章

1960-2005 年的增长和发展趋势

以多种尺度衡量，世界不平等现象都非常严重，并处于不断加剧中。今天，埃塞俄比亚的普通公民要比那些出生在欧洲或是美利坚合众国的公民穷 35 倍。¹1950 年，埃塞俄比亚人的收入水平是工业化国家普通公民的十六分之一。同样，大约在 1950 年时，美国普通公民的收入是普通尼泊尔人的 19 倍，现在已变成 27 倍。世界上大多数最贫穷的国家正在以多少类似的速度落在后面。主要原因是在过去 50 年里，工业化国家的收入水平稳步增长，而许多发展中国家却没能做到这一点。特别是自 1970 年代中期以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一直在与长时期的停滞和波动交替出现。在近几十年中，只有少数发展中国家以持续速度增长，但最值得注意的，其中包括了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中国和印度。由于仅仅这两个国家就占到了近一半的世界人口，全球不平等的程度正在开始下降（Milanovic, 2005 年）。不过，如果不计入这两个国家，我们会发现，全球不平等现象正在原本就已很严重的程度上继续加剧。

有一种传统经济观点解释了在一个更为一体化的世界经济中，各国之间的收入差别是如何随时间而改变的，上述变化与该传统经济观点大相径庭。1980 年代和 1990 年代，逐渐形成了一种给人很大希望的观点，即给予全球市场更多的空间将缩小穷国和富国之间的收入差距。实际上，尽管在全球范围内，各国都已向全球市场开放了其贸易和金融体系，但是，收入趋同只是发生在少数国家，许多其他国家并没有出现这种情况。事实上，在进行贸易和金融改革时，越是成功的国家越谨慎。联合国及多边和双边捐助者几十年的尝试都志在通过发展援助缩小富国和穷国之间的差距，但即使按最好情况说，这些尝试的成果也都非常有限。

人们应当如何关注越来越严重的全球不平等呢？不平等是个问题，在发展中国家内部尤其如此，这不仅仅是因为不平等象征着不公正，还因为机会不平等会使经济潜力得不到利用，从而更加难以实现千年发展目标。富人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好，受教育程度也越来越高。更高的受教育程度和更多的财

以多种尺度衡量，世界不平等现象非常严重，并处于不断加剧中

……不过，中国和印度的快速增长正在降低国际不平等的程度

不平等是个问题

¹ 这些数据比较了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收入（见表一.1）。

富是“资产”，它会帮助人们提升在社会上的影响力，并更充分地利用各种经济机会。另一方面，不平等也使得没有这些资产的人更加难以走出贫穷。简而言之，不平等会导致更多的不平等。此外，现在有更多的人认为，国家内部较大的收入差距往往会阻碍实现长期的可持续繁荣。近期的一些重要研究报告，如联合国秘书处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05年题为“不平等困境”的报告（联合国，2005年a）和《2006年世界发展报告》（世界银行，2005年a），都详尽地审查了国内日益扩大的收入差距对发展的不良影响。

世界收入不平等的70%要用国家间的收入差距来解释

与此相反，本报告的重点是各国间日益扩大的不平等的原因和可能产生的影响。²我们应当同等地关注世界各国间不断扩大的福利差异，原因包括：第一，审查世界人民的收入不平等时，现有研究显示，70%的不平等要用国家间的收入差距来解释，“只有”30%要用国家内部的不平等来解释（Bourguignon和Morrisson，2002年；Milanovic，2005年）。这些研究还表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国家内部的不平等似乎要更突出些。虽然这些并没有降低国内差异的重要性，但值得注意的是，全球不平等已日益成为一个无处不在的问题。

较富裕国家可以以更好的条件进入资本市场，且能够更好地抵御外部冲击

第二，我们在国家一级所看到的情况，也适用于全球一级。在全球一级，富国所具有的“禀赋”使得它们能够以更优惠的条件进入资本市场，并使它们能更好地抵御全球商品市场的变化。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世界市场还远未达到公平。全球投资者通常更看好拥有更多财富和更佳体制的国家，因为这可以确保较低的投资风险。穷国的经济和出口结构多样化程度低，这使得它们在商品价格变化和国际金融市场冲击面前更为脆弱。和医学领域的情况一样，专利保护可能会增加穷国在进行创新过程中所需支付的成本；此外，大多数的资源都被用到了较富裕国家为打击流行率较高的疾病而开展的新研究上。

较贫穷国家在国际经济决策中的影响力较弱

第三，经济大国和政治大国的实力正在不断增强。而且，从这个意义上讲，规范全球市场的规则很可能会比较不利于发展中国家，因为在为制定那些规则而开展的谈判进程中，这些国家的影响力往往都比较弱。发展筹资问题国际会议上达成的《蒙特雷共识》（联合国，2002年a）认识到了这一趋势，它明确要求国际社会改善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决策中的参与情况。不过，

² 国家间的收入不平等有时会被称作“国际不平等”，以区别于“全球不平等”，后者既包括国家间的不平等，也包括国家内部的不平等（见Milanovic，2005年）。因此，后者指的是世界上所有个体公民间的收入差距。如本报告所述，分析只限于各国平均人均收入间的差异。

这方面的进展一直都非常缓慢。这也影响到了“改正”全球市场不足之处的方式和程度，使得世界市场更加不利于发展中国家。

第四，日益扩大的全球不均衡反过来会损害经济的增长，阻碍较贫穷国家获得全球发展的丰足成果，进而有碍他们利用其全部经济潜力。应当将这种情况看作是整个世界经济的福利损失。低增长反过来会阻挠为消除贫穷而做的努力，而且在某些情况下，它还是区域冲突、国内斗争和社会不稳定的主要原因（Murshed，2006 年）。

忽视日益扩大的国际收入不平等意味着忽视了所有上述现象。《2006 年世界经济和社会概览》研究了增长趋异的模式和国家间的收入不平等，审查了其影响。本章指出了哪些国家正在落后，而哪些国家又正在迎头赶上。随后各章将更加详细地讨论不平等的国际和国内原因，以及可供各国选择的、用以避免进一步落后的政策方案。

本章开始时审查了各国收入增长的趋势，解释了一些特殊的趋同和趋异模式。特别地，确定这些模式的原因时要追溯一段很长的历史；然而，由于数据限制，工作的主要重点将落在 1960 年以来的那些趋势上。这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起点，就是在 1961 年 12 月 19 日，大会宣布了第一个联合国发展十年。几十年来，我们现在所说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间的收入不平等一直在加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黄金年代”（1950 至 1973 年），世界经济大范围增长，多数发展中国家也是如此，这期间，收入水平差异并没有扩大太多。与此相反，1980 年代和 1990 年代，除东亚和南亚外，发达国家和所有发展中国家区域间的国际不平等日益加剧。这些趋异和趋同模式要用增长失败和增长成功来解释，而这些失败和成功案例在时间和空间上似乎总是比较集中。因此，一些邻国的收入水平和经济增长也变得更加极端化。

该章这一节的题目是“增长趋异和人类发展”，它介绍了人类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系，特别强调了高度的国际不平等对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影响，扩大了经济学的重点领域。最后一节着重于不断加剧的全球不均衡的原因和影响。有人认为，世界市场是不平等的，从某种程度上讲，不断加剧的全球不平等是由全球市场的市场缺陷造成的，而且各种全球性的政策和规则并没有充分克服这些缺陷。最后一节还表明，发展中国家仍然非常容易受到外部冲击的伤害，而且，它们的经济增长与发达国家的经济趋势和涨幅密切相关。在很大程度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取决于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美国的状况。不过，随着东亚，特别是中国的持续快速增长，发展中国家可能会

日益扩大的全球不均衡会损害经济增长

1980 年以来，国际不平等日益加剧，只有东亚和南亚的经济增长速度超过了工业化国家

从某种程度上讲，日益加剧的全球不平等是由全球化进程造成的

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当然，我们也无法肯定中国是否能够继续快速发展。不过，如果中国继续发展，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当前不断加剧的全球不均衡模式是否会继续，或者与此相反，中国的持续高速增长是否能够改善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增长机会，进而缓和不等困境。

经济增长趋异模式

标准经济理论难以解释增长趋异的原因

人们发现，许多发展中国家都经历了一段很长的低迷增长期，而且，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只有少数几个国家似乎能够“赶上”发达国家，由于这个原因，人们开始更加关注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标准经济增长模式把主要重点放在了储蓄和投资的作用上，该模式还预测，长期看来，富裕经济体和贫穷经济体的收入水平终将趋于一致。为了解释为什么没有出现所说的趋同，该模式囊括了另外一些增长因素，如人力资本和内生技术变革。

根据这些模块，新的经济增长理论也谈及了各国间收入趋同的问题（例如，见Barro和Sala-i-Martin，1992年）。诺贝尔奖获得者罗伯特·卢卡斯（2000年）推测，在2100年之前，技术和观念的传播将促使收入在各国间进行分配以缩小差距，并使每个人都能“同等的富有，平等地发展”。其他人进行的复杂的经济分析进一步肯定了这个观点，他们所做的类似推测显示，当全球市场可以自由发挥作用时，可能会出现趋同。³这种情况可能会发生，也可能不会发生，要想证明卢卡斯的预测准确与否，还需要等上94年。不过，在此期间，主趋势正好与此相反，处于最底层的经济体的不良经济业绩极大地促进了各国收入分配差异的空前扩大。这种模式也是一种趋异，它不只发生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也发生在经济成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和经历增长崩溃的其他发展中国家之间。

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巨大鸿沟

经济发达地区与世界其他地区之间从未出现过预期的趋同现象

长期观察发现，1820年的经济发达地区——西欧及其西部衍生国（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与世界其他地区之间从未出现过趋同现象。在整个十九和二十世纪，就人均国内总产值而言，1820年经济最发达的那些国家都在

³ 例如，见Sachs和Warner（1995年）的著名论文，他们认为，开放贸易的发展中国家的收入水平将无条件地趋同于富裕国家的收入水平。

以较快的速度增长。日本是个值得关注的例外情况，该国从 1890 年代起开始增长累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现了一段时期的惊人增长，到 1970 年，其收入水平已等同于其他工业化国家的收入水平。

以购买力平价（作此类比较通常会用到）为单位，1820 至 2001 年间，发达国家将人均国内总产值增加了 19 倍（见表一.1）。⁴世界其他地区的业绩则相对比较有限。同一时期，东欧国家的平均收入增加了 9 倍，拉丁美洲和亚洲国家则分别增加了 8 倍和 7 倍。非洲各国的福利改善情况更有限：它们 2001 年的人均国内总产值只有 1820 年的 3.5 倍。因此，以较宽视角纵观整个时期，明显可以看出，在过去两个世纪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收入水平已出现分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二十五年里（1950 至 1973 年），差距扩大的速度有所放慢，在这期间，一些地区（东欧和中欧与亚洲）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以中等速度赶上了发达国家。如上文所述，由于世界上的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出现了快速增长，这段时间有时也会被称作黄金年代。当时，人们都非常乐观，因为多数人认为，大范围的良好经济形势是第一个标志，之后发展中国家将出现持续增长，各国间也将出现趋同。

1950 至 1973 年，收入差距的扩大速度比较缓慢

表一.1

1820 至 2001 年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大分化

	人均国内总产值 (1990 年国际 Geary-Khamis 美元)						与发达国家的人均国内总产值比					
	1820	1913	1950	1973	1980	2001	1820	1913	1950	1973	1980	2001
发达国家	1 204	3 989	6 298	13 376	15 257	22 825						
东欧	683	1 695	2 111	4 988	5 786	6 027	0.57	0.42	0.34	0.37	0.38	0.26
前苏联	688	1 488	2 841	6 059	6 426	4 626	0.57	0.37	0.45	0.45	0.42	0.20
拉丁美洲	692	1 481	2 506	4 504	5 412	5 811	0.58	0.37	0.40	0.34	0.35	0.25
亚洲	584	883	918	2 049	2 486	3 998	0.48	0.22	0.15	0.15	0.16	0.18
中国	600	552	439	839	1 067	3 583	0.50	0.14	0.07	0.06	0.07	0.16
印度	533	673	619	853	938	1 957	0.44	0.17	0.10	0.06	0.06	0.09
日本	669	1 387	1 921	11 434	13 428	20 683	0.56	0.35	0.30	0.85	0.88	0.91
非洲	420	637	894	1 410	1 536	1 489	0.35	0.16	0.14	0.11	0.10	0.07

⁴ 数据根据 Maddison 编制（1995 年；2001 年）。

	增长 倍数	人均国内总产值增量的年均 复合增长率（百分比）				
	1820- 2001	1820- 1913	1913- 1950	1950- 1973	1973- 1980	1980- 2001
发达国家	19.0	1.3	1.2	3.3	1.9	1.9
东欧	8.8	1.0	0.6	3.8	2.1	0.2
前苏联	6.7	0.8	1.8	3.3	0.8	-1.6
拉丁美洲	8.4	0.8	1.4	2.6	2.7	0.3
亚洲	6.9	0.4	0.1	3.6	2.8	2.3
中国	6.0	-0.1	-0.6	2.9	3.5	5.9
印度	3.7	0.3	-0.2	1.4	1.4	3.6
日本	30.9	0.8	0.9	8.1	2.3	2.1
非洲	3.5	0.4	0.9	2.0	1.2	-0.1

资料来源：
Maddison（2001年）与联合国/经社部。

注：
1990年国际 Geary-Khamis 美元是用以对产出进行估价的购买力平价，它是根据一种为界定国际价格而制定的特殊方法计算的。若想了解以 Geary-Khamis 美元为单位的购买力平价的计算方法，可登录 http://unstats.un.org/unsd/methods/icp/ipc7_htm.htm。

Maddison（2001年）详细说明了国家分组情况。

在这段时间里，所有区域的人均国内总产值的平均增长速度都至少达到了2%（见表一.1最下面那部分）。印度是惟一个增长速度慢于2%的发展中国家，其年增长率为1.4%。增长最快的经济体是日本，其人均国内总产值的增长率达8.1%，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其次是东欧、亚洲和苏联，增长率均达到了3.4%甚至更高。拉丁美洲的增长较缓慢。你可能会注意到，拉丁美洲和前苏联是仅有的两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和期间（1913至1950年）从某种程度上赶上发达国家的地区；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发展中国家确实出现了某种程度的趋同（见表一.1）。即使是在黄金时代，相对于发达国家，非洲的趋异现象也仍在继续。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经济增长向上趋异”的进程（见方框一.1），因为虽然某些发展中国家以慢于工业化国家的速度实现了相当令人满意的发展，但是，对它们而言，收入差距还是在扩大。

发展中国家普遍出现的强劲增长势头在1980年左右开始消失

随着第二次油价上涨、1970年代末世界利率突然增加、1980年代非石油商品价格下降，相对较好的经济形势也结束了。这些因素引发了1980年代的债务危机，危机对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的打击尤为严重。虽然在两次油价上涨之间，增长崩溃、特别是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增长崩溃的频率不断增加，但是，还是这些外部冲击的综合作用引发了1980年代发展中经济体的大量增长崩溃。因此，随着拉丁美洲、非洲、东欧和苏联相对于发达国家更加落后，

在 1980 年代，开始出现了一种新的趋异趋势，只有这次趋异是由自身经济不增长造成的。

“向下趋异”的表现有，拉丁美洲和非洲的人均国内总产值年均增长率降到了 1% 以下，前苏联已出现负增长。在前苏联，增长崩溃实际上发生在 1990 年代从社会主义转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亚洲的产出增长也有所放缓，不过，该地区的人均收入仍有适度增长，增长率为 2.4%。中国每年都以 5.3% 的速度快速增长；印度的人均产出也不再以缓慢而“四平八稳”的速度增长，它开始以 3% 这一新的、更加稳定的速度增长。各国增长情势日益趋异，世界各国（不包括中国）间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高。

方框一. 1

一些关键概念的定义

收入和经济增长趋异：收入趋异和经济增长趋异是两个不同但相互关联的概念。根据我们的理解，前者指两国收入（或国内总产值）差距扩大。相反，经济趋同则意味着两国收入差距缩小。

另一方面，经济增长趋异表示两个经济体的经济增长率存在差距。经济增长趋异可能会导致收入趋同，也可能会导致收入趋异，这取决于跟随国或领头国中哪类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更好一些。出现的几种可能结果都是由各经济体不同的初期收入水平和增长水平综合作用形成的。

Ben-David（1995 年）把较贫穷国家赶上较富裕国家的状况称作“经济向上趋同”，把较富裕国家经济增长放缓或者出现负增长、致使增长情况趋同于较贫穷国家的状况称作“经济向下趋同”。

“经济增长向上趋异”指各国家济都有相当增长，但富国的经济增长得要快一些。

“经济增长向下趋异”指一国家/区域的经济增长放缓或出现负增长，因此所述国家或区域落在了队伍后面。《2006 年世界经济和社会概览》着重论述了过去几十年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普遍经历过的这种趋异所产生的影响。

趋同组群：趋同组群是指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人均国内总产值达到类似水平的一组国家。这种组群处于收入类别的末端或中间。向上趋同或向下趋同都有可能产生这些结果。出现向下趋异时，领头国加入较底层的国家组群；出现向上趋同时，跟随国以较快的速度增长，最终加入较富裕国家组群。

方框一.1 (续)

飞雁式发展形态: 在1930年代, Kaname Akamatsu 在一篇日语文章中首次用到了飞雁式发展形态这一术语, 它意在描述落后国在工业化方面的追赶进程的动态。根据日本国家政策研究的说明, 追赶进程的动态包括三种现象: 第一, 特定发展中国家内部的生产发展, 由于国内市场不断扩大, 一个行业从进口替代发展成生产, 之后又发展为出口生产; 第二, 工业化进程有这样一种趋势, 即从日益多样化和不断升级的消费品逐渐转向资本货物, 换句话说, 即从相对简单的产品转为更复杂的产品; 第三,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各行业的重新定位, 因为后者已开始追赶前者。为使国际社会关注飞雁发展模式, Okita (1985年) 做了大量的工作。登录 <http://www.grips.ac.jp/module/prsp/FGeese.htm>。

增长崩溃: 根据所选择的方法和限度, 增长崩溃是指国内总产值增长率突然下降。“增长停滞”的定义是在特定的几年里, 经济增长率持续较低或为负增长(见 Reddy 和 Minoiu, 2005年)。

依赖途径: 依赖途径指增长和发展成果取决于历史上已经确定的体制建设、宏观经济政策及技术和人类发展方面的一系列特殊事件。从实质上讲, 依赖途径意味着以往变革和决定所形成的趋势会影响现有决定和变革的效力。依赖途径的特殊形式是可以界定的。例如, Ocampo 和 Parra (2005年) 都提到了“动态规模经济形成过程中的依赖途径”, 认为技术学习和生产经验之间似乎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从广义上讲, 即边做边学)。这些过程的结果反过来又取决于另一过程, 如销售网络的发展和公司信誉的建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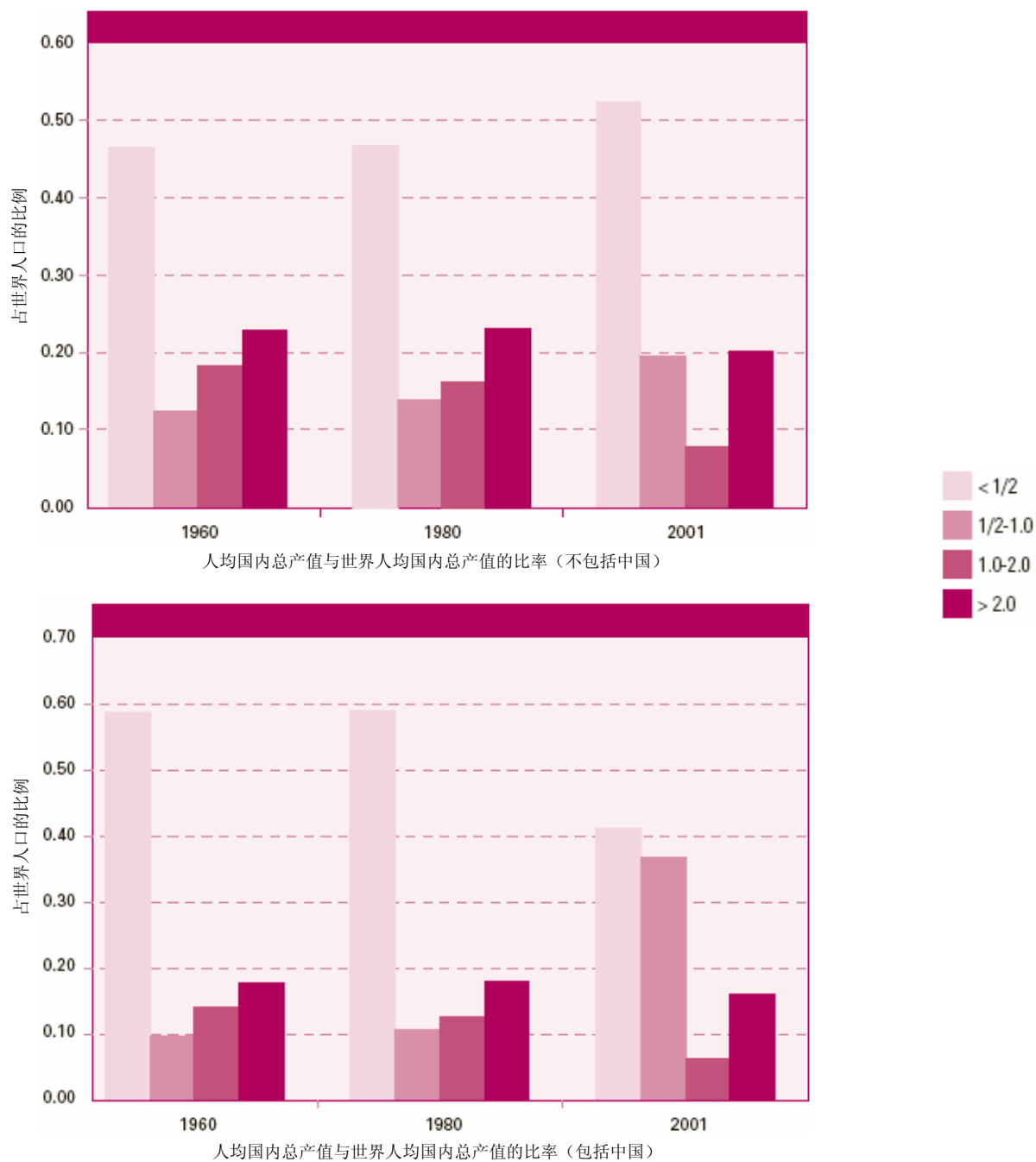
世界收入分配正在以“双峰”形式两极分化

如果我们把中国排除在外, 1960至1980年间, 生活在人均国内总产值不足世界平均水平一半的国家的人一直都占世界人口的47%。不过, 到2001年, 这一比例增加到了52%(见图一.1的上半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讲, 正如一项研究所指出的那样, 在富国和穷国之间两极分化的世界收入分配呈现出了“双峰”状(Quah, 1996年), 或者说, 如另一些人所说, 分配中已没有“中等”国家(Milanovic, 2005年; Milanovic 和 Yitzhaki, 2001年)。图一.1仅从某种程度上肯定了这一点。中等国家正在消失的概念特别适用于上中等收入国家。

因此, 黄金年代之后, 全球收入分配动态的一个主要的新因素就是发展中国家集团内部不断增长的趋异性。许多中等收入国家或是向阶梯上方移动, 赶上了富裕国家; 或是向下移动, 成了低收入国家的一员。在解释这些动态时, 很大一部分要归因于增长成功和增长失败往往都集中发生在特定时间和特定区域。

图一.1

1960 年、1980 年和 2001 年的世界收入不平等状况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 2005年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 联合国/经社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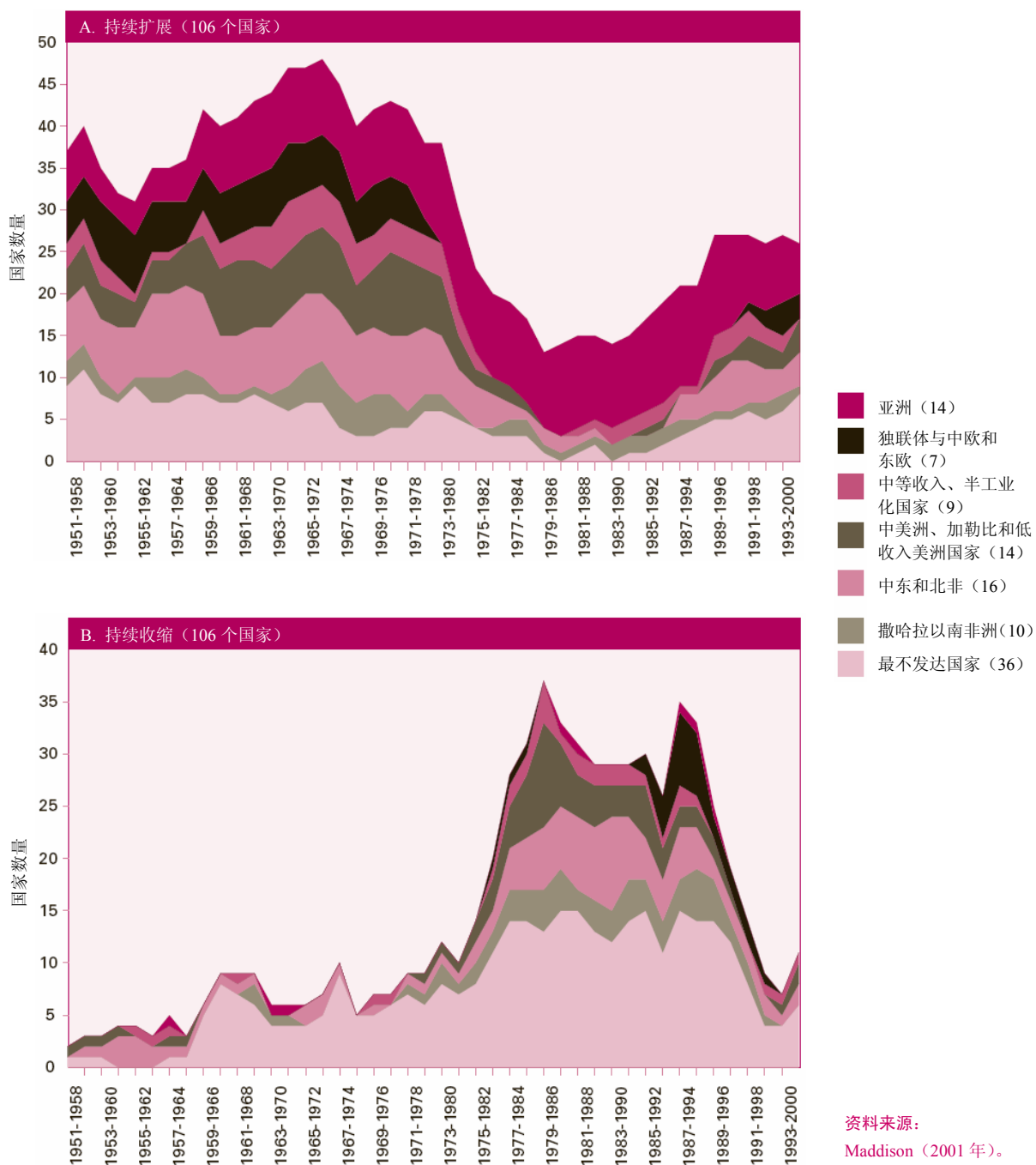
图一.2

1950-2001年发展中国家和经合组织成员国的人均国内总产值增长情况



图一.3

1951-2000 年按区域或同类国家数目分列的人均国内总产值持续扩展或收缩情况



增长成功和增长崩溃集中在某段时间发生

“黄金年代”过后，出现了双重趋异模式

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将近50个发展中国家经历了持续增长，不过此后，只有20个国家出现持续增长

黄金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的增长模式变得更加多样。一种双重趋异模式出现了，一方面，就经济增长而言，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类别，从整体上落后于发达国家，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集团内部的增长经历也有很大差异（见图一.2）。从某种程度上讲，发展中国家或地区不断趋异的增长经历是由一些成功的增长经历造成的，如大韩民国、中国台湾省、新加坡和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它们的经济增长速度都超过了其他国家。不过，过去25年里所看到的双重趋异与增长崩溃频率激增和增长成功案例减少有着很大的关系。

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本分析所包含的106个发展中国家中，有将近50个经历了持续扩展（即连续四年的稳定发展期，人均增长率超过2%）。与此相反，在过去25年里，只有20个发展中国家实现了持续扩展（图一.3A）。虽然在黄金年代，发展中国家普遍经历了持续增长，但是，在1980年代，除亚洲以外，这些现象基本上都消失了。1990年代，持续增长又开始频繁出现，不过，与黄金年代相比，其水平低了很多。⁵

经历加速增长期的国家数量已有所减少，表现包括增长失败或“持续收缩”（即连续四年人均国内总产值负增长）的情况不断增多。第一次油价上涨之前，很少出现这类增长失败。在1970年代，两次油价上涨之间，这种情况开始频繁出现，主要影响到了最不发达国家，特别是非洲的最不发达国家。之后，在1980年代“失落的十年”中，持续收缩开始在发展中国家扩散，并一直持续到了1990年代（图一.3B）。⁶

⁵ 该分析的主要依据是Ocampo和Parra（2005年）提供的证据。Hausmann、Pritchett和Rodrik（2004年）也发现了类似的模式。他们找寻了持续至少8年的经济快速增长实例，并提供了1950-1998年间经济快速增长的初始年份和经历国（同上，表2.1）。他们假定，如果在一次事件持续的最少七年时间里，有四年属于某一个十年，那么，称这个事件属于那个十年。依此计算，他们在1960年代发现了23次事件，在1970年代发现了30次，但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他们分别只发现了14次。

⁶ 见Ocampo和Parra（2005年），以及Reddy和Minoiu（2005年），他们报告了与此类似的结果。后面这份研究报告审查了实际收入停滞的情况，即人均实际收入增长可忽略不计或为负的情况。Reddy和Minoiu发现，1960年代至1990年代期间，在可以获得数据的所有国家当中，经历了停滞期的国家所占比例大幅、稳步增加，从1960年代的12%和1970年代的22%，增加到了1980年代的50%和1990年代的38%。

总之，在过去的 45 年里，增长成功和增长崩溃经常会集中在特定时间段发生。增长文献对国内因素进行了大量详尽的研究，但是，国内因素并不是造成许多国家同时出现一种共同模式的惟一原因。事实上，全球经济发展在促成这种结果的过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近几十年里，这些发展状况是 1980 年前后两次大的外部冲击造成的，当时实际利率猛增，对许多发展中国家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而且非石油初级商品出口贸易长期大幅下降。

增长成功和增长崩溃集中发生在特定时间段

1973 年的油价上涨打乱了发达国家经济体的正常运作，产生了通货膨胀和紧缩，此外，也对发展中国家产生了重要影响（通过工业化国家的出口需求，产生了消极影响，不过，由于外部融资条件暂时放宽，也产生了一些间接惠益）。然而，油价不稳对不同发展中国家集团的影响也各不相同，因此，1980 年左右只是出现了减速发展，而非更普遍的衰退（见表一.1 和图一.4）。两次严重的、大大出乎意料的冲击解释了发展中国家普遍衰退的原因。第一个是 1979 年利率冲击的长久影响。美国的实际利率（以 10 年期国库债券的利率为基准）从 1979 年的-1.8%增长到了 1981 年的 3.6%，并在 1984 年达到了峰值 8.2%。由于 1979 至 1981 年间发展中国家支付的平均风险溢价（高于伦敦银行同业拆放利率）实际从 2.5 个百分点提高到了 22 个百分点，发展中国家的借款成本更高了。由于从之前宽松的外部融资条件中受益，发展中国家所遭遇的冲击显得非常突然且相当严重，并致使许多国家都开始面临收支问题。第二个冲击是贸易的结构性衰退。1920 至 1980 年间，非石油商品的实际价格经历了长时期的波动，且无明显趋势，之后，便出现了长期下跌，跌幅超过 30%（见图一.5）。

大规模普遍衰退出现在 1980 年左右

贸易条件和利率冲击都是发达国家宏观经济调整的结果。不过，它们与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融资的盛衰循环也有一定联系。全球经济的这些现象结合在一起，对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趋异轨迹产生了决定性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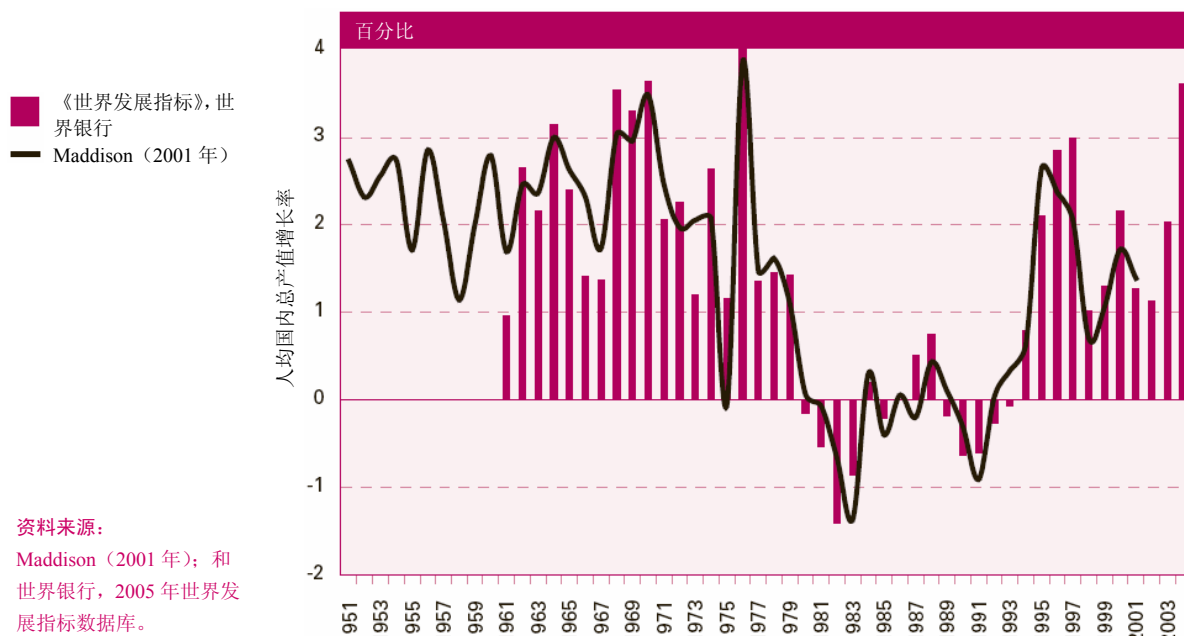
然而，这些冲击对全球商品和金融市场产生强烈影响并不意味着区域和国家因素不重要。相关区域/国家因素与全球循环特定阶段的特殊因素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一个国家在整个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扩展期是否会经历快速增长，或者是它能否在衰退期缓和或避免增长崩溃，取决于国内条件与该国受全球或区域市场动态影响的方式之间的相互作用。

各国应根据国内的具体条件进行调整，以适应全球性波动

例如，在这方面，宏观经济政策能够在减少外部冲击的负面影响方面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不过，这并不一定能够轻松实现，因为对各国而言，消除这类冲击影响的“政策空间”各不相同。从拉丁美洲和东亚的宏观经济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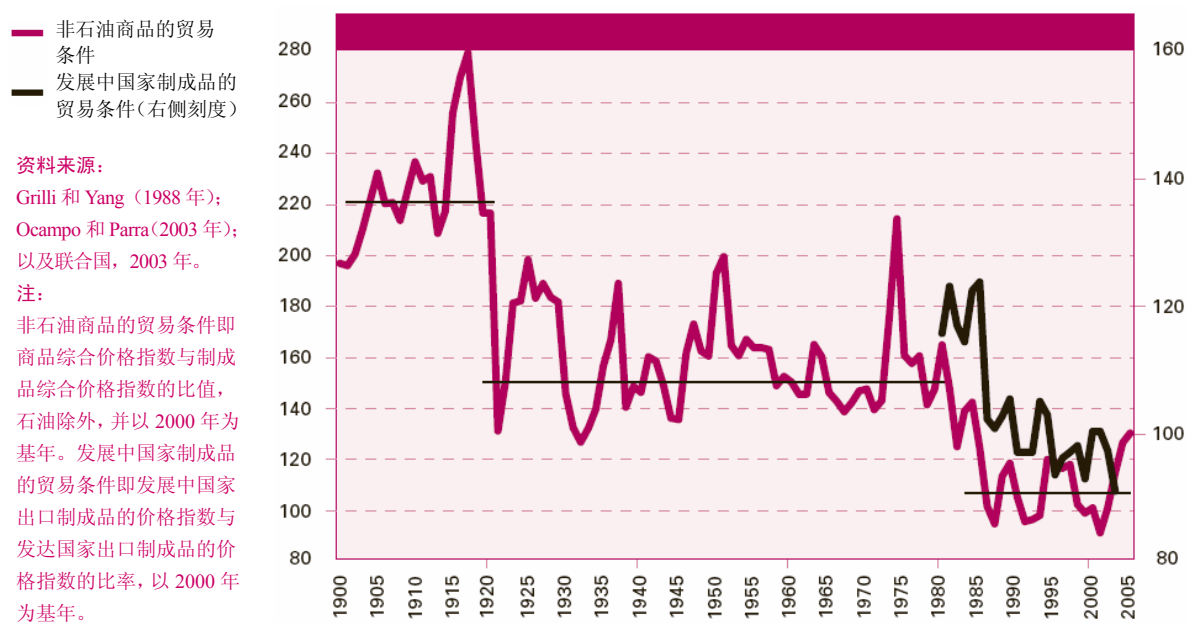
图一.4

1951-2003年106个发展中国家的人均国内总产值增长情况



图一.5

1900-2005年非石油商品和发展中国家制成品的贸易条件



策对比中可以明显看出这一点，由于在政策的选择和限制方面差别很大，它们在债务危机以来的宏观经济调整也各不相同。

各区域内部也存在差异。例如，亚洲金融危机使得东亚的两个最贫穷国家，柬埔寨和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经历了严重的经济衰退。相反，泰国和大韩民国，两个最先受到危机冲击的国家，却很快实现了复苏。这些国家得到了外部金融援救活动的支持，同时，其恢复也得益于反周期宏观经济政策的传统和进行金融管制调整的体制框架。各国货币的严重贬值推进了已建立的出口行业的增长（见第三章）。在柬埔寨和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对策一定更不完善、更棘手，因为这些国家的货币是与泰铢联系在一起的。泰国货币贬值 70% 产生了极大的通货膨胀的影响，致使实际收入大幅下降，但是，由于外部资金不足，财政制度极不完善，也没有据以执行反周期财政和货币政策的文件，这些影响都无法抵消。第四章以较长篇幅讨论了政策空间方面的不平等问题。

增长成功和增长崩溃的地理集中性

增长成功和增长崩溃不只是集中发生在某些特定时期，还时常发生在世界某些特定区域。成功增长的示例大多发生在东亚，而增长崩溃大多发生在非洲。此外，就区域各国而言，拉丁美洲各国的增长绩效十分相同。不过，与世界其他区域相比则有不同。因此，在国际不平等不断扩大（趋异）的同时，各区域内部的增长模式却愈加相似（趋同）。“区域趋同组群”的存在引起了特别关注，因为它表明，在解释全球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时，初始条件是一个越来越重要的因素。区域各国的能力、态度、社会体制和经济潜力各不相同，致使经济绩效长期存在差异，如果不消除这种差异，全球不对称的情况将会一直存在下去。

表一.2 证实，1980 年以后，中国的快速发展总体降低了国际收入不平等的程度，不过，如果不考虑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这一趋势仍在明显上升。从很大程度上讲，这种上升趋势是由地理区域间的差异不断扩大造成的。如表一.2 所示，84% 的国际收入不平等（不包括中国）要用区域间的差异来解释，只有 16% 要用区域集团内部的差异来解释（见表一.3）。⁷ 在几十年里，

经济增长和经济崩溃
具有区域集中性

84% 的国际收入不平
等是区域间的差异造
成的

⁷ 附件的表 A.1 对国际不平等的锡尔系数进行了更详细的分解，显示出了各区域对总体不平等程度的影响。所显示的不平等数值仅考虑了国家间的收入差异，没有考虑国内的差异。该表还证实，绝大多数的国际收入不平等要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异来解释。

区域内部的收入差距已变得更加突出，而且在解释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收入不平等时，这方面的因素相对来说更加重要。

表一.2

1960-2001年国际不平等的锡尔系数分解

	国际不平等的锡尔系数			对国际不平等的影响（百分比）		
	1960	1980	2001	1960	1980	2001
所有国家						
区域间	0.45	0.51	0.45	87	91	85
区域内部	0.07	0.05	0.08	13	9	15
共计	0.51	0.56	0.53			
除中国以外的所有国家						
区域间	0.35	0.42	0.48	84	89	84
区域内部	0.07	0.05	0.09	16	11	16
共计	0.42	0.48	0.56			

资料来源：联合国/经社部，根据 Maddison 编制（2001年）。更多的详细情况见附件表 A.1。

注：不平等指数只考虑了各国间的不平等，没有考虑国家内部的不平等。可根据各国的人口对不平等措施进行加权调整。

表一.3

1960-2001年发展中国家不平等的锡尔系数分解

	发展中国家不平等的锡尔系数			对发展中国家不平等的影响（百分比）		
	1960	1980	2001	1960	1980	2001
所有国家						
区域间	0.25	0.26	0.08	81	74	35
区域内部	0.06	0.09	0.15	19	26	65
共计	0.32	0.36	0.23			
除中国以外的所有国家						
区域间	0.17	0.17	0.12	70	64	38
区域内部	0.07	0.10	0.19	30	36	62
共计	0.24	0.27	0.31			

资料来源：联合国/经社部，根据 Maddison 编制（2001年）。获取更多的详细情况见附件表 A.2。

注：不平等指数只考虑了各国间的不平等，没有考虑国家内部的不平等。可根据各国的人口对不平等措施进行加权调整。

趋同组群似乎都集中在收入类别的两端。有一个是较富裕国家的趋同组群，它们主要位于西欧和北美；还有一个是较贫穷国家的趋同组群，它们主要位于非洲，这两个组群都在不断吸收新成员。一份研究报告（Ben-David，1995 年，第 12 页）评论说：“较富裕的组群呈现出向上趋同，在那里，较贫穷的成员实际上赶上了最富裕的成员。在最贫穷国家当中，出现了向下趋同，趋同组群中境况较好的成员以极低的速度增长，导致了收入差距的缩小。”一些欧洲国家，如希腊、西班牙、葡萄牙和爱尔兰（最近），都是向上趋同于工业化国家组群的例子。它们的地理位置和与欧洲联盟（欧盟）成员身份有关的地理政治学产生了积极的外溢效应；总之，在追赶过程中，技术转让、贸易强化和一体化政策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撒哈拉以南非洲和拉丁美洲次区域（特别是那些由几个安第斯美洲和中美洲国家组成的次区域）出现了向下趋异，原来较富裕的国家倒退到了周围邻国的较低收入水平。

趋同组群似乎都集中在收入类别的两端

图一.6A、B 和 C 以画面简单介绍了俱乐部的地理构成，并按照国家人均收入（国内总产值）与世界平均水平的比率，将 164 个国家分组。根据关于这一指标的得分，各国被归入四个组群之一。收入不足人均世界总产值一半的国家被归入了本图所指定的最贫穷国家组群。下中等收入国家组群包括那些人均国内总产值高于世界平均收入的一半、但低于平均收入本身的国家。上中等收入国家的人均国内总产值要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但低于人均世界总产值的两倍。富裕国家指人均国内总产值是平均收入水平两倍以上国家。

该图列示的结果证实了上述说法，即趋同发生在两极，也就是说，一方面，发生在富裕国家组群成员之间，另一方面，发生在贫穷国家组群成员之间，这表明增长的两极分化问题已更加严重。1960 年，63 个国家属于赤贫国家，其中，43 个在非洲，18 个在亚洲，2 个在拉丁美洲。这类国家的数目在 1980 年减少到了 58 个，但大多数仍在非洲。脱离赤贫的国家包括大韩民国、泰国、突尼斯、多米尼加共和国和阿曼。虽然斯威士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也门随后又回到了赤贫国家的行列，但在前半段时间里，它们也曾摆脱过赤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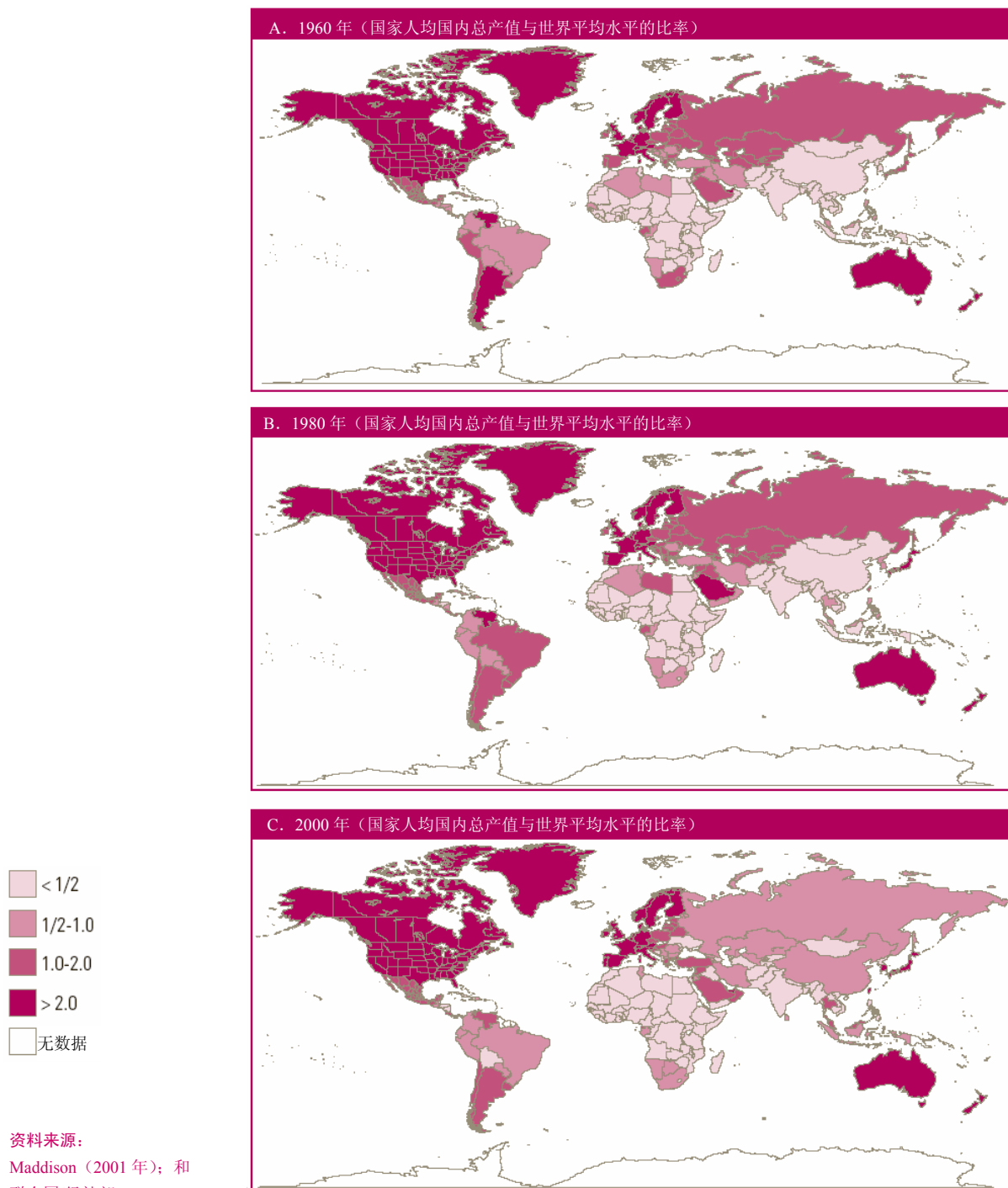
1960 至 1980 年期间，属于赤贫一类的国家数目有所减少

由于在 1980 年代和 1990 年代的部分时间里，发展中国家的增长绩效普遍较差，赤贫国家数目在 2001 年增加到了 75 个，独立国家联合体（独联体）几个成员国和一些拉丁美洲国家进入这一类别。这些拉丁美洲国家包括：在 1980 年代经历了一个时期恶性通货膨胀的玻利维亚，以及在 1970 年代和 1980 年代经历了长期内乱的萨尔瓦多和尼加拉瓜。增长的两极分化还反映在收入

在 1980 年代和 1990 年代，低收入国家集团的数量有所增加

图一.6

1960 年、1980 年和 2000 年 164 个国家人均国内总产值的地理分布



类别的另一端，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日本、以色列、大韩民国、葡萄牙、波多黎各、新加坡、斯洛文尼亚、西班牙和爱尔兰在内，富裕国家和地区的数字已从 1960 年的 22 个增加到了 2001 年的 29 个。与此相反，阿根廷、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共和国、卡塔尔和科威特降到了一个较低的收入类别。

1960 年，除中国台湾省、新加坡、菲律宾、马来西亚和日本外，东亚和南亚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属于赤贫国家之列，当时，它们的人均国内总产值已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到 2001 年，所有这些国家几乎都脱离了赤贫国家行列。次区域趋同组群似乎已经形成。到 1980 年，采取积极的出口导向工业政策并实现持续增长后，大韩民国赶上了缓慢发展的经济体马来西亚和菲律宾。虽然泰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增长速度低于大韩民国，但其人均国内总产值的增长速度也很快。

在这段时间里，新加坡、中国的台湾省和日本都超过了富裕国家组群的收入阈值。到 1970 年，日本已迈入工业化国家之列，其人均国内总产值是世界平均收入的三倍多。该区域出现了一种“飞雁式增长形态”（定义见方框一.1）：日本居领先地位，其次是一级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即大韩民国、中国台湾省和新加坡；以及二级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即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和越南，然后是中国。一旦开始运行，即使领先国（日本）放慢增长速度，飞雁式增长形态也仍会继续存在，还可以说，在近几年里，出现了一种以中国为主导的新形态。不过，随着中国和印度——那些年里最有活力的两个中心——的浮出，亚洲的增长模式已经完全改变了。

出现了一种“飞雁式增长形态”，领先的是日本，随后是一级新兴工业化经济体

1980 至 2001 年期间，南亚的孟加拉国、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的人均增长率几乎一直都是 2% 或者更高。该区域只有菲律宾的情况令人十分失望，它未能摆脱下中等收入国家的地位。

其他各洲的多样化程度略高一些。尽管方向不同，但区域趋同是大势所趋，原本较富裕的国家因增长缓慢而开始向下趋同。1960-1980 年期间以及到 1990 年社会主义集团解散，独联体与东欧和中欧国家都出现了向上趋同之势（图一.6 未显示）。在向市场经济转型期间出现了两种趋势。一方面，中欧国家和如今已加入欧盟的波罗的海国家仍然属于上中等收入国家。另一方面，其他国家的人均国内总产值出现大幅下跌，致使它们向下趋同，进入较低的国家之列。

东欧的多样化增长

拉丁美洲的增长波动

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黄金时代，巴西的经济实现了强劲扩张，人均年增长率达 3.8%，到 1980 年，其收入水平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墨西哥亦是如此。另一方面，阿根廷、洪都拉斯和秘鲁进入了较低收入国家之列。图一.6B 显示，阿根廷的收入水平已接近巴西、智利、哥伦比亚、乌拉圭和墨西哥，这些国家的人均国内总产值均为世界人均总产值的一至两倍。阿根廷的平均生活水平曾经是 1960 年世界平均水平的两倍多。对整个区域而言，1980 年代失落的十年和 1990 年代的几次金融危机抵消了早期增长收益的很多影响，与工业化国家收入差距的扩大速度也不再像先前增长时期那样逐渐变缓（见图一.6C）。这期间，除智利外，所有国家的国内总产值增长率都出现了明显下降。

非洲的向下趋同

相比之下，在过去的 40 年里，非洲大陆几乎所有国家的增长速度都比较缓慢，之后，便出现了收入水平向下趋同的情势。截至到 2001 年，只有非洲南端，包括博茨瓦纳、毛里求斯、南非和纳米比亚，以及西海岸的加蓬和北部的突尼斯没有进入最低收入国家之列。在这些国家中，只有博茨瓦纳、毛里求斯和突尼斯实现了长期稳定增长。博茨瓦纳的成功要归因于其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合理的体制（见第四章）。1970 至 2003 年期间，毛里求斯的人均国内总产值每年增长 4.2%。这主要是因为它采取了一些贸易保护措施，并改变了发展战略的方向，把重点从初级部门转移到了加强工业部门上（见第三章）。在此期间，其他几个国家出现了积极但非常缓慢的增长，这包括肯尼亚、加纳、乌干达、莫桑比克、津巴布韦和毛里塔尼亚。

西欧的向上趋同

最后，西欧和西部衍生国变得更加相似，也只有在这里，才出现了向上趋同的结果，1960 年较贫穷的国家到 2001 年都已进入该组群。最近，工业化国家组群的年人均增长率已下降 2%。

增长趋异和人类发展

预期寿命和教育方面的巨大差异仍然存在

除收入方面存在严重的不平等外，其他福利指标也有很大差异。2002 年，在日本（82 岁）、瑞士（80 岁）或美国（77 岁）出生的儿童的预期寿命是在赞比亚（37 岁）、马拉维（38 岁）或博茨瓦纳（38 岁）出生的儿童的两倍多。同样，各国的教育机会也存在很大差异。就以上学年数衡量的教育程度而言，在撒哈拉以南非洲不足 4 年，在发达国家却超过 12 年。和收入方面的情况一样，不同国家公民在教育 and 保健方面的主要差异基本上都要大于国家内部各种层次间的差异。

虽然这些差异仍然非常大，但在过去 40 年里，世界大多数地区都在实现更高的预期寿命和更多的教育机会方面取得了进展。实际上，与收入成果相比，各国在保健和教育方面的成果更具趋同性。例如，在 1960 年，有 73 国公民的预期寿命低于 50 岁，45 国公民为 65 岁甚至更高。到 2002 年，出现了“双峰状”；美国的人口数据显示，新生儿预期寿命低于 50 岁的国家减少到了 32 个（全部位于撒哈拉以南非洲），65 岁以上的国家则增加到了 128 个。同时，在 1980 年代和 1990 年代，预期寿命的两极分化更加严重，这主要是因为艾滋病毒/艾滋病的流行夺走了很多非洲人的生命。教育领域也取得了明显进展：在 1960 至 2002 年期间，所有公民的平均上学年数几乎都翻了一番，从 3.4 年增加到了 6.3 年，而且，各国间的差异也缩小了（Schady, 2005 年）。不过，对许多国家而言，福利指标方面的趋同速度自 1980 年以来明显放缓，并于 1990 年代初期出现了停滞（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5 年）。

与收入增长情况相比，保健和教育方面的改善要更普遍些

因此，虽然全球收入不平等也反映在其他福利指标上，但是，教育和保健成果方面的趋异已变得不那么明显。就人类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而言，这能说明什么呢？把各国的预期寿命和婴儿死亡率与人均收入水平联系在一起，我们会发现，发展水平较低时，保健状况会随着收入的增加而有很大改善，但当人均收入水平高于某一限值（根据图一.7，以 2000 年定值美元计，约为 3 000 美元）时，这一改善过程就会有所减缓。教育领域也存在这种非线性关系。

经济增长和人类发展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它很可能是一种双向关系，说明要在这两方面取得持续进展，就必须使之得到改善。⁸经济体可能会发现自己处于一个良性循环中，经济增长与人类发展相辅相成；或者，它们可能会陷入恶性循环。根据 84 个国家的实验证据，Ranis 和 Stewart（2005 年）发现了另外两种国家特性：一种以强势的人类发展与较差的经济增长为特色，作者称其为倚重人类发展型；另一种则以较差的人类发展和强势的经济增长为特色，即倚重经济增长型。⁹研究时所选择的大多数国家或是经历了良性循环，或是经历了恶性循环，只有一个国家属于倚重经济增长型国家集团，其他一些都呈现出了倚重人类发展的模式。以各种增长趋异模式为背景，我们应当关注在这 40 年里，哪些国家是在向良性循环发展，哪些国家不是，而且实际进入了其他国家类别，以及哪些国家成功地摆脱恶性循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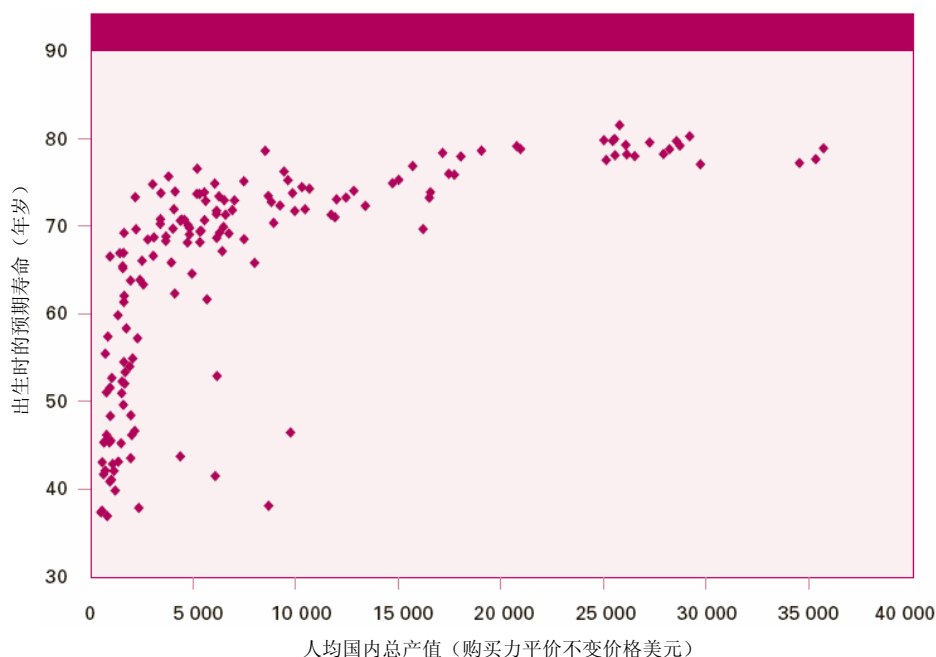
经济增长和人类发展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

⁸ 重新研究过相关文献之后，Ranis 和 Stewart（2005 年）也强调了这一点。

⁹ 用来代替总体人类发展指数的指标是婴儿死亡率的下降率。

图一.7

2002年收入水平与预期寿命之间的关系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2005年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和联合国/经社部。

东亚国家经历了人类发展和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

研究结果显示，大韩民国和新加坡是仅有的两个一直处于良性循环的国家。其他一些国家，大部分位于亚洲，也成功地转入良性循环国家之列，即中国，在1970年代；越南和马来西亚，在1990年代；以及智利，在1990年代。上文确认，所有这些国家都成功地实现了向上趋同。拉丁美洲的债务危机或是1990年代金融危机之后，其他许多国家都从良性循环转变为倚重人类发展型。研究还发现，1960年代就已处于恶性循环中的国家往往都没有发生什么改变，这更强化了上文讨论过的低平衡增长陷阱之说。只有那些最初受到内战影响的国家在冲突结束后发展到了一个更高的水平。这些结果表明，许多倚重人类发展的国家都成功地进入了经济持续增长阶段，并向上趋同，但是，那些倚重经济增长的国家并非如此。然而，并不是所有人类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国家都实现了经济的长期快速增长，这表明人类发展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之一。

人类发展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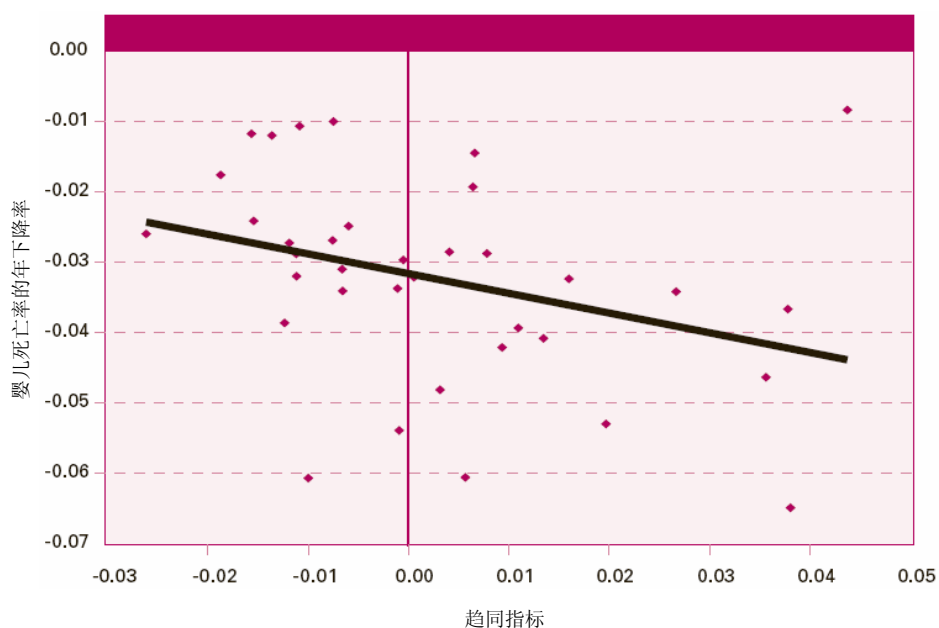
图一.8 力求表明1960至2003年期间趋同与人类发展之间的关系。该图对Ranis和Stewart（2005年）的观点做了一点修改，用一个趋同参数代替了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趋同参数反映出了所述国家人均国内总产值与一般人均

世界总产值之比每年的变化情况。人类发展指标用于计量婴儿死亡率（每 1 000 名活产的婴儿死亡数）每年的变化情况。负斜率表明，收入快速趋同可以加速婴儿死亡率的下降。

各国收入不平等的加剧对人类发展产生了间接影响。相对收入减少的国家将更多地受到全球不均衡的影响，例如，其获得外部资金的机会更少，国际议价能力也会更弱（见下文），这将影响到该国的增长潜力。反过来，如果低增长率致使政府收入缩减，进而使得人类发展所需资源的可获得性降低，那么，它可能会对国家内部的收入不平等产生消极影响。人力资本投入不足将产生反作用，致使经济增长放缓，趋异加重。

图一.8

1960-2003 年收入趋同与婴儿死亡率下降之间的关系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2005 年世界
发展指标数据库；和联合
国/经社部。

不平等的长期存在及其对世界发展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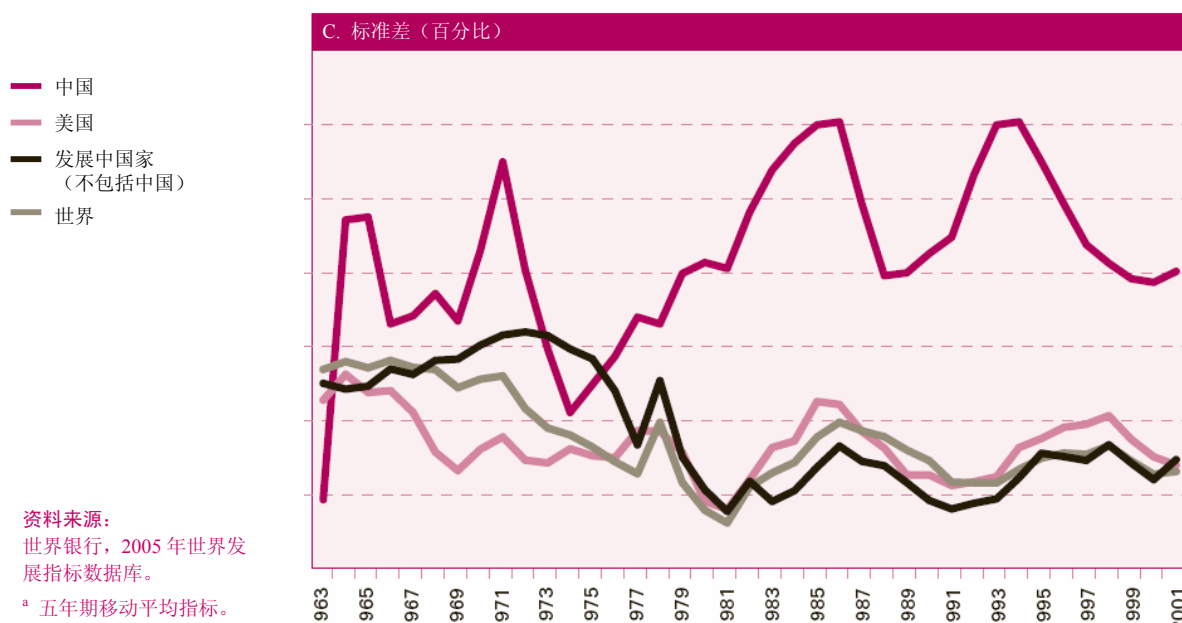
一些观察家，如罗伯特·卢卡斯（前文提到过）认为，我们已经承受了全球最严重的不平等。全球化使得技术传播更加容易，世界各国的体制也越来越相似，因此，收入水平终将达到趋同。从这个意义上讲，在全球不平等之势

日益加剧的情况下，中国过去 20 年来的惊人增长可以说是开了一个先河。不过，这确实是一个先河吗？没有人能保证该区域其他贫穷国家，如孟加拉国或巴基斯坦，不久也将转入以中国为首的新的“飞雁式增长形态”之中，并走上持续快速增长的道路。但是，即使没有出现这种情况，我们也应当考虑一下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会对世界收入分配产生什么影响。

此外，所产生的影响是很难预测的。我们首先要考虑的是，如果中国变成最大的经济体，将会出现什么情况。由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是步世界最大经济体的后尘（见图一.9），贫穷国家会受益于较具活力的世界经济增长势头。如方框一.2 中所讨论的那样，如果当前的趋势保持不变，中国将能于 2036 年之前（如果以购买力平价计量收入，时间会更早）超过美国成为最大的经济体，不过，在此之前，它就会极大地促进世界经济的增长。其他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初级产品出口国，将会在贸易迅速扩展和贸易条件得到改善的情况下取得进展，而这种情况又将促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进一步趋同。不过，对这类结果的预测不具任何确定性。人们可能会怀疑中国能否维持当前的速度，每年增长 9%。由于工资成本一定会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而

图一.9

1963-2001 年^a 全球经济、中国、美利坚合众国和发展中国家集团（不包括中国）的产出增长率



方框一.2

哪个国家是世界经济增长引擎重要么？

发展中国家跟随全球经济增长的趋势，特别是美利坚合众国经济增长的趋势，不过，其变动幅度更明显些。根据有关发展中国家增长波动问题的大多数文献，发展中国家更明显的增长周期会对经济增长产生长期的负面影响。

如果发展中国家的增长情况和整个世界经济的增长情况一致，那么，在理解与增长趋异有关的动态时，就应当关注最大经济体的表现。图一.9 比较了 1963 年以来全球经济、中国、美国和 153 个发展中经济体^a（不包括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的五年期移动平均值。美国国内生产总值长期增长趋势与世界国内生产总值长期增长趋势的相关系数是 0.82，一个简单的超前-滞后分析表明，美国经济在一段时期内引领了全球经济的发展（在这里是一年）。中国经济也引领了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发展，时间是一年或两年，不过这种情况仅始于 1970 年代末，尽管在这段时期之初，其相关系数要比美国的小很多。

不过，全球经济是在不断变化的。鉴于过去 20 年来中国地位的上升及其产出的快速扩展，研究全球增长和趋异的前景至关重要。如果中国经济体继续以当前的速度扩展，我们所看到的各国收入趋异的趋势会被扭转么？中国会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么？其增长会对其他发展中国家产生积极的外溢效应么？

我们知道，如果所有国家继续以当前的速度增长，到 2036 年中国经济体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这种发展会对增长趋异和全球不平等的日益加剧产生什么影响呢？

对发展中经济体增长情况的最直接影响将来自贸易和资本流动。1978 年改革开始以来，中国已日益开放。其出口量和进口量在国内总产值中所占的份额已从 1978 年的 12% 增加到了 2003 年的 42%。^b

很难详细分析中国在世界贸易中不断增强的作用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其他发展中国家若想通过贸易渠道从成功的中国经济体中获益，首先必须专门生产该经济体所需要的产品。但这还不足以增加出口，它们还需要使有活力的部门专业化，这类部门既能从不断增加的生产量中获益，又能保护经济体免受不利贸易条件的冲击（Hausmann、Hwang 和 Rodrik，2006 年）。Jenkins 和 Edwards（2004 年）的一项研究评估了中国贸易对 18 个发展中国家（6 个位于亚洲、6 个位于非洲、6 个位于拉丁美洲）的影响。该项研究显示，与中国有重大贸易往来的国家大都在出口初级（农业和采掘业）产品。如果这种趋势继续下去，出口国的结构改革不会有多少起色，因此，为产出增值的余地不会很大。当然，经济不断增长的中国对发展中国家出口产品的需求会一直很高，而且还有可能把产品价格维持

^a 根据 2005 年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发展中国家集团包括较低收入国家、下中等收入国家和上中等收入国家。

^b 联合国统计司提供的数据。

方框一.2 (续)

在一个较高水平上，但是，如果不进行大规模的结构改革，这种增长能持续下去么？换句话说，如果这些经济体不努力结束其路径依赖专业化，因东亚特别是中国发展起来之后所产生的较高需求而出现增长的拉丁美洲和非洲，将继续依赖初级产品出口实现经济增长。

或者，如果中国经济体经历了其他东亚国家所经历的结构改革，并继续发展技术，那么，它将从其贸易伙伴那里进口更多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这会为其他存在大量未被充分利用劳动力的发展中国家提供机会；但目前，如 Jenkins 和 Edwards 所论证的那样，中国经济体是许多专攻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发展中国家的竞争者。在第三市场和进口货与国内生产商产品的竞争方面，中国的低成本制造业形成了一定的威胁。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在全球市场上日益增加的重要性可能会加剧增长趋异。今后的情况不仅取决于中国经济体将要进行的结构改革，还将取决于涉及增长后的成本和生产率的宏观经济趋势。

《概览》第二章说明了伴随基本发展路线的深层次结构改革，中国经济体已从初级部门向第二和第三产业部门转型。结构改革正在进行意味着中国的经济增长很可能在其他发展中国家产生更加积极的外溢效应。因此，增长和收入趋异可能会缩小。

在外国直接投资流出额方面，当前的结果还远远不够。中国的出口额不足世界外国直接投资总额的 0.5% (Jenkins 和 Edwards, 2004 年)。然而，随着中国经济体的进一步开放，外国直接投资流出额也快速增加。非洲的一些（石油出口）国家在过去几年里看到了越来越多的中国资本，不过，这些投资主要面向采掘工业。目前，对那些将世界上最大份额的外国直接投资引向发展中国家的其他发展中国家而言，中国很可能还是一个竞争者。

升高，从长远来看，中国对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依赖不会持久，该经济体必须进行大规模的结构改革，来改变国家的进口结构，进而改变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影响。如果中国不能进行改革，那么，它将和日本一样，在可预知的将来进入停滞状态。总之，可能会出现很多不同的情况。

有益于经济增长的条件根据国家不同而有所不同，创造这些条件所需的政策也无法被简化成简单的公式

部分原因是我们对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的理解还非常不够。在过去二十年里，出现了大量关于该主题的文件，但其本质成果就是：经济学家们再次发现了经济增长的复杂性。有一种新共识认为，有益于经济增长的条件根据国家不同而有所不同，创造这些条件所需的政策也无法被简化成简单的公式。¹⁰一些

¹⁰ 大多数观点都涉及到了 Dani Rodrik 编写的有影响力的著作，Rodrik (2003 年)、Hausmann, Rodrik 和 Velasco (2005 年)、世界银行 (2005 年 b) 以及货币基金组织季刊《金融和发展》(2006 年 3 月) 的一份特刊也都详细地谈论了这些观点。

人认为，理解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时，必须结合一个国家的历史和体制背景。他们反对那种简单的观点，如华盛顿共识，该共识认为经济繁荣就是正确地运用一套特殊的国家政策。对增长条件的分析应当变成寻找有约束力的限制因素，如动员充足资金方面的限制、人力资本水平低、体制较差、缺少应对市场失败和外部冲击的政策空间等。不同的国家环境和初始条件会指向不同的限制因素，与实施起来会涉及到政治障碍且经常无法实现增长的全面改革相比，针对这些限制因素的政策可能会更有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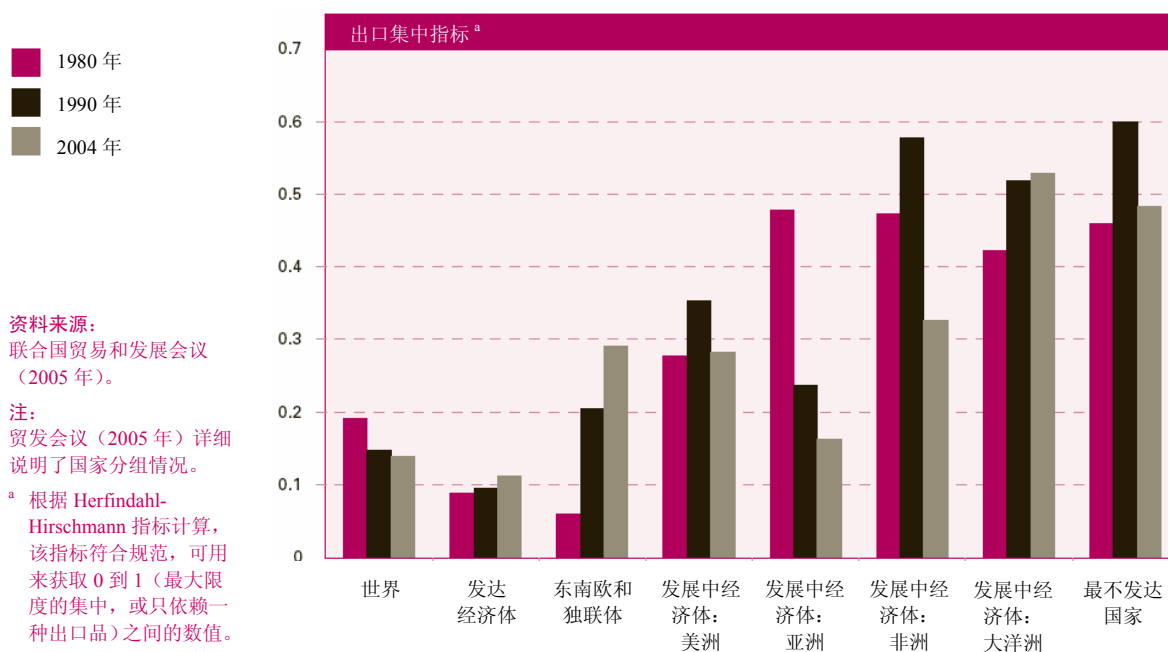
根据前面的讨论，这似乎是一个切实可行的办法。不过，观察到的区域增长两极分化情况也表明，初始条件并不只是针对具体国家的：它们还会与区域位置的特殊条件和全球经济动态相互作用。对这些因素所起作用的分析与上述办法并不矛盾，它会补充对国家一级特殊条件的分析。由于某些历史原因，各国可能会有这类似的初始条件。例如，在殖民时代和后殖民时代初期，拉丁美洲和非洲的经济体有了一定的发展，它们提供原材料，并专门从事采掘业。另外，由于都有一段殖民历史，体制框架方面可能会也存在类似的历史根源。

有一点非常重要，即应当谨记，初始条件很难操纵，而且，在对自身进行定位以便从世界经济增长中获益并突破过去方面，禀赋较差的国家会遇到更多困难。因此，背景和结构相似的经济体很可能会沿着同样的方向发展。从这个角度看，我们会想到 Gunnar Myrdal 的累积原因原则。根据该原则，只要没有外因迫使产生变革，穷国会越来越穷，富国会越来越富（Myrdal, 1957 年）。换句话说，即不存在收入自动趋同的趋势。世界市场的缺陷与趋异趋势混合在了一起。这种全球不均衡也会影响到各国改善增长机会的政策空间。

在从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中受益方面，禀赋较差或禀赋“不正确”的国家往往都存在较严重的不利条件。仍有人认为，对依赖几种初级出口商品如咖啡、棉花或矿物的国家而言，其出口品的世界市场价格都具有很大的波动性；在过去几十年里，它们也发现，与制成品相比，它们商品的价格已有所下降。这限制了可获得的资源，而且，体制薄弱使得无法实施可靠的政策并动员国家内部和外部的资金，以进行私人投资，以及多样化所需的人类发展和基础设施投资。图一.10 表明，对几种出口品的高度依赖与较低的发展水平之间很可能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最不发达国家集团由最贫穷国家组成，它的出口多样化程度最低；另外，与其他区域相比，拉丁美洲和非洲经济增长业绩较差区域的出口集中度仍然比较高。

在对自身进行定位以从世界经济增长中获益方面，禀赋较差的国家需要克服更多困难

图一.10
1980年、1990年和2004年按区域分列的商品出口多样化



流向发展中国家的资本集中在那些收入较高的国家

世界市场的不公平运作加剧了初始条件的差异。资本流动一般都集中在较富裕国家之间。大多数资本流动都发生在发达国家之间, 而且, 流向发展中国家的资本也往往都集中在那些收入较高、经济增长业绩较好的发展中国家。三分之二以上的外国直接投资集中在发达国家 (见图一.11)。流向发展中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中, 远超过 80% 的部分都流入了 12 个国家, 它们大都是中等收入国家 (但包括印度和中国), 其他发展中国家几乎没有收到任何投资。只有快速增长的亚洲国家获得了越来越多的世界外国直接投资份额。正如第四章详细分析的那样, 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其他形式的私人资本流动也呈现出了类似的集中模式和顺周期性。顺周期资本流向接收国提出了一些额外的政策挑战, 因为它们有碍于创造执行反周期宏观经济政策所需的空间, 而且可能会导致金融波动, 金融体制薄弱的国家尤其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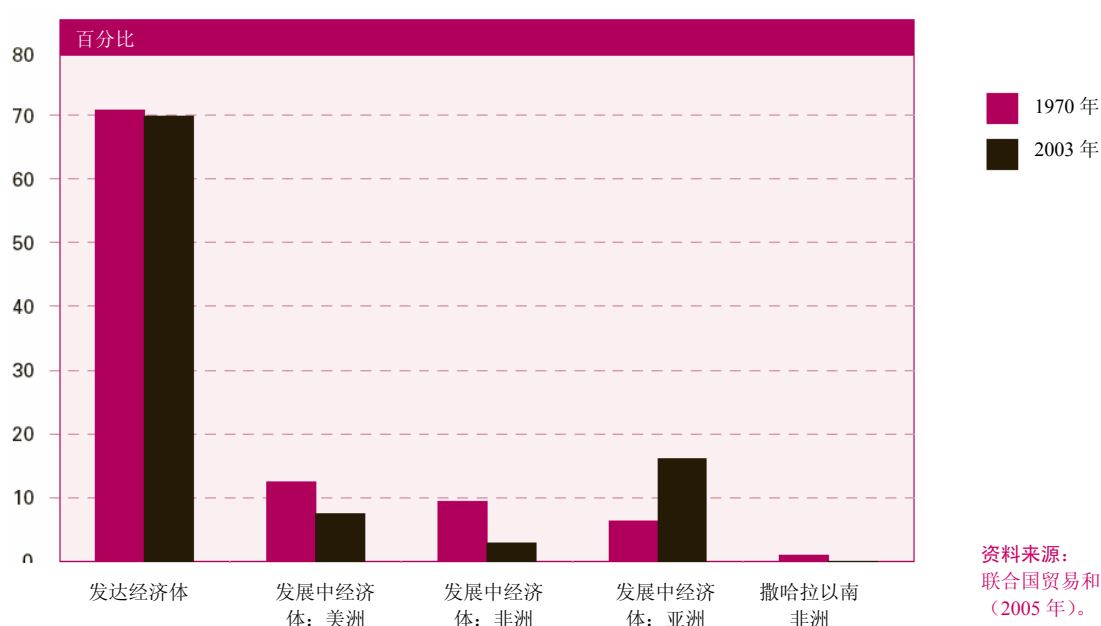
劳工调动方面也存在不公平。发展中国家的一些非技术工人在发达国家可以挣到更高的工资, 但在试图移民时, 他们会遇到很多障碍。

能够改善各国禀赋并解决世界市场缺陷的国际政策可以增加全球公平。全球贸易谈判涉及到了授予最贫穷国家特惠待遇的条款。发展援助可能会帮

助各国改善它们的资源基础，并进行投资，以改善其在基础设施、人类发展和其他领域的禀赋。债务减免倡议已开始实施，目的是减轻最贫穷国家的债务负担，此外，还采取了一些旨在促进全球金融稳定的措施，如在 1999 年设立了金融市场稳定论坛。

图一.11

1970 和 2003 年区域外国直接投资流量在世界外国直接投资总额中所占的份额



不过，全球不平等不仅会减少最贫穷国家受益于更自由贸易和资金流动的机会，还会影响到调控世界市场的各种规则的制定方式。国际金融市场并没有建立明确的债务解决机制，而且，现行非正式机制偏向于国际贷款人，经常会损害发展中国家投资者和纳税人的利益。关于更加合理地分担负担的倡议，包括通过集体行动条款实施的倡议，刚开始实施，离产生效果还有很长一段时间（见联合国，2005 年 b 等）。金融市场稳定论坛和巴塞尔银行监督委员会汇聚了来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成员国中央银行和财政部的代表，但是，其中并没有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国际金融机构如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中的表决权也有利于较发达国家，因为表决权的取得在于成员国的资本分摊额。

就宏观经济政策执行空间而言，也存在着非常明显的失衡。大多数发

全球不平等影响到了
调控世界市场的各种
规则的制定方式

执行宏观经济政策的
空间也不均衡

展中国家都没有以本国货币发行债务的权利，而且，由于金融和资本市场发展不良，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也普遍受到了限制。¹¹这些限制因素严重制约了决策者执行反周期宏观政策的能力，也使得各经济体非常容易受到外部冲击（如以他国货币标价的利率的波动）的伤害，金融危机期间的拉丁美洲、许多非洲国家都是如此。和东亚国家不同，拉丁美洲国家主要是顺周期政策，它们加剧了盛衰循环幅度，也深化了金融波动及其对增长的长期负面影响（见第四章）。

在对调控全球市场的
体制规则施加影响方
面，较贫穷国家的力
量弱于较富裕国家

世界贸易组织多哈回合多边谈判中制定的贸易规则可能也会使较贫穷国家有所收获。不过，不同国家和不同区域所受到的影响各不相同，如文所示，由于较贫穷国家的禀赋较差，更自由的贸易环境提供给它们的收益可能会比较少。在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中，决策要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因此，每个国家各有一票，并各有一个否决票，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些谈判是公平的。不过，事实上，发展中国家发现很难跟上谈判进程或是参与评价贸易改革对经济体的影响，或者，它们甚至没有派代表参加谈判的资源。穷国可以将争端提交世界贸易组织，但即便是裁决有利于穷国，也不意味着（《世界贸易组织协定》颁布的）不公平保护措施将得到纠正。穷国报复强大贸易伙伴的能力很低，基本上不会产生什么效果：世界贸易组织的这些不利裁决对强国造成的伤害微乎其微。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全球经济治理从本质上讲都是不公平的；发展中国家所起的作用仍然非常有限，而且，也很难把游戏规则变得有利于它们，这些都使得不平衡局势很难得以纠正。

发展援助首先惠及的并不是最贫穷国家。特别地，大多数官方发展援助都是因为受到捐助国的政治和经济目标驱动才提供的，这使得较富裕的发展中国家获得了大部分援助。此外，援助在刺激增长和发展方面的有效性也是第四章所分析的激烈辩论的主题。

因此，在对调控全球市场的体制规则施加影响方面，较贫穷国家的力量要弱于较富裕国家，进而，在纠正日益加剧的世界收入分配不平等的进程中，它们的影响也相对较小。

国内的各种体制和政
策也很重要

所有这些并不意味着包括体制和政策在内的国内因素不重要。事实上，它们非常关键，尽管它们并不是简单地给定或衍生，而是部分地通过与全球市场动态的相互作用形成的。下面各章节更详细地回答了下列问题：在 1950

¹¹ 关于该论点的详细内容，见 Ocampo（2005 年 a）和 FitzGerald（2006 年）。

年代时更富裕一点的拉丁美洲落后的同时，东亚经济体是如何成功摆脱低增长，并在很长一段时期保持高速增长记录的；为什么快速发展的博茨瓦纳仍然是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一个飞地，而大韩民国和中国台湾省却能把它们的成功“出口”给邻国？拉丁美洲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出现一个日本，就足以使这些区域出现一级或二级新兴工业化经济体了么？总的说来，各国和各区域间的增长趋异决定了世界发展格局，同时也会反馈到趋异模式上来。

成功国家和失败国家的经历给我们提供了同等重要的经验教训，因为它们提供了关于如何促成持续增长、以及如何纠正不利增长趋势的知识。第二章研究了经济体的结构改革是如何与长期增长模式联系在一起的。它会告诉决策者在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时，应该以何种结构改革为目标。第三章提出了从几十种国家经历中获得的经验教训，涉及增长趋异如何与贸易和资本流动的组成和趋势以及专业化模式相关联。行业和贸易的保护政策在维持和改变专业化模式的过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关于这一点，第三章努力探讨了一些东亚国家的成功经验，并分析了多边贸易协定留给各国的政策空间。

第四章涉及反周期宏观经济政策执行空间的性质，以及通过有形的社会基础设施投资于长期发展的财政空间的性质；这一章力求确定能够执行反周期宏观经济政策的国家是否在实现长期高速发展方面取得了更大成功，以及这些国家有无在人类发展和基础设施方面投入更多，以维持这种状态。第五章研究了一个问题，即哪些体制和善政条件对长期经济增长、进而对全球趋异和趋同最重要。该章还进一步表明，不断加剧的全球不平等和潜在的增长模式也影响了安全和冲突。主要从事不可再生资源采掘业的国家最容易发生冲突。结果显示，人均收入低、增长失败会使国家很容易受到动荡局势和冲突的影响。

正如所争论的那样，特别是在当今一体化的全球经济里，一国的经济增长业绩并不仅仅取决于在其地理范围内发挥作用的各因素。事实上，趋异的潜在原因也使摆脱贫困、增强对全球冲击的抵抗力变得更加困难。因此，随着全球不平等的加剧，增长崩溃和冲突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大。因而，全球不平等日益加剧的问题对联合国发展议程的执行工作也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它使得千年发展目标更难实现，并影响了全球安全。如果不能纠正全球不平等日益加剧的趋势，人类发展将受到更多的影响。

如果不能调整日益加剧的全球不平等，人类发展将受到更多的影响

第二章

结构变化与经济增长

古典发展经济学的一个基本观点是，经济增长与生产结构的变化具有本质上的联系。按照这种观点，工业化是技术变革的推动力，生产率的整体提高主要在于劳动力从生产率低的活动转向生产率高的活动。本章探讨了这种观点在今日还具有多大的相关性，以及结构变化的程度和性质对发展中国家增长趋异的影响。

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将改变生产结构

第一节对增长过程提出了一些不同的看法，强调了促进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增长过程的不同动因。第二节说明，增长迅速的亚洲区域能很快普遍地从农业向工业和服务业转型，而结构变化不大的经济体则落在后面。正如后面一节所表明的，资本积累对于增长至关重要这一传统观点依然有效，尽管其现在的关系不再是一对一的关系。投资结构也很重要，这不仅是因为工业化要求加大对制造业部门的投资，而且还由于金融和商业服务部门需要巨额投资以支撑工业发展。此外，低增长与投资波动性增强有关。外部冲击和不稳定的国内政策加剧了经济的不确定性，从而阻碍了实现动态结构变化所需的长期投资，第四章将详细探讨这个问题。

最后一节分析了发展中国家的就业和劳动生产率是如何随着增长和结构变化模式转变的。劳动生产率持续提高和劳动力从生产率低的部门转入生产率高的部门是高速增长经济体的特征。但是，增长绩效低的那些区域也出现了工业和服务业部门就业率开始明显上升的趋势。不过，在这种情况下，生产率并没有随着就业率的上升而提高，这表明劳动力被生产率低的活动所吸纳，而且始终未得到充分利用。

由于数据有限，本章只对所抽取的 57 个发展中国家做了分析。这些国家分为 10 个地域国家组别（中国为一个国家“组别”），另外，还有一个由 8 个半工业化国家组成的分析组别。¹另外，由于数据问题，某些变量（就业结构）

¹ 10 个地域组别为一级新兴工业化经济体（3）：大韩民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省；中国（1）；东南亚（5）：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和越南；南亚（4）：孟加拉国、印度、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拉丁美洲中低收入国家（3）：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和秘鲁；中美洲和加勒比（5）：哥斯达黎加、多米尼加共和国、萨尔瓦多、危地马拉和牙买加；中欧和东欧（6）：保加利亚、捷克共和国、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和斯洛伐克；独立国家联合体（2）：俄罗斯联邦

和某些国家组别的资料所涉时期较短。²

经济增长要求结构性改革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增长和发展主要不是依靠推动技术创新，而更多的是依靠改革生产结构

发达国家提高生产率主要靠技术创新。不过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增长和发展主要不是依靠推动技术创新，而更多的是依靠改变生产结构，以便转向生产率更高的活动。这种结构性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通过采用和改进现有技术、替代进口、进入世界制成品和服务市场以及快速积累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来实现。只有少数发展中国家能够在某些领域开展全新的研究和开发，但是，技术创新仍然高度集中在工业化世界。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增长过程在性质上具有本质区别，对此经济学家们仍然各持一词。最近几十年来最重要的分析发展态势是，所谓的新增长理论明确承认外部经济在人力资本形成和技术创新中的作用、与边干边学相关的动态规模经济以及增长过程中的体制要素。这些新的见解已不赞成一种更为传统的观点，即资本积累是经济发展的关键所在。他们还支持使政策与经济增长绩效更相适应的承诺。

不过，以这些理论观点为基础的经验性研究主要依赖于多国证据，因而不能对许多问题做出解答。特别是，这些分析没有明确实际有效的标准，无法肯定被各种研究认为具有统计意义的近 150 个变量中，哪些变量应视为经济增长的核心决定要素。除无定论外，该文献也没有表明与具体情况，特别是与体制发展有关的各种要素的重要性（见第五章）。另外，该文献没有充分证明，在不同国家和不同时期，政策对增长的影响往往也不同（这个问题被称为非线性问题）。其侧重点在于内部要素，而说明了为何增长的成败主要集中在具体时期和具体区域的外部要素没有引起重视（见第一章）。就本章主题而言，很重要的一点是，这种研究的着重点在于累积增

和乌克兰；撒南非洲（10）：喀麦隆、科特迪瓦、埃塞俄比亚、加纳、肯尼亚、莫桑比克、尼日利亚、乌干达、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和津巴布韦；中东和北非（10）：阿尔及利亚、埃及、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伊拉克、约旦、摩洛哥、沙特阿拉伯、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突尼斯和也门。半工业化国家小组（8）由以下国家组成：阿根廷、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墨西哥、南非、土耳其和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

² 现有的国际数据组（如联合国共用数据库、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以及国际劳工组织劳工统计数据库）没有提供许多国家 1990 年以前连贯且可比的投资和就业数据序列。因此，第二节和第三节的部分经验性分析基本上只能参照 1990 年代及以后观察到的模式。

长，而且主要是探讨技术进步的说明性要素，并设想充分利用这些生产要素和使用国内现有的最先进技术。换言之，侧重点在于发达国家不是发展中经济体增长过程的主要经历，发展中经济体的劳动力（有时还有其他生产要素）未充分利用以及现代生产技术与传统生产技术并存是一种普遍现象，而不是一种特殊现象。

另一方面，遵循古典发展观传统的经济学家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导致了向高生产率部门发展的结构变化，工业化在该进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Ros，2000年）。按照这一观点，现代工业部门的发展因其生产率增长较高，将从动态方面为总体产出增长做出更多的贡献，生产率增长较高是因为规模收益越来越大³以及创新和边干边学带来了好处。⁴农村部门劳动力就业不足，城市非正规部门这种现象也日趋严重，因此劳动力供应具有很强的弹性，使得这一过程不受劳动力供应的严重限制。

工业发展的重要性是古典发展观的核心

早期的经验性研究已经表明了工业发展对于较长期经济增长的重要性，指出这的确是发展模式一种明显的“规律”（Kuznets，1966年；Chenery和Taylor，1968年；和Chenery，1979年）。农业现代化对于促进由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积极转变十分重要（见第五章）。随着经济的逐步发展，服务部门将越来越重要。现代服务部门也是生产率提高的一个来源，对于实现工业化至关重要。随着国际服务贸易的增长，它们也为出口发展提供了新的机会（见第三章）。

除其他外，Verdoorn（1949年）和Kaldor（1957、1958年）的早期非古典派增长理论中也包含着与古典发展思想类似的理念。Kaldor（1978年）提出生产率与产出增长是相辅相成的。经济学文献中广泛论述了生产率的提高对产出增长的积极影响。反向因果关系，即生产率增长本身取决于总体经济增长的速度，没有受到多少重视。这种观点认为，生产率在扩大生产部门方面起了内在的决定作用。边干边学、创新和部门联系这些因素在增长加快时均对生产率产生了积极影响。实际上，随着经济的扩展，这些因素对于生产率增长更加重要，因为更多的资源能够用于新技术投资和工人培训。边干边

生产率和产出增长是相辅相成的

³ 工业生产过程的特点是，利用大规模的机器设备，在机器的帮助下，随着产出扩大，单位生产成本降低。用经济行话讲，这种机制称为规模经济。工业部门规模收益的增长和生产率增长的潜力也可能是生产组织得更好的结果，例如，让工人专门完成小型生产任务，这将提高其增加产出的潜力。

⁴ 十八世纪末期Adam Smith的著作中就包含这个概念，二十世纪初期，Alwyn Young进一步发展了这个观点（Young，1928年）。

学以及企业家和劳动者在生产过程积累的经验对于生产率的增长也至关重要，当增长表现为动态时，这些因素越来越重要。

失业现象减轻可能导致生产率增长的提高

如果资源最初因失业和就业不足而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增长不仅会导致更好地利用现有资源，而且随着资源从生产率低的活动转向生产率高的活动，生产率也会加速增长，这一理念同古典发展观是一致的。相反，经济增长缓慢将导致资源使用不足的现象越来越严重，从而对生产率产生消极影响。从这种意义上讲，生产率绩效不佳常与经济增长缓慢有关，其原因不是缺乏技术变革，而是资源使用不足现象越来越严重，这成为低增长环境的一个特点，反映了上述的反向因果关系。换言之，如果资源得不到充分利用或使用不足，生产率绩效不佳可能是低产出增长的结果，而不是决定因素。

结构变革的程度和性质是发展中国家增长趋异的原因

在这个基础上，可以对结构改革和增长情况有更加广泛的了解。从这个角度讲，活跃的结构变革不仅仅涉及工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增长。它还需要不断创造新的活动能力，并通过新的活动吸纳剩余劳动力和促进国内经济生产部门的整合（即，加强国内的联系）（例如，见 Ocampo, 2005 年 b）。另外，工业部门通过原材料加工和半工业投入，进行更深入的国内整合的潜力往往更大。这需要一些辅助性服务。国内经济的整合程度进一步影响到国内市场的规模以及技术和其他方面外溢效应的程度，出口和外国直接投资能够对国内经济活动产生这种外溢效应。在这方面，整合还影响到一国从国际贸易和投资中受益的程度。就此而言，只有整合基于牢固的国内联系或有助于建立这种联系，融入世界经济才能实现快速的技术进步和高速而持续的增长。第三章将对这些问题进行更广泛的讨论。

1970—2003 年的增长模式和结构变化⁵

随着工业和服务部门的增长以及农业部门的减少，发展中经济体的增长速度会更快

随着工业和服务部门重要性的提高以及农业部门重要性的降低，发展中经济体的增长速度会更快（见图二.1 和二.2）。1970 至 2003 年期间，中国、东南亚和南亚的迅速增长，是同农业的重要性迅速下降、工业和服务业的有力扩展分不开的。相反，1970 年代以后，半工业化国家、中美洲和加勒比以及中东和独立国家联合体（独联体）国家的长期增长缓慢，同（强度各异的）非工业化过程有关。在这些组别中，增长基本上都集中在服务部门，农业占产

⁵ 本节中的分析基于 Rada 和 Taylor 提供的证据（2006 年）。

出的比重也在降低或保持停滞状态。

显然，世界各地区的结构变革与经济增长之间有着不同的关系。一级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在经济迅速增长的同时，其面向工业的结构变革比（例如）南亚各国的增长要小得多。这可能主要是因为1970年——本分析期开始的年份——以前一级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完成了许多工业化活动。另外，南亚的服务业扩展比东南亚更具活力。撒南非洲和拉丁美洲中低收入国家也想方设法提高其工业产出的份额，但是，其人均收入的增长很不明显或者根本没有增长。1990至2003年期间，中欧和东欧国家尽管实行了非工业化，但（总体）增长适中，服务业在增长过程中起到了最重要的作用。

累积模式可能进一步掩盖了不同区域和不同国家之间的明显差距。亚洲国家采用了动态结构变化模式。中国是这方面最重要的实例。大约从1978年开始，中国经济制度经历了渐进式的变革，从苏联模式的中央计划经济转变为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尽管中国人口众多，但其生产部门的构成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快速变化。1970至2003年期间，制造业和采矿业占总体产出的份额从28%增至60%，而农业份额从49%降至12%。农村体制改革（见第五章）和促使基础设施发展以支持出口业的宏伟投资政策促进了中国经济的这一巨大转变。土地改革和基础设施的发展消除了农业增长的主要约束和限制，有助于激发以前未发掘的经济力量。除了这些趋势以外，中国还推行了逐步向世界市场开放的政策，人们发现，中国战略与一级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奉行的那种出口带动增长的战略非常相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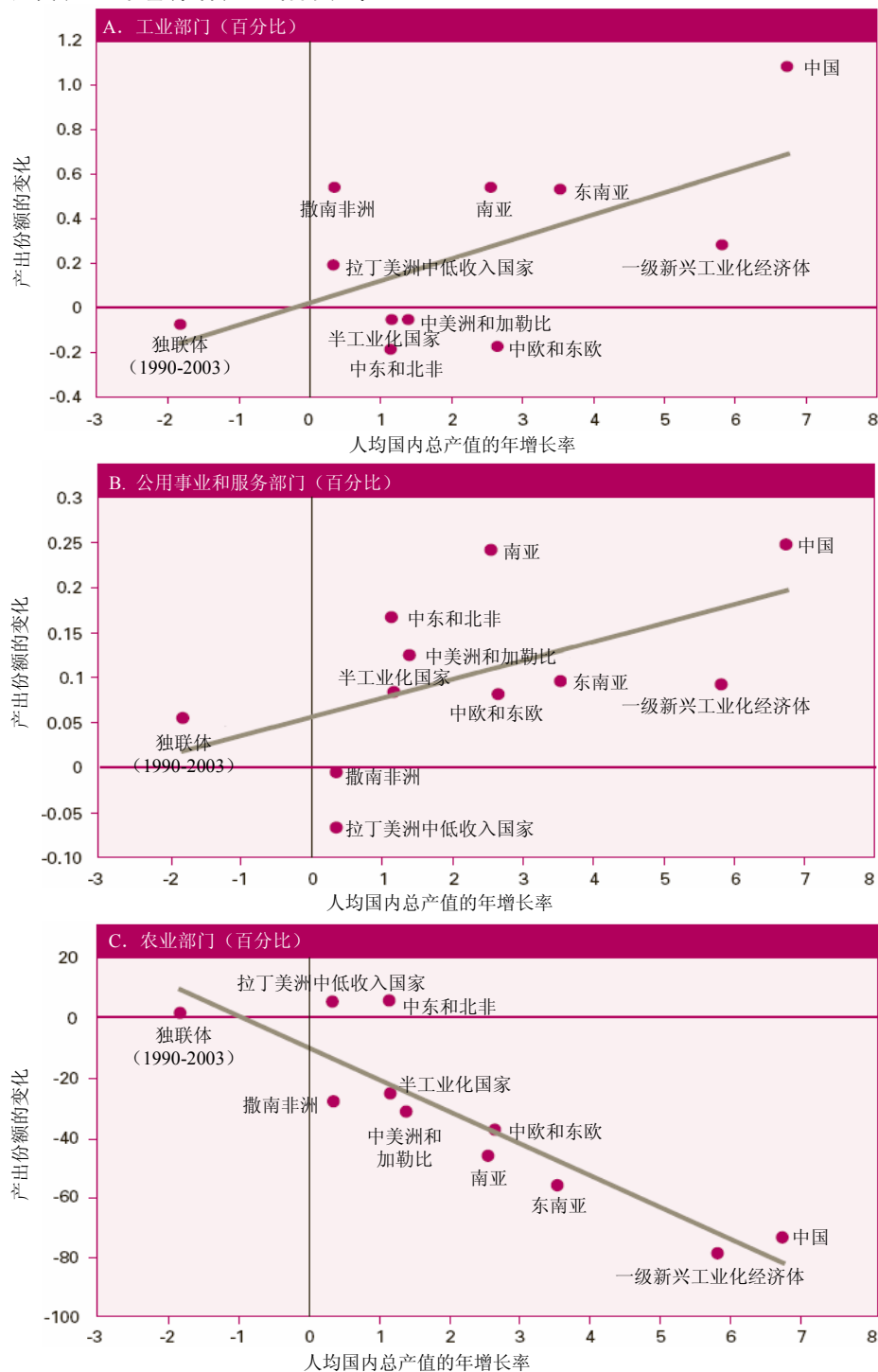
如上所述，1960年代，一级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在最初采用了进口替代战略之后，取得了可观的工业增长。到1970年代，工业部门已经壮大，占据了巨大份额，当时，增长已经变为面向出口型。但是，应该注意的是，为了发展新的部门，这些经济体始终实行出口替代政策。到1980年代中期，这些经济体转向了高技术制造业生产（见第三章）并且加强了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一级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在近期成功地实现了这些动态变革，它们在某种程度上是由外部事件促成的。这些事件包括：由于1985年《广场协定》的出台日元对美元大幅度升值，这一事件与这些经济体对出口增长的支持很有关。亚洲一级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将其汇率钉在美元上，日元升值提高了它们在技术更先进的产品市场与日本的竞争力，并且吸引了日本投资者为其出口行业投资。这种现象与为该区域创建的飞雁模式相一致。

中国经济经历了深刻而迅速的结构改革

1980年代亚洲一级新兴工业化经济体转向了高技术制造业

图二.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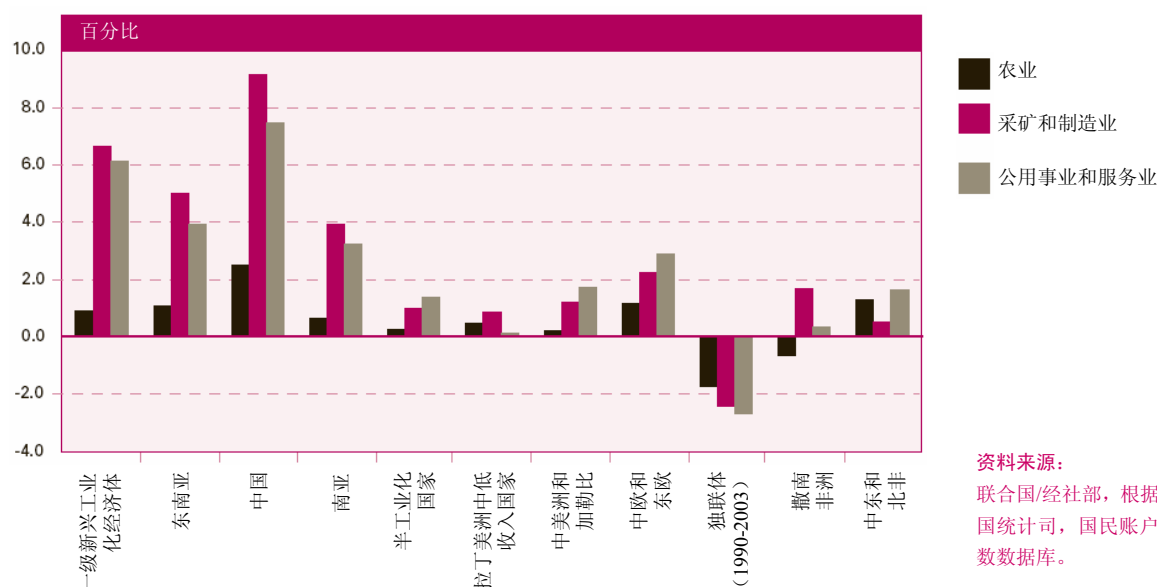
1970-2003 年按特定区域和国家类别分列的工业部门、公用事业和服务部门以及农业的经济增长和结构改革



资料来源：
联合国/经社部，根据联合国统计司，国民账户总计数据库。

图二.2

1970-2003 年按特定区域和国家类别分列的农业、采矿和制造业以及公用事业和服务部门的人均产出年增长率



资料来源：
联合国/经社部，根据联合国统计司，国民账户总计数据库。

南亚的活力和结构改革没有达到东亚一级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的水平。该区域的制造业和采矿业占总产出的份额从 1970 年的 14% 增长到 1990 年代的 22%，达到了顶峰。该区域采取的模式基本上反映了印度国内发生的变化。最近，印度的经济增长受到服务部门高速增长的推动。按传统的结构改革模式衡量，这种趋势意味着向服务业转变为时尚早，因为印度的收入水平还较低。但是，依靠先进的通信技术，各种服务日益成为可交易（即可以出口的活动）。依靠大量就业不足的熟练工人，印度已进入这一新的活动领域（见方框三.3）。

南亚，特别是印度很早就转向服务业

1950 年代和 1960 年代，拉丁美洲国家较突出的增长绩效建立在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的基础之上。自 1960 年代以来，这项战略的局限性在该区域大多数国家逐渐显露，促使其中许多国家同时鼓励出口多样化和区域一体化。1970 年代，由于获得低成本商业银行贷款比较容易，新产生的国际收支问题临时得到解决。但是，在 1970 年代期间以及随后的几十年，大多数国家的工业增长都停滞不前。不成熟的贸易自由化（例如，在几个南锥体国家）导致 1970 年代工业产出大幅度下降。在其他地方，工业发展因 1980 年代初期爆发的债务危机之后缺乏海外融资和稳定政策而受到严重影响。

拉丁美洲的工业增长停滞不前

非工业化成为中欧和东欧及前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在向市场经济转型时期的结构改革特点

随后实行的贸易和金融改革使出口成为拉丁美洲大多数国家在 1980 年代，特别是 1990 年代期间的增长动力。但是，这些国家的出口增长没有以活跃的工业化为基础，而是继续——在某些情况下进一步——依赖初级产品出口，在南美洲尤其如此，或者是依赖整合制造工序，例如，在墨西哥和中美洲（见第三章，Vos 和 Morley，2006 年；联合国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2004 年；和 Ocampo，2004 年）。经常性的金融危机导致增长更加不稳定，而且缺乏积极的结构变革所需的长期投资（见第四章）。因此，1970 至 2003 年间，制造业和采矿业占总产出的份额均有下降。该区域服务部门的增长与动态转型关系不大，与非工业化过程的关系较密切，后者将过剩的工人推向（非正规的）生产率低下的第三产业部门。

按照现有的数据，1960 年代和 1970 年代期间，中欧和东欧及独联体各国的人均国内总产值（国内总产值）出现了高速增长，平均年增长率分别为 6.2% 和 4.4%。工业成为经济增长的主体。中央计划的投资过程特别着重于发展重工业，这涉及到农业领域的劳动力大规模调动，但是最终未能产生持续增长。Podkaminer（2006 年，第 311 页）对波兰的描述可能适用于整个区域：“从结构上讲，发展政策的优先任务被严重误解，因为政府规定对农业、采矿业和制造业中的‘重工业’部门（冶金、造船、重型军备，如坦克、基础化学品，如化肥）给予优惠待遇，而以牺牲服务业和技术先进的高技能部门为代价。”

1980 年代，一个时期累积的全部问题暴露无遗。该区域的国家面临的问题是，在效率极低的工业巨头中投资了巨额的沉没资本，却无法生产在国际市场上可以销售的具有竞争力的商品。同时，经济互助委员会对石油贸易产生的缓冲作用逐渐消失，中欧和东欧必须支付更高的价格才能从前苏联进口到石油。制造、采矿、建筑和运输部门在以前的几十年一直是增长动力，但其绝对数字有所减小，特别是在 1980 年代后五年。随着柏林墙在 1989 年倒塌，开始了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艰难历程，这一过程导致了急剧而漫长的产出减少，这一现象最终被称为“变革造成的严重衰退”（Kornai，1993 年；1994 年）。农业和制造业是受中央计划系统崩溃影响最大的部门。俄罗斯联邦和乌克兰由于在 1990 年代头五年发生产出崩溃，其遭受的转型冲击最明显，当时，制造和采矿部门所占的份额从 35% 降至 30%。在上世纪末，制造业和采矿业才开始恢复，到 2003 年，其份额达到 33%；但是，这种恢复的部分原因在于，能源价格抬高进一步促进了石油和天然气的开采。

中东和北非大多数国家继续严重依赖石油和矿产开采。该区域的总体情况深受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和沙特阿拉伯境内事态发展的影响，因为这两个国家的经济约占该区域国内总产值的 50%，人口占 30%。增长绩效和结构变革模式主要是由石油市场的发展情况决定的。1970 年代，该区域产出高速增长是由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精心策划的两次石油大涨价引发的。相反，1980 年代出现了经济萧条。原油的实际价格下降，又回到几近第一次石油冲击之前的时价。在 1990 年临时涨价之后，油价在 1999 年之前继续呈下降趋势，将该区域的许多石油出口国家推向衰退深渊，并且造成大批失业者。此后，石油价格再度猛涨，刺激了强劲的经济复苏。

中东和北非的增长绩效主要取决于石油市场的发展

石油出口国的结构变革是石油市场的这些趋势打造的。提炼碳氢化合物在总产出中占主要地位，但是，其份额在 1970 至 2003 年从 35% 降至 22%。1980 年代中期，由于油价下降，其份额跌至 16% 这一创纪录水平。到 2003 年，制造部门所占份额增加，占到总产出的 12%，比 1970 年的 8% 这一低比率增长了四个百分点。突尼斯是该区域的一个特例，因为其制造业的发展非常强劲。它也是设法在整个时期里取得持久经济增长的少数非洲国家之一。

被抽样的撒南非洲国家还未能走出其低增长的发展困境。这些经济体缺乏结构变革也是显而易见的。农业仍然是这些经济体的主体，但是，1970 至 2003 年间，农业部门的人均产出有所下降（图一.2）。在大多数国家，1980 年代和 1990 年代采取的面向市场的结构调整政策未能提高增长绩效，实际上没有引起大的结构改革。这种政策不足以解决基础设施差和人力资本开发不佳以及缺乏运行顺畅的市场体制等问题。由于增长的这些约束和限制没有消除，这些经济体未能实现多样化并且继续深受外部冲击和贸易条件降低的影响，在许多情况下，还受到国内冲突和内乱之害（见第五章）。整个区域的制造业和采矿业的平均增长率较高，主要是由尼日利亚石油部门推动的，同新兴制造部门的生长关系不大。到该时期结束时，如果列入尼日利亚，工业份额达到 35%。如果不列入尼日利亚，该区域其他国家的采矿业和制造业活动只占产出的 17%。

撒南非洲国家的经济缺乏结构改革

投资模式和结构改革

资本积累不再像早期的某些经济发展理论那样被视为经济增长的惟一动力。但是，这决不意味着投资是不重要的。资本投资是经济发展和增长的关键，因为它是技术变革和生产率提高的主要载体。投资在基础设施发展及制造业

和服务业云集的城市中心建设中也起了重要作用。资本积累同其他因素相结合，也能引发结构改革。因此，经济转型要求积累模式的改变，因为新资源将投资到新的经济部门，从而增强了它们为总体产出所做的贡献。

经济增长和融合程度的提高与人均投资水平的提高密切相关

经济增长和融合程度提高，是与人均投资水平提高密切相关的，尽管这种关系不是一一对应的。如上所述，一级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和中国的结构变革最具活力，其固定投资额涨幅也最大，按人均计算，固定资产额成倍增长，在1970至2003年间，分别增长了15.6%和12.3%（见表二.1）。其他区域的投资增长则低得多。南亚的投资水平翻番，东南亚增长了两倍，而拉丁美洲、撒南非洲、中欧和东欧及独联体国家还有中东和北非基本上停滞不前。

表二.1

1960-2003年按特定区域和国家类别分列的人均投资水平

	居民人均固定资本形成总值 (1990年美元)				
	1960年代	1970年代	1980年代	1990-2003年	-倍增长
一级新兴工业化经济体 ^a	218	589	1 356	3 392	15.6
中国 ^a	20	37	75	244	12.3
东南亚 ^b	103	184	174 ^c	315	3.1
南亚	36	40	53	85	2.3
半工业化国家	608	855	794	766	1.3
拉丁美洲的中低收入国家	..	341	328	333	1.0
中美洲和加勒比	171	282	249	367	1.3
中欧和东欧	673	..
独联体	435	..
撒南非洲	67	50	0.7
中东和北非	..	498	397	330	0.7

资料来源：联合国/经社部，根据联合国统计司，共同数据库。

^a 自1965年起的数据。

^b 1960年代和1970年代不包括印度尼西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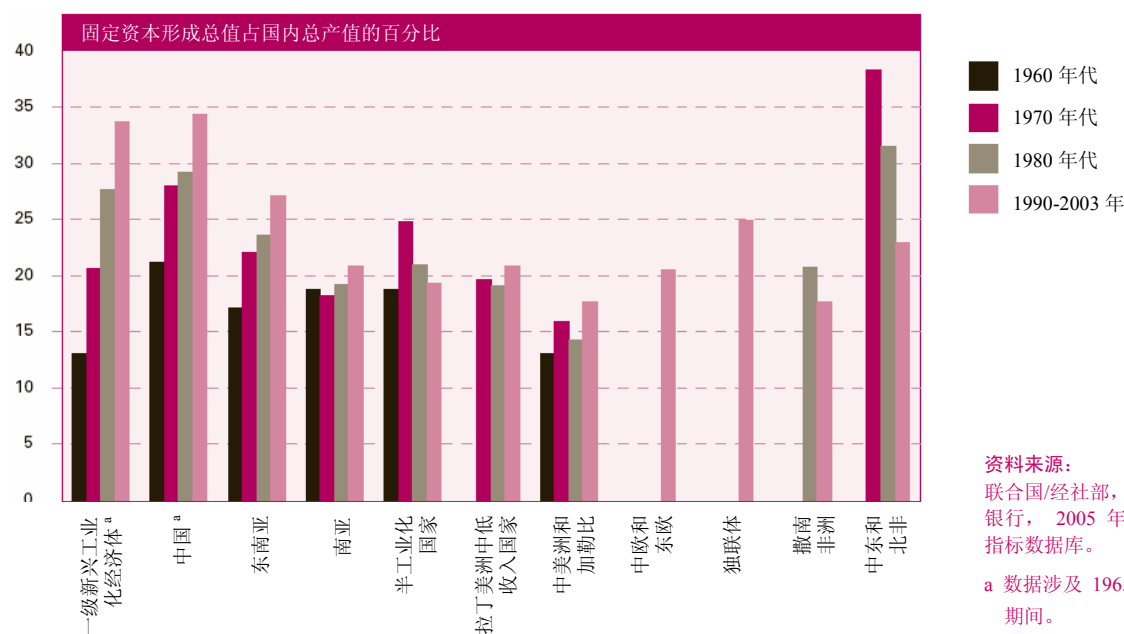
^c 不包括印度尼西亚，东南亚的平均额为279美元。

对一级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和半工业化国家集团（大多数是拉丁美洲）进行比较，可以从收入水平和更广泛的指标上更深入地了解经济趋异的程度。

在 1960 年代，一级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的人均投资总额大约为半工业化国家的三分之一。到了 1990 年代，这类工业化经济体的实际投资水平提高了四倍。赶上（尽管还没有超过）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其余国家（即，没有列入半工业化国家行列的国家）的实例还有中国、东南亚和南亚。

图二.3

1960–2003 年特定时期和区域的平均投资率



从投资占国内总产值的份额来看，亚洲一些国家也表现出强劲而持久的增长趋势。其次是南亚（图二.3）。1990 年代，一级新兴工业化经济和中国的固定资产形成总值占国内总产值的比率升至 34%，在东南亚，这一比率升至 27%。但同期，半工业化国家的固定投资总比率基本上停滞在约 19% 上，其余的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略有增长（原来的水平较低）。撒南非洲及中东和北非区域的投资水平有所降低。中欧和东欧及前苏联转型期经济体的投资模式与方框二.1 中分析的模式略有不同。

增长绩效较差，不仅与结构变化不大和投资水平较低有关，而且同投资易变性强也有关。用变量系数衡量（即，标准偏差除以时期平均值），收入增长低的国家的投资易变性显得高得多，在增长绩效强的国家里不太显著（见图二.4）。这两个变量的简单线性回归得出其对比系数为 71%。经济的不稳定

撒南非洲及中东和北非的投资水平明显下降

增长下降也与投资的进一步波动有关

和投资的不确定性显然不利于长期的经济增长。第四章探讨了发展中国家政府如何采取备选的方法，推行宏观经济政策，有效减轻经济的易变性并为长期发展投资创造更有利的环境。

资本积累是结构改革的动因

资本积累是结构改革的动因。图二.5 显示农业和工业产出份额的变化与投资增长关系密切，这与本章的论点相一致。在成功的亚洲国家，资本积累的速度非常快，而且都以其工业部门为主。如下一节所述，技术变革以及利用新的资本投资发展新的生产活动，使总体劳动生产率进一步提高，在这方面，工业也是一个主要的促动力量。

方框二.1

转型期经济体投资的增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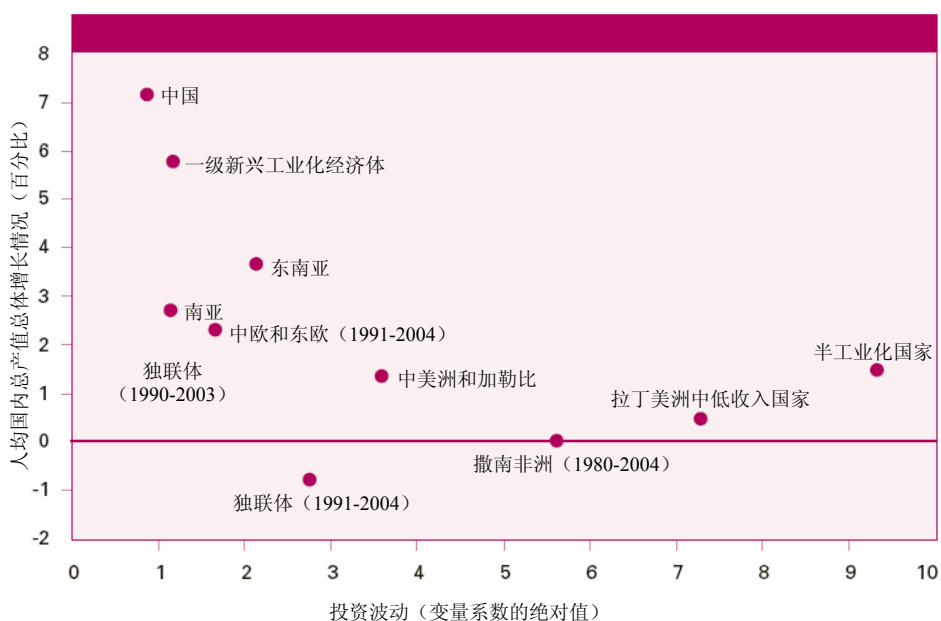
中欧和东欧以及独立国家联合体（独联体）在投资趋势方面属于特例，因为这些区域经历了深刻的体制变革。自这些经济体实行经济和政治改革以来，其经济中的资本积累模型经历了几个不同的阶段。在转型的早期阶段，累积投资的动态特点为各种深刻的负面冲击接踵而至。所有这些国家在转型一开始就经历了变革造成的深刻、漫长而严重的衰退，这使得大多数企业背上了超额生产能力的负担，由于经济解放产生的撞击效应，巨额的沉没资本成本显露出来。

中央计划经济遗留的结构全都是“工业化过度”，另外，工业结构也主要集中在大型国有企业，这两种情况进一步加剧了这一问题。由于生产设施普遍陈旧，企业要想在新的市场环境中生存壮大，就必须进行积极的改组和进行新的生产性投资。但是，在转型的早期阶段，股票和债券市场实际上并不存在；大多数企业惟一可用的外部筹资来源就是国内银行借贷。新兴的金融市场（商业信贷市场最先涌现出来）效率低，而且是在信息严重不对称的情况下运作的，因为企业不再有适当的信用程度跟踪记录。市场不完善给企业部门获得信贷造成了额外障碍，进一步限制了企业的投资能力。结果，几乎在所有转型经济体中，累积投资都经历了漫长的衰退期。

大约在 1990 年代中期，大多数中欧和东欧国家的投资率都从转型时期最初几年的崩溃状态中恢复过来。投资增长得益于国内储蓄恢复和新近流入的外国直接投资，这主要是由于这些国家有可能要加入欧洲联盟（欧盟）。独联体的投资情况没有出现持久恢复，因为 1998 年爆发的俄罗斯金融危机再度动摇了投资者对这些经济体的信心。在最近几年里，由于石油价格居高不下，增长和投资又得以恢复。

图二.4

1970-2004 年人均投资增长率和人均国内总产值增长率的波动情况：投资波动对经济绩效的影响



资料来源：
联合国/经社部，根据世界
银行，2005 年世界发展
指标数据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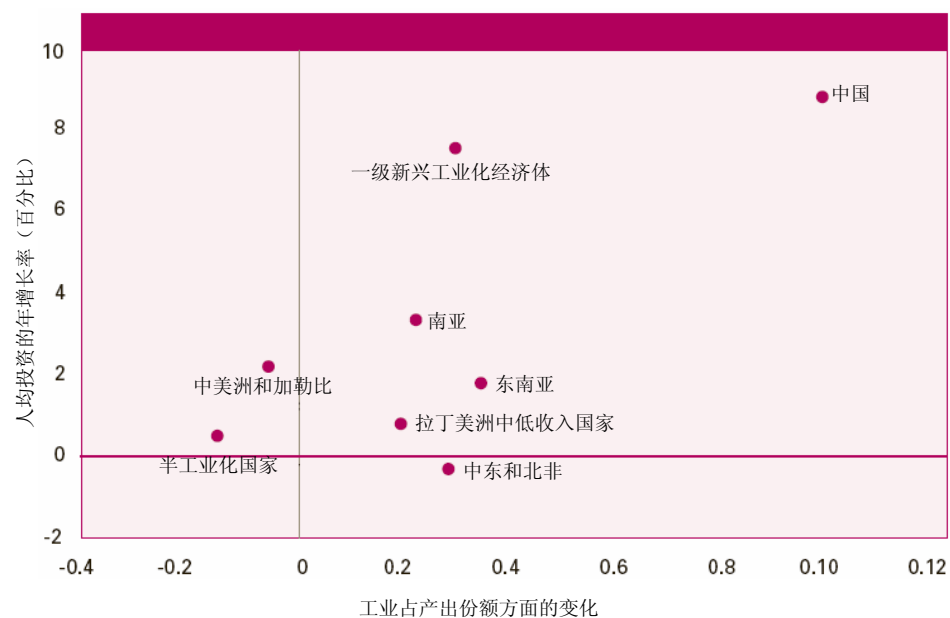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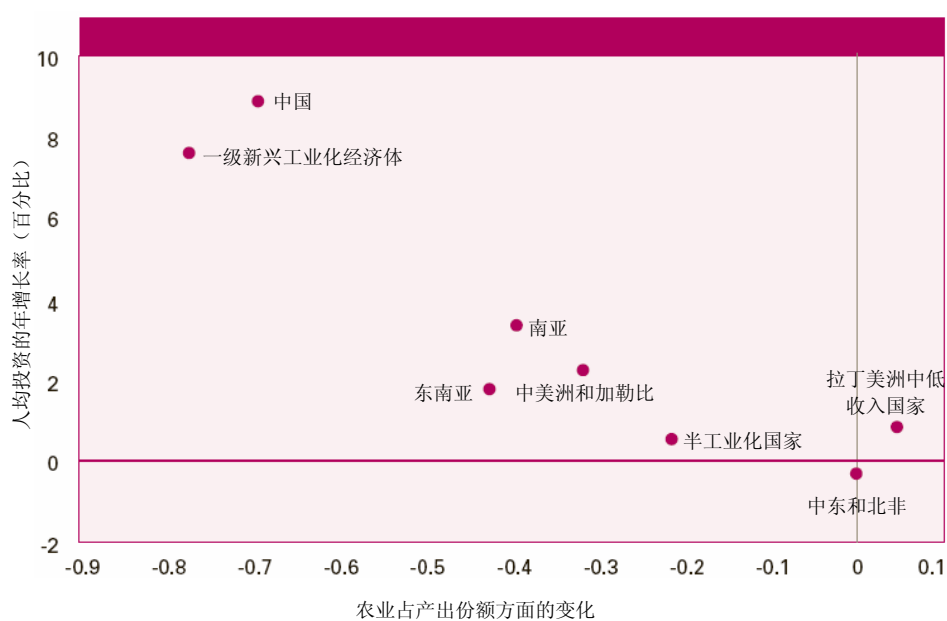
投资的构成也对增长绩效影响重大。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贸发会议）（2003 年）进行了经验性研究，有关该研究的审查表明，机械设备方面的投资比建筑方面的投资更有助于增长。按商品——例如，机械和建筑——分列的投资构成的可比数据比较少见，因此，证据有些分散。另外，如第四章所指出的，“理想的”投资构成也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如果收入水平比较低，对基础设施的投资能够产生巨大的增长效应。建造基础设施是不可避免的，这也要求高额的基础设施投资，特别是在发展水平较低的情况下。这暗示着在较低的发展阶段，各国应该为建筑投资分配较高的份额。

按目的部门分列的投资数据甚至更不容易获得。但可以认为，发展中国家预期的结构变化意味着许多投资一开始将流入工业部门。在较高的发展阶段，经济体可能要投资于（技术先进的）技术部门和金融及面向商业的服务部门。例如，在发达经济体，如美利坚合众国和日本，服务部门的产出占 60% 以上，预计大部分投资将流入服务部门。在其他发达国家（如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大韩民国），约 60% 的投资进入了制造业和金融中介、房地产和商业服务部门。

对金融和商业服务的
投资有助于工业增长

图二.5

1970-2003 年按特定区域和国家类别分列的人均投资年增长率与农业和工业
 占总产出份额的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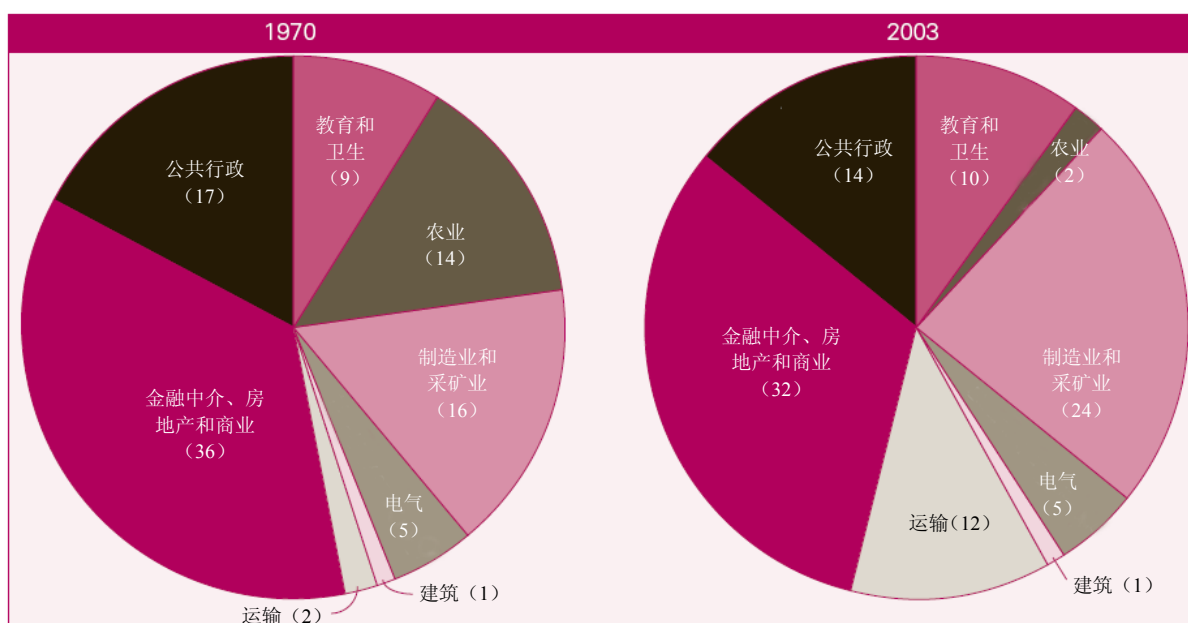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联合国/经社部，根据世界银行，2005年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和联合国统计司，国民账户总计数据库。

注：中国、一级新兴工业化经济体、中美洲和加勒比以及拉丁美洲中低收入国家，1970-2003年；东南亚、南亚及中东和北非，1980-2003年。

本章中使用了国家组别一段时间里的投资模式分析法，这种方法因缺乏数据而受到限制。但是，少数几个国家提供的数据或许可以说明很多国家的投资模式。大韩民国就属于这种情况。图二.6 显示，一段时间以来，大韩民国已不再为初级部门，如农业分配投资资源，而是转向了工业和增值更高的经济活动。农业的投资份额从 1970 年占固定资产形成总值的 14% 降至 2003 年的 2%，而工业部门的份额则从 1970 年的 16% 猛增至 2003 年 24%。在整个时期，其他部门的投资份额相对稳定，但是，应当指出的是，自 1970 年代初期以来，对金融中介、房地产和商业服务部门的投资占相当大的份额。这一事实说明了金融和商业服务发展不仅在高级阶段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在可持续增长过程的初期也具有重要意义。

图二.6

1970 和 2003 年大韩民国部门投资占固定资产形成总值的百分比份额



资料来源：联合国/经社部，基于大韩民国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

就业、生产率和结构改革

对于整个经济来说，实现劳动生产率增长，可以通过技术进步和/或将资源从生产率低的部门转入生产率高的部门。如上所述，通过后一种方法实现的那类生产率增长对于发展中国家往往更为重要。但是，采用新技术和经济的结构性转变如果没有增加产出，则可能会引起就业问题（因为按定义，生产率

实现劳动生产率增长，可以通过技术进步和/或将资源从生产率低的部门转入生产率较高的部门

发达国家的
增长过程也
包含就业
结构的明
显变化，
涉及到从
初级部门
向工业部
门并随后
向服务部
门的转变

较高的部门每单位产出使用的工人较少)。因此，如果要为所有工人提供有报酬的工作岗位并防止其失业，生产率较高的部门就必须在结构改革的过程中具有足够的活力（产出增长）。

根据 Maddison 提供的数据（2001 年），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过程也包含就业结构的明显变化，涉及到从初级部门向工业部门并随后向服务部门的转变。例如，1820 年，联合王国的农业就业份额为 37%，美国为 70%。到 1998 年，两国的这一份额分别降到 2% 和 3%。但是，就业方面的这些转变远远落后于产出方面的结构变化，因为农业和其他初级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往往比工业部门增长缓慢，在发展的初级阶段尤其如此。

在劳动力不过剩而且农业部门能够获得资本和技术知识的国家，没有看到农业和工业生产率增长之间存在差距。例如，阿根廷、加拿大和新西兰就属于这种情况，这些国家没有土地限制。但是，在许多其他发展中国家，农业生产率增长较慢，很可能是因为人口增长较快以及其他部门缺乏就业机会，这两种情况都意味着在农村部门劳动力未充分得到利用的现象日益严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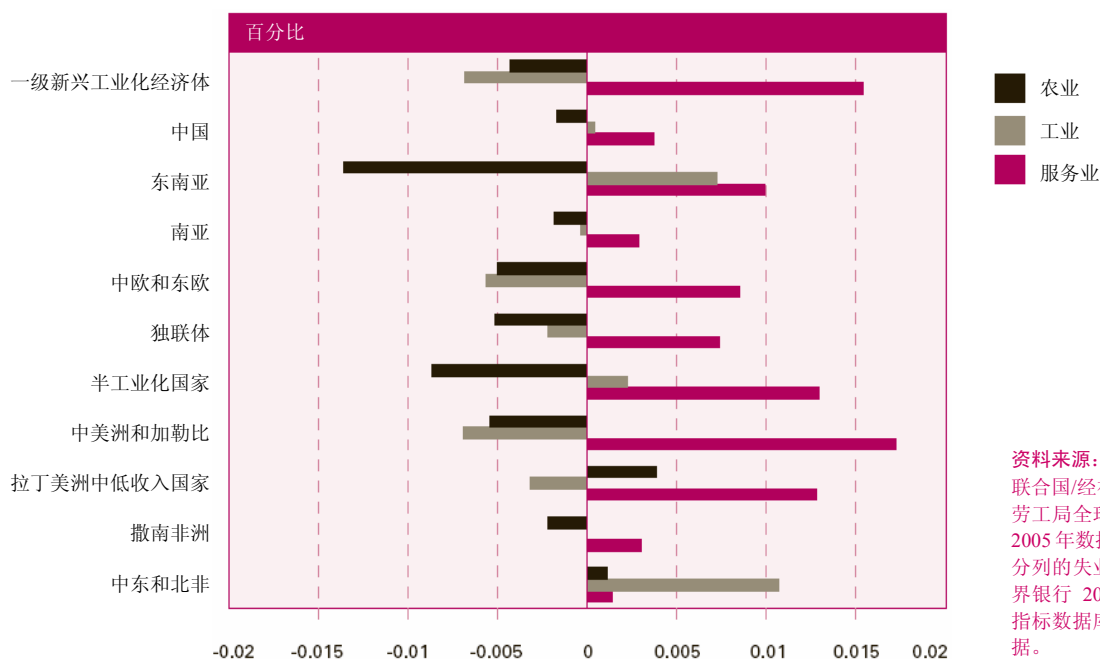
考虑到生产率与就业增长之间的联系这些概念之后，本节认定了哪些经济部门为生产率和就业收益所做贡献最多。根据按部门对整个经济的劳动生产率和就业率的简单分解，还是有可能确定各个部门为特定国家和区域的总体生产率和就业增长所做的贡献。按照这种分解法，累积生产率增长等于各经济部门的生产率变化之和，并以部门产出份额为加权数，再加上劳动力从生产率低的部门向生产率高的部门的调动（估算方法的详细情况，见本章附录）。重要的是要注意到，这种分解法适用于三个主要有关部门：农业、工业（即，制造业和采矿业）以及服务部门（也包括建筑和公用事业）。因此，这些部门内部发生的资源转移没有得到解释。这是一种严重的限制因素，因为生产率高和生产率低的生产单位在所有这些粗略界定的部门中并存。在服务部门中，这一点尤其重要，这是当今大多数经济体产生就业机会的最重要部门（见图二.7）。在这个部门，生产率低的的活动一般都包括非正规贸易和佣工，这种活动与生产率高的活动，如现代金融和商业服务并存。另外，由于数据有限，许多分析都局限于 1991 年至 2003-2004 年期间的劳动生产率变化模式。⁶图二.8 和图二.9 列示了本章所述所有国家组别的结果。但是，亚洲各国的时间序列较长。方框二.2 介绍了这些结果。⁷

⁶ 数据来自国际劳工局，全球就业趋势模式 2005 年数据库。

⁷ 数据的可用性有助于比较中国、一级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和东南亚自 1979 年以来的情况，以及不包括印度在内的东南亚自 1981 年以来的情况。关于后者，只有 1991 年以后的数据。

图二.7

1991 年至 2003-2004 年按特定区域和国家类别分列的农业、工业和服务部门为创造就业机会所做的贡献



资料来源：
联合国/经社部，基于国际劳工局全球就业趋势模式 2005 年数据库按经济活动分列的失业数据，以及世界银行 2005 年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的部门产出数据。

最成功的国家的特点是生产率增长较快（图二.8）。在所有这些个案中，工业发展是劳动生产率总体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图二.9，A 部分）。在大致界定的部门中进行劳动力调动在某些情况下很重要（特别是在东南亚和半工业化国家），从中可以衡量工人向生产率高的部门流动能为生产率的总体增长做出多大贡献，但在其他情况下这种调动则不太重要。这反映了在许多增长缓慢的国家，劳动力调动的主要特点是城市地区的就业问题。在这些国家，工业和现代服务部门的活力不足，将多余的工人推向非正规部门就业，致使生产率增长，特别是服务部门的生产率增长减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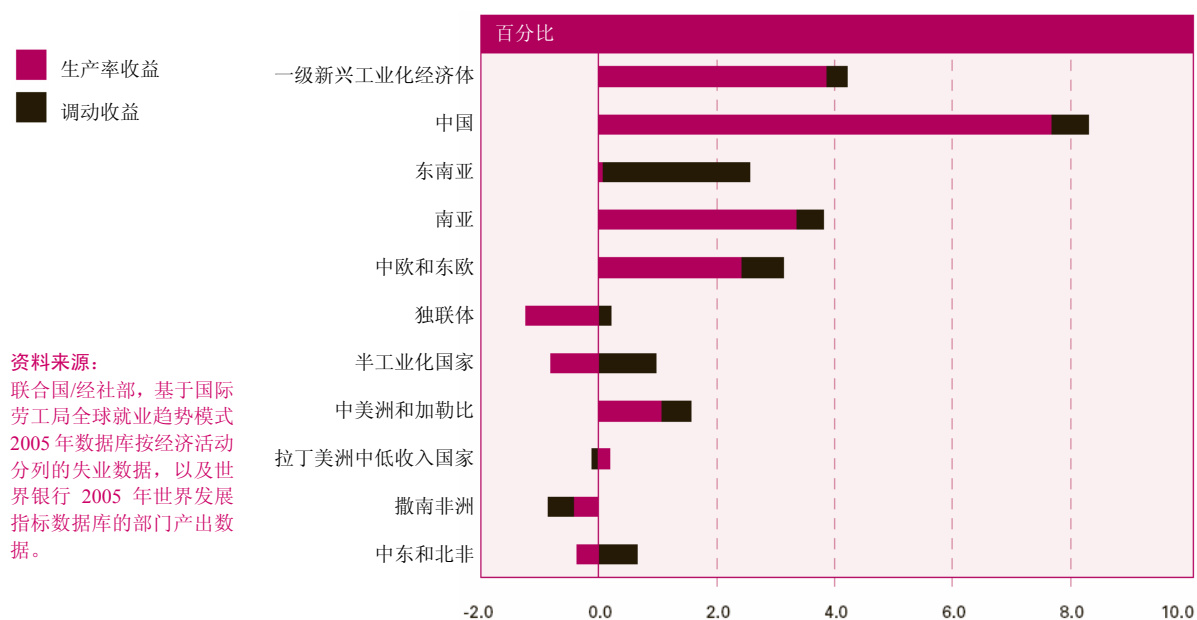
这意味着在增长缓慢的经济体部门内的分配效应大于部门间的调动效应，这具体反映在服务部门生产率提高（或降低）的比率上，确定这一比率的办法是看就业机会是在生产率高的服务部门产生的，还是在生产率低的服务部门产生的（图二.9，B 部分）。在此情况下，服务部门起着“最后就业门路”的作用，而不是促进生产率增长的能动作用。因此，服务部门生产率增

在某些区域，服务部门是“人们的最后就业选择”，从而造成了总体生产率增长低下

长缓慢完全可以说明增长过程缺乏活力。这是个典型的模式。但是，在其他一些情况下，农业也起着残余雇主的作用。因此，这一部门既没有劳动力明显调动的现象，也不会取得强劲的生产绩效。拉丁美洲中低收入国家就是这种模式的最佳实例（见图二.9，C部分）。在低收入国家，特别是在撒南非洲，传统农业的生产率水平极低，正好与城乡地区劳动力就业不足的情况十分吻合，这导致了生产率总体水平低下。

图二.8

1991至2003-2004年某些国家和地区劳动生产率年增长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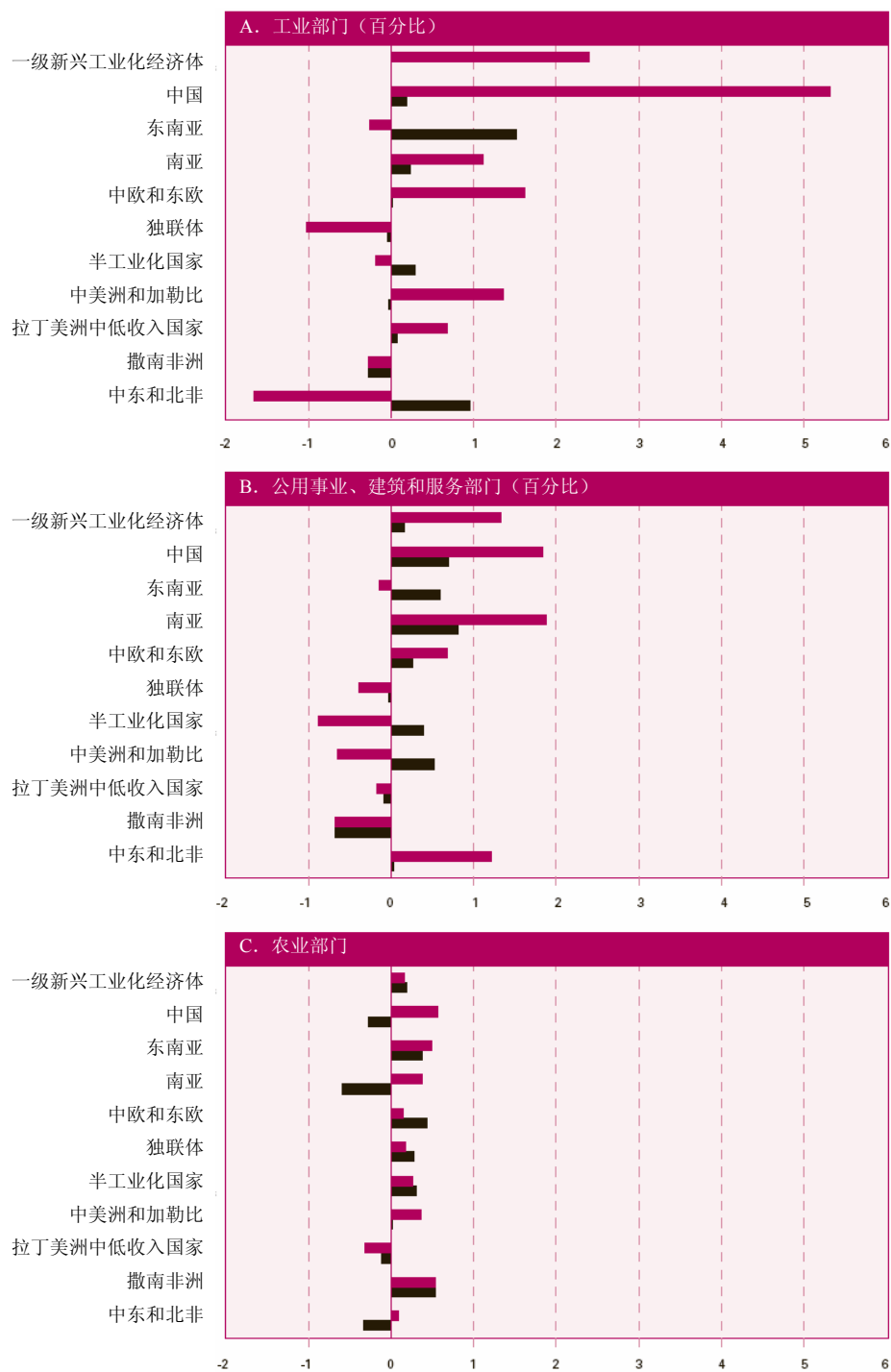


亚洲区域在结构改革期间的劳动生产率和就业率增长强劲

图二.8和二.9显示，三个亚洲区域和中国在劳动生产率年增长方面超过了其他所有区域，各种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增长都很高，同时产生了积极而显著的调动效应。因此，生产率高的部门就业增长强劲，与劳动力从生产率低的活动向生产率高的活动动态调动相吻合。从某种程度上讲，东南亚是这一模式的例外，不过，应该注意的是，1990年代该区域总体生产率绩效深受印度尼西亚在亚洲危机期间经历的严重衰退的影响。同其他区域相比，中国、一级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和东南亚的生产率都有强劲增长，并为整个经济创造了净就业机会（图二.10）。另外，从长期来看，亚洲各经济体在这方面取得的绩效给人印象最深（见方框二.2）。

图二.9

1991 年至 2003-2004 年按特定区域和国家类别分列的工业部门、公用事业、建筑和服务部门以及农业部门为整个经济部门劳动生产率增长所做的贡献



资料来源：
 就业情况，见国际劳工局，
 全球就业趋势模式 2005
 年数据库；产出情况，见
 世界银行，2005 年世界
 发展指标数据库。

方框二. 2

亚洲的生产率增长和结构改革

一些亚洲经济体提供的可比数据有助于对生产率增长和就业的部门转移进行长期分析。对亚洲各经济体的绩效进行更密切的研究受到重视，这也是因为它们它们在劳动生产率增长和就业的部门转移方面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

中国创造了该区域最佳绩效的纪录：1979-2002年间的劳动生产率平均每年增长6.7%（见表）。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势头与1978年实行的农村体制改革是一致的，当时，中国推行了家庭责任制并为农民提供了集体所有土地的使用权。此项改革也保证了农民能在自由市场出售其部分产品（见第五章）。这种体制改革导致了1980年代头五年农业部门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

中国政府采取渐变办法，经济向外国资本和技术开放，这为中国其余经济部门的生产率增长和劳动力需求的提高做出了贡献。所有部门，特别是制造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出现非常强劲的增长。劳动力从生产率低的部门大量调入生产率高的部门——按照传统的发展路线——为生产率的总体增长做出了更大的贡献。在1979-2002年整个时期，工作岗位的增长超出了劳动力增长的1.3个百分点（见图表）。尽管所有部门的就业率都有增长，但服务部门的增长最明显，该部门也见证了生产率增长最大的劳动力调动效应。

1979-2002年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劳动生产率分解情况

百分比							
	年平均生产增长率			调动效应			年增长总平均值
	农业	制造业	服务业	农业	制造业	服务业	
一级新兴工业化经济体	0.2	1.4	1.9	0.3	0.0	0.4	4.3
中国	1.3	3.3	1.6	-0.4	0.3	0.6	6.7
东南亚	0.2	0.7	0.4	-0.4	0.4	1.3	2.6
南亚	-0.2	0.3	0.4	-1.0	0.1	1.1	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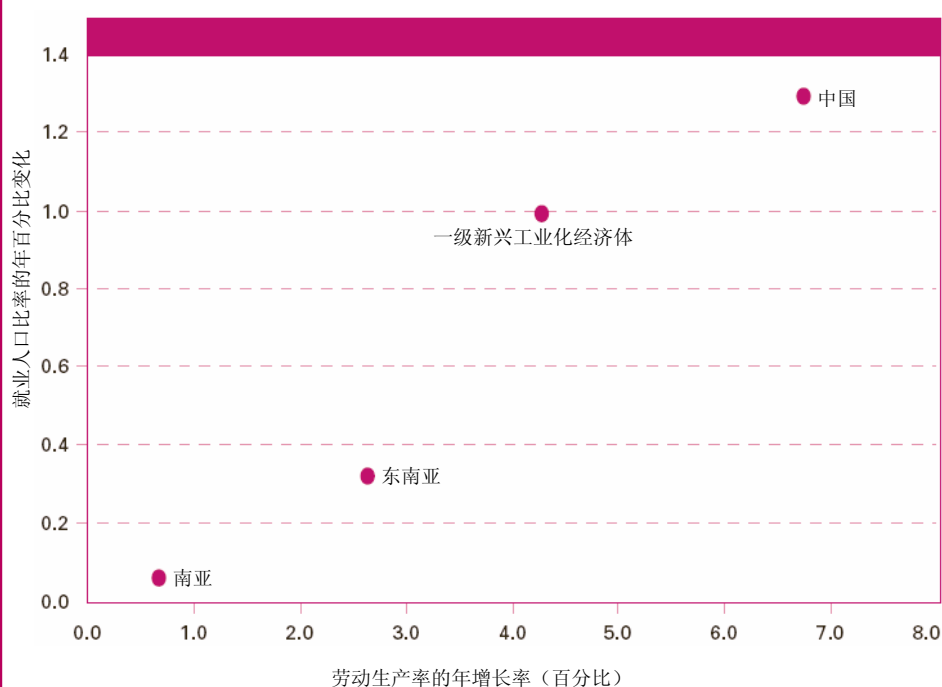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就业数据，见东亚发展研究国际中心（<http://www.icsead.or.jp>）；部门产出数据，见联合国国民账户总计数据库。

注：计算方法，见附录。

一级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的成功增长也得到了长期发展战略的支持，这种战略强调结构改革与改进各级经济活动需要同时进行。生产率实现了持久增长，特别是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经济在向资本和技术更密集的部门转型的同时，人力资本也有了明显改善。该区域的平均上学年数从1975年的6.5年增至2000年的10年以上。就业率（即就业工人占总人口的比例）在整个时期都有提高，尽管农业——1990年代还有制造业——对创造就业机会产生了消极影响。越来越多的工人被吸收到迅猛扩张的服务部门，这个部门创造了许多新的工作岗位，与此同时，与技术变革和投资相关的进步也使劳动生产率明显提高。

东南亚的劳动生产率增长不太可观，尽管仍然很强劲。1979-2002 年期间，劳动生产率的年增长率为 2.6%。产生的就业岗位只比人口增长高出 0.24 个百分点。工业生产率增长高于其他部门，而该区域服务部门创造的工作机会最多。因此，工业部门没有像中国那样在提高累积生产率方面起着最主要的作用。结构改革致使农业不断释放出劳动力，同时其他部门也创造了就业机会。

1979-2002 年亚洲发展中国家劳动生产率的年增长率和就业人口比率的年百分比变化



方框二. 2 (续)

资料来源：
东亚发展研究国际中心
(<http://www.icsead.or.jp>)；
联合国统计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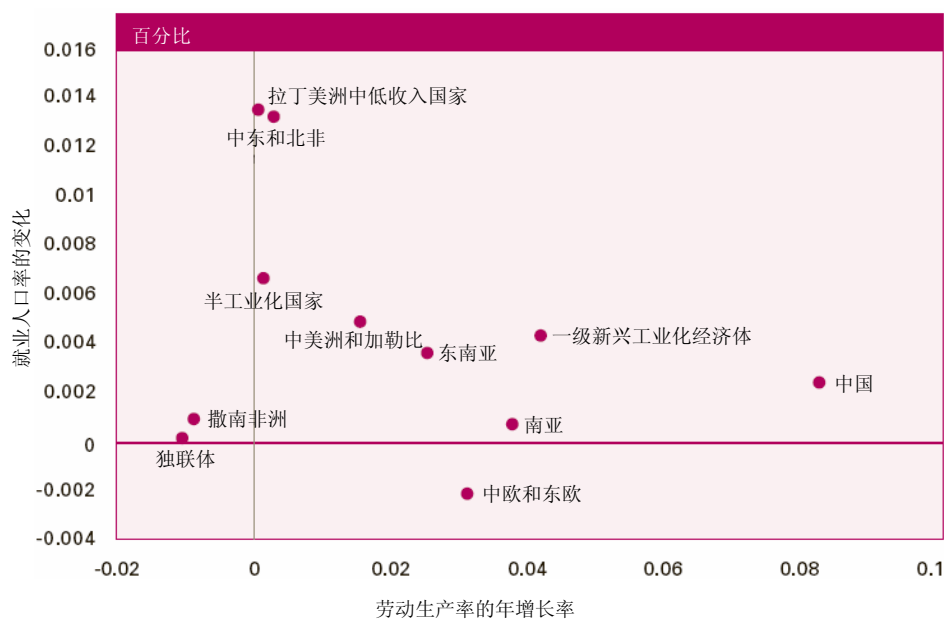
有关南亚的现有数据表明，尤其是在 1990 年代，该区域的劳动生产率增长开始加速。最近的发展情况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中国的经济增长和一级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的工业改组产生了积极的外溢效应，这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特别是纺织业向该区域转移有关。贸易服务部门迅速扩张也是一件大事，是该区域生产率绩效在 1990 年代得到改善的重要原因。同时，印度经历了一个非工业化过程，这使某些观察家对印度的增长过程能否持续下去表示怀疑。例如，Dasgupta 和 Singh (2005 年) 指出：“经济史表明，对于印度这种人均收入水平的发展中国家来说，经济增长一般是由制造部门引领的。”事实上，现有数据表明，在整个 1990 年代，尽管该国国内总产值增长水平较高，但整个经济没有创造多少工作机会。因此，劳动力使用不足的现象仍然十分严重，特别是不熟练工人，因为扩大服务部门主要为熟练程度较高的工人创造了工作机会（见方框三.3）。

中欧和东欧及中美洲和加勒比的生产率增长非常适中

从模式上看，中欧和东欧及中美洲和加勒比各国居于亚洲和生产率总体绩效很差的区域之间。这些区域的生产率在1991至2003年期间增长不明显，它们的经济十分脆弱，几乎没有创造任何净工作机会。中欧和东欧尤其如此，该区域的生产率增长在1990年代后五年有所好转，这是在外国直接投资流入支持下经济复苏和对新技术投资的结果。劳动生产率增长主要是由工业的技术变革推动的，但是，该部门的就业率每年下降0.15%。1991-2003年间，中欧和东欧整个经济部门的就业率每年下降0.75%，这主要是由于工业和农业部门大量人员下岗和企业进行了改组。尽管如此，就业人口比率仍有所改善（见图二.10），这是因为在柏林墙倒塌后一个时期人口有所减少。

图二.10

1991至2003-2004年按特定区域和国家类别列的劳动生产率年增长率和就业人口比率的年百分比变化



资料来源：
就业情况，见国际劳动局，
全球就业趋势模式 2005
年数据库；产出情况，见
世界银行，2005年世界
发展指标数据库。

除哥斯达黎加以外，中美洲和加勒比国家的工业部门没有成功地增加多少工作岗位，整个区域每年有0.8%的劳动力失业，致使制造部门占就业总数的份额大幅度下降。但是，总的来说，由于服务部门吸纳了其余经济部门的失业工人，该区域的就业率有所增长，而且确实有助于总体就业人数的适度增长。然而，这导致了服务部门生产率的下降，并对快速提高工业生产率产生了反作用。

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的拉丁美洲国家，工业部门的生产率增长也以牺牲工作岗位为代价。事实上，工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之所以增长，主要是因为就业下降速度超过了产出。由于农业和服务业部门的生产率绩效为负数，整个区域的劳动生产率总体增长几乎为零，这两个部门吸纳了工业部门精减的大多数工人，并确实帮助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如上所述，只有该区域的农业部门在帮助吸纳工业部门精减的剩余劳动力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见图二.9, C 部分）。总之，就业率有所增长，但生产率没有同时增长（见图二.7）。

在绩效较差的拉丁美洲国家，生产率增长以牺牲就业岗位为代价

在半工业化国家及中东和北非经济体，吸纳了大部分工人的部门的生产率增长表现为停滞或负增长。半工业化国家的工业和服务业的生产率都有下降，分别导致累积（整个经济）生产率增长为-0.1%和-0.9%。部门间劳动力调动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生产率下降的局面，成为在此期间累积生产率没有下降的原因。这两个区域的就业岗位总体上是动态的（见图二.10），但大多数工作岗位都产生于服务部门，特别是非正规活动中。⁸智利属于这种模式的例外。智利经济的劳动力生产率增长强劲，每年达 3.1%，这主要是由工业（1.4%）和服务业（1.4%）推动的。

在半工业化国家及中东和北非，提供工作岗位的部门的生产率没有明显增长或没有增长

最令人不满意的是既没有产生净工作岗位，生产率又没有增长的区域。在这种情况下，部门为生产率增长所做的贡献和调动效应往往是负数。这种形势是独联体和撒南非洲增长过程的特点（见图二.10）。1990 年代前五年，俄罗斯联邦和乌克兰的产出和就业急剧崩溃。尽管如此，产出下降速度比就业更快，导致劳动生产率绝对下降。近年来，产出增长有所恢复，致使整个时期的劳动生产率增长为正数。在撒南非洲，大多数就业岗位（70%）仍在生产率低下的农业部门。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入城市，从事的仍是生产率较低的服务和工业活动，导致这些部门的生产率增长为负数，而且调动的总体效应是消极的，但是，各部门的生产率水平仍然相差悬殊。农业部门每名工人的产出比其他经济部门低九倍。

在撒南非洲，大多数就业岗位仍在生产率低下的农业部门

结论

发展中国家增长模式日益趋异，这在结构改革中也以不同程度凸现出来。对

⁸ 1990 年代头五年，服务部门的就业份额从 50%增至 61%。据 Stallings 和 Weller（2001 年）讲，1990 年代拉丁美洲创造的新的工作岗位中有 60%为非正规部门中报酬低、生产率低的工作岗位。非正规部门之外产生的工作岗位大多数在商务部门，其次是金融和商业服务。

过去 40 年来结构变化格局的分析表明，这种有活力的变革是高速增长东亚和南亚经济的一个显著特征。结构改革程度相对较低的经济体则落在了后面，特别是撒南非洲国家。拉丁美洲和加勒比中等收入国家以及中东欧、中东国家和前苏联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长期增长缓慢就是与非工业化过程有关。在这些国家，增长——尤其是就业增长——主要集中在生产率低下的服务部门，而农业和工业增长几乎停滞不前。相比之下，东亚和南亚的高速增长始终与农业重要性的快速下降以及工业和服务部门的强劲扩张有关。

东亚和南亚经济体的高速增长表现为劳动生产率持续增长，劳动力从生产率低的部门向生产率高的部门转移

这些经济体不仅增长迅速，其劳动生产率也持续提高，而且劳动力已从低生产率部门向包括现代服务部门在内的高生产率部门转移。在低增长区域，就业向服务部门的转移甚至更为明显。不过，与亚洲相比，撒南非洲、拉丁美洲和前苏联服务部门的生产率却在不断下降，许多工人因其他经济部门不能创造就业机会，而在生产率低下且同更为活跃的经济部门联系不密切的服务部门寻求就业。

积极的结构改革包括加强经济体内部的经济联系

积极的结构改革包括加强经济体内部的经济联系，即整合国内经济，而且所有重要部门的生产率都要进一步提高。国内经济的整合程度还影响到一个国家能够从国际贸易和投资中获得多少好处。后面各章探讨了外部环境、宏观经济政策和治理结构是如何影响结构改革模式差异的。

附录

关于分解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和
就业人口比率的技术说明

此处采用劳动生产率分解法来跟踪农业、工业和服务部门为整个经济部门劳动生产率增长所做的贡献。它使用的是 Syrquin 法（1986 年）。在图表二.9 中，每个部门的生产率增长率总和及其各自的调动效应加起来，即为累积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分解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的相关公式为 $\sum X_0^i = X_0$ ，其中 X_0^i 一项代表按部门分列的产出水平（ $i = 1, 2, \dots, n$ ）

设 $\theta_0^i = X_0^i / X_0$ 为部门 i 的在零时期占实际产出的份额。同样，就业为： $\varepsilon_0^i = L_0^i / L_0$ ，其中 $\sum L_0^i = L_0$ 。 i 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水平为 X_0^i / L_0^i ，其增长率被界定为 $\xi_L^i = (\hat{X}^i - \hat{L}^i)$ 。在略做处理之后，得出了如下整个经济部门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的精确公式：

$$\xi_L = \sum_i [\theta_0^i (\hat{X}^i - \hat{L}^i) + (\theta_0^i - \varepsilon_0^i) \hat{L}^i]$$

劳动生产率增长率 ξ_L 可以分解为两部分。一个是按常规计量的部门生产率增长率加权平均值之和，即， $\sum \theta_0^i (\hat{X}^i - \hat{L}^i)$ 。该权数为产出份额， θ_0^i 。第二项是 $\sum (\theta_0^i - \varepsilon_0^i) \hat{L}^i$ ，反映了“调动效应”。如果 $\theta_0^i > \varepsilon_0^i$ ，则 i 部门的产出份额大于其就业份额，意味着该部门的平均劳动生产率较高。该部门的就业增长（或在 $\theta_0^i < \varepsilon_0^i$ 的情况下，该部门的 \hat{L}^i 为负数）将使累积生产率增长提高。

（图二.10 和方框二.2 中报告的）第二项工作将整个经济部门的就业人口比率分解为每个部门的就业人口比率和部门就业份额的增长率。如果特定部门的人均产出超过了该部门的劳动率增长，该部门的就业率则升高。这一新的深刻见解由 Passinetti（1981 年）提出。强劲的经济绩效的特点是生产率增

长持久，而且总体就业/人口比率也在上升。为了观察详细情况，人们可以从这 $\phi_0 = L_0 / P_0 = \sum_i (L_0^i / X_0^i)(X_0^i / P_0)$ 一公式入手，其中 P_0 是人口， Φ_0 是一个时期初就业人口所占的份额。每个部门的劳动产出率（生产率平均水平的逆运算）被界定为 $b_0^i = L_0^i / X_0^i$ ，部门人均产出水平为 $\chi_0^i = X_0^i / P_0$ 。就业人口份额增长率 Φ 可以表示为 $\hat{\phi} = \sum_i \varepsilon_0^i (\hat{\chi}^i + \hat{b}^i)$ ，其中 ε_0^i 为部门就业份额。每个部门的人口生产率增长率为 $\xi_L^i = (\hat{X}^i - \hat{L}^i)$ 这样，劳动/产出率的增长率则 $\hat{b}^i (1 + \hat{X}^i) = -\xi_L^i (1 + \hat{L}^i)$ 为。 $\hat{\phi}$ 的最终结果是按 $\hat{\phi} = \sum_i \varepsilon_0^i (\hat{\chi}^i - \xi_L^i)$ 得出的。换言之，就业/人口比率增长率为部门人均产出增长率与生产率之差的加权平均数。占就业总数份额较高的部门 ε_0^i 为该平均数做出了主要贡献。可以说，就“动态”部门而言， $\hat{\chi}^i > \xi_L^i$ 及其逆运算在“下降”或“成熟”部门也适用。

第三章

贸易一体化引起了更大的趋异性吗？

经常有人宣称，通过加大商品、服务、资本、技术和劳动力（被公认为是群体中流动性最差的因素）流动而进行的全球经济一体化增加了增长和发展的机会，因此，为缩小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之间的收入差距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趋于一致的说法是，经济一体化通常是指战后日本所经历的过程，是指自 1950 年代以来的西欧周边国家和最近以来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体所经历的过程。在所有这些例子中，投资与贸易之间的强大联系的确提供了强大动力，有助于这些经济体的经济增长率超过领先工业化经济体的增长率。

但是，一体化并不是实现经济迅速和持续增长的灵丹妙药。自 1980 年代中期以来，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一直在忙于向全球经济力量开放，但结果却是不尽相同，包括有些发展中国家毁掉了以前所取得的成就。最近以来，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取得了强大的经济成就，实现了它们几十年以来所见的最快的平均增长率。除了其他原因之外，取得这一成果基本原因是政策环境和政策结果得到改善，没有重大外来冲击以及以增加官方发展援助、减免重债穷国的债务、全世界范围内的低利率以及商品价格的强大反弹为特征的国际背景。但正像过去的商品周期所证明的那样，所提到的最后一个因素可能不会长期持续下去（联合国，2006 年）。

本章将重点讨论贸易一体化和外国直接投资在支持这一进程当中所起到的作用（金融一体化将在第四章进行讨论）。它认为，实际上，各国为了让它们的经济融入全球商品和服务市场所采取的具体策略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因为它们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这些国家可能从加强贸易流动中所得到的利益的程度。一体化的时机选择（包括在国家准备加入并积极参与全球市场和在一体化发生时可以获得的机会两个方面）以及用多快的速度来执行这一进程（是逐步执行，还是通过快速放开）也是相关的因素。但在一个相互依赖的世界，一个国家的策略是否有效不能孤立地加以判断，它取决于全球经济的基本结构特点。贸易的成功取决于所制造的产品和所提供的服务，产品和

经济一体化并不是经济迅速和持续增长的灵丹妙药

服务是如何制造和提供的，以及生产过程是否引起与经济体中其余部分建立充分联系，从而使这些活动能够为经济体的活力转变做出充分准备，同时要在整个国内经济中对增长动力来自国外的事实进行宣传。如果外国直接投资进行适当管理并将其纳入以不断提高国家技术能力为目标的战略，它可以带来持久的利益。这些因素（包括能够使更加有效的一体化模式成为可能并促进更大趋同性的政策选项）将在下文进行分析。

本章组织如下：第一节讨论专门化模式和出口多样化在增长结果中所起的作用。然后是评估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对支撑专业化模式和对促进加快接收国增长速度所做出的贡献。在这两节所进行的分析强调了生产部门在制定政策，推进结构转变，促进将新的活动、产品和流程引入经济体和提高本地技术能力方面的重要性。这些问题将在下一节讨论。在本章的上下文中，生产部门制定政策被理解为包含以下干预措施，即以促进转变经济结构和转移资源以支持农业、制造和服务业中更有生产能力的活动为目标的干预措施。结论部分提到一些需要进一步加强国际合作以促进提高趋同性的领域。

国际贸易对增长趋异性的 促动作用

较快的国内总产值增长和较快的出口增长经常是相互关联的

较快的国内总产值（GDP）增长经常是与迅速的出口增长联系在一起的。出口在几个方面与经济增长联系在一起（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1992年）。第一，出口是总需要量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它对国内生产有着直接效应和乘数效应。第二，（净）出口增长减少了许多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外汇制约因素，增加了为投资和增长筹集资金所需的资源总量。第三，通过取消国内需求可能对扩大产出所施加的限制，出口使利用大规模经营的规模经济和增加收益成为可能。最后，出口（特别是工业制成品）能够通过各种渠道有助于技术革新，而技术革新通常又是与迅速增长联系在一起的。

出口组成对增长关系重大

尽管这些理论依据具有说服力，但关于总出口增长与增长之间的因果联系的统计证据却是五花八门，似乎随着国家和时间的不同而各异。增长情况似乎关系到一个国家长期以来所选择的具体出口组成。具体来讲，选择改变国家的生产结构（使跨部门建立生产联系和增加附加值成为可能）和参与不断成长的全球市场通常有可能取得更好的经济效益。

如果要分析发展中世界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系以及国际贸易在各国

增长趋异性中可能起到的作用，有两个因素需要考虑。第一个因素是全球市场增长对发展中国家出口增长的贡献率。通常而言，快速增长的（或有活力的）出口市场是拥有高收入弹性需求的产品和服务市场，也就是说，需求增长高于进口市场中收入增长的产品和服务。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使经济多样性（通过差别化、新设计等方式创造新的服务或产品）或通过利用较低的生产成本（主要是工资成本）引进先前在工业化国家开展的生产活动（全球最大的进口需求来源），增加这些市场中的出口机会。例如，近几年纺织品和服装出口相对快速增长的部分原因就是生产能力已经从发达国家转到发展中国家。

第二个因素包括以拥有强大技术含量的部门为代表的有活力的规模经济和由此带来的收益增加。在此方面，可以预计，使具有较大技术含量的部门专业化将会导致更快速度的经济增长。在实践中，这两个因素是联系在一起的，因为具有较高技术含量的产品常常就是那些用来扩大全球市场的产品（见下文）。关于服务贸易，现有数据也表明，以较长速度增长的出口市场是那些技能和知识密集型的服务市场。

具有高技术含量的产品市场通常增长较快

当然，其他方面的发展也在起着作用。生产过程的全球化和综合生产网络（IPNs）的出现导致了某些产品的贸易增加，因此“形成了”新的市场。多边贸易环境也对市场的发展变化或阻碍它们的出现产生某种影响。例如，在市场准入方面，农产品和低技能、低等技术产品比具有较高技术含量的产品面临相对较高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而以短期提供自然人（国际劳动力移民）为形式的服务出口则受到严格控制和限制。

发展中国家可以采用两种广义出口策略当中任何一种。一种策略是将提高专业化作为一个国家提高其市场渗透率的手段，也就是说，在其已经成为一个既定出口国的市场扩大其存在。另一种策略是必须使国家的生产结构多样化，从而使它能够参与其以前并不活跃的（动态或其他）市场。在这两种情况当中的任何一种情况中，出口策略通常意味着要在市场中从其他参与者那里夺取市场份额。产品和服务多样化，使之具有全球市场扩张、高附加值和高生产率增长的更大潜力“扩大了利用从更大市场增加收益的范围，增加了贸易对增长的贡献”（Aykuz，2003年，第2页）。

通过专业化或多样化可以实现不断增加对全球市场的参与

在实践中，这些可能都是相互支持而不是相互竞争的策略，大量证据表明，大多数国家可能都会经过越来越复杂的多样化阶段，直到工业成熟水平，

虽然外部一体化重要，但形成国内联系才是根本

同时，服务活动表现出的重要性在不断增加（Imbs 和 Wacziarg，2003 年）。当然，如果新部门中的生产率增长的潜力以及与经济中其他部门的联系潜力受到限制，那么多样化本身将不具备产生可持续发展的条件。因此，Wade（2004 年）对“外部一体化”和“内部一体化”进行区分，并且认为，多数成功案例已经制定了确保这些策略相互支援而不是相互制肘的政策。因此，专业化模式和融入全球经济的模式对增长趋异性起着重要作用。

一些商品市场比其他商品市场更容易进入……

发展中国家比较容易获得的机会是生产和出口初级商品、以自然资源为基础和劳动力密集型的产品。但是，如果国家不对其经济进行超出这些部门范围的结构改革，这些产品在全球市场上的扩张潜力相对有限的事实可能会反过来制约长期增长。另外，新参与者对这些市场的同时进入可能会轻而易举地导致市场饱和，因为许多初级商品市场增长相对缓慢。换句话说，在几个国家同时尝试相同的贸易多样化策略时，对一个国家或少数国家起作用的策略未必带来相等的积极成果：这些“组成假象”作用随产品供应过剩出现，可能导致价格下降和恶化贸易条件。在面临低收入弹性需求的商品市场，这种现象可能特别重要，非燃料商品平均价格的发展变化就是例证，这些价格相对于发达国家在 1980-2000 年期间出口的工业制成品价格下降了 49%。最近非燃料商品价格的恢复尚不足以补偿这一损失。截止 2005 年底，非燃料商品实际平均价格仍然低于 1980 年的价格水平（见联合国，2006 年）。另外，商品价格显示了明显的挥发性，可能会降低初级产品生产多样化的效率。这种价格挥发性常常会导致收入和外汇缺少稳定性，而这种稳定性正是长期投资和较快增长所需的。

……但这可能无助于长期的持续快速增长

一些具有商品类似特征的制造业从属部门也出现了“组成假象”。事实上，一些低技能工业制成品的出口商已经遇到出口价格下降的问题。电子和电气商品的技术进步和市场竞争的加剧（工业制成品经常是与高技能高技术含量联系在一起的）也是导致一些产品价格下降的原因（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002 年）。同时，其他国家似乎随着本国经济结构继续多样化也在改善其贸易条件方面取得了成功。

经济快速增长的经验表明，成功不光靠增加出口量，还要靠从有活力的规模经济中获得利益，在国内经济中形成生产联系，在寻找具备增长潜力的产品和服务的背景下转变长期生产结构。由于数据方面的限制，服务出口中专业化模式对增长的影响将另行分析。

全球市场活力和商品出口 结构的变化

在过去 40 年当中，商品贸易迅速增长。在 1962 年至 2000 年期间，全球商品贸易价值的年平均增长率为 10.4%，贸易量年增长率为 6%。在贸易价值和贸易量两个方面，这一时期的前半段时间都经历了相对较快的增长。¹ 尽管发达经济体仍然掌控着所有非石油出口市场，但发展中国家已经迅速扩大了其在全球市场中的参与，特别是自 1980 年代后半期以来。更为重要的是，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集团）的出口结构已经从初级产品向工业制成品有了重大转变（见图三.1）。²

发展中国家增加了其在低等技术（LT）、中等技术（MT）和高技术（HT）工业制成品全球市场的参与，平均而言，这些市场比初级产品（PP）市场和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工业制成品市场相对更有活力（定义、方法和数据来源见本章附件）。事实上，在 1965 年至 2000 年期间，前三类产品在全球出口中的份额增加了，而初级产品和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NRB）工业制成品在全球市场中的份额在不断减少（见表三.1）。由于初级产品的收入弹性低、市场准入门槛提高、技术革新和价格变化等原因，致使初级产品在全球市场中份额不断减少的趋势尤其明显（见方框三.1）。

发达国家增加了其对全球工业制成品市场的参与

发展中国家在低等技术工业制成品市场中取得的突破给人们的印象尤其深刻，截止 2000 年，这一类产品已占世界总出口量的 50%。这一成果的取得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中国、一级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和东南亚所做出的努力。它们出口的低等技术工业制成品合在一起占到全球本类产品市场总额的 32%。对中等技术工业制成品的市场参与也在增加，而且这一努力也集中在以下几个地区：新兴工业化经济体、东南亚和拉丁美洲。同时，由于一级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和东南亚在这个部门中取得的突出成就，致使发展中国家在高技术工业制成品方面的市场份额也取得了大幅度增长。另一方面，由于发达国家在市场渗入方面的增加，发展中国家在初级产品方面的平均市场份额下降。由于本章所进行的分析是按照贸易价值而不是按照贸易量进行的（见附件），故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商品出口之间的价格差异可能对这一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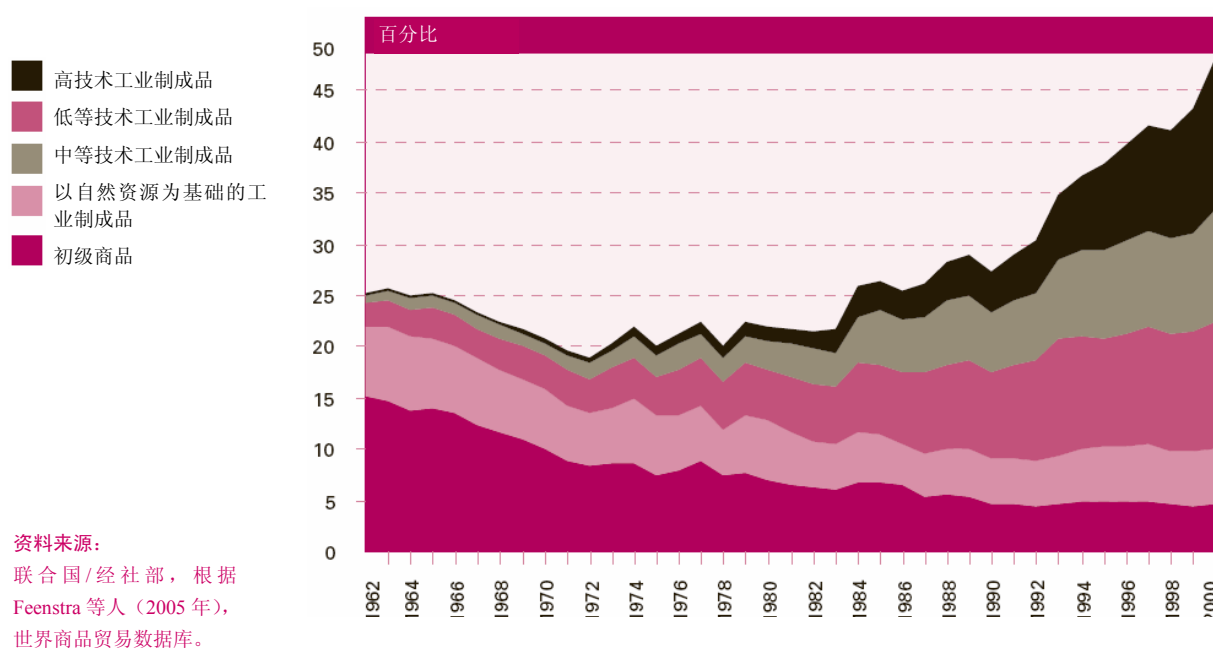
¹ 在 1962 年至 1980 年期间，世界商品贸易实际年平均增长率为 15.7%，贸易量年平均增长率为 7.1%。1981 年至 2000 年期间的相应数字分别为 5.8% 和 5.1%。

² 在本章所进行的分析当中，发展中国家集团中包括那些处于转型期的经济体。

起到一定作用。另一种可能存在的因素是发达国家在农业市场方面执行的相对较高的保护主义和补贴。总的来说，发展中国家得以实现其生产结构的多样化，因此增加了其在比较活力的全球市场中的参与。

图三.1.

1962年至2000年期间发展中国家出口价值占发达国家出口价值的比例，按商品种类列示



表三.1.

1965年至1970年、1980年至1985年和1995年至2000年期间世界商品贸易中的产品份额^a，按产品种类列示

比例	1965-1970	1980-1985	1995-2000
初级产品	22.8	15.5	6.7
以资源为基础的商品	20.8	18.0	14.6
低等技术工业制成品	16.2	17.4	18.8
中等技术工业制成品	31.9	36.1	35.4
高技术工业制成品	8.3	13.0	24.5

资料来源：联合国/经社部，根据 Feenstra 等人（2005年）提供的资料。

^a 按美元时价计算价值。

初级商品市场和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 工业制成品市场能否成为有活力的市场？

方框三. 1

尽管初级商品和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NRB）工业制成品在世界贸易中的总体增长率相对较低，但许多产品还是显示了它们的增长活力，也就是说，它们的出口增长快于世界出口增长率（见附表 A.4）。这里应该有一个附带条件，即这里所提供的出口数据包含贸易价值而不是贸易量，这或许意味着价格趋势可能比出口贸易量的增长对出口收入产生的影响更大。

但附表 A.4 所显示的 1962 年至 1980 年期间所有快速增长的初级产品（一种除外）和所有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工业制成品的出口增长率稍略低于其他种类有活力产品的增长率。在 1980 年至 2000 年期间，这一差距被拉大，而有活力的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工业制成品的平均表现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以铀为基础的产品的影响（见附表 A.4）。除了这些以铀为基础的产品，其余产品的出口平均增长率低于其他种类工业制成品。

以上证据并不能充分说明，如果资源转向初级产品或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工业制成品生产，或这些部门的活动必定是低技能和/或技术含量低和具有溢出效应的活动生产力就不能更快提高（见附件）。同样，发展中国家参与中等技术和高技术工业制成品出口，未必意味着这些国家已经取得接近或达到技术尖端领域所需的能力。在这些国家中，除少数国家外，研究和开发（研发）支出水平以及科技发展方面所雇用的人力资源都不足以与其出口的产品技术含量的要求相匹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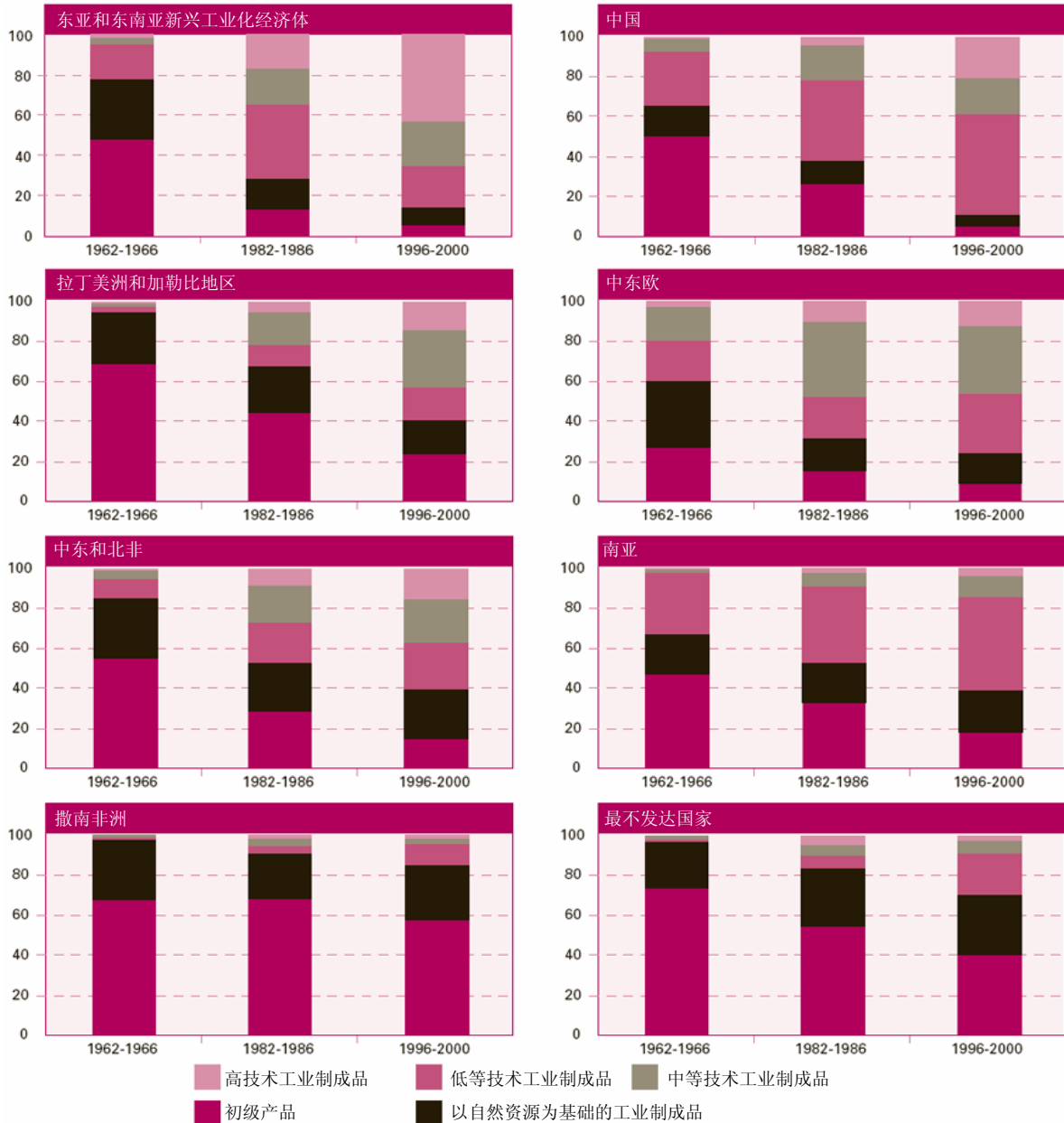
正如在第五章中所讨论的那样，一个具有生产效能的农业部门常常是今后经济发展的基础。另外，个别国家还利用对其自然资源进行工业加工，成功地实现了产业多样性。智利的经验表明，通过专门从事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高值出口，能够保持高出口和国内总产值增长率，包括采矿业和农产品（如果智利想要保持长期增长，就需要不断地向更高增值商品改进）。在非洲，博茨瓦纳通过钻石和肉类出口的推动，实现了高增长率（Acemoglu、Johnson 和 Robinson, 2003 年）。在马来西亚和泰国的工业化过程当中，农业也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出口也帮助两国克服了亚洲金融危机以来的经济衰退（Bonaglia 和 Fukasaku, 2003 年）。在发达经济体当中，芬兰和瑞典是所提到的另外两个例子。但这些国家并没有止步于使商品生产专业化，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向正在经历更稳定的贸易条件和更快生产率增长的其他部门发展。

因此，在过去 40 年当中，发展中国家的出口结构发生了迅速变化（见图三.2），一些国家集团比其他一些国家更早和更快地实现了以非自然资源为基础的出口多样化。一级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和东南亚国家就是这样的例子，

发展中国家的出口结构发生了迅速变化

图三.2

1962-2000年^a按发展中国家所在地区或国家集团列示的发展中国家某些种类的非石油出口占总地区出口的股份
(在地区出口总额中所占的比例股份)



资料来源：联合国/经社部，根据 Feenstra 等人（2005 年），世界商品贸易数据库。

注：定义和方法见第三章中的附件。

见国家分组的注解。

^a 特定时期的地区出口总额作为单个国家在每一类出口总额的简单平均数进行计算。

首先使低等技术工业制成品多样化，然后是高技术工业制成品多样化。与之相反，撒南非洲一直是初级商品出口多样化速度最慢的地区。其余地区介于这两种极端情况之间，正以不同的速度向新的出口市场前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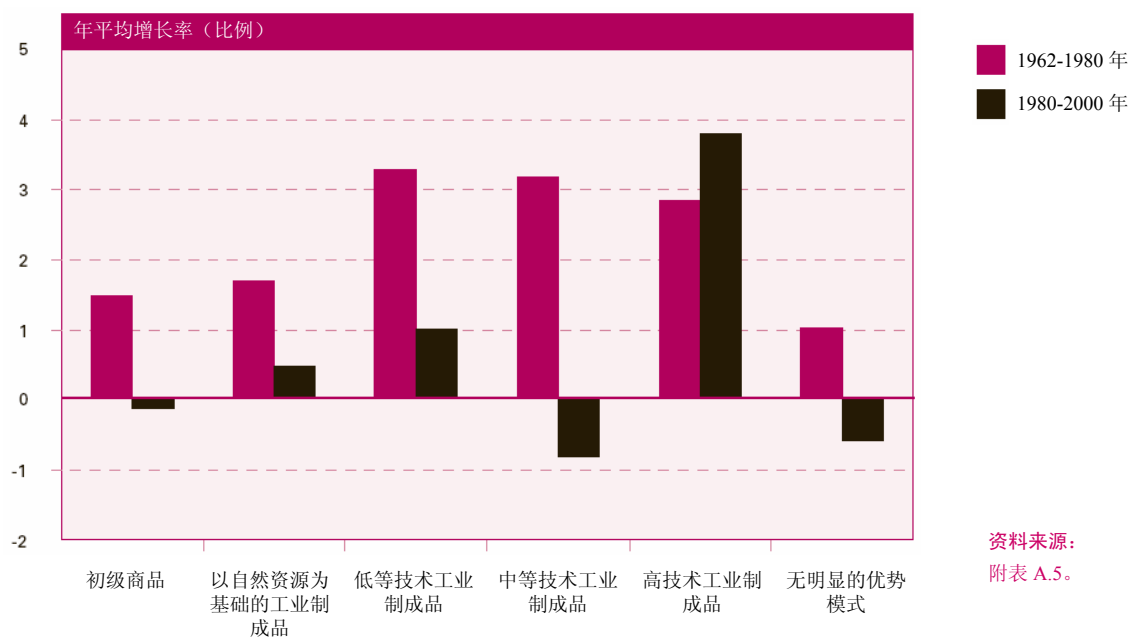
工业制成品在全球贸易中相对较快的增长意味着，没有十分迅速或广泛地转向这些产品生产和出口的地区，其出口增长相对较慢，而且都失去了在全球市场中的份额。所有地区都将市场份额拱手让给了一级新兴工业经济体、东南亚国家和中国（见附件表 A.3），这就造成了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增长趋异性。

商品贸易、专业化模式和增长

图三.3 按照各国家集团的优势出口结构和专业化模式，说明了它们的人均增长率的趋异性。附件表 A.5 中介绍了个别国家的详细情况。

图三.3

1962-2000 年期间 105 个发展中国家相对于贸易专业化的人均国内总产值增长



资料来源：
附表 A.5。

比起 20 世纪的最后二十年，尽管在 1962-1980 年期间确实存在增长趋异性，但增长趋异性并不太明显。在 1960 年代和 1970 年代，从事初级产品和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工业制成品专业化出口的国家的平均增长率相对较低，

尽管 1962-1980 年期间的增长趋异性不太明显……

是其他出口国家增长率的一半。另外，只有少数从事初级产品和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工业制成品出口的国家能够超过发达国家在此期间的年人均国内总产值增长率（3.1%）（见表三.2）。

……工业制成品出口
国增长速度较快

从事各种以非自然资源为基础的工业制成品专业化的国家集团以类似速度增长。在不同集团的以非自然资源为基础的出口国当中，对发达国家人均国内总产值增长有利的增长趋异性经常出现，因为在它们当中 47%的国家（49个国家当中有 23 个）的增长速度能够高于发展中国家在此期间的平均人均国内总产值的增长速度。但中等技术工业制成品的出口国集团之间的趋异性相对比较快，因为在 24 个国家中有 12 个国家（50%）增长率超过 3.1%。然而，人均国内总产值的下降也发生在以非自然资源为基础的工业制成品出口国之间（阿富汗、利比里亚、科威特和尼日尔）。其他动力（大概是它们的特性）也在发挥作用。二十六个国家似乎在此期间没有展现任何具体的多样化趋势。它们的人均增长率是所考虑的国家团体中最慢的（见附件表 A.5）。

表三.2

1962-2000 年期间发展中国家人均国内总产值增长水平，按主要出口专业化模式列示

国家数目				
	专业化 数量	人均国内总产值增长		
		超出发达 国家平均 水平	超出世界 平均水平	超过 3%
1962-1980 年				
初级商品	12	1	6	1
以自然为基础的工业制成品	18	3	5	3
低等技术工业制成品	17	8	13	8
中等技术工业制成品	24	12	17	16
高技术工业制成品	8	3	5	3
无明显趋势	26	2	5	3
共计	105	29	51	34
1980-2000 年				
初级商品	7	0	0	0
以自然为基础的工业制成品	21	3	4	1
低等技术工业制成品	31	8	13	4
中等技术工业制成品	12	0	0	0
高技术工业制成品	10	7	8	7

国家数目				
	专业化数量	人均国内总产值增长		
		超出发达国家平均水平	超出世界平均水平	超过 3%
无明显趋势	24	0	2	0
共计	105	18	27	12
备忘项目：				
1962-1980 年				
世界人均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	2.2			
发达国家人均国内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 ^a	3.1			
1980-2000 年				
世界人均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	1.3			
发达国家人均国内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	2.2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2005 年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以及附表 A.5。

^a 指 1966-1980 年期间。

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趋异性似乎在 1980-2000 年期间加大了。除了出口高技术工业制成品的国家之外，所有出口国的人均收入增长率都有明显下降。在属于初级产品和中等技术工业制成品出口国行列的所有国家中，没有一个国家的增长率超过发达国家人均国内总产值的平均增长水平（2.2%），而发达国家的人均国内总产值平均增长率已经低于前一个时期的实际增长水平。对于初级产品出口国来说，不断增加对慢增长市场的参与尚不足以抵消在此期间盛行的不利趋势，如较低的平均商品价格。在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工业制成品出口国当中，赤道几内亚人均收入年平均增长率最高，其主要原因是发现并开发其石油储量。

在此期间没有显示任何明显多样化模式的多数国家增长速度低于全球平均增长率。这一集团主要由最不发达国家和/或在此期间经历了冲突和内战的国家组成。结构和制度方面的束缚很可能成为制约这些国家增长的因素之一（见第五章）。

在 1980-2000 年期间，与前一个时期相比，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工业制成品的三类出口国之间的增长趋异性也很明显。新加入低等技术工业制成品出口国行列的国家如印度、斯里兰卡和越南等在此期间表现突出，人均国内总产值增长在 3% 以上（据信这一增长率是发展中国家减少贫穷所需的最低增长率），而另外几个国家（18 个）的增长速度高于发达国家的人均国内总产

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趋异性在 1980-2000 年期间加大

一些新的低等技术工业制成品出口国在 1980-2000 年期间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值的平均增长率。但这些国家当中的多数国家的增长速度低于本亚期内世界生产总值（WGP）的人均增长水平。除了特殊的国家条件之外，这些产品的市场似乎为迅速增长提供的机会不多，可能的原因是组成假象效应或因为实施对特定国家集团有利而对其他国家有害的配额和其他贸易限制（纺织品和服装是这类国家主要工业制成品的组成部分）。

专门从事中等技术工业制成品出口的国家数量缩减了一半。新加入这一行列的国家有墨西哥（来自高技术工业制成品出口国行列）、匈牙利（来自低等技术工业制成品出口国行列）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来自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工业制成品出口国行列）。在从这一类国家中走出来的12个国家或地区当中，只有哥斯达黎加和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转到了高技术工业制成品出口的行列；所有其他国家则进入经常被视为具有较低等技术含量的各种部门（见附件表A.5）。

跨入高技术工业制成品出口国行列需要做出不懈努力

以上表明，一个国家要想进入高技术工业制成品生产国行列，就必须在获得技术能力和技能方面不断努力，而不是越过阶段性的工业化进程，也就是说，之前先要经过低等技术和中等技术工业制成品生产阶段。马来西亚从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工业制成品出口国行列进入高技术工业制成品出口行列，而中国、大韩民国、中国台湾省和泰国都是从低等技术工业制成品出口国进入高技术工业制成品出口国行列的。

大部分高技术工业制成品出口国的增长速度高于发达经济体的增长速度

几个净燃料出口国在中等技术工业制成品出口国行列中的存在可以表明，它们的总体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石油经济（就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来说，其增长还取决于贸易禁运），石油价格很不稳定，并且在此期间出现价格下降；但即使是在非燃料出口国当中，经济表现也不令人满意。就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来说，债务危机及其缓慢的解决过程阻碍经济增长，而其他因素可能也在起着作用。同时，大部分高技术工业制成品出口国在1980-2000年期间的经济表现非常不错，（10个国家当中）有7个国家的增长速度高于发达经济体的人均国内总产值的平均增长率。这个集团中的大部分经济体（中国、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马来西亚、大韩民国、新加坡、中国台湾省和泰国）已进入1960年代和1970年代快速增长的市场。它们成功地登上了技术高峰，并且从连续增长中获利，而发展中国家在这个时候总体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在其他出口国当中，只有印度尼西亚、阿曼和土耳其能够在这两个亚期中增长速度高于发达国家。

令人感兴趣的是，在最近几十年当中，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亚洲国

家的从出口技术更加先进的产品当中获得经济增长的能力似乎有了显著差异。例如，即使是在向工业制成品出口多样化之时，绝大部分拉丁美洲国家没有能够实现快速增长，特别是在最近几十年。

有两个主要因素可能对这一结果起到了作用。首先，特定国家的战略发展影响不仅取决于在进入市场时是否获得成功，而且还取决于在生产环节中
获得增加值份额的能力（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002年）。中等技术和高技术工业制成品出口的扩大与展示高进口含量的跨国公司一体化生产体系的增长联系在一起。因此，获得某些活动的能力（如装配任务）不能导致迅速或持续增长，如果这些活动的增加值有限的话，并且可能会导致失去控制。³在许多情况下，这些结果都是各国在制定外国直接投资方面所采取的策略所造成的（下文讨论）。

增长与在生产环节中
获得增加值份额的能
力联系在一起

例如，在墨西哥和中美洲，服装和电子两个行业当中出口加工部门表现出的相对较好的出口成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低工资、美国市场的优惠准入条件和接近美国市场，但这并没有产生较快的总体产出增长率。与此形成对比的是，亚洲的技术出口在国家和区域性质方面有着密切的联系。

第二，融入世界经济所产生的影响不仅取决于国家所出口的产品类型，而且还取决于国家在融入世界经济时的国情和在一体化阶段期间所执行的各项政策。拉丁美洲、非洲和中东欧融入世界经济的过程标志着其发展战略的巨大转变。它们采取的是“急于求成的”做法，这导致了一个时期的危机。相反，东亚国家的较快增长是与国家和企业部门不断努力提高出口生产能力紧密相联的，并且促进了工业化的持续发展。

循序渐进的一体化方
式优于“急于求成的”
做法

增长缓慢地区这种急于求成的结构改革具有“破坏性的”特征，致使以前的生产能力受到损失，减少了强大生产联系的出现几率。例如，撒南非洲在1980年代的制造业在国内总产值中所占的份额下降，并且在1990年代保持在相对较低的水平上。包括阿根廷、巴西和墨西哥在内的许多拉丁美洲国家，其传统劳动力密集型产业部门的生产力均有下降，纺织和服装等部门在贸易自由化后出口量减少。相比之下，交通设备等中等技术行业的生产力则有提高，因为即便是在最近的改革时期，这些行业也继续受到一些国家很大程度的保护（Cimoli和Katz，2002年）。

³ 按照Palma的说法（2004年），除非各种工业与国内经济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否则，它们的增长促进能力就会消失。Ocampo（2005年b）将这些专业化模式称为“浅模式”。

发达国家在活跃的
全球服务贸易市场依然
处于主导地位

服务出口的专业化模式和增长

尽管商品贸易仍然占据世界全部贸易中的大部分，但服务贸易的份额已经在最近 25 年里有了较大增长，从 1980 年的 17% 增长到 2004 年的约 20%。因此，服务贸易为出口多样化提供了一个重要且不断增加的机会。然而，尽管服务出口可能与增长有关，但这种联系似乎对发达国家更强，因为它们主宰着全球服务出口市场最有活力的一些部门。

由于缺少全面的和国际上的参照数据，使对国际服务贸易进行分析受到阻碍。以国际收支数据为基础的现有信息只是收集了跨境的服务流动，无法提供关于《服务贸易总协定》中定义的实际大量服务贸易的准确数据，特别是通过“第 3 种方式”（商业存在）和“第 4 种方式”（自然人存在）产生的贸易（世界贸易组织，2006 年）。但是，后者只以临时移民为中心，不能反映出劳动力流动对经济增长的全部影响（见方框三.2）。⁴

方框三. 2

国际劳动力移民和经济增长

^a 关于国际移民对经济影响的更详细分析，见联合国（2004 年 b），特别是第四和第五章。

国际劳动力移民可能通过几种渠道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下面对其中一些渠道作简要评述。^a 它既可以带来积极的影响，也可以带来负面影响，这取决于一国的特点和国情。它对增长的最终作用取决于这些力量如何起作用。利用现有证据难以说明移民是否会进一步加剧增长趋异性或增长趋同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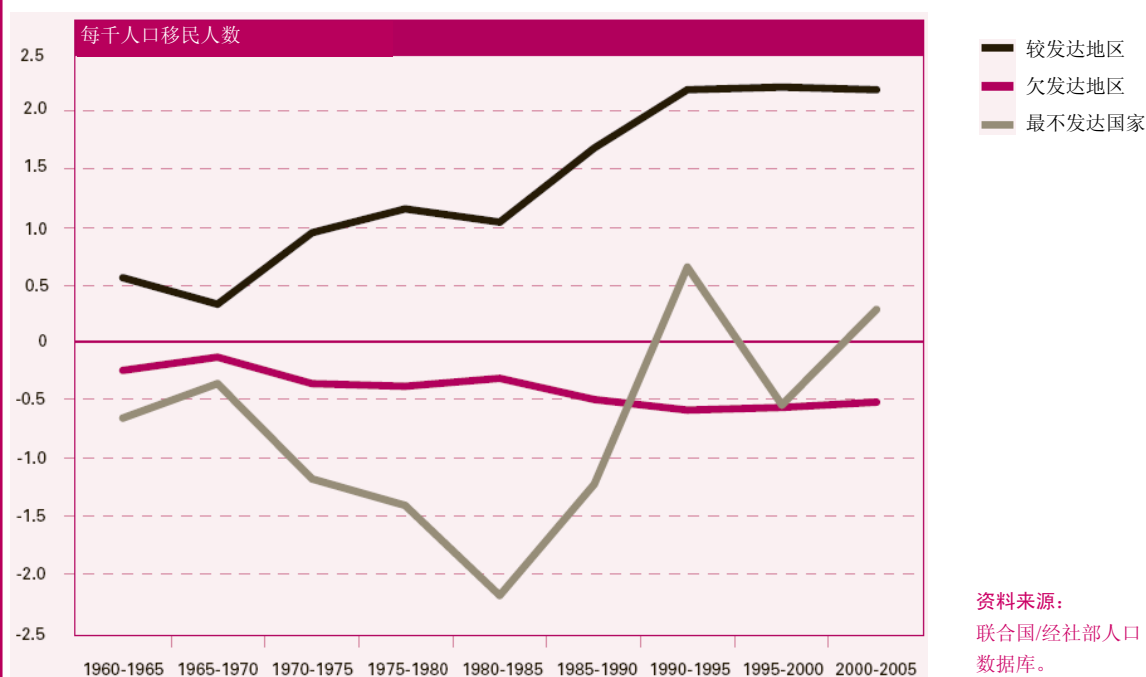
主要移民模式是从低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流动（见图），而在发展中国家当中，从增长速度较慢的国家向增长速度较快的国家流动（尽管这些增长速度较快的国家目前未必是高收入国家）。对于劳动力派出国而言，移民可能意味着人力资源和资本的损失，而这种人力资源和资本本可以实际促进经济的增长和发展。人们往往认为，如果这种人力资源是具有高技能和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力资源，那么它的流失有可能对增长产生负面影响，这不仅是因为损失了移民所拥有的知识，而且还因为这种损失会影响到那些留下者的生产力，因为向有技能的劳动力学习的机会没有了。正如本章所论述的，如果人才流失情况严重，一个国家有可

⁴ 《服务贸易总协定》界定了提供服务的四种方式：（a）跨境提供服务（跨国边界提供服务）；（b）国外消费（消费者旅行到服务提供者所在国领土）；（c）商业存在（服务提供者在消费者所在国领土建立分支机构或子公司）；（d）自然人存在（个人服务提供者临时流动到消费者所在国领土提供服务）。国际收支数据只完全涵盖第 1 和第 2 种方式。通过第 3 种方式进行的贸易未被涵盖进去，而通过第 4 种方式进行的贸易只涵盖了一个大概。最后，许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没有提供详细数据，说明交通、旅行和其他服务等三种广义部门以外的服务贸易情况。

能被迫更大程度地依赖于半熟练和不熟练劳动力，而这会影响其实现较快增长的前景。另外，一些国家还必须增加以前的教育投资，而且所得税收入也会受到损失，因为这些工人常常受雇于正规的经济部门，并且获得相对较高的收入（联合国，2004年b）。加勒比、中美洲、西非和东非是人才流失率最高的地区（高级熟练工人占派出国受过教育的潜在劳动力的一定比例）。代价可谓巨大。例如，据估计，每移居国外一名非洲专业人员，非洲就会损失184 000美元，仅南非一国在1997年至2001年期间就在高级熟练工人移民方面损失了50多亿美元（Pang、Lansang和Haines，2002年）。另一方面，熟练工人移民可能通过所产生的贸易和金融联系为派出国带来积极的附带影响（Lucas，2001年）。例如，在美国（硅谷）工作的印度工程师和软件开发人员为印度计算机和信息服务部门的出现做出了贡献（见方框三.3），而一些成功的中国移民也成为对中国进行投资和商业机会的一个重要来源。

方框三.2（续）

1960-2005年净移民率



资料来源：
联合国/经社部人口
数据库。

关于不熟练工人问题，有人认为，过剩劳动力移民能够降低失业率和减少工资下降压力，从而对派出国的劳动力市场产生积极影响。瑞典和爱尔兰在十九世纪晚期和二十世纪早期的情况显然就是这样，但在实际工资仍然很低或甚至在移民增长而工资仍然下降的发展中国家，这种现象不明显。另外，绝对数量的不熟练工人移民可能也会对增长产生负面影响。例如，墨西哥以移民率居高不下而出名的一些农村地区就出现了劳动力相对缺乏的问题，致使这些地区更加贫穷，并且从宏观上增加了食品进口。

方框三.2 (续)

对于劳动力派出国而言，伴随移民外流而产生的是以移民汇款形式出现的资金内流。根据官方记录，2005年流入发展中国家的汇款达到约1670亿美元，成为发展中国家外汇的一种重要来源，尽管约30-45%的汇款流入源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在绝对价值方面，一些大国（如中国、印度和巴基斯坦）和/或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例如，墨西哥、摩洛哥和菲律宾）是汇款流入的最大接收国，但汇款在较小经济体（例如，海地、莱索托和汤加）的国内总产值中占很大份额，可能会产生更大的经济影响（世界银行，2006年）。

汇款经常被用于消费以满足基本生活需要，因此对减缓贫穷产生积极影响。在家庭方面，汇款还有利于对教育和健康进行投资。它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来自总体需求的增长及其倍增效应（联合国，2004年b）。相反，汇款的大量流入可能导致货币升值，因此损害出口竞争力和降低增长。例如，大量的汇款流入导致厄瓜多尔和洪都拉斯的实际货币升值，因此抵消了贸易政策改革对这些国家出口部门获利能力产生的积极影响（Sánchez，2005年）。

移民缓解了接收国的劳动力市场短缺的问题，因此，消除了对增长的制约因素。另外，移民工人还作为消费者和（在有些情况下）作为投资者增加了实际需求，从而对经济增长产生积极影响。经验研究表明，移民对本国人的工资和就业只产生有限负面影响，即使是在移民占劳动力中比例相对较大的国家也是如此。在任何情况下，这种负面影响都要视移民工人所处的具体劳动力市场细分而定：经常是本国低等技术劳动力比熟练工人受到的不利影响更大。例如，据估计，1980年代和1990年代美国移民流入导致普通本国工人工资下降3.3%。对中学辍学工人工资的负面影响（8.2%）大于对大学毕业生工资的负面影响（3.8%）（Borjas和Katz，2005年）。但是可以这么说，这种负面影响不是静态的，而是随着时间变化、获得的技能和接收国经济需求的变化而变化的（联合国，2004年b）。

就本国人口不断缩减的国家而言（通常是发达国家），国际移民可能有助于持续经济增长，并且可能有助于缓解为福利国家筹集资金的问题。例如，移民占到2001年欧洲联盟（欧盟）人口增长的四分之三。鉴于这些国家的人口趋势和受抚养人比率（不工作年龄人口与工作年龄人口的比例）的增长，有人预计，在今后的20年，外来工人将会因其在劳动力中所占比例而越来越受重视（Feld，2005年）。但是，即使对发达国家产生移民冲击（外国工人总量3%的年增长率），对受抚养人比率的影响也是有限的，尽管外国工人总量增长了50%，从2001年的6%增长到2025年占整个劳动力市场的9%（世界银行，2006年）。实际上，考虑到人口老化问题，维持现有福利制度需要移民在2050年之前占到主要发达国家总体劳动力不少于42%的比例（Kapur和McHale，2005年）。

除了经济成本和利润之外，移民还对接收国和派出国以及对移民本身产生积极和负面的社会影响，但这种影响难以量化。由于文化背景和出身的差异，并且由于移民可能被接收国各界视为就业和公共服务的竞争来源，而致使移民及其家庭无法轻易融入本地社会。另外，尽管移民工人在经济增长时能够比较容易被劳

动力市场吸收，但他们在经济衰退时也经常面临较高的失业率（比起本国工人的失业率）。

方框三.2（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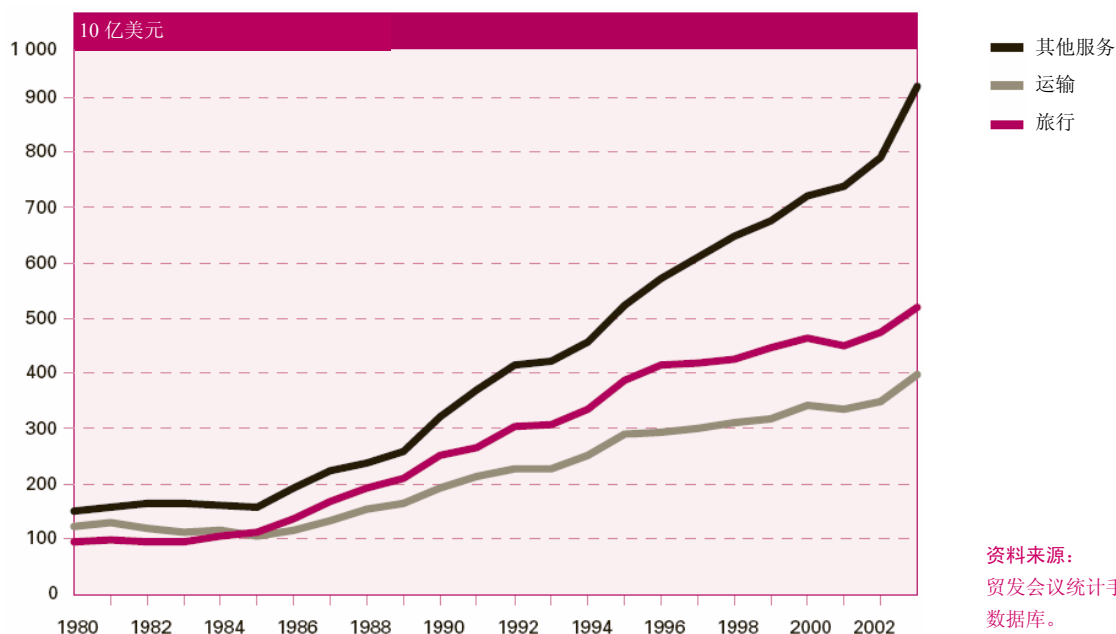
最近，临时移民一直受到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关注（许多欧洲国家在 1960 年代的“外来工人”方案就属于这种情况），将临时移民作为防止出现一些与长期移民有关的不利情况和代价的一种手段。但是，劳动力的临时流动仍然受到严格的控制和限制。这些规则并没有平等地对待所有移民。接收国通常放宽对熟练工人的移民限制，而严格限制不熟练工人的进入。不过，研究表明，如果放宽限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会在经济方面受益。例如，Winters（2002 年）认为，如果发达国家的临时工人指标（包括熟练工人和不熟练工人）增长 3%，将会每年为全球福利带来 1 560 亿美元的增长，其中有 700 亿美元流入发展中国家。

发展中国家加快了对全球服务出口的参与，导致其市场渗透比例从 1980 年的 19% 增长到 2004 年的 23%。在 1980-2003 年期间，三大服务部门（运输、旅行和其他服务）在世界出口贸易中所占的比例展示了趋异性的增长动力（见图三.4）。

发展中国家增加了对全球服务市场的渗透

图三.4

1980-2003 年世界服务贸易出口额，按部门列示



资料来源：
贸发会议统计手册
数据库。

“其他服务”包括通讯、计算机和信息服务、金融服务和其他商业服务，是整个期限内增长速度最快的部门。发展中国家对这一部门的参与从1980年的14.8%增加到2003年的18.3%（见关于所有国际收支分部门服务出口数据⁵的附表A.6）。运输服务出口是整个期限内增长速度最慢的行业，而旅行服务出口具有多变性，在1980年代期间强劲增长到自此以后放慢增长速度。发展中国家约占世界旅行服务出口的28%。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旅游业是一个重要的外汇和就业来源。对于小岛屿发展中国家以及许多最不发达国家来说，旅游业可能是“主要的且有时是唯一的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惟一动力因素”（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006年，第10页）。另外，鉴于传统商品出口市场增速缓慢或呈下降的趋势，这一部门可通过出口的多样化帮助降低外部脆弱性。

大部分分析服务贸易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都以贸易自由化的作用为中心，特别是以增长服务进口所产生的效率收益为中心。⁶关于服务出口的实践工作往往限于具体的服务部门或案例研究（例如见Nielsen和Taglioni，2004年；及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006年）。较少尝试去估计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当中服务出口与国内总产值增长之间统计关系的存在方式及重要性。

发达国家似乎从服务出口中获得更多利益

对此进行的一项分析表明，尽管服务出口对经济增长产生重要影响，但商品出口的影响要大得多。另外，尽管在1980年代期间，发展中国家的服务出口增长与国内总产值增长之间的联系一直比较紧密，但这一趋势在1990年代期间颠倒过来了，同时，这种联系在发展中国家变得更加松散，但在发达经济体中却逐渐加强。后一种现象的产生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两类国家所采取的不同出口专业模式发挥了作用（Gabriele，2004年），二是发达国家主宰了最有活力的全球服务市场。⁷

技能密集型服务为较快增长提供了更多机会

关于服务出口中专业化模式的现有可用数据似乎支持这样一种假设，即发达国家从其于1990年代迅速增加的技术和技能密集型服务的专业化过程中受益。但是，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的服务出口主要集中在增长速度相对缓

⁵ 关于另外列出了某些主要发展中国家出口国的更加详细的情况介绍，见Gabriele（2004年），第29-40页。

⁶ 关于最近的文献调查，见Nielsen和Taglioni（2004年）以及Stiglitz和Charlton（2004年）。

⁷ 本论文没有正式讨论这个因素，只是分析了服务出口总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而不是对个别部门的影响。

慢的运输和旅游服务。但比较详细的分析表明，少数主要发展中国家在更具活力的分部门获得了大量市场份额，增长速度相对较快。这一趋势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各国之间在增长趋异性方面的增大。举例来说，发展中国家通讯服务出口的份额主要集中在少数主要国家，其中印度所占份额较大。其他先进的半工业化亚洲和拉丁美洲国家也起到了一定作用。⁸ 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属于增长速度最快的服务部门之一，这也说明，在发展中国家，只有少数出口国在这个出口市场占有较大且不断增长的份额（在 2003 年占 20%），其中印度（非发达国家中最大的出口国）的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出口额是该部门第二大出口国以色列的三倍（见方框三.3）。⁹ 少数其他发展中经济体（如阿根廷、中国、哥斯达黎加、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新加坡和中国台湾省）也确立了它们在这一市场中的地位（见附表 A.7）。

总之，与货物贸易一样，增长速度较快的国家在专门从事具有较强增长活力和具有较大潜在溢出效应的服务出口。而一些发展中国家可能会利用其在支持适当政策方面的优势，逐渐进入更具活力的服务出口行业，而其他一些国家可能会发现自己难以走这条路。尽管这些国家仍然处在积累必要能力的早期阶段，但它们仍然可以有效地参与其他服务部门，从而推动其经济的多样化（见第二章）。本章最后两节论述了在国内和国外采取正确政策的重要性。

方框三.3

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出口：南亚飞雁

一些发展中国家在计算机和信息服务方面的强劲表现似乎表明了这些国家以及潜在追随者的新发展观。

在 2003 年全球出口额排名当中，印度紧随爱尔兰之后排名第二，而以色列排名第六（见附表 A.7）。这三个国家在那些设法赶上一级主要软件出口国的国家中脱颖而出。^a

印度软件部门的发展变化深受过去和现在的经济政策的影响。直到 1990 年

^a Carmel（2003 年）提出了软件出口国四级分类法，按此法，俄罗斯联邦和中国属二级，其他出口国（见附件表 A.7）属三级。较小的出口国，如古巴、萨尔瓦多、约旦、埃及、孟加拉国和其他国家属四级，即“雏形”类。

⁸ 从这种对其他经济部门可能具有溢出效应的技能密集型部门中，也不乏发展中国家内部贸易取得成功的例子。例如，墨西哥的一家大型移动电话公司可以在所有中美洲国家、安第斯地区和巴西开展业务活动，使它成为该地区在用户基础方面最大的供应商。欲知更加详细的说明和其他个案研究，见 Nielson 和 Taglioni（2004 年）。

⁹ 但对这一部门的数据尤其需要谨慎对待，因为许多国家在提供数据时都将这一类出口列在“其他商业服务”之下（就像印度在 2000 年之前所做的那样）。

方框三.3 (续)

代早期，这个部门一直得益于政府的“良性疏忽”，它直接通过国有企业和通过对私营部门的严格管理的方式，控制了该种经济的大部分（Singh，2003年，第18页）。同时，印度教育系统开始向高等教育段斜，特别是在科学和工程技术方面。结果造成国内劳动力供求的技能水平的不相称，致使出现熟练工人进一步向国外移民，主要是向美国移民。计算机维护公司和印度电子有限公司（ECIL）等国有企业也吸收了大量的过剩熟练工人。随着1990年代经济自由化和全球软件行业的起飞，这些企业的前雇员在班加罗尔建立这一部门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Kochhar等人，2006年，第27页）。在此基础之上，该部门借助具有纯熟英语水平的专业人员和强大的外部需求增长，为1990年代中期以来软件和服务出口的巨大成功做出了突出贡献。到1990年代末期，印度公司成功地利用了与千年虫问题有关的巨大合同量和引入欧元所带来的机会，使其计算机和信息服务部门得到充分发展。

1990年代，政府政策继续发挥重要作用。中央和邦政府开始以增长部门为目标，建立了出口加工区和软件技术园，允许免费硬件进口，免除营业税和货物税，并提供有补贴的办公场所和电力。该部门，特别是通讯部门还受益于一般自由化政策，以及电子施政项目和目标金融。外国直接投资流入的增加以及通过印度侨胞和回国者资本和专业技术为形式的“人才回流”也对这一部门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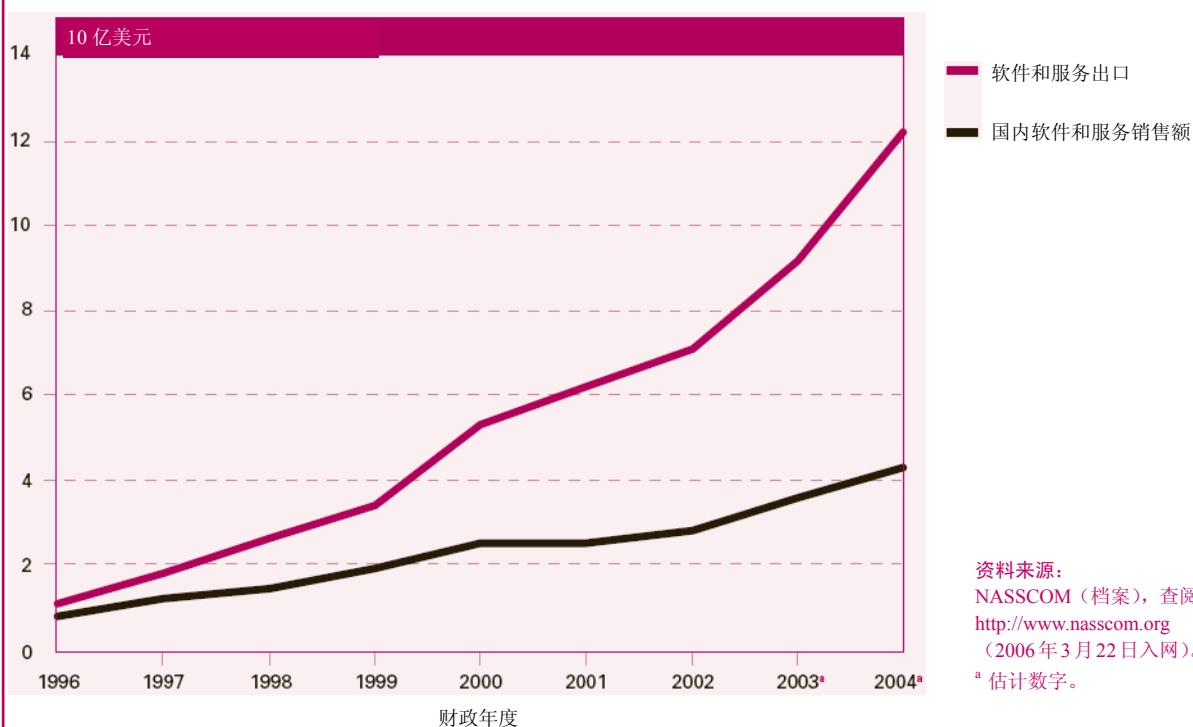
在经过十年的持续增长之后，印度信息技术部门在国际上已经成为一个强大的具有活力的品牌。国内销售市场也变得越来越重要，与其他行业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见图）。该部门的工资迅速增长，这说明在熟练工人的提供方面存在障碍，另外还需要增加教育方面的投资，以保持国家的竞争优势。

巴基斯坦仍然是一个较小的出口国，尽管它在一些方面与印度一样具有竞争优势。最近，该部门经历了强劲增长，但较长期前景取决于巴基斯坦是否能够克服一些关键性的障碍。其中最重要的障碍是受过训练的专业人员的供应数量有限。另一个问题源于巴基斯坦信息技术部门起步比较晚，错过了1990年代末期的增长和学习机会，现在面临着已经成名的印度公司的强大竞争。其他问题是政治安全问题以及对软件部门知名品牌缺乏认同的问题。

根据这些薄弱环节，所以巴基斯坦政府在其《2000年信息技术政策和行动计划》中采取了几项措施，包括增加对信息技术教育的支出、建立信息技术园、提供更好的因特网接入服务和加强电子政务。为了增加这一部门的出口，政府在1996年设立了巴基斯坦软件出口委员会，其目的是指导研究和开展活动，寻找新的市场机会，并营造有利的商业环境。与印度一样，该部门也正在从人才回流效应中受益，尽管回流的程度没有印度那么大。

1996-2004 年印度信息技术市场：软件和服务

方框三. 3 (续)



鉴于这些支持性的政策，这一部门的强大增长率，以及外国投资者不断增加兴趣（较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印度突然出现的拥塞效应），巴基斯坦软件和计算机服务部门的未来前景充满希望。其余挑战是长期存在的不稳定的安全局势和存在强大的竞争对手和长期的区域竞争对手，即印度。但巴基斯坦拥有学习印度成功经验和吸引印度外国直接投资的空间。印度软件巨头塔塔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和设在巴基斯坦的泰克劳斯软件公司之间 2005 年的交易量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个合资企业的第一步是在巴基斯坦的拉合尔市成立一个技术工人培训中心，而塔塔公司的最终目标是在巴基斯坦建立一个软件开发工厂。假如这项工作取得成功，该企业将会成为南亚“飞起的鹅”发展模式的先驱，这种发展模式是对东亚和东南亚新兴经济体十分有利的一种现象。

外国直接投资和趋同性-趋异性 困境

长期以来，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一直认为，外国直接投资提供了潜在的重要融资来源，因为除了相对稳定的资本来源之外，它还能够带来最新技术、组织

技能和销售网络（溢出效应）。假如稀有资源能获得最高的回报率，较贫穷的国家（资本较少，但拥有大量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不熟练工人）应能吸引跨国公司，使外国直接投资成为收入趋同性的潜在强大动力。

不过，在1960年以来的大部分时间里，外国直接投资流量尚未达到预期的水平。投资流动主要在资本充足的工业化国家之间进行。即使在投资流入发展中国家的情况下，外国直接投资流量也一直与时间和空间密切相关，并且与它们所产生的成本效益有关。最近外国直接投资流的猛增似乎并没有改变这种局面。

外国直接投资流量的趋势和存量

自从1980年代早期以来，外国直接投资增长速度比产量和贸易增长速度都要快得多，造成这种情况的部分原因在于，加工生产工艺和金融公司的管理方式发生变化（下文将进一步讨论）、证券市场得到发展、外国直接投资制度进一步加强和实行了私有化等。由于流量的迅速增长，世界外国直接投资存量自1980年代以来增加了近20倍，几乎达到世界国内总产值的四分之一。但是，正如第一章所论述的，外国直接投资流量仍然主要集中于发达经济体（见图三.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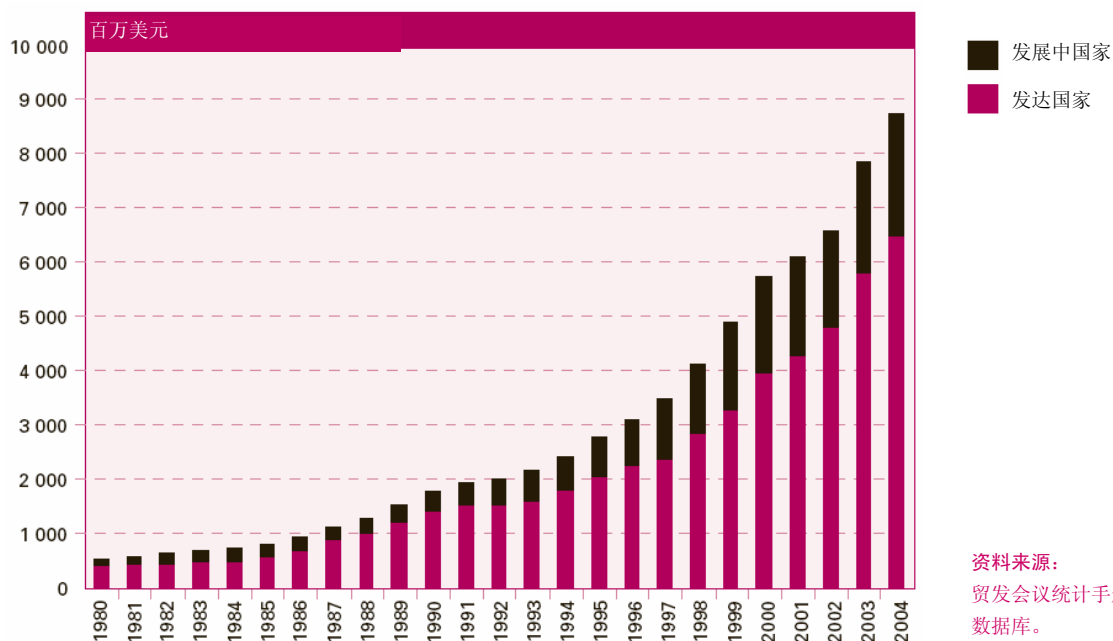
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自1980年代中期以来猛增

在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量快速增长的同时，发展中国家从1980年代的前半期到1990年代后半期经历了年平均流入量10倍的增长。外国直接投资流量一直集中在少数几个国家。自从1980年代早期以来，八大接收国吸收了从这些国家流入的四分之三的外国直接投资。但随着中国的兴起，各国和国家之间进行了重新排序，因为中国作为一个东道经济体所占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从1990年世界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存量的1.1%增加到1990年代末期开始的6%以上。

外国直接投资存量的部门组成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都发生了变化。在发达国家当中，外国直接投资不断流向服务领域。因此，与1980年的40%相比，目前服务领域占据了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存量的四分之三。在1990年至2003年期间，发展中国家类别在加工业方面的外国直接投资存量所占的份额从25%增长到37%，而发展中国家同期在全球加工业外国直接投资存量中所占的比例从五分之一增长到直接三分之一。这种倾斜在某些部门尤其明显，服装、电子和汽车尤其是贸易体系中最有活力的部门之一。

图三.5

1980-2004 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



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外国直接投资部门出现不同的发展趋势。自从 1980 年代晚期以来，拉丁美洲和加勒比不仅通过私有化在大规模自然资源和服务方面吸引外国直接投资，而且还在纺织品和服装等劳动力密集型加工业方面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特别是中美洲、多米尼加共和国和墨西哥）。非洲主要在自然资源方面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尤其是在燃料和矿产方面。但一些非洲国家也能在加工行业吸引外国直接投资：莱索托（在纺织和服装方面）和南非共和国（在汽车制造方面）都是很多的例子。同时，东亚和东南亚在加工业（电子、纺织）方面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多于其他发展中国家所在地区。在此方面，最近集中在少数几个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猛增现象及其部门构成似乎进一步加剧了经济的趋异性（Mody, 2004 年，第 1201-1205 页）。

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外国直接投资部门出现不同的发展趋势

外国直接投资流量的集中和趋异性

在 1980 年之前，先进国家之间数额不断增长的外国直接投资流量一直与它们的快速工业化密切相关，特别是在资本和技术比较密集的部门，并且收入也在快速增长和趋同（Hymer, 1976 年；Rowthorn, 1992 年）。它们主要

朝两个方向流动，并且常常是流入同样的部门。外国直接投资包括大公司所进行的投资，这些公司已经建立了强大的出口联系，它们在国外所控制的生产性资产为在不完善的竞争市场中划拨或增加租金提供了更可靠的手段。这种行业间的外国直接投资主要是市场规模扩大和技术完善的产物（Driffield 和 Love，2005 年）。¹⁰ 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都不存在这种趋势，为跨国公司提供的投资机会很少。但是，不断扩大的本地市场吸引跨国公司向化工和运输等比较集中地使用半熟练工人和中等技术的部门进行投资，特别是在一些较大的发展中国家，且通常是在关税壁垒能够提供比较安全市场的情况下，这对外国直接投资集中流向这些国家起到了作用。¹¹ 因为许多相同的经济力量一直在支持外国直接投资迅速扩大到现代服务部门，包括银行业和销售服务业，因此偏重于先进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自 1980 年代以来一直通过合并与收购等方式继续进行，包括最近。

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及 存量集中于发达国家

主要外国直接投资动力似乎具有累积性，而现有外国直接投资存量的规模对随后流量的规模具有强大影响。另外，附聚压力和趋同倾向也产生强大的邻近效应，也就是说，跨国公司发现了许多与本国接近的地点——由创建欧盟等自由贸易区所支持的和通过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北美贸协）确立的一种趋势。同样，在亚洲，当日本在 1980 年代作为一个外国直接投资国出现时，它的投资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集中在一些邻国（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1996 年）。因为这些区域集团非常庞大，生产设施能够大到足以承担大部分原先由母公司在本国从事的活动，这样可能会取代贸易。因此，在区域集团之间，直接投资和贸易很有可能成为替代物。相反，在这些区域集团内部，直接投资和贸易具有互补性。它们经常反映出同一公司内部劳动分工的发展情况，而设在该集团不同国家的工厂进行合作，共同生产某种单一产品。换句话说，各工厂专门生产不同的产品，向整个集团或其他地方出口。

¹⁰ 先进国家间外国直接投资流动收益如何分配的问题仍然是研究人员争论的一个问题。例如，一些研究表明，大部分收益归本国经济所有（也就是说，由外国直接投资者占有），外国直接投资接收国只能获得少量或混合的利益（见 van Pottelsberghe de la Potterie 和 Lichtenberg，2001 年）。在外国直接投资接收国当中，吸收能力是提高溢出效应的关键（Blomström、Lipsey 和 Zejan，1992 年）。应该指出的是，比较单位劳动成本也在确定先进国家之间的一些外国直接投资流量方面继续发挥一定作用，而这种投资为外国直接投资接收国带来了就业机会，但不太可能出现技术溢出（见 Driffield 和 Taylor 的论述（2002 年））。

¹¹ 直到 1970 年代中期之前，墨西哥和巴西在加工业方面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占到发展中国家在此方面所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的一半以上。要想更有效地讨论这种投资的性质和影响问题，请参照巴西经验，见 Evans（1979 年）。

自从 1980 年代早期以来，几种新的趋势对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量猛增起到了一定作用，为发展中国家的决策者们带来了新的挑战 and 机会，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向发达国家倾斜的现象。首先，由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迅速和广泛地放开外国直接投资政策，致使政府与跨国公司打交道的方式发生重大变化。在发展中国家，这些变化包括减税、加大对投资人的保护力度和增加奖励。国际多边论坛以及双边和区域条约及协定也对这种变化起到了促动作用。在多数情况下，外国直接投资立法的修订都与旨在扩大市场力量在资源分配中的作用的措施（国有资产私有化）联系在一起。例如在拉丁美洲，大量外国直接投资流入服务行业，这就是通过私有化项目推动的。

政策环境变化导致更大的外国直接投资流量

其次，大公司在管理其国外资产方面采用了新的方式方法。一方面，这些公司在很大程度上结合加工活动，采取了从“简单”向“复杂”转变的一体化策略。以前，大公司通过重复其在某个单一外国场所的活动向国外扩大其业务，而现在则是在不同地方从事其价值链中个别部件的业务活动，并根据它们对公司整体目标所起的作用评估其价值，而不是根据它们在东道国的获利能力（Hanson、Mataloni、Jr. 和 Slaughter，2001 年）。¹² 对亚洲、中美洲和墨西哥加工业进行的大量外国直接投资就是在这些趋势下进行的。相比较而言，横向扩大（其中大部分产品在东道国销售）一直与服务部门的外国直接投资增长密切相关。

生产程序的分解有助于增加在加工业方面的外国直接投资

与新的生产能力投资不同的是，大公司战略的另一个发展目标是优先进行合并与收购。¹³ 在许多发展中国家，这一趋势与私有化方案有关，而且，还与一些公司在治理过程中进行的较广泛的改革有着比较密切的关系，这些公司通过发行普通股和公司债券筹集资本。与向垂直多样化（其中比较单位劳动力成本是一个主要的决定因素）发展不同的是，有效证券市场的上涨将外国直接投资与短期金融因素比较密切地联系在一起，这有可能使国际生产

¹² 根据一项估计，基于垂直生产网络内部专业化的贸易高达世界出口的 30%，在最近 25 年里增加了 40%（见 Hummels、Ishii 和 Yi（1998 年））。

¹³ 应该指出，合并其实不是一件平常的事。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000 年，第 99 页）估计，它们只占 1987 年至 1999 年期间合并与收购总量的 3%，完全收购占总量的一半以上。少数收购（拥有 10% 至 49% 的所有权）在发展中国家似乎比较常见。另一方面，尽管计量问题妨碍做出准确的估计，但少数收购可能占到 1990 年代世界外国直接投资流量的一半到三分之二。

关系处于更加不稳定的状态。¹⁴

对加工业的外国直接投资：国际生产网络及增长

对加工业的外国直接投资需要有工业基地和国内市场

存在生机勃勃的工业基地、稳固的本地市场和有活力的企业部门是吸引国外资本对加工业进行外国直接投资（并从中获益）的前提条件。增长停顿或崩溃的国家，或者加工基地受到毁坏的国家，很少有机会能加入国际生产体系中最有活力的部门并从中受益。因此，最近与外国直接投资有关的出口型加工活动的迅速扩大一直严重偏重于东亚少数国家，其中中国是加工业外国直接投资最大的接收国。这一类型的南北外国直接投资在某种程度上是以前在先进国家之间资本流动的一种扩大，而且是由某些部门的技术标准化和许多发展中国家向比较自由的商业环境转变促成的。这些促动因素在增加东亚区域外国直接投资流量方面也起到了一定作用，处于领先地位的是一级新兴工业经济国的新兴跨国公司。由于这些部门包括中等和高等技能和技术密集型产品，故这些产品在发展中国家出口中所占的份额也急剧增加。

加入综合生产网络与外国直接投资流入相关联

这些外国直接投资大多与加入综合生产网络相关联。¹⁵ 在有些情况下，由能够在几个不同地方生产某种标准化商品的大型跨国公司组织生产（就像在电子和运输行业一样）。在另外一些情况下，生产涉及到设在不同国家的中小型企业团体，并且通过国际分包将它们联系在一起（如服装行业）。

对个别国家经验进行的比较说明了外国直接投资和贸易流动是如何与不同模式的专业化结合在一起的：东亚和中美洲国家在电子和电气商品方面处于突出地位，而这些国家还与北非国家一起加入了服装网络，同时，只有较大的拉丁美洲国家和大韩民国在运输设备方面处于领先地位。

¹⁴ 关于后一种趋势，见 Kregel（1996年）、Plender（2003年）和 Kamaly（2003年）。资本流动的趋同性不仅仅涉及合并与收购问题。正如世界银行研究报告中指出的那样：“由于直接投资人掌握着不可能流动的工厂和其他资产，故有时候假定直接投资流入比其他形式的资本流动更加稳定。情况未必是这样。虽然直接投资人常常会有一些不动资产，但原则上讲，这些不动资产不能用国内债务完全抵消没有道理。显然，直接投资人可以为了获得出口资本而贷款，从而产生快速的资本流出”（Claessens 等人，1995年，第22页）。但合并和收购与大部分新的生产能力投资不同，似乎与经济繁荣和萧条之间的交替循环关系更密切，使产生新的收购机会的新兴市场出现金融危机（见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1999年，第118-119页；和 Mody，2004年，第1209-1210页）。

¹⁵ 这些网络不是一种新的发展：在东亚，它们可以追溯到1960年代，成为1970年代国际劳动分工的一个比较明显的特征（见 Helleiner，1973年）。

确定这种外国直接投资是否能降低全球收入不平等的一个关键因素是确立动态的投资出口联系类型，这种联系曾在先前东亚的成功经历中出现过，并导致从只需要不熟练工人的生产活动向生产多样化稳步发展。外国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主要是通过生产网络组织投资，在发展中国家进一步实现技术和组织溢出效应，并大量增加本地私人投资。

综合生产网络与东道国增长的出口和就业联系在一起。但是，同样的最终产品部件可能会不止一次地越过和再次越过国家边界的事实使贸易总值膨胀（Krugman，1995年）。更重要的是，一些有力的证据表明，加入综合生产网络使国内生产和消费的进口含量增加。因此，发展中国家加工出口的强劲增长（特别是加入综合生产网络的发展中国家）可能不会带来收入和增加值方面的相应增长。例如墨西哥就是一个例子，据估计，在过去二十年中，再加工进口占某些行业美国跨国公司关联公司总销售额的一半到三分之二（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002年）。同时，该国加工业的增加值增幅很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在北非经济体、中美洲和亚洲部分国家和地区（包括柬埔寨、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和菲律宾）也可以找到类似的发展模式。

加入生产网络对增值的贡献按最丰富且是最不具有流动性的因素的成本即劳动力成本来确定，而资本、管理和专有技术等具有国际流动性的因素的报酬是由它们的外国所有人占有。在这方面，一些调查结果表明，资本流动性的增强与不熟练工人快速进入全球劳动力市场这两种情况的并存，可能会削弱较贫穷国家的谈判地位，并加剧处于价值链顶部的寡头垄断市场结构与底部竞争市场结构之间极不对称的关系（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002年；Milberg，2004年）。

最后，综合生产网络能否产生强大外溢效应的机会值得怀疑。首先，加入生产网络劳动力密集型和低技能价值链部分不可能吸引具有高水平技术完善程度的外国直接投资。因此，无法预期这些安排会带来何种类型的外溢效应。¹⁶ 另外，加入综合生产网络所产生的外溢效应有可能减少，这不仅是因为任何地方所需要的一揽子技术的范围进一步缩小，而且还因为跨边界联系的加强会削弱国内的联系。因此，比起将外国直接投资用于寻找市场的较为传统的横式经济体，被跨国公司主要用作向第三市场出口基地的经济体更难

综合生产网络对增长的贡献取决于能否产生技术和组织溢出效应

综合生产网络已经导致较快速度的出口和进口增长，但对总的收入增长没有起太大作用

加入综合生产网络的报酬似乎分配不均

来自综合生产网络的外溢效应的机会减少

¹⁶ 这里应当指出的是，在先进国家进行的外国直接投资证明，当外国直接投资是按生产要素成本进行的时候，它就不可能为东道国带来外溢效应（见 Driffield 和 Love，2005年）。

进行技术升级。¹⁷但在两种情况下，所有利用外国直接投资进行技术升级并取得成功的示例（包括在综合生产网络背景下）都证明，国内经济要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就必须推行明智的政策措施（见下文关于部门政策的章节）。

外国直接投资能否导致发展中国家较快速度的经济增长？

尽管外国直接投资流动的恢复并没有在结构上充分说明，外国直接投资是增强工业化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甚至是发展中国家之间趋同性的一种力量，但它们所具有的宏观经济优势已得到认可，有可能为经济的均衡增加提供更多的机会。1990年代早期，经过十年或更长时间的宏观经济调整和宏观经济改革，人们相信，外国直接投资流量的恢复是许多发展中国家投资气候得到比较普遍改善的一种迹象。另据预测，这些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会因国内投资的增加而进一步得到改善。

外国直接投资和国内资本的形成处于相反方向

但自1990年代早期以来，外国直接投资和国内资本的形成一直处于相反方向，这是因为主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流量增加，而投资率和投资量却呈下降或停滞状态（联合国，2006年，第16页）。例如，通过计量1980年代和1990年代外国直接投资在拉丁美洲所有主要国家（阿根廷、巴西、哥伦比亚和墨西哥）和非洲一些较大经济体（科特迪瓦、摩洛哥、南非和突尼斯）国内总产值中所占的比例，可以看出外国直接投资增加了，而总体投资却处于停滞或下降状态。这可能是因为吸引外国企业的条件不利于本国经济资本的较快形成，因而出于不同的动机做出两种投资决定。关于外国直接投资是挤进还是挤出国内投资的证据各种各样，依国家的具体情况而定，但一些研究表明，后一种趋势在发展中国家较为普遍。¹⁸

¹⁷ 实际上，由于寻找市场的外国直接投资更多地依赖于国内经济，因此它使东道国政府具有更大的、有选择地使用外国直接投资的谈判权力，从而保证外国直接投资能够产生外溢效应并与国内工业建立联系。

¹⁸ 有证据表明，在某些地区和某些时期内，外国直接投资可能会挤出本国投资。最近对1970-1996年期间32个发展中国家情况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拉丁美洲挤出本国投资的证据最明显，亚洲挤进的证据较明显，而非洲的情况则不十分突出（Agosin和Mayer，2000年）。在涉及1980-1999年期间对98个发展中国家进行的一项比较全面的研究中，在52个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与国内投资存在重要关系，其中29个国家经历了净挤出，有23个国家经历了净挤进，而拉丁美洲国家又是在防止挤出方面是最脆弱的（Kumar和Pradhan，2002年）。据Ghose（2004年）称，与1983-1989年期间相比，在1990-1997年期间外国直接投资挤出本国投资的趋势在所有发展中地区都有上升，包括撒南非洲地区，造

来自出口联系方面的证据也各种各样，并且取决于外国直接投资所投入的部门。如上所述，大量的外国直接投资进入了非贸易部门，特别是服务部门。相反，加入综合生产网络加快了出口增长，但也可能会因进口增加而产生国际收支压力。

外国直接投资对出口的贡献取决于其所在的部门

外国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国家收支的影响可能大不相同，这取决于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部门的方式、跨国公司盈利在增加值中所占的比例、对进口的依赖程度、跨国公司的外债偿付以及最终商品在国内市场的出售份额（Akyuz, 2004 年）。因此，一种不利的情况是，随着与外国直接投资有关的利润汇款和其他资本流出的出现，国际收支将会受到较长时间的负面影响。

即使是在外国直接投资活动造成外汇逆差的情况下，如果它所创造的重要外部条件能够加强整个经济出口潜力，仍有可能促进国际收支平衡。同样，即使外国直接投资会导致不利的国际收支结果，但如果外国直接投资和跨国公司的存在导致重要的技术外溢，则这种投资仍能产生净效益。总而言之，外国直接投资的经验证明，积极的外溢效应并不是决定性的（Addison、Guha-Khasnobis 和 Mavrotas, 2006 年）。¹⁹

外国直接投资对国际收支的影响取决于若干因素

为了从外国直接投资中获利，各国需要在国内公司和机构之间拥有必要的吸收能力。在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同时又对建设国内能力进行重要投资的国家（例如，新加坡和爱尔兰）在影响外国直接投资流入方面最为成功。相反，如果是利用主要税收鼓励措施来吸引外资，或者是通过扭曲的贸易政策（如纺织品和服装配额）来吸引外资，若不同时加强本地能力建设和外国联属企业与本地公司之间的联系，从外国直接投资中获得长期利益的范围就会有限。

各国需要拥有从外国直接投资流入中获利的吸收能力

因此，外国直接投资对趋异性和趋同性的形成似乎都是一种促动因素。一方面，在接收外国直接投资的同时，包括通过综合生产网络，还可以在国家和国际经济力量之间做出回报比较丰厚的安排。另外，在较贫穷的国家利用其大量的廉价劳动力资源或其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同别国进行竞争时，外

外国直接投资是形成趋异性和趋同性的动因

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可能是由于合并与收购在外国直接投资流量中所占的比例不断增加的缘故。需要对个别国家的情况进行比较详细的分析；尽管对这种分析加以利用的情况不多，但它们一直被用来证实情况的复杂性（见 Harrison 和 McMillan（2002 年）关于科特迪瓦的著述；和 Braunstein 和 Epstein（2004 年）关于中国的著述）。

¹⁹ 外溢的基本定义是提高国内公司的生产力，这些公司可以是同一部门的，也可以是其他部门的。若想了解对有关证据的一般性评论，见 Aitken 和 Harrison（1999 年）；Gorg 和 Greenaway（2001 年）；以及 Blomström 和 Kokko（2003 年）。

有关外国直接投资与资本积累和增长之间联系的统计证据并不是决定性的

国直接投资还与等级更加分明的劳动分工挂钩。

由于这些潜在的结果具有冲突性，所以仍无法解决将外国直接投资、资本积累和增长联系在一起在发展中国家形成良性循环的问题。有人认为，落后的外国直接投资与增长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能充分证明，外国直接投资是促进增长的动力，但条件是国家要采取开放的政策立场（Blomström、Lipsey 和 Zejan, 1992 年）。还有人认为，没有证据证明外国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是一种独立的促动因素，即使存在上述条件（Carkovic 和 Levine, 2002 年；Mody, 2004 年；Nunnenkamp 和 Spatz, 2004 年）；而且也没有证据证明这种效应非常脆弱，会随着更多的国家特征受到控制而消失（Rodrik, 1999 年，第 37 页）。

总之，接受外国直接投资带来的增长效应似乎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条件的限制，并且不是线性效应。尽管外国直接投资可能会影响增长，但快速增长也是外国直接投资的一个决定因素（Addison、Guha-Khasnobis 和 Mavrotas, 2006 年）。大量的证据表明，只有越过收入、人力资本、技术知识和企业发展方面的最低限度，才能确定外国直接投资是否具有十分明显的积极影响。²⁰ 因此，制定吸引和管理外国直接投资的政策时，不应忽视一个经济体在某个特定时期所面临的原有条件和结构方面的制约因素。

生产部门的发展政策、多样化和出口增长

所有快速增长的国家都采取了生产部门战略

尽管经济学家对政府干预生产部门的理论基础和有效性进行了激烈辩论，但公认的答案是，前几节所确认的所有成功示例都依赖于为推动工业化和/或支持对其经济体进行结构性改革而采取的某种生产部门战略。事实上，所有在近期实现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都采取了类似的干预措施，对其新兴工业实行大力保护的政策，并努力促进同类部门的发展，特别是在 1950 年代和 1960 年代，在随后的几十年和最近，也在一定程度上采取了这种做法，（例如在信息和通信技术方面）。但在当今的政策环境下，有些干预措施已不再适用。正如下文所述，事实上，生产部门战略的范围已在当前全球贸易自由化的背景下变得非常有限。

²⁰ 特别见 Borensztein、De Gregorio 和 Lee (1995 年)；de Mello (1997 年)；以及 Lim (2001 年)。就业数字也说明了这一问题，很少有证据能够表明低收入国家接受外国直接投资能够产生积极的就业效应，但有证据表明高收入国家接受外国直接投资能够产生积极的就业效应（见 Spiezia, 2004 年）。

当然，并非所有干预措施都能全面发挥有效作用。即使是在取得成效的国家，也不是每一项政策措施都能够达到预期结果。这些实际存在的重要差别反映在如下方面，即能否很快放弃无效政策，国家能以多快的速度和能在多大范围内使其出口结构多样化并扩大到有活力的全球服务部门和商品贸易部门。但这些经济体向外向型经济发展并不意味着自由放任态度和不加选择的自由化。最近，大韩民国和中国台湾等地的成功示例对新兴部门的崛起继续起着有效的促动作用，甚至在较为自由的经济环境下也不例外（Wade, 2005年）。成功干预的另一个明显特征是私人企业部门的积极参与和/或参加，这些部门所获得的经验以及新技术和竞争，使它们的行为越来越不受政府控制。

成功示例涉及快速确认并摒弃无效政策

应该将工业和其他生产部门政策看作是对经济进行一系列干预的一部分，从而使改革其生产结构成为可能，同时要把资源活动从不太有活力的活动转向比较有活力的活动，这些活动未必都在加工部门。在这种意义上，这些政策包括宏观经济政策等涉及整个经济的措施（在第四章进行讨论）；对物质基础设施进行投资、鼓励和支持技术开发等横向或跨部门政策；以及针对具体部门或公司的选择性政策。前两类干预措施的实用性及影响已经得到公认。辩论一直集中在选择性的干预措施上（Wade, 2005年），这类干预措施的批评家们尤其认为，它所干预的是在运作良好的市场支配下进行的资源有效分配——这个条件不一定在所有发展中国家都会出现。它们进一步表明，政府往往会因失败而付出代价。然而，消除对市场的扭曲可能不足以加快和维持经济增长所需要的结构性改革（世界银行，2005年b）。许多发展中国家在1990年代增长缓慢就证明了这一点，包括撒南非洲经济长期停滞不前。

生产部门政策推动经济结构改革

正如第二章所讨论的，经济增长取决于经济结构改革。这种改革是通过广义上的创新（也就是说，以前在本经济体中没有生产和使用过的产品、服务或工艺）；在整个经济体的推广，以及公司和部门之间的各种联系进行的（Ocampo, 2005年b）。没有创新，只能继续使用不太先进的技术进行经济生产，而且无法实现多样化，使经济活动更具活力。这些活动都是以不断增加利润为特征，并且与新技术的学习和实际运用有关，它可以明显增强资本的盈利能力，并能进一步促进投资和增长。

创新对经济增长至关重要

尽管推动世界前沿技术发展的创新是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动力，但在发展中国家，创新往往通过代替进口、促进出口或二者相结合的方式，与以前在工业化国家进行的具有吸引力的活动和技术联系起来。如上文及第二章所述，较高的增长率一直与结构性改革联系在一起，这反映在有关国家的出口

创新是一个国家取得竞争优势的基础

组成中。事实上，计量经济学充分证明，随着国家出口经济的多样化，国民收入也会不断攀升。专业化或部门集中化处于发展过程的后期（Imbs 和 Wacziarg, 2003 年）。一个国家取得竞争优势的基础是创新而不是天然要素。因此，具有类似天然要素的国家在一些特殊部门和行业可能不具有相对的发展优势。Klinger 和 Lederman（2004 年）认为各种发现（被定义为在国家开始出口一种新产品期间出现的各种情况）与天然要素关系不大。另外，发展中国家不一定只是在具有不同发展水平的各部门提倡发现新事物。例如，Rodrik（2006 年 b）认为，中国拥有一个比较完善的出口总体，远高于人们通常对具有这种收入水平国家的出口总体完善程度的预期。

知识的取得会受到成本、外在性和进入市场壁垒的制约

先进的经济理论，特别是关于创新和技术变革的先进经济理论，证明了这样一种结论，即光靠市场力量无法取得最理想的增长结果。有利于增长的知识或技术的取得是一个学习过程，但受到成本、外在性和进入市场壁垒方面的制约。在需求（或结果）不确定的情况下启动成本的额度和外在因素的存在（从发生未必由最初投资人划拨的成本所产生的利益），使公司难以引进新的产品或工艺。另外，为了有利可图，许多项目都需要一些方面的互补投资，这往往需要大量的固定成本，如果其提供的各种服务没有很大的市场（而这种市场是难以事先保证的），私人企业家是不愿承担这些成本的。²¹对于某个地方的生产者来说，在新的市场赢得声誉也需要启动成本；这一过程可能会对其他公司产生重要的外溢效应，从而使它们能够从牵头者的成功中受益（而不必分担其成本和失败）。

如果获得知识是决定一个公司竞争力的关键因素，那么临时保护和给予奖励将会在公司积累其技术能力和保持其具有国际竞争能力所需的研发成本方面起到保证作用（Shapiro, 2005 年）。同样，还需要公共干预向企业家保证，对非传统活动进行风险投资所产生的经济效益不会在面临竞争时过早地消失。最后，通过加强私人投资之间的协调和进入新市场，或者通过提供社会回报高但私人回报低的基础设施，公共政策也在解决外在性协调问题方面起到一定作用。

私营部门的参与对确定制约因素非常重要

尽管某些政策的执行可能会为寻求经济效益的行为提供机会，但这不应该妨碍政策和私营部门之间的相互作用。应该着重设计一种程序，以便在与私营部门进行协商和协作的基础上确定是否为新的活动提供公共支持。这些协商的目的应该是查明那些阻碍私营部门对新的活动进行投资的制约因素。

²¹ 对加强追赶的技术能力的其他分析，见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2005 年）。

所使用的实际政策手段将取决于具体环境情况（Rodrik，2004年b）。

这一讨论引起了两个问题：公共多样化政策的相关性和积累技术能力以便提升国家经济结构的重要性。正如上文概述的那样，需要考虑第三个问题，即公共干预的质量问题。对这三种因素的研究将有助于加深我们对国家经济表现趋异性的理解。

创立动态比较优势：政策和结果

以出口带动增长战略的成功示例（例如，一级新兴工业化经济）常常涉及以前的进口替代阶段及积极的出口多样化战略。这些国家采取了一系列干预措施，如新兴工业保护、出口补贴和输出目标制度、性能要求、贷款分配、地方含量规则、对人力资本进行大量投资、发展技能和积累本地研发能力等，还包括放宽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以便为仿形和逆向工程提供机会。

尽管都是与外国投资人打交道，但做法却大相径庭。在大韩民国，国内内容协议和技术筛查制度使用的非常广泛，并且得到了政府全力的支持。中国台湾过去也经常使用类似措施，并且一直持续到1980年代晚期，许多行业都禁止外国投资。但新加坡的情况恰好相反，虽然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参与要大于大韩民国，但本地的企业能力历来较弱，出口型工业化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跨国公司。不过，以政策为导向的加工和服务活动是通过各种培训设施和政府资助的研发机构进行的，目的是吸引同类跨国公司进行参与。²² 二级新兴工业化经济体所采取的做法是对出口型外国直接投资更加开放，通过一系列财政鼓励措施，放宽所有权和汇款法律，建立出口加工区。哥斯达黎加和墨西哥都在1990年代采取了类似做法。

中国使用了一套复杂的、背离传统的政策，将关税、非关税壁垒和特许制度与特别经济区、连带的退税政策及其他出口型投资鼓励措施结合起来。拉丁美洲也使用了一系列的特殊干预措施，其中一些措施与一些一级新兴工业化经济体所使用的措施类似，如新兴工业保护和给优先部门予以发放贷款补贴。但从总体来讲，取得的成功比较有限。不过，该地区成功进入世界加工市场，在发展中国家当中仅次于东亚。这一成绩表明，拉丁美洲国家过去的生产部门战略所产生的工业能力使它们能够参加近期的出口发展，并从中

在吸引外国投资人方面有着不同做法

生产部门战略帮助拉丁美洲和亚洲形成了工业能力

²² 比较而言，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虽然建立了一种最开放的外国直接投资制度，但在完善其加工部门方面业绩不佳。

获利。但如上所述，急于求成的自由化做法也降低了这种能力，并且偏重于国内联系薄弱的部门（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2003年和2004年；Ocampo，2004年）。它还导致减少了在研发支出等关键领域中所做的努力（Lall，2003年）。

东亚和其他发展中区域之间的技术差距日益扩大

为促进撒南非洲工业发展和结构变革所做出的努力在该地区多数国家都没有取得成效。该地区的技术能力仍然薄弱（Lall，2000年）。另外，从总体来说，东亚与其余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技术能力差距日益扩大，特别是撒南非洲地区。如果这个问题得不到解决，这种技术差距可能会进一步加剧发展中国家的增长趋异性。

几种因素造成了政策结果令人失望

可以用外来因素（自然灾害或国际利率升高等外部冲击）和结构性因素（本地市场分裂、企业家基础薄弱等）来解释一些国家生产部门的政策结果令人失望的原因，因为这些因素对政策选择和政策设计构成负面影响。在经济体人口不多的特殊情况下，由于小规模经济涉及到因经营规模扩大而成本费用增加，致使以较低成本实现多样化存在较大难度（Guillaumont，2005年）。

在其他情况下，多边或双边的制度性安排可能在决定经济体采取何种专业化模式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例如，有些国家未能利用从优惠待遇中获得的经济效益，使它们的经济脱离一直接受临时补贴的部门，实现多样化，或提高这些行业的竞争力，从而使它们能够在没有特别优惠或安排的情况下生存下去。欧盟糖类和香蕉制度或《多种纤维协议》所规定的配额制度的许多受益国及其后继者就是这样的例子。不过，其他一些国家能够利用对它们的优惠：例如，毛里求斯提升并改革了其糖业部门，并且成功地实现了向纺织和服装行业发展的多样化进程；圣卢西亚及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等加勒比国家能够使其经济多样化，实现从香蕉部门向旅游部门的发展（Gillson、Hewitt和Page，2004年）。因此，决策者的态度和远见以及其政策的质量也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事实上，有些政策失败的原因在于缺乏政策的一致性和合理性，目标不明确以及政策手段的选择有误（见第五章）。

外向型经济、贸易自由化和增长

贸易自由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问题成为激烈辩论的主题

贸易自由化和开放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问题成为激烈辩论的主题。自1970年代晚期以来，东亚经济体相对于拉丁美洲和非洲的较高经济增长表现和外向型经济已经让分析家们尤其将贸易自由化描绘成促进经济增长的一种手段。正

如 Shapiro (2005 年, 第 5 页) 所解释的那样, “这种假定就是, 对进口替代政策的反出口偏见以及缺少国内竞争都会阻碍创新和鼓励寻求经济效益的行为。这些微观上的无效率反过来又会导致宏观上的经济增长不平衡和增长速度较慢。出口和进口竞争将会通过学习和创新产生动态效应。”

但贸易自由化是否有助于促进经济以较快速度增长尚不得而知。1990 年代早期开展的若干计量经济学研究声称, 贸易自由化能够导致经济的较快速度增长, 对这项研究的精心修订表明, 研究结果是建立在不恰当的贸易自由化指标之上, 或者是使用了有问题的计量经济学方法。对在 1990 年代 (这一时期的特征是较大程度的经济一体化) 收集的证据进行的评估并不能说明比较开放的经济体在这一时期内始终比开放程度较低的经济体发展的更加顺利。另外, 没有发现与贸易开放有关的措施 (关税和非关税壁垒、贸易份额、贸易份额的变化、封闭和开放的指数或虚假程度) 与增长有重要联系 (Rodriguez, 2006 年 c)。

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在 1990 年代似乎已经下降

Dowrick 和 Golley (2004 年) 也得出了类似结论, 他们发现, 在 1960 年至 1980 年期间, 贸易增长使较贫穷国家的生产力增长速度达到较富裕国家增长速度的两倍, 但这一增长在 1980 年至 2000 年更加开放的贸易时期被颠倒了过来, 这一时期贸易对生产力增长的些许影响有利于较富裕国家, 实际上对较贫穷国家的影响变成了负面影响。²³ 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水平似乎有所提高, 但收入却减少了。

调查贸易自由化对福利的影响采取的另一种方法, 是研究取消壁垒政策是否能缩小实行自由化的国家之间在收入水平上的差距。Slaughter (1998 年) 对实行贸易自由化的国家在从事主要自由化活动前后的趋同性模式与其他一些实行贸易管制的类似国家所采取的模式进行了比较, 通过这种方法, 他发现, 在贸易自由化和收入趋同性之间没有系统性的联系。

即使是在自由化导致出口扩大或与出口扩大同时发生的国家, 对总体增长的影响也因国家的不同而各异。一些国家通过其出口似乎实现了高于其他国家的国内总产值增长 (Palma, 2006 年)。这一结论佐证了本章的论点, 即由多样化和经济结构改革所支撑的一体化模式对经济增长十分重要。

²³ Dowrick 和 Golley (2004 年) 呼吁进一步加强研究, 加深对这些结论的理解。他们自己的初步建议是, 通过跨国公司进行技术转让的性质已在后一个时期发生了变化, 前一时期有利于顺利实现贸易自由化的各种互补政策没有体现在后一时期的“一种政策适合所有情况”的做法中。两种建议都符合本章及随后几章中所介绍的论点。

光进行贸易自由化是不够的，还需要采取互补性的改革措施

最近的经验研究表明，贸易自由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取决于一个国家为了利用国际贸易而实施的互补性改革措施（另见第五章）。它还取决于各种结构性特点（Chang、Kaltani 和 Loayza，2005 年）。其他研究表明，对于人均国内总产值水平低但随着发展水平提高不断增长的国家来说，贸易自由化的增长效应不十分明显，而对高收入国家而言则是在逐渐削弱（Calderón、Loayza 和 Schmidt-Hebbel，2005 年）。根据 Chang、Kaltani 和 Loayza 的研究结果，我们认为贸易自由化不应被看作是追求增长的一种主要手段，而应视为总体发展战略的一个要素（另见世界银行，2005 年 b）。根据 Calderón、Loayza 和 Schmidt-Hebbel 的研究结果，我们可以认为，贸易自由化的时机选择似乎很重要，但贸易自由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仍不明确。

贸易自由化的时机选择和速度至关重要

与贸易自由化推动者的预期结果相反，许多迅速（以急于求成的方式）或过早地实行贸易自由化的经济体都经历了一个限制工业化的过程和一个进口明显增长的时期，却未必是较快速度的经济增长。²⁴ 过早的自由化损害了工业能力逐步形成的过程。另外，贸易保护期过长可能会导致负面的或不当的鼓励和无效率。不能只靠贸易保护，这样会阻碍发展。正如Wade（2004 年，第xlvi页）所说的那样：“在私人企业、市场经济背景下，贸易保护始终必须成为较大工业战略的一部分，以增强国内企业的能力和国内投资比例。”

贸易自由化使一些国家的工业化受到限制至关重要

限制工业化的现象在提供中间投入和部件加工部门特别明显，致使出口活动脱离本地工业，减弱了出口对总体经济增长的潜在积极影响。但在有些情况下，时机选择并不是惟一的约束因素：如上所述，由于误导的政策设计，导致一些行业无法形成真正的竞争力，这类政策虽扩大了保护或补贴的范围，但没有规定十分严格的标准。在有些情况下，贸易自由化并没有使那些面临新的竞争局面的公司获得充分支持。不健全的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估价过高的国内货币，也在削弱竞争力方面起到某种作用（见第四章）。

发达国家在充分确立工业化生产之后实现了贸易自由化

这并不是说贸易自由化在提高竞争力方面不起作用。世界市场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大量机会，发展中世界的许多成功经验就是证明。然而，贸易自由化需要谨慎地结合到一个国家的生产部门战略之中。值得注意的是，当今发达国家在有选择地实行贸易自由化的同时，还采取其他政策措施。²⁵ 这些

²⁴ 应该提到，在这些经济体当中，有几个经济体在 1990 年代实现了强劲的进口增长，而在 1980 年代，由于外汇紧张、债务危机和由此导致的国际收支调整，它们的进口量明显下降。1980 年代的增长受到进口收缩的负面影响。

²⁵ 香港特别行政区是一个明显的例外，因为该经济体采用的是非常自由的制度，并且也改变了它的结构，使其增长战略从以加工为基础转变到以服务为基础。

国家在推动国内工业化进程时，几乎都没有实行自由贸易，那些实现工业化较晚的国家在追赶当时领先的经济体时也没有实行自由贸易。贸易自由化只是在工业化生产已充分确立之后才开始实行（Chang，2003年）。即使是在现在，发达国家也通过支持研发和其他工业化政策，积极参与推动那些技术变革密集的生产部门。而自由贸易被限制在那些被发达经济体视为敏感的或应受到特殊待遇的部门；农业和服装等劳动密集型工业制成品是最明显的例子。

适当的战略必须要有针对性。除了其他因素之外，它尤其取决于发展水平、技术能力、经济规模、自然资源基础、政府能力和已经确立的国家与商业之间的关系。它不仅涉及到加工生产，而且还涉及到充分利用具体国家的天然资源所提供的机会以及现代化服务的发展。如果有关战略能够为—个经济体提供使其生产结构持续多样化的能力，形成强大的国内联系，逐步增强技术能力，发展有活力的私营部门，包括中小型企业，那么这些战略就可以被视为成功的战略（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2000年和2004年）。

适当的战略必须要有针对性

当今有没有生产部门发展政策的空间？

需要有一致政策来推动国家进行结构改革，当今世界对这一需要并没有消失。在技术变革日新月异的背景下，现在的入门要求高于—级经济体工业化期间所要达到的要求。这种趋势更加需要发展中国家逐步加强国内能力，以便独立地或依靠外国资本促进新部门的发展。不过，成功的发展中国家在过去所采取的政策做法可能不再适用或不再合乎需要。起步条件可能不一样，而且可以用来实现多样化的机会也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了变化。另外，全球政策环境和国家政策环境都发生了变化。全球政策环境现对以前不受管制的行为和部门具有制约作用。国家政策环境经历了一个自主自由化的过程，有的是根据多边金融组织和双边捐助者规定的限制条件形成的，有的则是在自愿基础上形成的，例如，加入其条款超出国际公认的纪律要求的自由贸易协定（FTA）。某些做法有可能被放弃，但其他做法仍可采用。尽管政策空间可能已经缩小，但肯定没有消失。

政策空间已被缩小但并没有被消除

过去的多边贸易环境确实比较宽松。多年来，《关税及贸易总协定》（《总协定》）中引入了授予发展中国家专有特权的条款。原协定（第三十六条第8款）规定，发达国家不得要求发展中国家做出对等承诺，也就是说，不要指

过去多边贸易规则为政府提供了较大的行动自由空间

望发展中国家做出与其发展需求不相符的让步。这条不对等原则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可以自行承诺接受有限的市场准入条款和有限的关税约束。另外，关于非关税纪律的协定（进口许可、补贴和反补贴措施、对贸易实施的技术壁垒等）只适用于签字国（例如，在1973-1979年东京回合多边贸易谈判中所使用的所谓准则做法）。引入了“授权条款”，以便能够（除其他事项外）给予发展中国家关税优惠（通过普遍优惠制），正因为这样，随着总协定的签订，最惠国原则从此失去了意义。

“单方面承诺做法”
减少了发展中国家的
选择机会

在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1986-1994年）过程中，“单方面承诺”做法取代了准则做法。不再让发展中国家从某些协定中做出选择。因此，各国必须接受由《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和《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和《服务贸易总协定》等所规定的其他纪律。

需要考虑限制对发展
的作用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确定了知识产权的最低保护水平，禁止或限制抄袭、强制许可和逆向工程等做法，这些做法被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作为一种追赶手段得到广泛使用。该协定可能有助于促进地方的创新活动和本地品牌的发展，以及外国直接投资和技术转让，因此应根据它的这些潜在好处对此种限制进行权衡轻重。另外，越来越多的双边和区域自由贸易协定中关于知识产权的条款往往会超出该协定的承诺范围。²⁶

《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不允许外国投资者使用对贸易产生某种影响的业绩相关措施，如本地内容和贸易平衡要求。不过，允许提出出口和技术转让要求。这些措施在中国等国家广为采用，用以提高本地半导体和信息技术等高新技术产业的能力。引人注目的是，鉴于墨西哥在工业表现方面相对不太成功，北美自由贸易区规则明确禁止刚刚提到的要求（Houde 和 Yannaca-Small, 2004年）。由美国签订的所有后北美自由贸易区自由贸易协定都载入了类似的条款。这些条款类似于一般双边投资条约（见Cosbey等人，2004年）。

另一方面，《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禁止给予非法补贴、财政贷款和奖励，从而要求接受者达到一定出口目标或与实际或预期出口收益联系在一起。

²⁶ 美国尤其主张进一步加大专利保护的力度。值得注意的是，鉴于《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中规定的最惠国待遇义务，如果承认与美国签订的协定中所规定的更大程度的专利保护，可能会迫使发展中国家向第三国提供类似的专利保护。例如，美国-摩洛哥自由贸易协定所载入的条款允许对原专利已经期满的现有药物中所发现的新用途进行保护（Cosbey等人，2004年）。

还禁止将补贴与使用国内产品联系在一起。另外，如果能够证明以某个具体行业或某个行业集团为发放对象的补贴损害到本《协议》其他缔约方的利益，那么这种补贴就可能成为诉讼标的（也就是说，其他国家会对此提出异议）。相反，研发补贴或以环境或以条件特别差的地区为对象的补贴不会成为诉讼标的。人均国内总产值低于 1 000 美元的国家不受这些承诺条款限制，但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优惠待遇只限于经过延长的逐步取消期。

尽管《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限制政府干预鼓励出口，但一些计划仍然符合世界贸易组织的要求，并且得到准许。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不再允许存在具有某些特征的出口加工区，除非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委员会同意延长这些出口加工区的存在期限。²⁷ 免税规定可以保留，还可以保留某些形式的出口补助，包括公共出口贷款。另外，尽管这些措施能够与世界贸易组织的要求相一致，但为了完成同样的目标，可以对出口奖励结构的某种要素进行更改。例如，国家可以让出口加工区企业也服务于国内市场，或者将出口加工区企业所享受的某些好处扩大到国内所有企业（Keck和Low，2004年）。另外，国家可以继续补贴一些特殊部门，直到投诉国提出有关受到实际损害的证据（但对市场渗入很小的国家提出这样的诉讼可能是一件困难的事情）（Chang，1999年）。

一些形式的干预仍然
为世界贸易组织所支持

世界贸易组织仍然支持提供新兴工业保护和国际收支保护，但必须符合额外的程序要求。新兴工业保护条款自 1967 年以来还未被任何国家援引，这可能主要是因为它们必然会伴随对受损害当事国的赔偿。因此，发展中国家通过国际收支条款延长了新兴工业的保护期限。通过乌拉圭回合谈判，引进了补充纪律：²⁸ 各国在由于国际收支因素而适用各项措施之前必须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货币基金组织）进行协商（Keck和Low，2004年）。尽管补救应与国际收支问题相当，但各国仍然可以选择将要实施各项措施的所在部门。

关税趋势也缩小了政策空间。这些趋势包括发展中国家增加关税约束承诺、随着时间推移关税逐步下降以及最近采取的和/或为了进一步降低关税而采取的形式。约束承诺意味着国家对公司做出关于其关税标准不超过约束水平的承诺。在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实际关税和约束关税之间有一定差别，实际关税水平低于其相应的约束关税水平。不过，做出某一具体约束水平的承诺将会降低国家在把关税作为一种工业政策手段方面的灵活性：即将促进的

不断增加的关税约束
承诺和不断下降的关
税有助于缩小政策空
间

²⁷ 只有某些方案和国家符合条件，可以考虑延长期限（见世界贸易组织，2001年）。

²⁸ 东京回合谈判已经采用了以价格为基础的措施优于数量限制的提法。

行业或部门会随着时间推移而变化，但最高关税水平却是固定的。最近在世界贸易组织多哈回合谈判中提出的建议则强调了完全约束作为非农业市场准入（NAMA）目标之一的合意性（世界贸易组织，2005年）。

关税统一和降低关税差别削弱了将关税结构作为一种政策工具的能力

限制政策选择的另一种趋势反映了在采用以统一各国关税和降低各种产品之间关税差别为目标的非线性公式方面新形成的共识。这一做法将会削弱国家把关税结构作为一种政策工具的灵活性。发展中国家需要将相对较低和较高的关税结合起来，在不同时期对不同部门适用不同的关税，因为这样做有利于促进其经济结构的转变。因此，可能需要保留相关很大的关税差别。另外，关税的最优水平和结构也会随着时间推移而改变，有必要“对多边纪律和工业发展政策的灵活性进行协调”（Akyuz，2005年，第26页）。

需要扩大政策空间

总之，积极的生产部门政策的范围已经缩小，但仍然有激励“发现”新活动和解决协调问题的空间。但推动生产多样化和技术升级可能需要增加灵活性。或许尤其应该比过去更加注意那些支持新兴出口工业发展、以及动态出口部门和其他国内活动之间的联系和由此带来的国内市场一体化的规则。为了给知识产权方面的协定赋予更加发展的定位，可能还需要增加空间。因此，应该根据在多边贸易协定中给予发展中国家特殊待遇和优惠待遇的定义，对这些问题给予更多的关注。更广泛地讲，正如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贸发会议）于2004年6月13日至18日在巴西圣保罗召开的第十一届会议上通过的《圣保罗共识》（文件TD/412，第二部分）中所强调的那样，重要的是要在国家政策空间与国际纪律和承诺之间达成适当的平衡。

实现更大趋同性的道路

尽管一些发展中国家能够以较快速度增长并缩小与发达经济体的收入差距，但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程度的加深，各国之间收入的趋异性似乎更加明显了。

出口多样化

生产和一体化的模式关系到增长

国际贸易在各国之间增长趋异性方面所起的作用源于各国所提供的商品和服务类型之间的差异，以及这些商品和服务在国际市场出口增长潜力方面的差异。另外，与一种经济融入全球经济所采取的方式也有关系，因为它反映了专业化模式有没有随时间推移而变化以及出口部门有没有与经济中其余

部门产生联系（上文所说的内部一体化）。

尽管高科技工业制成品出口国的增长速度较快，但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向高科技出口多样化发展可能并不是一种立即可行的选择。许多国家缺少必要的技术能力，包括充分的熟练工人。另外，如果缺少有效的其他有利因素（如地理上接近和在受益于现有东亚区域分组参与者的生产单位之间存在运输和通讯基础设施），进入这一部门必然会变得更加困难。如果几个国家同时采取同一路线，市场就会迅速饱和，导致价格下降，同样影响增长速度（例如所谓的组成假象效应）。

但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都能在初级商品方面具有竞争力（并且以初级商品为平台，向生产其他商品发展），并且随着多边贸易环境逐步变得更加有利，向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工业制成品加工出口或低等技术工业制成品加工出口多样化发展。在此方面，发展中国家提高了在农业和低等技术工业制成品两个方面的出口市场准入条件，减少了在这些部门中的关税和非关税保护，取消了农业方面使贸易失真的国内支持和出口补贴，所有这些可能都增加了发展中国家的市场机会，因此有利于较快速度增长和收入趋同性。但是，在增加农业市场准入的谈判过程中，发展中国家还需要考虑其经济的长期结构性变革。它们需要预计到向生产工业产品进军，并且要避免往往与商品生产联系在一起的经济停滞以及由纯粹向组装加工多样化发展所带来的浅层一体化。向新活动发展的多样化可能需要某种类型的保护或支持，因为能力是在不断提高的，公司竞争力也是在不断增强的。

发展中国家较快速度的趋同性需要有得到改善的市场准入

加强服务贸易在多边贸易谈判中的机会

国际服务贸易也为几个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机会，特别是在旅游、运输和一些劳动力密集型的商业服务部门。与商品贸易的情况一样，多样贸易谈判也在放开服务的利益方面起到一定作用。但是，与商品贸易不一样的是，服务贸易往往要求同时存在服务供应商和消费者，这意味着增加的服务贸易必须伴随着生产要素流动性的增加。

从其本身的性质来看，通过《服务贸易总协定》第三种方式（商业存在）进行的服务贸易与外国直接投资的所有潜在利益（而且包括限制因素）都有联系。关于国际劳动力迁移管理的自由化（第四种方式）可能是发展中国家增加服务出口最有希望的做法，因为这种做法能够让发展中国家利用它们富有劳动力资源的比较优势。它能够带来与全面迁移类似的好处，如汇款流入

第四种方式为增长服务出口提供了巨大潜力

以及获得技术和管理技术，同时有利于节约某些成本，如本国持续的人才流失，或接收国的政治对抗情绪。不过，第四种方式面临的壁垒仍然最高，使它成为发展中国家在世界贸易组织多哈回合贸易谈判的最后阶段期间的服务谈判过程中关心的一个优先领域。

推动参与全球市场及国内市场一体化

过去政策的失误应当避免

市场动力随时间推移而变化，全球商品和服务市场中的趋势强烈影响某些战略的生存能力。因此，各国在试图迅速复制一种在过去有效的替代战略之前需要谨慎，并且需要避免再犯与以前所采用的某些政策有关的错误。选择具体的运作市场与选择国家将要采取的一体化模式有关的战略同样重要。无论与外国直接投资有没有联系，通过不仅提供劳动力而且提供商品和服务，形成与国内经济的联系似乎都是实现持续增长的一个前提条件。国内一体化才是根本。

总之，生产部门战略至关重要

需要营造推动结构性改革的政策环境

没有什么证据表明，只要通过开放和稳定经济、增加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发展中国家就会进入快速和可持续发展道路。东亚战后经济取得了成功并融入了全球经济一体化，原因在于这些国家采取的目标明确的贸易和部门政策，始终如一地促进加强其技术能力。尽管这些干预措施的空间多年来一直在缩小，但在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以及（尤其是）低收入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仍然有采取积极的公共政策的空间。不过，政策空间不应该进一步缩小，或许需要重新评估一些现行纪律要求对增长和发展的真正价值。因此，重要的是，将要在多哈回合多边贸易谈判中通过的决定应能营造比较有利的国际政策环境，帮助发展中国家进行动态结构改革，并避免进一步限制这些国家的经济转型工作。因此，多边贸易制度能够提供一种重要的手段，使各国进一步回到更大趋同性的道路。

附件

数据和方法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统计司根据相关国家或地区统计主管部门报告的年贸易统计数字（贸易量、价值和贸易伙伴），维护并不断更新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但各统计部门未必每年都报告每一种商品的贸易统计数字，也未必使用同样的标准商品分类。这些数据限制可能对商品一级的长期趋势分析和可以比较的国家分析构成挑战。在共同标准分类（标准国际贸易分类，第二次修订版（国贸分类））（联合国，1975年）的基础之上，通过将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与其他可用贸易数据库结合起来，并且利用各种估算方法，国家经济研究局创建了一个涵盖163个国家的1962-2000年期间世界双边贸易综合数据库（Feenstra等人，2005年）。可以通过www.nber.org/data访问这个数据库，并用于本章所进行的分析。

分析期：本分析期被分为两个亚期（1962-1980年和1980-2000年），用以说明在这些时期所发生的结构变革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记账单位：报告数据所使用的货币单位是美元。没有国家数目很多的商品一级贸易量的可比综合数据库。初级商品有价格估算，但工业制成品没有。后者的贸易量数据特别难估算，因为产品质量会随时间推移和国家的不同而发生变化。为了部分抵消价格浮动带来的影响，使用了较长观察期的平均值（而不是单独的某一年）。

地区：本文所使用的国家分组同第二章广义国家分组定义，但包括的国家数目更多，同时提供1962-1980年期间的统一数据。因此，本次分析中共分析了105个国家的状况。^a关于国家分组方面的情况，见注解。

按技术含量进行的产品分类：在Lall（2001年）制定的分类方法基础上，按自然资源和技术含量将产品分为五类。本次分析不包括国贸分类第三组（燃料和能源）和第九组（未分类产品）中的产品。在此方面，尽管不可避免会有一定程度的随意性，但Lall的分类是根据加工业中技术活动的指标进行的。这五类产品包括：

1. **初级产品（PP）**，包括食品和活体动物、原材料（燃料除外）及银、

^a 孟加拉国未包括在南亚范围之内，因为缺少1962-1980年期间的贸易数据。

白金、铜、镍、铝、铅、锌和锡。

2. 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工业制成品 (NRB)，主要包括加工食品和烟草、普通木制品、精制石油产品、染料、皮革（但不包括皮革制品）、宝石和有机化学品。产品可以是简单和劳动力密集型产品（简单食品或皮革加工），也可以是资本、规模和技能密集型产品（现代加工食品）。这些产品中的竞争优势一般（但并不是始终）是由本地拥有丰富自然资源而产生的。

3. 低等技术工业制成品 (LT)，主要包括纺织品、服装、鞋类、其他皮革制品、玩具、简单金属和塑料制品、家具和玻璃制品。这些产品往往具有如下特点：采用主要体现在固定设备之中的和十分普及的耐用技术，研发支出少、技能要求不高以及低规模经济。在这些产品的成本结构中，劳动力往往占主要部分。产品之间往往显不出差别，至少是在大规模批量生产的（非时装）末端是这样。进入市场的壁垒相对较低；这些产品的竞争优势来自价格而不是质量或品牌。

4. 中等技术工业制成品 (MT)，包括重工业产品，如汽车、工业化学品、机械和相对标准电气和电子产品。这些产品往往具有如下特点：采用复杂但变化并不快的技术，具有中等水平的研发支出，制造工艺和设计技术先进，而且是大规模生产。在工程制品中，强调产品设计和发展能力以及广泛的供应商和承包商网络。由于资本要求较高，在运作、设计和（对于某些产品而言）产品差别方面学习效应明显，因此进入市场的壁垒往往较高。在工程技术方面的创新和学习越来越涉及到价值链中加工者和供货商，有时也包括消费者之间的合作（对于大的设备项目而言）。

5. 高科技工业制成品 (HT)，包括复杂的电气和电子（包括通讯）产品、航空、精密仪器、精细化学药品等。这些产品需要变化迅速的先进技术和复杂的技能，进入市场的壁垒最高。最具有创新意义的产品需要大量的研发投入、先进的技术基础设施以及公司、大学和研究机构之间的密切互动；但许多活动（尤其是在电子方面）采用的可能是由简单技术组合而成的最终程序，低工资可能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竞争因素。这些产品的高价值重量比（例如，相对于其本身的重量，电子产品拥有比汽车产品更高的单位价值）使价值链的各个部分能够分开并设在距离较远的不同地方。

贸易专业化模式：贸易专业化/多样化模式是比照上文所定义的五种产品分类进行分析的。多样化被广义地界定为初级产品在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总商

品出口中所占份额下降，工业制成品所占份额增加。

动态产品和部门：动态产品可以用不同的方式进行定义。为了本次练习之目的，动态产品和部门被界定为在特定时期内增加了其在全球出口中所占市场份额的产品和部门。

贸易专业化（多样化）指标：附列表 A.5 中所提供的估计数字说明了长期以来的多样化进程，同时按照本分析期期末时的观察，反映了某个特定国家在每一类产品的总出口（发展中国家）中相对重要性。因此，这一指标说明了五类产品之中任何一类产品在某个特定国家总出口中所占的份额，乘以该国在发展中国家这一类产品总出口中所占的份额。形式上，

$$\text{贸易专业化指标} = \left[\left(\frac{X_{ij}}{\sum_{i=1}^n X_{ij}} \right)_{t+1} - \left(\frac{X_{ij}}{\sum_{i=1}^n X_{ij}} \right)_t \right] * \left[\frac{X_{ij}}{\sum_{j=1}^n X_{ij}} \right]_{t+1} * 100,$$

其中，X=出口价值，i=商品，j=有关国家，t=时期。

如果某个国家的出口结构变化相对较大，但这个国家未能在发展中国家某一类产品出口中获得相应的出口份额，那么这一类产品的指标就可能相对较小。正如设想的那样，这种措施尽力将出口多样化与市场渗入结合起来。根据某类产品指标达到的最高价值，将各国分为初级产品、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工业制成品或低等技术、中等技术或高科技工业制成品出口国，也就是说，专业化相对于发展中国家总商品出口最重要的那一类产品。

第四章

宏观经济政策与增长差异

一个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通常被认为有益于长期增长。然而，经济学家们对于应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目标的稳定程度和类型看法不一。经济稳定性是否应成为宏观经济政策的核心目标，或者宏观经济政策是否应更直接地促进更广泛的发展目标，关于这些问题也是众说纷纭。

事实上，发展中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重点在过去几十年已经发生转移。1980年代以前，发展中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主要体现在更广泛的、以增长为主的国家发展战略中。发生这种变化的原因是，1980年左右，许多发展中国家面临严重的宏观经济不稳定，而且发达国家推行宏观经济政策的主流示范已经从注重充分就业的逆周期波动需求管理的凯恩斯主义方法转为以控制通货膨胀为目的的更加保守、谨慎的货币主义观。发展中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还把其重点集中在尽一切力量实现低通货膨胀，避免重大的财政失衡和外部收支失衡上。短期经济稳定化，从这个词的限定意义上来讲，被看作是长期经济增长的一个关键。

宏观经济政策中的这一新的“正统派学说”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颇为盛行，但其在促进更高经济增长中的有效性正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在设法降低通货膨胀率和恢复财政平衡的同时，许多执行这类政策的发展中国家未能实现强有力的持续经济增长。常见的情况是，稳定化政策导致“顺周期波动”的宏观经济政策模式，损害公共投资和私人投资，从而损害经济增长。

批评传统的宏观经济政策框架的人赞成回归到基于将短期的逆周期波动财政货币措施与长期的发展政策相结合的宏观经济稳定化政策的更广泛的发展方式（例如，见Ocampo, 2005年a; 和Stiglitz等人, 2006年）。他们强调指出，宏观经济政策应以增长为主，以充分就业为最终目标。由于发展水平和机构素质不同，发展中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框架应在目标、手段、政策立场以及宏观经济稳定的标准上与发达经济体有很大差异。以较为广泛的方式处理宏观经济政策也是必要的，因为，正如第二章中所论述的，发展中国家的增长过程与发达国家有本质上的不同。在发达国家，生产率的提高主要取

关于对发展中国家来说什么是“正确”的宏观经济政策的看法已经发生改变

宏观经济政策应以增长为主，以充分就业为最终目标

决于技术创新。在发展中国家，更典型的情况是，生产率的提高可以通过成功地使劳动力从低生产率部门向高生产率部门转移以及通过积累人力资本和有形资本来实现。由于这些活动直接影响到投资决定和资源在各部门间的分配过程，因此，与较为发达的经济体相比，宏观经济政策对发展的影响在发展中国家要大得多。正如第三章中所论述的，增长的影响将进一步取决于宏观经济政策如何与贸易和生产部门的政策相协调。

本章首先联系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情况简要论述一些与宏观经济稳定有关的事实，即那些涉及通货膨胀与增长、宏观失衡与增长以及金融发展与增长之间关系的事实。一个不稳定的外部环境可能限制宏观经济政策在确保稳定和增长条件方面的有效性。正如第二节中所分析的那样，许多发展中国家自1970年代以来一直面临外部融资条件极不稳定的局面，这给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也影响到政府制定宏观经济政策的方式。资本流动“顺周期波动”的特性也使得宏观经济政策更加“顺周期波动”。这意味着，当经济情况好转时，国际投资者更热衷于在该国投资，政府更愿意花钱，而当经济情况恶化时，外部金融家们不太愿意在更加需要资金的时候提供这些资金。没有资金，政府将不得不减少开支，这有可能使经济陷入衰退。第三节分析顺周期波动的宏观经济政策事实上是否对长期经济增长有不利影响，经济增长表现更出色的国家取得这一成绩的原因之一是否是逆周期波动的短期宏观经济调整的支持。

第四节论述在基础设施和人的发展方面进行公共投资对于长期经济增长以及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增长差异的重要意义。为了填补目前的巨大差距，许多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贫穷国家，将不得不动用大量公共资源来对基础设施和提供社会服务进行必要的投资。这类投资对生产率和经济增长可能产生的积极影响一般需要一些时间才能显现出来，因为基础设施工程也许需要几年的时间才能完工，从孩子们走进学校到他们作为生产率较高的劳动者进入劳动力市场也许需要更长的时间。因此，为了在将来获得经济上的好处，政府现在需要就动员大量的资源，这就给政府的预算管理增加了额外的内容，“跨期”内容。通过税收和更有效地分配现有预算资源所调动的国内资源可以为这类开支提供更多的经费，但必须在逆周期波动宏观经济政策框架内小心管理。就低收入国家而言，国内资源调动的范围可能不符合投资需要，有效而充足地分配官方发展援助将不得不发挥重要作用。本章结尾将概述发展差异所涉及的问题以及消除这一差异的国内国际政策的影响。

宏观经济稳定和增长差异

宏观经济稳定对经济体的长期增长表现有很大影响。不过，应更广泛地看待宏观经济稳定的问题，因为宏观经济稳定所需要的不只是保持价格稳定和可持续的财政平衡，还要避免经济活动和就业情况波动过大，另外，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还要保持可持续的外部收支账户以及避免外汇汇率高估。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危机频发，这表明宏观经济稳定还意味着维持管理良好的国内金融部门、银行系统合理的资产负债表以及合理的外债结构。

宏观经济稳定和增长一般是相辅相成的。强有力的可持续增长使得实现进一步的宏观经济稳定更加容易，特别是通过增强国内和外国公债的可持续性。另外，从广义上说，更大的稳定性降低了投资的不确定性，从而对较高的长期增长起着支持作用。

第二章图2.4 表明，投资波动较小的国家一般有较高的长期增长率，而第一章图1.2 表明，发展中国家的产量增长波动在 1960 年代之后的二十年间显然较高。较大的波动在其他宏观经济指标中也可以看到，例如通货膨胀率（见表四.1），但各组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波动率差异很大。

表四.1

1960-2003 年按区域分列的产量和通货膨胀波动情况

变动系数	1960 年代	1970 年代	1980 年代	1990-2003 年
国内总产值增长率				
发达国家	0.12	0.51	0.51	0.35
发展中国家				
东亚和太平洋	2.03	0.41	0.20	0.32
南亚	0.62	1.16	0.24	0.28
中东和北非	..	0.89	1.22	0.56
欧洲和中亚	29.65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0.37	0.25	1.53	0.84
撒哈拉以南非洲	0.46	0.81	1.00	0.68
通货膨胀率（消费物价指数）				
发达国家	0.69	0.68	1.02	0.87
发展中国家				

增长差异与宏观经济波动密切相关

	1960年代	1970年代	1980年代	1990-2003年
东亚和太平洋	3.70	0.82	1.00	1.25
南亚	0.96	0.90	0.50	0.64
中东和北非	1.41	0.83	0.87	1.34
欧洲和中亚	3.65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1.88	2.25	5.06	6.08
撒哈拉以南非洲	1.75	1.06	1.54	10.97

资料来源：联合国秘书处经济和社会事务部，根据世界银行的2005年世界发展标数数据库。

说明：波动用波动系数来衡量，该系数是标准偏差除以平均数。对于每组国家的国内总产值（GDP），产量变动经过了加权计算。通货膨胀是指消费物价指数（CPI）的变化，各地区通货膨胀的变动系数没有经过加权计算。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1960年代经历了强劲的增长和相对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宏观经济波动的加大可以部分归因于全球经济中的各种冲击，例如1970年代早期国际货币安排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1970年代开始时和结束时的两次石油危机以及1980年前后世界利率的急剧上升。各国受这些冲击影响的程度以及应对这些冲击的能力各不相同。特别是，尽管确实未能幸免于危机，但比起增长较慢的拉丁美洲和撒哈拉以南非洲来，快速增长的东亚经济体设法实现了更大的宏观经济稳定性，这是从这个词的广义上来说的。1990年代（至少一直到1997年），在拉丁美洲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宏观经济波动似乎稍微缓和了一些，但波动程度仍然高于1960年代和1970年代，虽然是在缓慢得多的经济增长条件下。1990年代末，新一轮金融危机是发展中世界许多地方再一次相继出现宏观经济不稳定的原因之一，一些充满活力的东亚经济体也遭到牵连。到了2000年代中期，趋于增长的世界贸易和商品价格使发展中世界出现了一个增长异常快速和宏观经济稳定的时期，自1960年代以来还尚未经历过这样既实现快速增长又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的局面。

通货膨胀与增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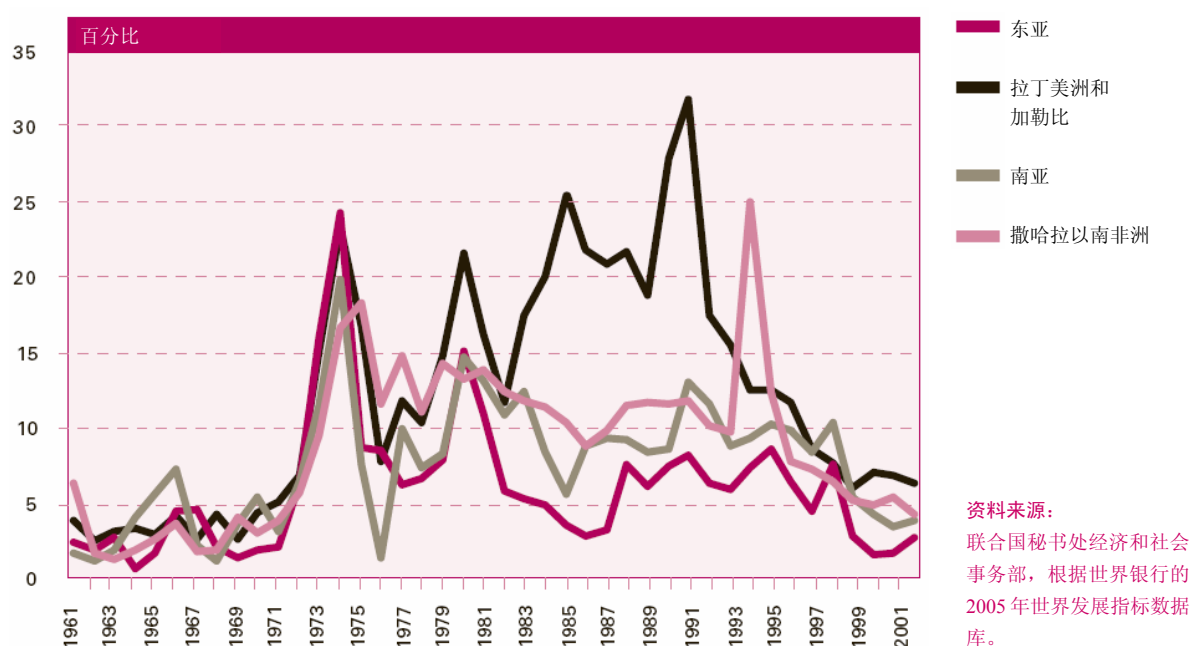
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各发展中国家的通货膨胀率大相径庭，但在1990年代都呈下降趋势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1960年代保持了一个既低又稳定的通货膨胀水平（见图四.1）。1970年代初通货膨胀率急剧升高的情况在所有发展中国家所在区域普遍存在。从那以后，通货膨胀率波动相当大，但各地区之间差别很大。大多数亚洲经济体设法使通货膨胀保持在了适度的水平上。拉丁美洲的通货膨胀迅速上升，在债务危机期间变得特别严重，导致了几次恶性通货膨胀的出现。

在 1991 年达到最高点后，拉丁美洲的通货膨胀率有了大幅下降。在撒哈拉以南非洲，通货膨胀在 1970 年代前半期上升很快，但从那以后一直在下降，虽然年度波动仍然很大。更普遍地说，发展中国家的通货膨胀率在 1990 年代开始呈现出下降的共同趋势，这也是世界范围内的一个趋势。

图四.1

1961-2003 年特定区域的通货膨胀率中位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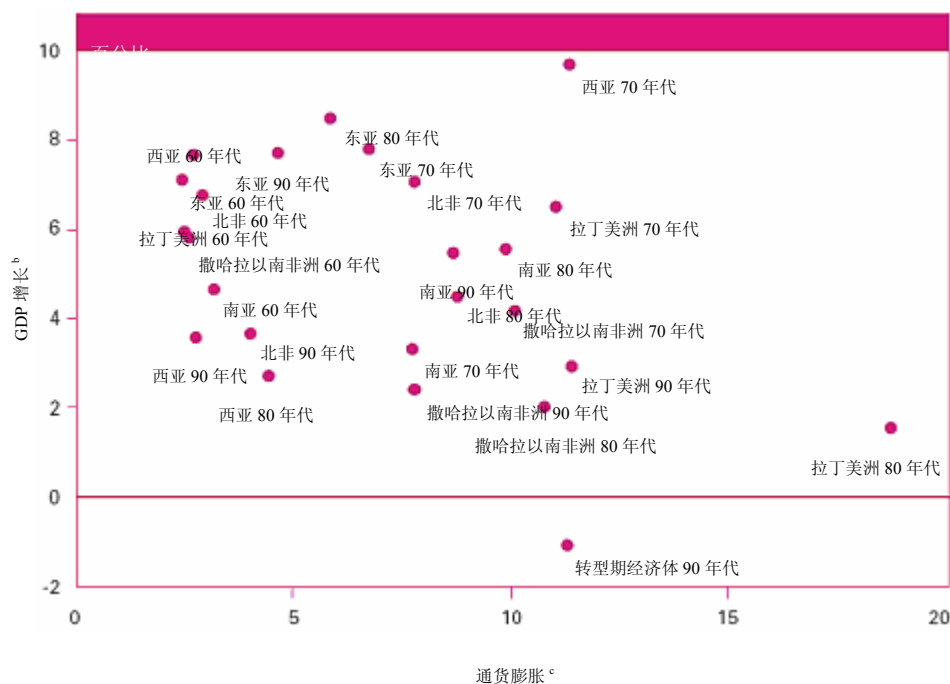


对于在 1960 年代以及最近几年，也就是 2000 年以来通货膨胀较低并且保持稳定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所在区域来说，这两个期间正是有稳步增长表现的时期。相反，在 1970 年代和 1980 年代通货膨胀率既高又不稳定的大多数区域，增长表现也差得多（见图四.2）。

较低的通货膨胀率与较高的长期增长相关

这些研究成果似乎证实了一个流行的观点，即高通货膨胀不利于长期增长，因为高通货膨胀引起更大的经济不确定性，阻碍长期合同的签订并提高利率的风险溢价，从而打击私人投资的积极性。由于高通货膨胀一般还与较大的价格变率相联系，价格信号会变得更加难以解释，导致各部门之间资源分配扭曲。高通货膨胀将通过对利率和税收系统产生不利影响进一步扭曲资源的时际分配（Fischer 和 Modigliani, 1978 年；Briault, 1995 年）。

图四.2
1961-2003年按区域和时期列示的通货膨胀水平和增长表现^a



资料来源:

联合国秘书处经济和社会事务部, 根据世界银行的 2005 年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

^a 标明为“1990 年代”的时期是指从 1990 年到 2003 年的可用数据。

^b 加权平均数: 1960 年代关于西亚的数据只包括 1967 年到 1969 年这一期间; 1970 年代关于南亚的数据只包括 1974 年到 1979 年这一期间, 1960 年代的数据不包括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1960 年代北非的数据包括 1961 年至 1969 年这一期间。

^c 所估计的通货膨胀率是该区域的中位数, 而区域的中位数是根据有关时期各个国家的通货膨胀率中位数来计算的。

不过, 通货膨胀与长期增长之间的相反关系并不稳定

高通货膨胀与较低的增长相关, 但——正如计量经济学所证实的——二者的关系并不稳定, 因果关系不确定。特别是, 温和的通货膨胀不一定导致低于平均水平的增长。例如, 在 1960 年到 2000 年之间, 泰国的产量增长大大低于大韩民国, 尽管后者的平均通货膨胀率较高。博茨瓦纳的通货膨胀高于其他许多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 但引人注意的是, 它的经济增长较高。还有, 许多经济体经历了长期的低通货膨胀和低增长期, 而其他一些经济体设法将高产量增长率与温和的通货膨胀率相结合, 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与较高的通货膨胀率相结合。后者的例子有 1968 年至 1980 年的巴西以及 1981 年至 1990 年的土耳其。另外, 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历使得一些观察家认为有可能在较长的时期内保持大约 15-20% 的中度通货膨胀率而不影响宏观经济的稳定性或阻碍增长 (Dornbusch 和 Fischer, 1993 年)。不过, 价格不应波动过大。如果价格波动过大, 则通货膨胀的平均水平低也能损害长期增长。

低通货膨胀率与较快的经济增长之间关系不密切反映在图四.2 中, 该图显示, 如果不考虑某些情况 (特别是, 1980 年代债务危机期间拉丁美洲的情况和 1990 年代转型期经济体的情况), 这两个变量之间在统计学上没有显著

的相关性。因此，尽管通货膨胀很重要，但没有必要为保持宏观经济稳定以支持长期增长而把很低的通货膨胀率定为目标。

宏观经济失衡与增长

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稳定化政策受到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货币基金组织）“财政规划”模式（Polak，1957年）的基本理解的很大影响。在货币基金组织与发展中国家一起制定的几乎所有稳定化方案中，该模式曾长期作为确定宏观经济政策目标的基础。该方式所依据的一个核心原则是过度的政府支出和贷款需求过高是造成收支平衡问题的主要因素。因此，为了弥补外部收支赤字，一般需要进行税务调节和采取措施来降低国内借款需求。

宏观经济调整不是一个简单的恢复财政平衡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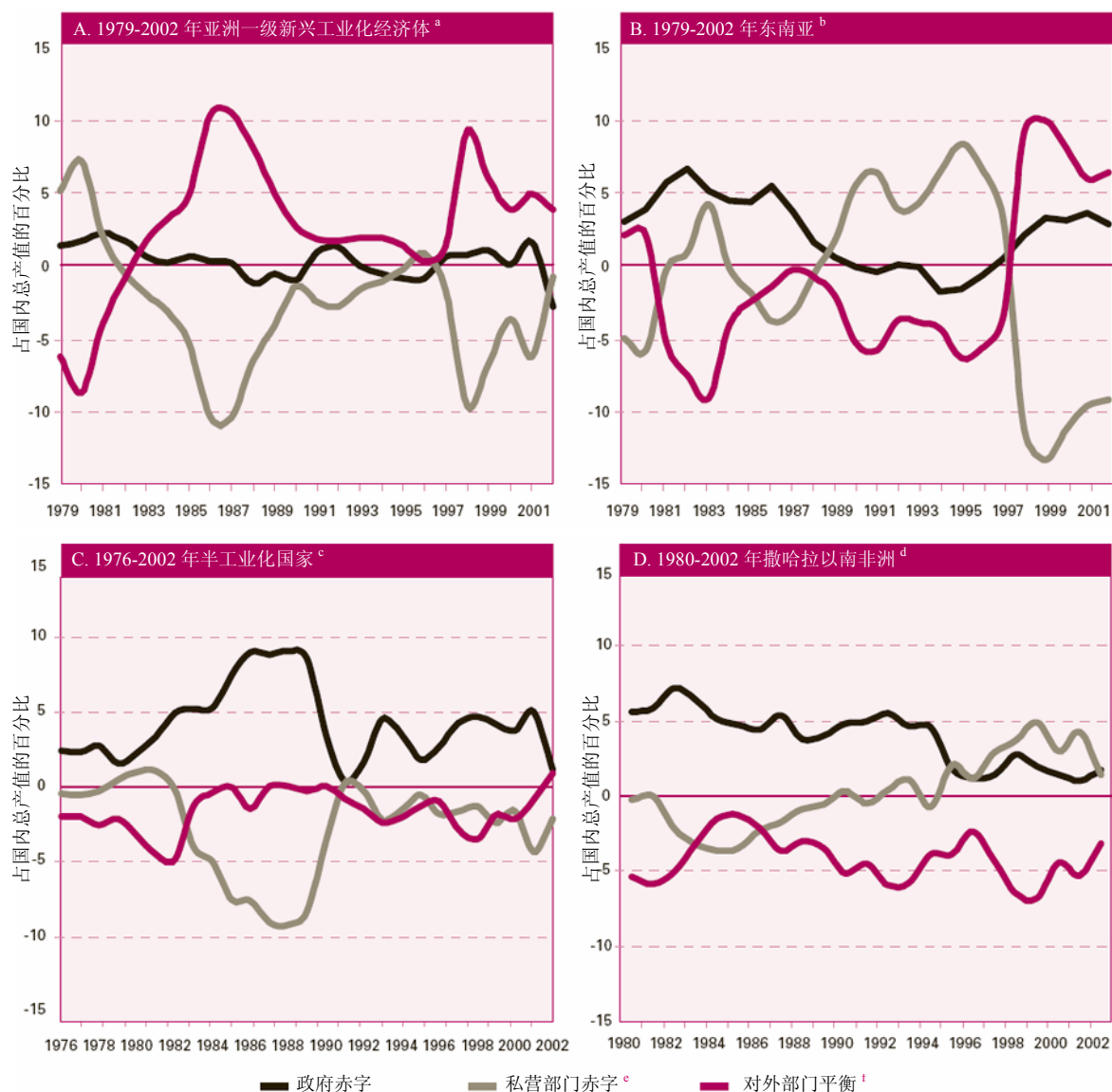
然而，在实践中，发展中国家的宏观经济平衡没有表现出关于“双赤字”的任何明确的一前一后运动模式。图四.3 显示四组发展中国家的政府赤字、对外收支差额和私营部门储蓄缺口，使用的是与第二章中相同的国家分类。按照宏观经济会计规则，就一个经济体而言，三项差额之和应为零。

四张图显示，政府收支差额和对外收支差额并不是一对一的关系。最常见的模型是私营部门赤字（储蓄缺口）和对外收支差额共同运动的模式。尽管不那么常见，但在有些情况下，私营部门赤字和政府赤字之间是相反的关系。财政规划中假定的财政赤字与经常账户失衡的典型联系因而显得少见。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财政紧缩似乎与私人借贷增加而不是对外收支赤字减少关系更加密切。

在呈上升趋势的第一列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和（范围较小的）东南亚，私人借款和国外借款净额的强烈波动并没有使增长陷于停顿。第一列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在1979至2002年期间作为国内总产值的一部分保持了稳定的、几乎平衡的财政账目（图四.3，A部分）。因此，宏观经济失调中的波动几乎完全可以用对外收支差额和私营部门储蓄缺口的共同运动来解释。私营部门和对外部门收支差额的波动较大，增减幅度超过国内总产值的10%。这些波动起源于可以确认的事件。例如，在1980年代，随着1985年《广场协定》引发汇率重新调整，出口受到刺激，区域的外币资产增加，因此，私营部门出现了储蓄盈余（图中的负值就表明了这一点）。这一情况后来出现了逆转，原因是在1980年代末私人需求增加，在1990年代前半期随着中国的竞争力增强该区域的竞争力减弱了。一直到1997年危机爆发，私营部门一直处于亏

图四.3

宏观经济平衡：亚洲第一列新兴工业化经济体，1979-2002年；东南亚，1979-2002年；半工业化国家，1976-2002年；以及撒南非洲，1980-2002年



资料来源：联合国秘书处经济和社会事务部，根据 <http://www.icseed.or.jp>提供的数据，这些数据来源于联合国共同数据库，以及联合国统计司的国民账户数据库。

a 新加坡、大韩民国和中国台湾省的加权平均数。

b 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的加权平均数。

c 阿根廷、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墨西哥、南非、土耳其和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的加权平均数。

d 埃塞俄比亚、加纳、肯尼亚、尼日利亚、乌干达、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和津巴布韦的加权平均数。

e 作为余额计算的，但代表私人投资减去储蓄额。

f 等于国际收支差额经常账户。

损状态。该危机导致对外收支差额急剧增加，与之相伴随的是国内总需求剧减导致的私人盈余激增。不过，在一定程度上借助于温和的逆周期波动的财政政策，后一种情况随后很快得以恢复。最典型的情况是，财政收支差额的变动占国内总产值的 1% 左右，因此在整个宏观经济调整过程中不占主要地位。

亚洲金融危机也使东南亚遭受打击，1997 年和 1998 年东南亚的私人需求锐减（图四.3，B 部分）。该地区，尤其是印度尼西亚，恢复的速度比第一列新兴工业化经济体要慢得多。总的说来，如同在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和中国一样，在 1980 年代和 1990 年代，私人借贷和国外借贷中的抵消摆动支配着宏观经济调整，政府的借贷水平保持着相对稳定，尽管财政赤字期间更为频繁。

相反，在半工业化国家，政府赤字在调整过程中更为突出（图四.3，C 部分）。在 1980 年代，外部借贷的途径枯竭，需要用私营部门的储蓄盈余来为弥补财政赤字提供资金。无论如何这都涉及私人需求萎缩，在某些情况下，需要使用通货膨胀税来产生私人储蓄盈余。私营部门资本形成相成较低，这主要是由于宏观经济不稳定。

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私营部门净借贷与政府净借贷两方面的波动抵消了对外收支平衡方面的变动（图四.3，D 部分）。在 1980 年代期间，政府赤字保持在相当稳定的水平，主要是外国援助提供了资金。当政府赤字在经济紧缩方案中减少时，私人储蓄盈余也减少了（同时私人借贷增加了）。同样，在该区域，尽管 1990 年代实行财政紧缩，对外收支不平衡却没有减少，因此私营部门收支赤字和对外收支赤字结束了相继变动。

金融发展、增长与宏观经济稳定

发展中国家间的增长差异，以及宏观经济稳定特点不同，这些也受到过去四十年金融部门发展的影响。通过为公司投资调动家庭储蓄和外国储蓄，确保这些资金用于最有盈利的地方，并且分散风险和提供清偿手段以便公司能有效驾驭新能力，金融媒介活动对经济增长过程起着支持作用。因此，金融发展涉及建立和扩大机构、手段和市场来支持这一投资和增长过程。然而，在这一环境中，金融媒介活动有很强的客观性，这一般是积极的（例如信息和偿债能力规定），但在市场机制特有的系统的金融危机中也可能是消极的。

增长差异也受到过去四十年金融部门发展的影响

发展中国家的金融自由化没有导致预期的储蓄水平和投资水平提高

在 1960 年代和 1970 年代，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金融部门的特点都是以银行为基础的系统、影响银行贷款分配的规则、赋予国有商业银行和开发银行的重要作用、已结资本账户、有上限的利率以及积极的货币干预。在那之后的十年，这一传统的、“被压抑的”金融部门结构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实行金融自由化的过程中瓦解了。金融自由化预计将提高储蓄水平和投资水平，提高增长率并降低宏观经济不稳定性。然而，在许多情况下，这些目标没有达到。

自 1980 年代以来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爆发的一波又一波的金融危机使这一点变得明显起来。还有证据表明随着金融自由化，对许多生产部门的大公司以及一般的中小型企业的投资减少了，这给长期的可持续增长造成很大的问题（FitzGerald, 2006 年）。例如，来自四个非洲国家（乌干达、肯尼亚、马拉维和莱索托）的证据表明，更大程度的金融深化不一定会增加农村地区的储蓄量或获得商业银行贷款的机会，除非那些已经有抵押品的人（Mosley, 1999 年）。

传统的金融机构，比如商业银行，也倾向于歧视小的借款人，原因是贷款管理的单位成本高，并且缺乏有效的抵押品，也就是说回报低，风险高。这对所有发展中国家来说都是一个大问题，因为小公司占产量的大半，并且是雇员人数最多的。

传统上，这些“缺口”是由国有银行填补的，但在许多国家，作为金融改革的一部分，这些银行瓦解了，新的小额贷款计划只是对这些银行的部分替代。相反，在快速增长的亚洲经济体，金融自由化是逐步进行的，国有开发银行和有管理的贷款计划长期得到维持并且对增长过程起到了支持作用。¹

金融深化没有导致较高的储蓄率

出于这样的原因，以经验为根据的研究未能在金融自由化与增长表现之间建立牢固的因果关系。²也很少有证据表明这样的金融深化（或者说金融自由化）导致了更高的储蓄率，较高的储蓄率被认为是较高的投资和较高的增长的主要源泉。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有两个。首先，金融改革的结果是储蓄从财产或货币之类的资产转为银行存款和有价值证券。这将提高记录的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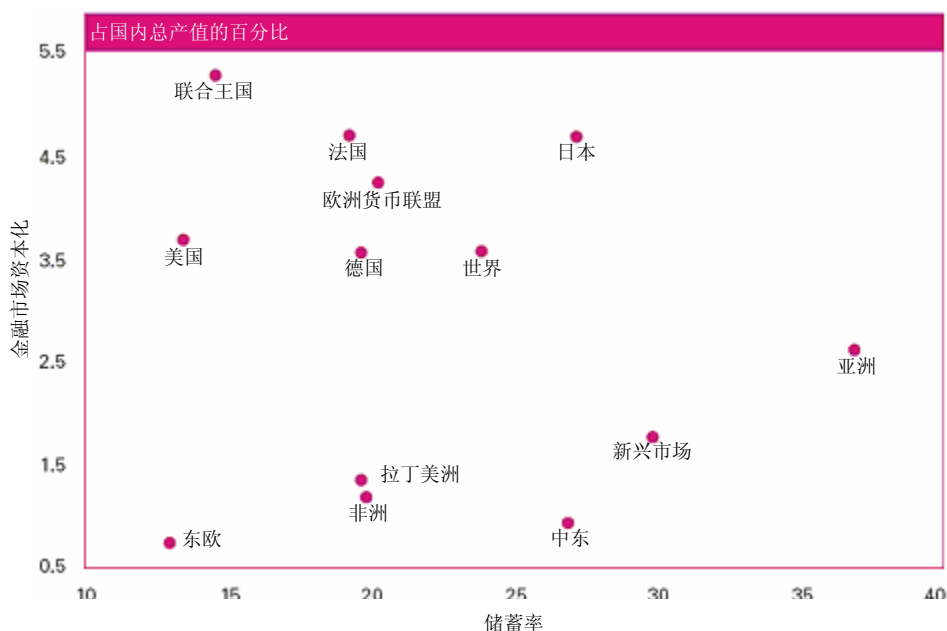
¹ 例如，见世界银行（1993 年）关于在“亚洲奇迹”中国家干预金融市场的作用的著述以及联合国（2005 年 b，第一章，题为“长期融资”的一节）关于在发展中经济体开发银行在提供长期资金方面的作用的著述。

² 例如，见 King 和 Levine（1993 年）以及 Prasad 等人（2003 年）关于被经常引用的研究的著述以及 FitzGerald（2006 年）关于文献评述的著述。

融“深度”而不提高储蓄率。其次，金融自由化扩大了获取信用卡和其他类型个人贷款形式的消费信贷的途径。这样一来就会减少家庭储蓄总额，如果缺乏获得流动资金的途径是家庭在一个更为“受抑制的”金融体制下在增加消费支出方面所受到的基本限制的话。图四.4 证实，没有可靠的证据表明金融深化（用尽可能广泛的度量标准，也就是市场资本化总额来衡量）提高了储蓄率，从而促进了投资或增长。事实上，储蓄率似乎取决于其他因素，例如人口和税收对养恤金供给的影响、健康和教育方面的资金提供，以及公司的所有权结构或者甚至家庭的组织。

图四.4

2003 年特定国家和地区的金融市场资本化和储蓄率



资料来源：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05年），《2005年全球金融稳定性报告》，华盛顿特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4月），统计年表 3；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概览》数据库。

注：

金融市场资本化是指股票市场资本化、未偿债券和银行资产的总和与国内总产值的比例。储蓄率是指国民总储蓄与国内总产值的百分比。

各国的金融自由化经历表明自由化过程千差万别，正如其结果一样。此外，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市场的不完善和非市场的不完善并存于一个更大的自由化的宏观经济框架中，在这些国家，影响公司投资决定的除贷款数量和成本外还有很多因素。

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不太发达的金融市场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缺乏一个面向用本国货币标价的政府债券或公司债券的长期国内市场。这一特点可能给投资以及金融自由化环境下的金融稳定造成问题。国内债券市场的缺乏使得

国内债券市场的缺乏使得为公共基础设施或私人现代化项目提供资金变得更为困难，也使得金融系统更加脆弱

给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和重大私人现代化项目提供资金更为困难，还迫使公司利用短期债务来为长期投资提供资金，因而在它们的资产负债表中累计到期日匹配失当，或者在国际市场上借更多的钱来为长期投资提供资金，导致货币匹配失当。到期日匹配失当再加上货币匹配失当，增加了汇率贬值和利率提高期间的金融脆弱性，由于外部供资的可获得性有顺周期波动的特点，汇率贬值和利率提高在时间上常常同步。国内债券市场不够发达以及与之相关的金融脆弱性又减少了为抵消外部冲击而进行货币干预的范围。

亚洲危机凸显了发展国内债券市场的重要性，使得金融政策更加关注这个问题。因此，自1990年代末以来，国内金融市场迅速成长起来，不只在亚洲、拉丁美洲和欧洲新兴国家，而且是在非洲，只是非洲的范围较小（见图四.5）。³

国内金融自由化常常与同全球资本市场接轨相联系，也就是说，与外部金融自由化相一致。原则上，这应形成一个国内金融系统可以利用的国际流动资金总库，到那时，国内金融系统应该会变得更加稳定。然而，正如在下一节中详细分析的，国际资本流入的高度变动性，再加上所有经济行为主体的有价证券的到期日匹配失当和货币匹配失当，这些使得资本接收国面临可能既严重又频繁的冲击和风险。

宏观经济不稳定使项目回报差异增大，也加剧了银行的逆选择问题，从而使银行回避风险。宏观经济稳定的实际好处不仅来自于金融储蓄增加和贷款可获得性提高，而且还来自于其对借款人与贷款人之间风险共担关系的有利影响（Villanueva和Mirakhor，1990年）。因此，自由化的步伐本身似乎至关重要，因为，放开利率所导致的借款利率突然升高可能会让一些公司无利可图，因为它们需要为从前以较低利率借进的资金支付一个较高的价格。

只把重点放在低通货膨胀和恢复财政收支平衡上的宏观经济政策对实现理想的增长速度来说或许过于狭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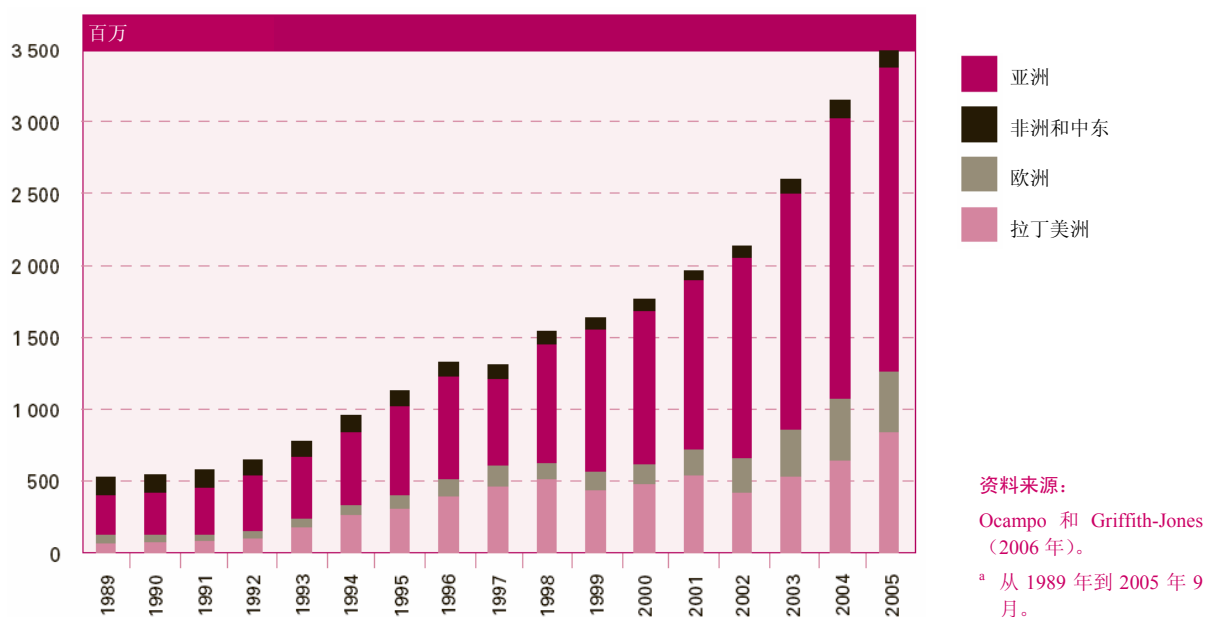
总的说来，宏观经济稳定和长期增长之间存在一种双向关系。只把重点放在低通货膨胀和恢复财政收支平衡上的宏观经济政策对实现理想的增长速度来说或许过于狭隘，尤其是如果对货币限制和财政谨慎的强调在短期内使经济活动受到抑制并且使更广泛的发展政策受到限制的话。同样，正如所显示的，财政调整在恢复宏观经济平衡中的作用似乎有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样的政策如何有助于促进一个有利于私营部门的以增长为目的的环境。

³ 国内债券市场的成长如果用占国内总产值的百分比来表示也很显著，在亚洲、欧洲和拉丁美洲增长了13-16个百分点。只是非洲在这方面下降了0.5个百分点。

这样一个环境的创造不仅取决于宏观经济政策与发展政策的整合程度，而且还取决于金融部门的结构和发展水平。

图四.5

1989–2005 年发展中经济体国内债券市场的成长（未偿总额）^a



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潜在贡献是巨大的，并且金融自由化能帮助发挥更加有效和流动的金融媒介作用。然而，不能认为对增长的这些贡献是理所当然的，并且对增长的影响取决于适当的体制结构的构筑。全世界的金融结构千差万别，并且在金融结构与人均收入水平或人均收入增长之间不存在单一的关系。重要的是金融部门确保为包括中小型企业和农场在内的企业的生产性投资以及长期投资提供足够的资金。根据发展阶段的不同，这也许意味着为公营部门银行（尤其是开发银行）保留一个重要角色，以及确保建立用本国货币提供长期资金的国内债券市场。体制发展还应确保适当的管理和监督以保障可靠的金融部门资产负债表，在本报告中只是顺便考虑了这个问题（不过，详情可参见联合国，2005 年，第一章）。

金融发展的这些方面似乎在许多金融自由化方案中被忽视了。因此，增长差异似乎与各国避免顺周期波动稳定化政策、将宏观经济调整政策与更广泛的发展政策相联系以及确保金融部门的发展能够控制（而不是加剧）外来资本流动的变动性的能力差别有关。以下章节将更加详细地探讨这些问题。

对发展中国家稳定和增长的外部限制

变动的国际资本流量成为了许多发展中国家宏观经济不稳定的一个根源

经济理论提出，私人资本应从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在发达国家资本过剩，投资机会被发掘得比较充分，而在发展中国家，与比比皆是的投资机会相比，资本稀缺。资本的流入能补充国内储蓄，为发展中国家的投资提供资金，帮助其增长和发展。此外，能够进入国际资本市场将有助于减轻商业周期里流动资金的变动，抑制宏观经济的波动性。然而，在实践中，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资本时常变动，是宏观经济不稳定的一个根源。

自1970年代中期以来，流入发展中国家的私人资本猛增。资本流动的两个中期循环对许多国家的稳定和增长产生了重大影响（联合国，2005年b，第74-75页；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1999年，第二部分，第四章）。1970年代国际银行给发展中国家的贷款急剧增加，结果导致了1980年代的债务危机。另一个高潮发生在1990年代，主要是由有价证券投资流量和外国直接投资（规模较小）推动的。同样，较近的一次高潮以亚洲金融危机后净流入锐减告终。2001年全球减退的趋势发生逆转，国际经济环境得到改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条件有所好转，这些为2003年私人资本流动重新恢复提供了基础，表明另一个周期有可能开始。

私人资本流动集中在少数中等收入国家

私人资本流动集中在少数中等收入国家，回避了大多数仍然依赖于官方资本流入的低收入国家。在1970年代期间，大多数国际银行的放款流入了大约十几个（较为富裕的）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并且大都采取中长期贷款的形式，利率可变，直接提供给国营部门，或者在有政府担保的情况下提供给私营部门（Vos，1994年）。在1990年代期间，绝大多数有价证券投资流入了一些新兴市场经济体，但这一次主要是接收国的私营部门借款（联合国，2005年b）。继加速亚洲危机来临的资本流动突然停止后，流入东南亚的私人资本在该十年初期开始发生逆转，迹象就是金融危机最严重的时候过去了，出现了强有力的复苏，达到了1990年代中期的水平。外国直接投资加速向中国以及印度（规模较小）的流动是此次复苏的主要促进因素。相反，经过始于1990年代末的长期下滑后，流入拉丁美洲的资金基本上一直低于1990年代的高水平。

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商业银行贷款和有价证券投资证明是高度顺周期波动的。在经济扩张期间外来资金容易获得，并且成本低，而在经济下滑期间，

外来资本不容易获得，并且成本提高。在 1970 年代，发展中国家得到了获取商业银行贷款的机会，而在这之前的几十年，它们都主要依赖于官方发展援助或外国直接投资。从一个方面说，能够获得私人供资是发达国家银行寻找新市场以使它们的多余流动资金能转变成可以赢利的贷款的结果。国际银行系统中多余的流动资金主要来源于第一次石油价格上涨后产生的石油盈余，这些钱大多存放在商业银行中。还有一个原因是国际金融市场中发生的制度改变，这一改变使得以前不被允许从事国际贷款的中小型银行得以进入。国际贷款中的竞争加剧进一步压低了借款的成本。不过，与此同时，银行集团通过综合贷款来分担风险，贷款进一步集中在少数发展中国家（见 Vos，1994 年，第 5 章）。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当时被认为是一个值得冒险的地方，一个原因是其出口业绩好，例如东亚，而在 1970 年代商品价格居高不下，使拉丁美洲和其他中等收入的主要出口国从中获益。

私人资本流动是顺周期波动的，变动更加不稳定

1980 年左右，银行贷款的猛增突然停止，因为世界利率上升了，并且随着借款国的偿债负担突然加大，对风险的看法发生了改变。随后银行贷款的大规模收回加速了发展中国家中蔓延的债务危机。在借款成本的上升和对获得借款的限制加大的同时，商品价格急剧下降，事实上对外部供资的需求更大了。

获得私人资本流的机会减少的情况持续了整个 1980 年代，从大约 1990 年以后情况有所好转，其中一个刺激因素同样是新的参与者进入了市场；特别是，养恤基金和其他机构投资者的加入，以前，它们只被允许在国内金融市场上运作。此外，1980 年代末根据《布雷迪计划》进行的债务重组以及金融自由化进程和许多发展中国家进行的其他结构性改革方便了私人资本流的进入。正如上文提到的，这第二个周期期间的许多贷款采取的是短期有价证券债务和股权投资的形式，由于其性质，这些贷款证明比长期债务和外国直接投资要不稳定得多。短期银行贷款甚至更不稳定，在东亚危机中见证了这一点。在 1990 年代期间，发生了几个盛衰循环，最开始是 1994 年年末墨西哥的比索危机。东亚危机掀起了在该十年最后几年看到的一系列基础广泛的金融危机。

私人资本流量从 1990 年起复苏，但随着盛衰循环再次起伏

除了以强烈的顺周期波动特点为特征，盛衰循环一般会波及其他市场。墨西哥的货币危机导致了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中的资本逆转，被称为“龙舌兰酒效应”。亚洲危机也在其他地方引发了资本逆转，1998 年俄罗斯的违约

引起了投入发展中国家的资金的更广泛撤回。既然一个国家失去进入国际银行市场或债券市场的机会波及其他资金来源（除了可能影响其他国家进入市场的机会外），那么全面的市场关闭可能随即发生（联合国，2005年）。即使在国家没有完全失去进入市场的机会时，它们一般会受到风险溢价提高的对待。信用评级机构顺周期波动的降级常常对本已减少的获得有价证券贷款的机会和债券发行的价差产生不利影响。

尽管外国直接投资流量也受到亚洲危机的不利影响，但仍然是积极的，并且成了流向发展中国家的私人资金的主要来源。值得注意的是，外国直接投资也顺周期波动而变动，虽然与短期贷款和有价证券投资的程度不同（世界银行，1999年）。因此，外国直接投资也能增加宏观经济不稳定性。其原因之一是许多外国直接投资采取的是在发展中国家兼并和收购公司的形式，这些公司可以轻易地被再次出售（见第三章）；并且从外国直接投资适应国内市场这个意义上说，它要对经济下滑做出反应，就像国内投资一样。跨界银行贷款的适度扩大、发展中国家当地债券市场最近的成长以及国际新兴市场债券的投资者基础扩大，这些也有助于减轻近年来资本流动的不稳定（联合国，2005年b，第89和90页）。

不稳定的和顺周期波动的资金流量减少了逆周期波动的宏观经济政策的余地

私人资本流的顺周期波动性限制了政府，尤其是中等收入国家的政府为实行逆周期波动的宏观经济政策而利用这些资本的可能性。由于在经济上升时获得资金比较容易，政府也许更倾向于允许预算赤字扩大，并且/或者中央银行也许允许扩大给私营部门的贷款。相反，当外部供资在经济下滑期间收缩并且借款成本上升时，非利息财政支出也许需要受到严格限制，给私营部门的贷款将收缩，从而加剧经济的衰退趋势。实行逆周期波动政策能力的这一降低意味着获取国际资金流量的机会也影响着实际经济，尽管不是通过缓和商业周期，正如经济理论所预计的，而是通过扩大经济周期：流入常常导致产量扩大，流出导致收缩和停滞（Kaminsky、Reinhart 和 Végh，2004年）。

没有适当的管理并且金融系统薄弱，金融不稳定就很容易波及实质部门

此外，由于发展中国家没有适当的管理框架和法律框架，并且金融系统薄弱，所以金融的不稳定很容易波及实质部门（Easterly、Islam 和 Stiglitz，2001年；世界银行，1999年；以及 FitzGerald，2006年）。例如，当薄弱的金融机构管理以及政府担保金融负债导致银行和其他投资者过度参与高风险贷款时，经济高涨就会发生。最初低成本的资金流的涌来将加剧过度承担风险的趋势并为盛衰循环创造条件。此外，它们将推动实际汇率升值，这会损

害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加剧对外收支不平衡。

在发展中国家，政府在宏观经济政策制定中的操作余地将被限制在通过传统手段来阻碍这些发展趋势。财政政策很可能将无效，因为相对于资金流的变动性，财政方法一般没有灵活性。此外，让外部供资条件中的不稳定波及公共支出有可能与其他发展目标不符，例如在人力资源和有形基础设施（见下文）方面持续长期投资的必要性。紧缩的货币政策和封存甚至可能导致随着资本市场的开放资本流入的进一步增加。特别是，这可能吸引不稳定的短期资金流向实际利率较高的地方。汇率政策将面临另外的抉择。利率限制将消除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并且进一步刺激对外借款。一个更加灵活的汇率也许不足以控制过度借款和提高汇率的变动性。方框四.1 论述了在汇率管理中的抉择以及与广义的经济增长的联系。

未能抑制资本大量涌入的影响将加大宏观经济失衡，并且当由于缺乏有效的逆周期波动的宏观经济政策的操作余地突然丧失筹措外资的机会时，必须进行相当大的经济下调。因此将需要其他政策手段，正如在本章结尾时所论述的。

流入发展中国家的私人资本的变动性和顺周期波动性也部分解释了为什么无法找到证据来说明这样的资本流动在过去三十年普遍导致了更多的投资或更高的长期经济增长（Prasad 等人，2003 年；Ramey 和 Ramey，1995 年；Kose、Prasad 和 Torrones，2005 年）。金融的变动性转化为了更大的投资不确定性和更大的产量变动性，而这些，正如前面论述过的，对于长期经济增长是不利的。此外，虽然资本大量涌入刺激了总的需求和产量，但在突然停止引发金融危机的情况下，除产生很大一部分逆收益外，还常常会出现其他问题。

一般说来，私人资本流没有促进更高的长期增长

资本流量的变动性是自 1980 年代以来在发展中国家越来越频繁发生的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由于危机导致在一开始的产量大幅度减少之后许多年内增长缓慢，产量降到了本不应该的低水平上。根据一些估计数，在过去 25 年里累计产量损失高达 25%（Eichengreen，2004 年）。另一项研究认为，1980 年代和 1990 年代期间拉丁美洲和亚洲的新兴市场经济体中发生的 26 次银行和货币危机事件中，每次危机损失的产量的平均成本（相对于趋势产量而言）为 GDP 的 18.8%（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98 年，表 15）。在四分之三的情况下都会发生产量增长损失。

方框 4.1

对汇率政策的挑战

^a 在所有的衡量方法中，根据样本中各国实际人均收入增长与美国实际人均收入增长之比，对购买力平价进行了调整。实际人均收入增长被用来替代生产力增长。生产力和人均收入较高的国家被认为劳动力较为稀缺，因此工资较高，这将抬高不能进行交易的东西的价格，引起实际汇率升值（或者说高估，正如相关文献中所提到的）。这个方法是 Dollar（1992 年）提出的，Easterly（2001 年）以及 Lucinda 和 Gala（2006 年）进一步研究了这一方法。

资料来源：

国内生产总值数据来自联合国统计局，汇率数据来自全球发展网增长数据库，发展研究所，纽约大学，可上网查阅：<http://www.nyu.edu/fas/institute/dri/global%20development%20network%20growth%20database.htm>。

^a 大于 100 的数值表示被高估（升值）的货币，小于 100 的数值表示被低估（贬值）的货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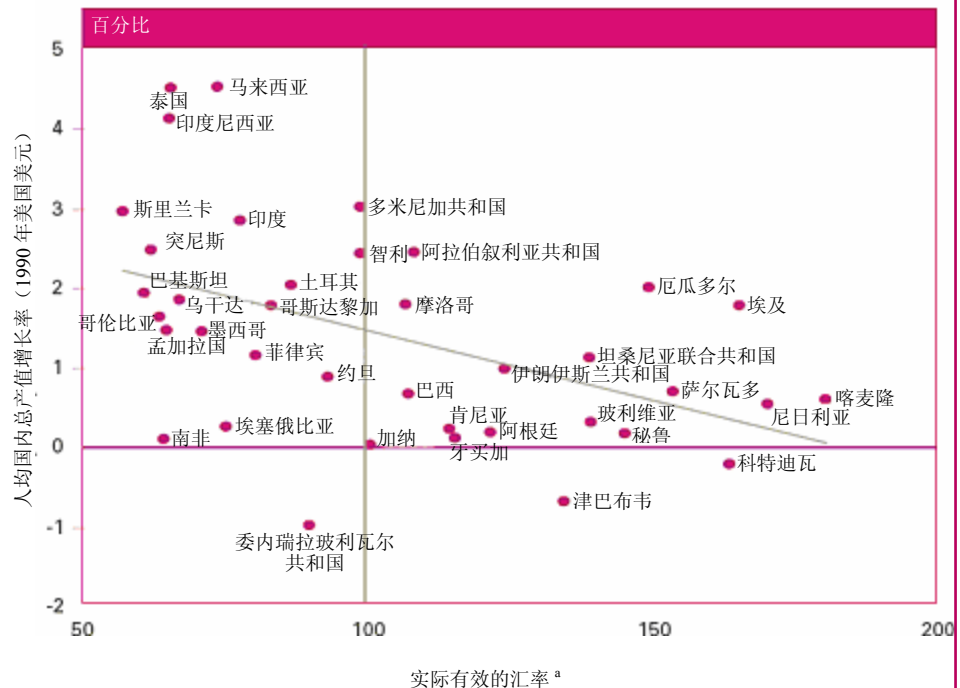
一个稳定的名义汇率能够为普遍的价格稳定提供支持。特别是，在过去经历过高通货膨胀并且其中央银行缺乏信誉的国家，依赖于一个稳定的固定的名义汇率能够帮助减轻通货膨胀和宏观经济不稳定。另一方面，由于汇率为国家间和部门间的资源分配提供了一个信号，也许需要更大程度的汇率灵活性来避免长期的资源无效分配。资本流量加大使得发展中国家保持一个固定汇率制度更加困难，坚持一个固定的利率限制的国家中发生的各种货币危机就是证明。为了应对这种情况，许多发展中国家转向了更加灵活的汇率制度，一般是夹杂着中央银行对外汇市场的一定程度的干预（通常被称为所谓的干预浮动）。

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干预外汇市场的一个原因是为了提高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在这种情况下，目标是实际汇率，也就是说，根据各国的相对通货膨胀率调整的汇率。这样做有一个迫不得已的理由。能够保持相对稳定的和有竞争力的实际汇率的国家在经济增长方面似乎进展得更加顺利（见图 A）。

下图显示的是实际汇率“升值”（或“高估”）的平均程度，用各国货币与美国美元的购买力平价之差来衡量，并且根据该国生产力增长与美国生产力增长之差进行调整。^a 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和拉丁美洲国家显然集中于图的右下部分，

图 A

1970 年-2003 年某些国家实际有效的汇率升值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



表明升值的实际汇率与较低的增长相结合的情况。拉丁美洲的两个大的经济体，阿根廷和巴西，也在这一组里。东亚和东南亚国家一般位于左上方，将更有竞争力的汇率与较高的经济增长结合在一起。这些国家的汇率政策大都支持促进出口型增长的工业和商业政策。图中撒哈拉以南非洲唯一一个奉行保持有竞争力的汇率政策的国家是乌干达，该国自 1986 年以来保持着货币的竞争力，人均国内总产值逐步提高到每年 1.9% 的平均比率（Rodrik，2000 年）。许多拉丁美洲国家也在左边部分，包括墨西哥、智利、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和多米尼加共和国，所有这些国家都是相对成功的出口国，特别是在 1990 年代期间。智利在增长方面是最为成功的拉丁美洲经济体。自 1982 年初的货币危机后智利经济体避免了比索高估的事实，不论是对宏观经济稳定还是对增长都是有利的。

方框四. 1 (续)

一个有竞争力的汇率并不表示货币贬值始终有利于促进增长。贬值可能对增长产生不利的短期影响。例如，在某些情况下，受危机驱使的货币贬值所产生的不利影响可能完全抵消在国际竞争中的优势，导致产量收缩（例如，参见 Cooper，1971 年；Krugman 和 Taylor，1978 年；Edwards，1986 年；以及 Agénor，1991

图 B

1972-1998 年某些货币危机期间的扩张/收缩^a



资料来源：
Gupta、Mushra 和 Sahay
(2003 年)。

^a 收缩/扩张程度 = $g_{post2} - g_{pre3}$ (稳定的)，其中 g_{post2} 是 T 和 T+1 的平均增长率，T 是危机年， g_{pre3} (稳定的) 是 T-1、T-2 和 T-3 年的平均增长率，在 T-1 和 T-3 之间有危机的时候除外，在这种情况下用最近的三个连续稳定 (非危机) 期来替代。

方框四.1 (续)

年)。一个最为重要的导致经济收缩的后果可能由政府 and 私人公司资产负债表上的资产和负债之间的货币匹配失当引起，尤其是在那些外债多的国家。贬值会提高与国内资产相比的外币负债的价值，增加破产的可能性，抑制消费和投资，正如 1990 年代末亚洲危机所显现出来的。即使一个国家总的说来是净债权人，但一些公司可能是净债务人，其所受损失的经济后果可能是经济状况好的公司的盈利所抵消不了的。

大规模的货币贬值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期间对增长有不同的影响（见图 B）。大约一半被选定的贬值事件引起了国内总产值的大幅收缩，不过，也有轻微扩张的情况。

在发展中国家，选择一个汇率制度和设计一项汇率政策始终离不开与汇率的灵活性和稳定性的突出特点相联系的收益和成本之间的权衡。因此，就一个特定国家在一个特定期间而言，一个适当的汇率制度和政策取决于该国广泛的宏观经济政策框架。

由于国内政策、结构特点和外部条件不同，自 1990 年代以来各国从金融危机中恢复的速度大相径庭。凭借相对较快的债务重组和更有支持力的财政政策，遭受危机的亚洲国家能够相对较快地从经济增长的波谷中攀升出来。一开始为应对危机而强制推行的过于紧缩的宏观经济政策发生了快速逆转，这一逆转提供了信贷来资助出口产品并且有助于稳定国内需求。相反，由于债务重组的延误和限制性的宏观经济政策，1999-2003 年期间，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从金融冲击中恢复过来的速度相对较慢。

发展中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周期性

逆周期波动的宏观经济政策对于长期增长很重要

最近以经验为依据的增长文献证实，推行宏观经济政策的做法能对长期增长产生重大影响。Aghion 和 Howitt (2005 年) 以及 Aghion、Barro 和 Marianescu (2006 年) 指出，逆周期波动的政策能直接影响长期增长。当公司在财务上受到限制时，经济下滑会迫使它们削减投资，阻碍长期增长。不过，如果政府有财政手段来增加公共开支，减轻赋税，为私人企业的长期投资提供补贴以及/或者在经济下滑期间放松货币政策，那么对长期投资和增长的不利影响将减轻。

然而，在实践中，发展中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常常趋向于顺周期波动，不是减轻而是加剧下滑对长期增长的不利影响。在这方面，发展中国家政府推行逆周期波动政策的能力的不同可能是在这些国家间看得到的增长差异的一个促进因素。

政策周期性被定义为关于经济增长率的政策立场。例如，当支出增加并且/或者税率降低以遏止经济下滑时，财政政策被认为是逆周期波动的，当经济扩张时，则出现相反情况。

Kaminsky、Reinhart和Végh（2004年）研究了1960-2003年期间104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周期性。⁴按照一个被构想为公共支出和税率的加权平均周期的指数，卢旺达和阿曼的财政政策主要是顺周期波动，而芬兰的财政政策则主要是逆周期波动。研究发现，一般说来，宏观经济政策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倾向于顺周期波动，而在发达经济体大都是逆周期波动的。

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财政政策一直是极其顺周期波动的（表四.2）。在快速增长的东亚经济体，财政政策不是对商业周期无动于衷就是逆周期波动的。

在仔细考虑大量发展中国家的例子时发现，在顺周期波动的财政措施与长期增长率之间存在很强的负相关性（见图四.6），尽管例外的情况很多。货币政策的周期性与增长之间的直接联系要弱得多，其中一个原因是，在为世界各国的货币政策确定一个合适的周期指数方面存在技术上的困难，因为货币政策制度不同。⁵

表四.2

1960-2003年某些国家和地区财政政策的周期性与经济增长

地区/国家	财政政策的周期性 (指数) ^a	人均国内总产值增长率 平均数 (百分比)
非洲	0.30 (高度顺周期波动)	1.1

⁴ 政策周期性被定义为一个特定政策立场的周期性措施与国内总产值增长的周期性措施之间的相互关系。Hedrick-Prescott 滤波法被普遍用于将产量增长、财政支出、捐税和货币变量趋势的周期成分与“结构”成分相分离。

⁵ 与财政政策相比，要为所有国家找到一个衡量货币政策立场的共同方法更为困难，因为一些国家以货币总供应量为目标，而其他一些国家以利率为目标，还有一些国家以汇率为目标。

发展中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常常是顺周期波动的

比起亚洲来，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财政政策更为顺周期波动

财政政策的周期性和长期增长率之间的负相关性是可以觉察的

地区/国家	财政政策的周期性 (指数) ^a	人均国内总产值增长率 平均数 (百分比)
喀麦隆	0.51 (高度顺周期波动)	1.0
科特迪瓦	0.38 (高度顺周期波动)	0.4
肯尼亚	0.26 (高度顺周期波动)	1.2
卢旺达	0.63 (顺周期波动最明显)	0.5
拉丁美洲	0.25 (高度顺周期波动)	1.2
阿根廷	0.28 (高度顺周期波动)	1.0
巴西	0.22 (高度顺周期波动)	2.4
哥伦比亚	-0.02 (无周期波动)	1.8
墨西哥	0.19 (中度顺周期波动)	2.0
秘鲁	0.40 (高度顺周期波动)	0.8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	0.36 (高度顺周期波动)	-0.3
亚洲	0.16 (中度顺周期波动)	3.3
快速增长的亚洲	0.06 (无周期波动)	4.4
中国	-0.03 (无周期波动)	6.1
印度尼西亚	0.09 (顺周期波动)	3.6
大韩民国	-0.11 (逆周期波动)	5.8
马来西亚	0.11 (顺周期波动)	4.0
经合组织	-0.11 (逆周期波动)	2.6
芬兰	-0.51 (逆周期波动最明显)	2.9
法国	-0.24 (高度逆周期波动)	2.5
德国	-0.02 (无周期波动)	1.9
日本	0.05 (无周期波动)	4.0
联合王国	-0.37 (强烈地逆周期波动)	2.2
美国	-0.19 (中度逆周期波动)	2.2
中高收入发展中国家	0.28 (高度顺周期波动)	2.8
中低收入发展中国家	0.17 (中度顺周期波动)	2.0
低收入国家	0.28 (高度顺周期波动)	1.0

资料来源：联合国秘书处经济和社会事务部，根据 Kaminsky、Reinhart 和 Végh (2004 年) 著作中的数据。

^a 被解释为财政政策周期性指数的加权平均数，包括公共支出，用来代替 104 个国家商业周期中的税率变化和支出变化。指数的范围从 -0.51 到 0.63，其中正数表示较高的顺周期波动性，负数表示逆周期性的程度（详情可见 Kaminsky、Reinhart 和 Végh，2004 年）。

图四.6

1960–2003 年发展中国家财政政策的周期性与经济增长



资料来源：

联合国秘书处经济和社会事务部，根据 Kaminsky、Reinhart 和 Végh(2004 年)著作中的数据以及世界银行的 2005 年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

注：

周期性指数的定义见表四.2，脚注。

对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顺周期波动政策的成本很高。在经济好转时，顺周期波动的宏观经济政策，例如轻率的财政支出，会导致无效的资源分配，在某些情况下直接加剧经济过热并且播下宏观经济不稳定的种子。在经济下滑时，顺周期波动的政策，例如过紧的货币政策和胡乱的财政调整，会导致许多有价值的社会项目的巨大损失，削弱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的积累，因而不仅加剧经济的下滑，而且还降低长期增长的潜力。

对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顺周期波动政策的成本很高

例如，在 1980-1993 年期间，贸易方面的严重衰退导致基本货币为 CFA 法郎的西非经济体中政府收入大减以及巨大的对外收支赤字。事实上，所有这些国家都向布雷顿森林机构请求支持。结构调整贷款以强制性节省开支的宏观经济稳定方案为条件，主要通过减少支出来进行经常项目调整和财政调整。在科特迪瓦，例如，政府支出在 10 年间削减了几乎三分之一。同样，公共投资和教育支出也削减了，教育支出的削减导致 1960 年代和 1970 年代在入学率方面取得的进展化为乌有。⁶ 基础设施方面的公共投资减少还导致私人

⁶ 在科特迪瓦，政府支出从 1980 年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32% 下降到 1989 年的 22%；小学入学率从 1980 年的 75% 下降到 1992 年的 65%（根据世界银行的估计数，2005 年世界发展指数数据库）。另见，除其他外，Hadjimichael 和 Galy（1997 年）以及 Azam（1998 年）对宏观经济稳定方案对公共支出和社会服务的不利影响的分析。

引起宏观经济政策顺周期波动的因素

投资的减少（见下文）。

几个因素可以引起发展中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顺周期波动性并且限制它们实行逆周期波动政策的空间。按照前面的论述，在这里强调一些因素，尽管不可能完整。首先，外国资本流入成为顺周期波动政策举动的一个潜在缘由，尤其是在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正如在前一节中所论述的，这些资金流的顺周期波动性限制了传统的宏观经济政策手段的有效性。

其次，同样如前一节中所论述的，不论是在国家一级还是在国际一级，财政自由化加剧了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易变性和顺周期波动性。市场代理人倾向于在繁荣期间低估风险，向信用等级较低的借款人提供贷款。繁荣期间的资产价格快速上涨进一步刺激了借贷的增长。准备金与当前的贷款拖欠率相联系的趋势进一步增大了这一顺周期波动偏向。在繁荣期间，拖欠贷款的情况很少，贷款损失准备金的提取有限：这使得贷款的表面成本降低，从而促进了贷款的增长。相反，在经济下滑期间，拖欠贷款的情况增多，准备金的提取不得不增加，贷款出现减少趋势，也许甚至会导致“信贷紧缩”，使经济进一步下滑。在下滑期间对金融系统薄弱的担忧会促使引入更严格的管理要求，在短期内使获得贷款的问题进一步恶化（Ocampo, 2003年）。

第三，国内机构框架中的缺陷一般是顺周期波动财政行为的另一个缘由。在某些情况下，起源可能是不稳定的政府收入，再加上严重依赖于初级商品，而国际市场上相关价格起伏不定。当价格高，经济也因此高涨时，政府倾向于参与扩张性支出行为。当价格暴跌时，政府收入减少，在经济进入衰退期时很可能需要进行财政紧缩。诸如稳定化基金之类的手段有利于出口商品的发展中国家。一些国家管理着商品稳定化基金以减轻不稳定的商品价格对财政收入的影响。这其中包括智利的铜补偿基金、哥伦比亚的咖啡和石油稳定化基金以及布加纳法索的棉花支助资金。这些基金的功效——也就是它们在减轻财政政策的顺周期波动性方面的作用——各不相同。适当管理这些基金的机构能力是衡量绩效的一个重要因素（Gottschalk, 2005年）。在其他情况下，正如在上一节中提到的，脆弱的、管理不善的银行和金融系统的存在部分解释了不稳定的资本流动引起顺周期波动政策立场和限制宏观经济政策有效性的原因。

一些发展中国家，比如1990年代的智利，设法实现了在经济增长中不受短期波动影响的财政目标（所谓的结构预算规则）。这一逆周期波动政策立场的维持是智利与其他拉丁美洲国家相比增长表现和宏观经济稳定性都要好得

多的原因之一（Fiess, 2002 年；Ffrench-Davis, 2006 年）。有效地管理这样一个系统需要审慎而持之以恒的政策制定者和对维持这类规则的政治支持。

更笼统地说，自 1980 年代以来，已经从基于斟酌决定的宏观经济政策安排转变为基于规则的宏观经济政策安排，这方面的依据是后者能避免政策导致的宏观经济不稳定。然而，一个基于规则的体制不是万能药。例如，通货膨胀目标的确定最近已成为为制定宏观经济政策而大量采用的基于规则的方法。大约 20 个经济体通过了政策规则，包括相当多的发展中国家。在这一货币体制下，一个独立的中央银行通过公布预先确定的通货膨胀幅度，致力于价格的稳定。这样一种政策安排有许多优点，包括有可能增强一个中央银行的政策透明度和可信性（联合国，2000 年）。不过，货币政策狭隘地把重点放在通货膨胀目标上会导致偏向于保持一个稳定的汇率，会使宏观经济调整顺周期波动以应对外部冲击（包括影响外资筹措可能性的冲击），并且，更普遍的，会使宏观经济稳定化变得不利于就业和增长目标。一般说来，基于规则的政策能够在正常环境中很好地发挥作用，但由于经济结构随时间而变化，并且各种冲击可能发生（例如，需求冲击和供应冲击），预先确定的政策规则可能变得不那么恰当，或者说过于僵化。此外，由于一个经济体所面临的风险和不确定可能是不固定的——也就是说，它们不会完全重复过去的模式——在像危机那样的反常期间的政策制定中总是需要一定程度的斟酌决定，以便尽量降低巨大的宏观经济损失的风险。东亚经济体和少数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成功经验也显示了平衡规则和灵活性的好处（见方框四.2）。

方框四. 2

为博茨瓦纳的出色表现打下基础的灵活的宏观经济政策

非洲金融共同体和兰特区中的非洲各国坚持一种“基于规则的体制”，其特点是固定汇率和对中央银行出资弥补财政赤字的严格限制，而所有其他非洲国家遵循一种“基于斟酌决定的体制”，其特点是在出资弥补财政赤字和确定名义汇率方面有很大的自由。

正如下表中所显示的，那些采用基于规则的宏观经济政策安排的非洲国家设法实现了比其他国家要低得多的通货膨胀和更好的财政收支平衡。然而，衡量过去四十年的增长成绩没有发现这两类国家之间有任何统计上的巨大差异。博茨瓦纳是该规则的一个明显例外。

事实上博茨瓦纳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唯一一个成功地将矿产转变为持续经济增

方框四. 2 (续)

1960-2002年撒南非洲的国内总产值
增长、通货膨胀和对政府的债权

百分比			
	基于规则的体制	基于斟酌决定的体制	博茨瓦纳
国内总产值增长率			
中值	3.4	3.2	8.4
最大值	5.6	4.4	26.4
最小值	1.4	-0.5	1.9
通货膨胀			
中值	6.3	12.8	10.5
最大值	10.5	915.9	16.4
最小值	-1.4	4.4	6.6
对政府的债权及其他 (作为 M2 份额的年增长)			
中值	0.9	9.7	-29.5
最大值	6.7	306.6	117.2
最小值	-7.2	-8.1	-255.4

资料来源：联合国秘书处经济和社会事务部，根据世界银行 2005 年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

长的国家。其成功的一个原因是利用逆周期波动的财政政策来制约矿产业，尤其是钻石业的盛衰，另一个原因是对外汇的有效管理。

政策环境为这一惊人成就的取得打下了基础，其特点是基于规则的政策与一定的灵活性相结合。英国所遗留的货币发行局之类的安排在独立后仍然存在，但南非的兰特替代了英镑。1976年，博茨瓦纳从兰特区退出，以推行更独立的货币和汇率政策。博茨瓦纳的货币多年来一直盯住一揽子外币，允许汇率在一定范围内浮动，但最大的权重仍然留给南非兰特。这一制度也得到一些汇率控制措施的支持，制定这些措施是为了对付潜在的资本账户波动。博茨瓦纳已设法防止本国货币升值，目的是保持除矿业以外可交易的产品竞争力，并且帮助自己实现与其他非洲国家相比成功的经济多样化。事实上，尽管制造份额在博茨瓦纳的国内总产值中仍然微不足道，但其扩张显然令人印象深刻，尤其是与撒哈拉以南其他非洲国家制造业的成就相比较而言。

长久以来，在博茨瓦纳，货币政策被视为促进实现各项发展目标的一种手段，而不是纯粹的需求管理工具。利率被保持在低水平上，以鼓励投资和经济增长。旨在防止货币升值的外汇市场干预在银行系统中产生了多余的流动资金，使向私人提供的贷款增加。不过，由于多余的流动资金开始急剧增加，货币管理当局通

过改变一些制度安排来做出反应。例如，因为一个货币市场的缺乏有损于中央银行消化多余的流动资金的能力，所以中央银行引进了银行证书，并且定期拍卖这些证书。因此，直接的政策手段的使用被逐渐放弃了，取而代之的是以市场为基础的手段。

方框四.2(续)

在财政方面，博茨瓦纳最成功的一点就是在实现公共事业开支平稳的同时实现公共支出可持续增加。逆周期波动的财政政策战略的广泛组成包括在钻石价钱高的时期管理大笔预算盈余和建立巨大的国际准备金。当钻石市场疲软时，比如在1980年代早期和1990年代早期，减少这些准备金，从而避免在经济下滑期间急剧削减开支。国家发展计划促进了如此稳定公共支出，国家发展计划按照预期的政府收入和经济吸收能力为公共支出确定目标。

总而言之，顺周期波动的宏观经济政策可能是一个国家的制度框架所固有的，并且依赖于外部筹资来源和政府收入。不过，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重要的是设法为逆周期波动的宏观经济政策开辟更大的空间。正如所分析的，顺周期波动政策对于经济增长来说可能代价高昂，尤其是在经济下滑期间，可能严重影响基础设施和人的发展，或许会危害长期发展前景。

基础设施和人的发展方面的公共投资

在发展中国家间看到的生长差异可部分归咎于基础设施方面的公共投资和人的发展方面的支出的差距。正如第三章中所论述的，促进经济结构改变的公共政策包括跨行业政策的或水平政策，例如对有形基础设施的投资（例如，道路、港口和电信）以及旨在提高经济中可以利用的人力资本的质量的干预措施，人力资本也就是使得人们在经济方面有生产力并且能够利用和适应新技术的能力和技能。不是所有这些服务都一定需要由政府提供。不过，主要是供应部门需要起牵头作用，因为这类投资通常与巨额资金和可观的预期社会回报有关。

在发展中国家间看到的生长差异部分可归咎于基础设施方面的公共投资和人的发展方面的支出差距

有形基础设施与增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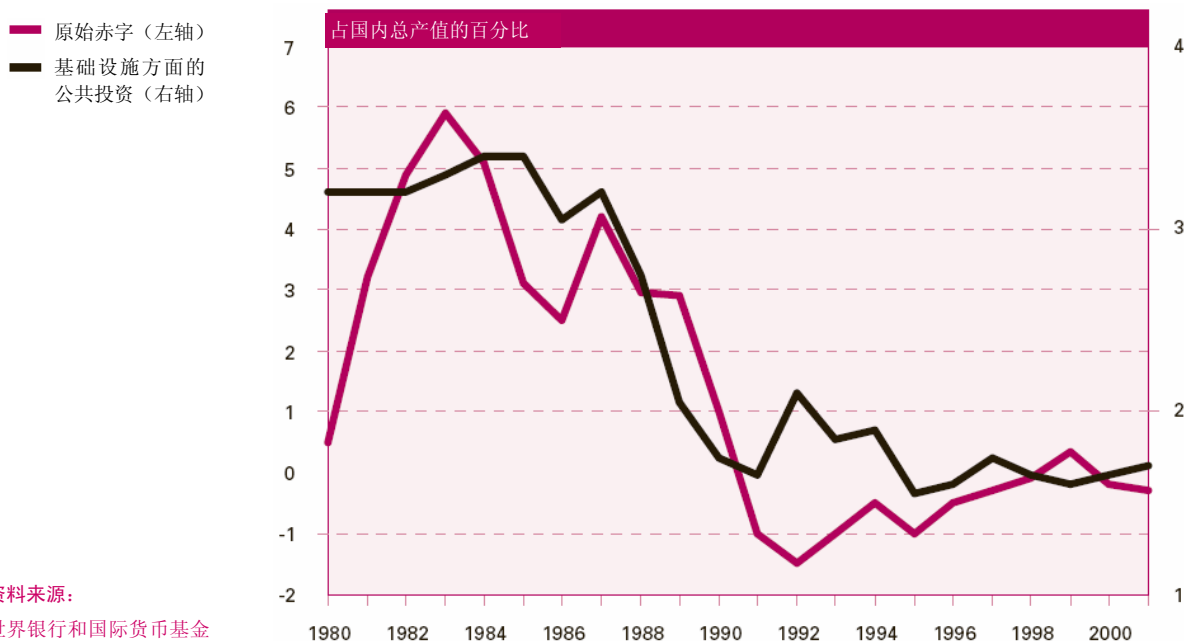
一个适当的基础设施水平是公司实现生产力的一个必要条件。由于其本身的性质，基础设施的特征是不可分割性，各国需要逐步建立最低限度的或最低水平的基础设施（比如，起码的道路网），这对整个经济的生产力增长很重要。为了达到基础设施的最低水平，各国将需要长期维持巨大的公共投资。

基础设施的质量和范围的差距在快速增长的东亚经济体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之间扩大了

未能这样做的部分原因在于拉丁美洲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在维持基础设施投资方面落后于东亚经济体。东亚经济体在有形基础设施的质量和范围方面投资较多。在非洲，援助似乎有助于维持许多低收入国家的资本支出。一种截然不同的情况是，由于自1980年代以来财政日益紧缩，拉丁美洲国家的基础设施投资不断减少。就拉丁美洲七国集团而言，基础设施投资方面的公共支出从1980年的占国内总产值的3%下降到2001年的占国内总产值的不到1%（见图四.7；以及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06年）。

图四.7

拉丁美洲：1980-2001年原始赤字和基础设施方面的公共投资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06年），图1.7。

这些造成了基础设施质量和可利用性方面的巨大差异。事实上，自1960年代以来，拉丁美洲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公路密度几乎没有增加，而在东亚却增加了两倍。另外，东亚的电话线数量是拉丁美洲的2倍，比非洲多10倍（见表四.3）。

经验证据证实，基础设施与增长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对基础设施和增长所做的国家间对比研究常常会发现基础设施投资的回报率为正数。在这一文献中最普遍引用的分析之一是Easterly和Rebelo（1993年）所做的分析，他们研究了1970-1988年期间有代表性国家的经济增长与财政政策之间的关系。除其他外，两位作者发现公共交通和通信方面的投资与增长有正相关关系。较近的著作侧重于增长与基础设施总量之间的关系。例如，Sanchez-Robles（1998年）构想了一个基础设施总量指数（铁路和道路

的公里数、能量和人均电话数)，并且发现基础设施总量对增长有巨大影响。其他研究发现不管是对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来说类似的影响都存在（Easterly, 2001 年；Demetriades 和 Mamuneas, 2000 年；以及 Roller 和 Waverman, 2001 年）。

虽然上述研究确定基础设施的提供对增长有促进作用，但它们没有进行评估来查明基础设施方面的公共支出增加所得到的回报是否超过提供基础设施的成本。相反，Canning（1999 年）估计，发电和运输路线的社会回报似乎与私人回报没有差别，虽然他的确发现每个劳动者拥有的电话有高得多的回报。他认为这一结果引起了对以扭曲的征税来为基础设施的提供提供资金是否明智的怀疑。另一方面，许多其他研究的确发现基础设施服务对国内总产值的贡献一般会超过提供基础设施服务的成本（例如，参见 Rodriguez, 2006 年 b）。此外，交通和通信方面的公共投资会提高私人投资水平。当公共资本和私人资本相互补充时，基础设施的增加将提高私人资本的回报率，从而使私人资本存量增加。这一影响可能是巨大的，尤其是在一个开放的经济体中。

表四.3

1960-1995 年电话主线利用率以及道路和铁路的密度：发展中地区与发达国家两个关键的基础设施指数数值之比

百分比								
	1960	1965	1970	1975	1980	1985	1990	1995
每 1 000 名劳动者拥有的电话主线数								
发达国家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东亚	7.6	10.2	14.5	18.8	24.7	29.9	35.5	41.1
东欧和中亚	13.2	14.9	17.8	21.1	23.7	29.4	36.8	47.0
拉丁美洲	17.3	15.9	15.1	14.2	14.0	15.2	17.5	23.6
中东和北非	15.3	19.2	21.4	23.2	28.7	32.1	35.4	39.8
南亚	0.9	0.9	0.9	0.9	1.0	1.2	1.7	3.1
撒哈拉以南非洲	3.0	2.7	2.4	2.3	2.4	2.6	3.1	4.3
每平方公里的公路和铁路数								
发达国家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东亚	22.3	32.7	40.7	44.2	50.6	57.3	60.1	63.7
东欧和中亚	30.3	40.0	41.6	40.2	40.8	41.5	46.2	48.7
拉丁美洲	2.9	3.3	3.6	3.9	4.5	4.7	4.8	5.0
中东和北非	8.8	10.0	11.0	11.2	12.2	13.2	12.8	13.5
南亚	14.1	14.1	14.3	15.0	16.3	17.3	18.1	24.1
撒哈拉以南非洲	6.6	9.0	9.4	8.6	8.3	8.0	7.9	7.9

资料来源：Rodriguez（2006 年 b）。

公共投资中的变化是导致穷国与富国之间收入差距扩大的一个次要因素，在该增长中所占的比例不超过12%

基础设施发展滞后可能占东亚与拉丁美洲之间收入差异扩大的三分之一

削减能够促进增长的公共投资会损害未来的财政可持续性

人力资本对于长期增长很重要

因此，可以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对基础设施的投资较少——调整政策引起公共开支节省导致了这种情况——使得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增大。然而，这似乎并不是主要原因。最多，公共投资中的变化是导致穷国与富国之间差距的一个次要因素，在该增长中所占的比例不超过12%，因为大多数发达国家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也经历了基础设施总量累积速度减慢的情况（Rodriguez，2006年b）。这使得一些发展中国家迎头赶上，而另一些国家落在后面。

相反，基础设施的利用率和质量方面不断加大的差距的确似乎可以说明发展中国家间增长差异的一个重要方面。据估计，基础设施方面的公共投资差异程度能够解释东亚与拉丁美洲之间产量差异的三分之一（Calderón 和 Servén，2003年）。

许多公共支出的减少可以追溯到在稳定化方案中执行的财政调整，正如所指出的，这些调整大都是顺周期波动的。这类支出的削减可以反映政策制定者在经常开支中对这类缩减的偏好，短期内在政治上更加难以维持。然而，这些削减损害长期的财政可持续性，因为未来增长速度放缓会减少另外增加财政收入的可能性——在已知的征税水平上。此外，基础设施对增长有非线性规模效应：不能维持基础设施在某一必要下限之上会阻碍整个增长过程。例如，据估计，1980年代和1990年代期间，在几个拉丁美洲国家，公共投资降低导致基础设施资产的积累减少，这使得国内总产值的增长下降了不止1个百分点（Calderón、Easterly 和 Servén，2003年）。因此，基础设施支出减少预计将对财政状况产生有利影响，不过这种影响基本上被调整后数年内产量增长下降所导致的赤字加大抵消了。如果不考虑出于政治动机和无效的或不必要的投资的情况，基础设施方面公共支出的减少最终将削弱而不是增强财政实力，这与财政调整的初衷南辕北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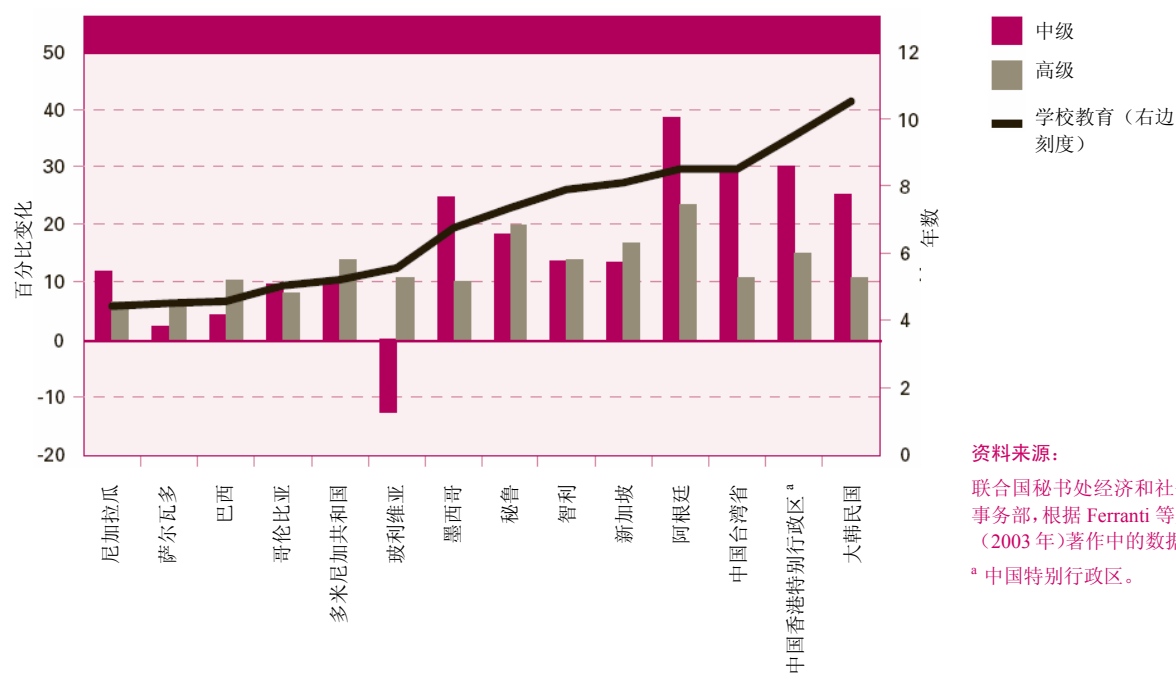
人力资本投资中的差距

财政政策还会对人力资本的形成产生影响，表现为受教育水平较高和身体健康的人力资本能够提高人们的能力及其创造力和生产力。更健康的和受教育程度更高的人能够比人力资本水平低的人更有效地从事附加值更高的任务。他们也更有可能接受先进技术并进行创新。最后，人力资本水平高的劳动者更容易适应工作条件的改变和行业的改变，并且更有可能掌握迎接国际竞争所需的技能。

正如图四.8 所显示的，在过去的四十年间可以看到拉丁美洲与东亚之间在教育方面的差距加大。在 1960 年，不论是在拉丁美洲还是在东亚教育水平都很低；但从 1960 年到 2000 年，在东亚各国，学校教育的平均年数增加了不止 4.5 年，在大韩民国增加了一倍多，达到 10.5 年。相反，拉丁美洲中学和大学的入学率一直处于低水平（Perry 等，2006 年；De Ferranti 等，2003 年）。虽然其他区域的大多数国家接近于实现小学普遍入学，但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小学学业完成率平均只有大约 50%，男女比率有显著差异。

图四.8

拉丁美洲和东亚 2000 年的学校教育年数以及 1960 年至 2000 年教育水平的变化



资料来源：

联合国秘书处经济和社会事务部，根据 Ferranti 等人（2003 年）著作中的数据。

^a 中国特别行政区。

因此，人的发展方面的这一进展差异也许部分解释了观察到的增长差异的原因。早期的发展研究已经发现健康和学校教育方面的投资——公共的或私人的——对经济前景和穷人的福利有改善作用（Schultz，1961 年）。自这一基本著作以来，经济学文献越来越认识到人力资本的高起始水平作为长期增长的先决条件的重要性（Barro，1999 年；Lucas，1988 年；以及 Lee，1997 年）。这些分析中有许多把重点放在教育的作用上，但一些分析也发现更好的健康结果，例如更高的预期寿命，能够促进经济增长（Bloom、Canning 和 Sevilla，2004 年）。

对长期增长来说，人的发展是一个必要条件，但不是一个充分条件

同样，正如第一章中所论述的，Ranis 和 Stewart（2005 年）发现经济增长与人力资本的各种量值，包括识字水平和预期寿命，有相当大的关系。此外，没有国家能够从一种高经济增长和低人力资本的状况转入一种增强高人力资本率和高增长率的良性循环。不过，有几个国家的确从这样一种状况转入了一种恶性循环，即低人力资本抑制经济增长，受到抑制的经济增长又对人力资本的积累产生不利影响。作者们的结论是，首先加快经济增长而忽视人力资本发展是不可能达到良性循环的理想状态的。这样实现的增长不会持续。另一方面，还应注意，较高的人力资本水平不一定能保证较快的增长。训练有素的、健康和熟练的劳动力是持续增长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

该结论意味着更多地投资于教育和健康也许不足以满足增长目的。需要同时解决对经济增长和结构改变的其他限制，以便为受教育程度更高的和更有生产力的人群创造就业机会。尽管如此，人的发展对增长来说仍然具有重要意义，并且其本身当然也是一个目标。在教育结果和健康结果方面差距大的国家将不得不为这些领域的支出大大增加财政空间。

能够为人的发展和基础设施方面的公共支出创造更大的财政空间

可以实现这一点的途径是，首先，更好地瞄准社会部门内的优先领域来提高健康和教育方面的公共支出的有效性，并且改善公共方案的成本效益。其次，加强税基是根本，尤其是在政府收入低的国家。为人力资本投资调动国内资源的这些形式应是中等收入国家的重中之重。对于最贫困的国家来说，这可能还不够，外国援助必须在弥补差距中发挥重要作用（见下文）。

第三种方式受到下述事实的影响：顺周期波动的宏观经济政策环境使得实现促进长期经济增长所需的稳定而适当的社会支出水平和基础设施水平更为困难。因此，虽然维持可持续的宏观经济平衡的必要性得到承认，但必须探索新的方式来平衡这一目标与对于经济增长和发展来说至关重要的公共部门支出。关于这一点，里约集团提议讨论创新方式以便采纳经过改进或调整的财政目标的概念，例如资本支出的排他性，因为资本支出促进资产的积累（从而抵消负债），在危机和调整期间具有逆周期波动的潜力，并且促进长期增长的可持续性（联合国，2004 年）。不过，该提议迄今为止得到的支持很少。

官方发展援助、增长与发展

1961 年，当联合国大会宣布第一个联合国发展十年时，不论是富国还是穷国都认为，要实现规定的增长目标，就必须做出更大的努力，调动内外资源。

发达国家拿出国民总收入的 0.7% 用于官方发展援助的目标是在 1960 年代末关于第二个联合国发展十年的讨论期间提出的。除了少数捐赠国，该目标从未实现过。2002 年，在墨西哥蒙特雷举行的发展筹资问题国际会议上，国际社会重申，捐赠国有必要为实现将国民总收入的 0.7% 用于官方发展援助的目标做出具体努力，并且把千年发展目标作为一个具体的标准包括进来，用于评估官方发展援助的有效性。有关马歇尔计划和“大推进”——如同 1960 年代早期一样——的提案重又提出（联合国千年项目，2005 年）。

1950 年代和 1960 年代宣扬大推进的初始逻辑是基于当时流行的增长原动力的概念：增加一美元的援助就会增加投资，同时放松对进口的资本货物和技术的外汇限制。这一推理并不能体现一致意见，许多明确的研究查明，援助增加的可能后果是排挤私人投资以及浪费。最初的讨论大都受数据缺乏和不可靠的制约。

此后对援助的有效性进行了大量分析研究。这些研究一般是利用各种国家实例，并且分析长期存在的情况。这些研究大都运用计量经济学技术来核实经济增长与援助承诺（或支付）之间的关系。搞清这些研究的意思因多国回归分析所具有的熟悉的方法缺陷而变得复杂，一位评论家称之为“数字无政府状态”（Roodman, 2004 年）。随着有关援助有效性的讨论取得进展，有一点得到承认，即因为援助是一种多功能的和可代替的资金流，其对增长的影响不可能与一种简单的线性关系相关（早期援助有效性的一个特点），而是很可能因时间和国家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的特点。

援助对增长的影响将取决于援助资金是如何使用的，以及援助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是什么。因此，援助与增长的关系在实践中一般是复杂的。首先，不是所有援助都打算用于投资目的或者花在人的发展上。许多援助被用于紧急事件和人道主义救济。同样，尽管这一援助形式通过减轻自然灾害和不安全局势对人的发展的不利影响也许对发展具有积极影响，但其确切贡献很难衡量。其次，即使援助被直接用于，例如，基础设施和人的发展方面的投资，对增长的影响不仅将取决于这样的投资如何促进增长，而且还将取决于其他因素。钱是可代替的，援助资金也一样。如果政府已经打算在没有官方发展援助来源的情况下进行这样的投资，那么部分援助可能因此最终用于其他支出或者用来激励较小的征税努力。援助支出的可替代性问题在文献中有广泛研究并且被认为是援助对增长的影响较小的一个原因（见，例如，White, 1998 年；McGillivray 和 Morrissey, 2001 年；Gupta、Powell 和 Yang, 2006 年）。

援助对增长的影响受到质疑

援助对增长的影响取决于援助是如何花的，以及援助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是什么

没有发现有关援助流量增加导致实际汇率升值和竞争力损失的系统证据

不过，有一些最新证据显示——总的说来——当援助被用于发展支出时，援助将引起较高的经济增长。Reddy 和 Minoiu（2006 年）指出，与出于地缘政治目的的援助相比，发展援助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积极影响（见方框四.3）。

第三，巨大的援助流入还将引起其他宏观经济的调整。一些怀疑论者早就警告说有可能出现所谓的诅咒援助现象，就像“自然资源诅咒”一样（见第五章），因此，由于使当地成本飞涨或者导致汇率升值压力，高水平的援助对积极的活动有抑制作用。⁷Rajan和Subramanian（2005 年）报告了与挤压积极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援助流量相联系的实际汇率升值的“非常有说服力的证据”，一般说来，制造业是最贫困国家中长期增长的动力。他们的结论对于 1980 年代来说最为可靠，当时援助流量对汇率的影响最弱，使人想到属性问题。事实上，1980 年代的外部冲击引起额外的援助（包括减债）流向那些制造业也受到那些冲击的不利影响的国家的情况几乎肯定就是这样的。不过，其他研究显示，援助流量不一定导致实际汇率升值。例如，货币基金组织（2005 年）在对五个非洲国家的研究中发现，在援助流量猛增的年份，只有加纳的货币实际上有小幅升值，并且这五个国家的出口成绩大都保持良好。

方框四.3

援助的有效性与经济增长：援助事项的类型

在一项基于一个标准的多国增长模型的经济计量学研究中，Reddy 和 Minoiu（2006 年）分析了援助的不同组成部分对接受援助的国家的增长的长期影响。1990 年代的人均收入增长是因变量。相关的说明变量主要包括人均收入的初始水平、预期寿命、政府消费、机构素质、地域因素、剧烈的变革、进出口比价的增长率、捐赠者中止的多边援助和双边援助，以及作为国内总产值一部分的地缘政治援助。计算这些变量的平均数，并且对四个不同时期进行回归分析：1960-2000 年、1970-2000 年、1980-2000 年以及 1990-2000 年。结果表明，滞后的援助变量是解释 1990 年增长原因的一个重要因素，并且在较早期间援助增长国内总产值的 1% 与平均的人均国内总产值增长率有关，该增长率比 1990 年代高 0.085 个百分点。

该研究进一步分解了全部援助流量，试图将总体援助的有利于发展的、促进增长的部分的实际影响与该援助的出于地缘政治动机的、可能起抑制作用的成分相分离。在备选属性中使用了替代发展援助的三种援助：（a）多边援助；（b）来自北欧（包括冰岛）的双边援助；以及（c）来自关心发展的更多捐赠国（北欧

⁷ 在经济学文献中，这类影响常常被称为“荷兰病”。至于为什么这些文献没有适当叙述与援助流量有关的经历，有关论述见，除其他外，Gupta、Mishra 和 Sahay（2003 年，第 21-22 页）；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05 年 b）。

国家加上奥地利、加拿大、卢森堡、荷兰和瑞士)的双边援助。对替代援助的选择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多边援助肯定更适合发展目的而不是地缘政治目的,并且一些捐赠国更关心的是发展而不是其他。虽然这种方法不是没有它的局限性,但最近对北欧的援助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相对于其他双边捐赠者而言,北欧的援助有明显的不同,这表现在以下方面:慷慨大方;偏向于民主;较少以开放标准为条件,更多地以人权记录为条件;不取决于接收国的“友好关系”(Gates 和 Hoeffler, 2004 年)。对地缘政治援助的替代是根据过去和现在的地缘政治纽带(表现为殖民关系、共同的语言以及同为某协约、联盟或协定的成员)。

方框四.3(续)

将援助流量分解为这些组成部分所得到的结果令人震惊。1960 年代接受的多边援助每增加国内总产值的 1%, 1990 年代的人均国内总产值平均增长率就提高半个百分点, 1970 年增加 1%, 二十年后增长就额外增加四分之一个百分点。同时, 地缘政治援助与增长没有关系, 这在统计上很明显, 虽然其边际影响在数量上要小得多。担心这些属性的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一些双边援助可能在性质上是发展的, 但在进行回归分析时从替代发展援助的援助中遗漏了。将来自两个双边捐助团体的援助包括进来后得到的结果特别令人印象深刻, 让人从中看到很强的实际关联性: 对于那些在 1970 年代和 1980 年代因为从北欧国家转来的援助而额外得到 1% 的国内总产值的国家来说, 1980 年到 2000 年之间的平均增长率增加了 1% 多。与回归分析的其他属性相比, 这一结果比较可靠。

鉴于捐赠界重新做出的承诺, 有关援助对增长的、实际的、长期影响的这类证据肯定具有重要意义。不过, 援助仍然是增长中的次要因素。在许多情况下, 其影响显然不足以抵消对增长表现的其他不利影响。承认了这一点, 更好地领会提高援助有效性的可能渠道就显得尤为重要。这些结论, 在让人更为仔细地审视援助流量的同时, 也对援助大推进的观点提供了某些支持。在这方面, 千年发展目标可以被理解为是提供了一系列明确的目标, 能够帮助指导这样一种朝着消除许多国家, 尤其是非洲存在的贫困陷阱而进行的推进。大推进概念的基本假设是: 在大多数非洲经济体, 现有的实际资本低于为对该经济体的生产率和一体化产生强有力的影响而需要的某一最低水平。因此, 目标是通过有针对性的公共投资的驱动达到这一最低水平。一旦达到可以利用的基础设施和人的发展的这一关键水平, 规模经济、补充、连锁效果的综合影响能够产生一个以私人投资为主导的自我维持的过程。有针对性的大量援助的涌入——尤其是注重基础设施、教育和保健项目以帮助提高农村的生产率——能够使许多非洲经济体走上更快速发展的道路。自然地, 大推进要发挥作用, 必须具有起码的施政水平(联合国千年项目, 2005 年)。

这些结论对有针对性的大量官方发展援助的流入对增长产生的“大推进”概念的合理性提供了一些支持

不过，发展中国家也许缺乏管理大流量的外国援助的施政能力

不过，其他研究结果引起了深切的担忧，就是能否在潜在的援助接受者那里找到发展中国家为了管理生产性资产和资源——国内或国外创造的——以确保产生累积收入和生产率收益所需要的“促进增长的施政能力”（Khan, 2006年）。同样的，Easterly（2005年）和Rodrik（2006年a）警告说，不要假设捐赠界熟知情况以致能够在缺乏国内制度的情况下发起一场野心勃勃的运动来根除全球的贫困——这样一场运动，经过尝试和失败，会发现在当地一级真正起作用的是什麼。的确，正如在第五章中所论述的，最近给援助和贷款流量增加施政条件的趋势没有在改善公共服务质量方面取得预期的结果，因此是对自上而下方式的一种警告。不过，从成功的例子中可以得到教益，这些例子表明可以同时投资大推进和机构学习，以建立一条快速的和可持续的增长轨迹（Kozul-Wright 和 Rayment, 2006年）。

概述和政策影响

过去四十年发展中国家间的增长差异不能完全归咎于宏观经济政策的差异，但宏观经济政策无疑在其中起了作用。

宏观经济稳定性和政策灵活性对增长的重要性

宏观经济稳定性对经济体的长期增长表现有强烈影响。不过，应更宽泛地去看宏观经济稳定性，因为宏观经济稳定所需要的不仅是维持价格稳定和可持续的财政平衡，还要避免经济活动和就业形势的大涨大落，以及维持可持续的对外收支账户，避免汇率高估。发展中国家金融危机的频繁发生表明，宏观经济稳定还需要维持管理良好的国内金融部门、银行系统可靠的资产负债表以及合理的外债结构。

强有力的可持续增长使得实现更大的宏观经济稳定变得容易，特别是通过增强内外公债的可持续性。相反，从广义上说，更大的稳定性使得投资的不确定性降低，因此对更高的长期增长起着支持作用。

许多发展中国家自1980年代以来执行的稳定化政策大都强调降低通货膨胀和恢复财政收支平衡的目标。虽然缓和通货膨胀和财政审慎作为明智的宏观经济政策目标无可争议，但是，令人担心的是，在实践中，各国可能强调这些目标而不充分考虑宏观经济稳定的其他方面。特别是，价格稳定常常

以导致汇率升值、低增长和不可持续的外债负担为代价得以实现。此外，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在过去二十年是高度顺周期波动的。这对发展不利，因为在顺周期波动的财政行为与长期增长之间存在很强的负相关关系。因此，为逆周期波动的宏观经济调整政策创造余地从广义上说似乎对增长和宏观经济稳定有利。这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更为重要，因为它们易受外部冲击的影响。

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来说，实行逆周期波动的宏观经济政策的空间有限，因为可以利用的财政资源和外汇资源比起所面对的外部冲击的规模来一般较少。减轻私人资本流量变动的影响的国际行动（见下文）能够进一步帮助增大必要的政策空间。然而，同样是在国家层面上，政府能够采取措施，通过改善宏观经济决策的制度框架，增加逆周期波动的政策的机会。

需要为逆周期波动的宏观经济政策创造更大空间

宏观经济政策和国家发展战略

在更适合的制度背景下，财政政策首先应达到财政谨慎与财政灵活的平衡，以确保政策的可信性和财政的可持续性。确定不受经济增长中短期波动影响的财政目标（所谓的结构预算规则）能够有效地坚持一种逆周期波动的政策立场。一些发展中国家，例如智利，能够成功地操纵这样的财政规则。财政稳定化资金也能帮助在一段时间内防止不稳定的税源造成的收入变动，比如对初级出口产品征收的税。尽管在世界不同地区这类基金的运用情况不同，但它们能够构成一种有效的手段，通过保护促进增长的对基础设施和人的发展的长期公共投资，解决财政支出方面跨时期的权衡问题，这在外部冲击和经济下滑导致税收减少的时期也是如此。

在更适合的制度背景下，财政政策首先应达到财政谨慎与财政灵活的平衡

其次，应保留一定程度的斟酌决定权。基于规则的政策也许太过死板，不能应对宏观经济的变动。一些基于规则的制度，例如通货膨胀目标会使宏观经济稳定化偏向于狭隘界定的目标（低通货膨胀），不利于更广泛的就业、增长和其他发展目标。基于规则的政策在一段时间内，当经济没有受到大的冲击时，也许运行良好；但由于经济结构随时间而改变，对外部冲击的脆弱性也将发生改变。在这样一个变化的环境里，预先确定的政策规则有可能变得不那么重要或者显得过于僵化。此外，由于一个经济体所面临的风险和不确定从不保持一成不变或者表现出相同的强度，为了进行调整，使宏观经济损失最小化，为斟酌决定的政策保留一定的空间始终是必要的。

对宏观经济政策应保留一定程度的斟酌决定权

第三，宏观经济政策应很好地与经济决策的其他领域相结合。一个有竞

宏观经济政策应很好地与更广泛的发展政策相结合

竞争力的实际汇率在这方面似乎至关重要。在快速增长的东亚经济体，例如，宏观经济政策是一个更广泛的发展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直接促进长期增长。在这些经济体，财政政策优先重视发展方面的支出，包括教育、卫生和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以及对出口业的补贴和贷款担保。货币政策与金融部门和工业政策是协调一致的，包括有指导、有补贴的信贷计划和意在直接影响投资和储蓄的有管理的利率，同时有竞争力的汇率被认为对于鼓励出口和出口多样化至关重要。相反，在许多拉丁美洲国家和非洲国家，自1980年代以来，宏观经济政策一直把重点放在要狭隘得多的短期稳定化目标上，多次导致汇率高估。

根据发放贷款时的预计损失（而不是普遍损失）估计的有远见的准备金提取是减轻由金融部门引起的周期性的一个选择

第四，为了减轻金融部门造成的顺周期波动性，一个可能的政策措施是有远见的准备金提取，准备金的估计根据的是发放贷款时预计的或潜在的损失（而不是普遍的损失），考虑的是整个商业周期（Ocampo, 2003年）。这将有助于通过繁荣期间的准备金或储备金，帮助减轻经济下滑期间的信贷紧缩，从而消除周期。根据该措施并且在采取该措施的同时，管理者应鼓励采取使贷款战略对短期因素不那么敏感的危机管理做法和模式（例如，见Griffith-Jones、Segoviano和Spratt, 2003年）。

减轻金融变动性的国际政策

对多边金融机构来说，一个巨大的挑战就是帮助发展中国家减轻不稳定的资本流量的破坏性影响，并且提供逆周期波动的筹资机制来补偿私人资本流量固有的顺周期波动的变动。可以利用许多选择来抑制资本流量的顺周期波动性，从而帮助创建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更好的环境（Ocampo和Griffith-Jones, 2006年）。

减少货币匹配失当并将偿还债务的义务同发展中国家的支付能力相联系

一系列优先措施包括采用金融手段来减少货币匹配失当并将偿还债务的义务同发展中国家的支付能力相联系（例如，通过与国内总产值或商品相关联的债券）。这一措施可以以多边发展银行和出口信贷机构推出的具有逆周期波动特点的公债担保机制作为配套。第三个领域涉及在加强阻碍短期资本流量变动和巩固国内公私金融部门结构的管理框架方面对发展中国家政府的支持。

多边监督仍应是预防危机努力的核心

此外，多边监督——主要由货币基金组织进行——仍应是预防危机努力的核心。为应对外部冲击而在国际一级增强紧急提供资金的做法被认为对于降低不必要的调整负担和大量储备余额的成本非常重要。不论是对中等收入

国家还是对低收入国家来说，适当的资金融通应包括提供流动资金以抵消出口收入的变动，尤其是不稳定的商品价格和自然灾害引起的变动。在资本账户危机期间获得官方的国际流通手段应受到促进，并且使之适合可能超过基于各成员的货币基金组织配额的正常贷款限额的可能巨大的国家需求。

尽管最近在促进以基于市场的方法来有序地和符合成本效益地解决债务危机方面取得了进展（例如，通过在政府公债合同中采纳集体行动条款以及通过《新兴市场中稳定的资本流量和公平的债务重组原则》），但在多边机构应发挥的作用上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即将审查货币基金组织采取有效手段促进危机的解决，包括传播“向拖欠国放贷”的政策和信息的情况，应有助于澄清基金在解决危机，从而为帮助各国重新回归正途提供额外手段方面预计能够发生的作用。

投资于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

可以看到的生长差异可部分归咎于有关国家中基础设施和人的发展方面公共投资和支出的差距。适当的基础设施水平是公司实现生产力的一个必要条件。由于其本身的性质，基础设施的特征是不可分割的，各国需要逐步建立最低限度的或最低水平的基础设施（比如，起码的道路网），这对整个经济的生产力增长很重要。为了达到基础设施的最低水平，各国将需要长期维持巨大的公共投资。未能这样做部分地解释了拉丁美洲和撒哈拉以南非洲落在了以持续的基础设施投资为特征的东亚各国后面的原因。

经验研究让人想到，只要提高人的发展水平，发展中国家能够赶上发达世界。不过，增长与人的发展的关系是复杂的。第一章中提出的证据显示，经济增长表现优异的国家在高持续增长开始的期间之初人的发展水平都较高。不过，反过来，不是人的发展水平较高的所有国家都设法实现了长期的高经济增长率。人的发展是增长的一个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这意味着，消除对经济增长和结构改变的其他限制对于为受教育水平较高的人口创造机会来说是必要的。

在基础设施和人的发展方面差距显著的国家将不得不大幅提高在这些领域支出的财政空间。在许多国家，通过更好地针对社会部门的优先领域来提高教育和卫生方面的公共支出的效率和提高公共方案的成本效益，可获得更大的空间。改善基础设施方面的筹资计划和打击基础设施工程签约中的腐败现象能够帮助降低成本。不过，即使在公共支出方面提高了效率，资源也可

可以看到的生长差异可部分归咎于基础设施和人的发展方面公共投资和支出的差距。

需要为基础设施和人的发展方面的长期投资创造财政空间

能不够。加强税基将是不可缺少的，尤其是在政府收入低的国家。对最贫困的国家来说，显然需要大量额外资源来进行必要的投资。需要更多的发展援助，并且需要将援助用于支持基础设施和人的发展方面的投资。

逆周期波动的财政政策，正如前面所论述的，也能帮助为维持目前政府支出和公共投资的适当水平铺平道路，并且有助于确保教育、卫生和基础设施方面的支出在经济下滑期间不受到不恰当的缩减。

提高援助及其有效性

官方发展援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一直是大量辩论的主题。本章中的分析得到的结论是，证据的分量支持这样的观点：援助对于长期发展是积极的。因此，官方发展援助部分抵消了导致在过去 40 年间看到的收入差异的趋势。不过，由于援助划拨的数量始终有限，官方发展援助对减少国际收入差异的影响最多也是非常微弱的。

援助所资助的目标明确的方案能够使最贫困的国家走上更快速发展的道路

不过，这一结论对于重新提出的用援助刺激发展中国家的大推进的观点提供了一些支持。援助所资助的目标明确的方案能够使最贫困的国家走上更快速发展的道路。这样一种方式不仅假定对如何将这些资源有效地输入特定国家有足够的了解，而且接受援助的国家的政府拥有行政能力来管理资源流量以确保产生累积收入和生产率的提高。因此，考虑施政结构——特别是在诸如预算过程的透明度、培养高素质的公务员和改进社会服务的提供等方面——的改善条件必须是对发展援助的额外需要的评估的一个组成部分。不过，在地方一级实际发挥作用的是，每个国家各不相同，因此给援助和贷款流量增加外部所定义的施政条件，这是捐赠机构最近的一种做法，这种做法也许不会在提高公务员素质方面产生预期的结果。

第五章

施政、体制和增长 趋异

本章将分析体制和施政因素如何解释各国经济增长趋异问题。如第一章所述，极少数国家——西欧国家及其附属国的经济增长率在1820年之后得到提高，并一直持续增长，这些国家一直是世界最富有的国家。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这种成就是独一无二的，因为以往的经济大增长总是与革命联系在一起。此外，日本的例子似乎表明，通过拥有比首批工业化国家更快的增长率，其他国家也可以“赶上来”，成为增长俱乐部的一员并实现与发达国家相当的生活标准。但是，第一章也表明，由于大多数其他国家未能实现比发达国家更快的经济增长率，以上情况并未发生。1980年以后，出现了双重趋异现象，以发展中国家为一组，与工业化国家相比其增长比率较低，而且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增长经历也截然不同。

本章认为，体制“品质”和施政结构是影响一国的经济增长和国家之间增长趋异的原因。理想的情况是，施政通过增强社会凝聚力、使社会更加公平稳定、保证适当提供公共物品、确保市场发挥职能、鼓励个人和公司实施计划内的风险行为来提高公共利益。在经济增长受到最严格限制的特殊领域建立更合理的体制（而不是推翻整个施政结构）可以使经济走上更快的增长之路。此外，某些东亚国家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经历表明，消除经济增长限制的办法要以各国自身的实践和组织为基础，因此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是多种多样的。这些国家的经历也表明，采取渐进方法，或者在某种意义上说，实验性方法（而不是大规模的方法）可以有效地消除各种限制。在某个领域开展的改革有助于帮助决策者了解并执行施政结构其他部分必要变革，从而完善最初的改革并使其更加有效。此外，渐进方法支持这样的观点，即成功的经济转型依赖于创建各种机制，不仅要保证市场更好地运作，而且要确保社会凝聚力。

本章首先分析了体制和经济趋异之间的关系。接着探讨了两项研究施政结构对经济增长/发展的重要性及其与发展中世界政治决策的相关性的主要理论。本章第三部分分析了几个国家施政结构转型，成功消除增长限制，从

体制和施政要素有可能进一步加剧增长趋异

成功的增长在于建立有关机制，使市场更好地运作，并确保社会凝聚力

此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的事例；第四部分分析了增长不足问题以及受冲突影响的各国在体制和施政方面的一些问题。本章最后提出了几项政策措施。

体制、施政和经济增长

支持经济持续增长的体制“品质”和善政形式视各国国情而不同

很难确定应当寻求哪种体制“品质”和善政形式才能支持经济的持续增长进程。它们与各国国情相符，是因地制宜的措施。对决策者而言，即使现有体制和施政结构的变化更谨慎、更清晰，也有必要了解大张旗鼓地放开新经济机会的可行性。因此，决策者不仅要了解在现有经济体系向新经济体系转型过程中经济可能受到的影响，还要了解如何在避免大量消耗社会成本的同时创建最符合需要的高质量施政结构。

建立更好的机构框架足以消除增长限制

纵览经济发展史和体制变迁史，显然在特定领域建立更好的机构框架足以消除增长限制，开创持续增长进程。17世纪，荷兰和英国为各类贸易商提供保护，使他们在行使财产权时免受独裁干涉之苦，而且还建立了详尽有效的法律体系来保护商人的财产权，这些措施为荷兰和英国的经济持续增长进程奠定了基础（见方框五.1）。更近一些的例子是，中国在1970年代开始的农村与农业体制改革为它今天的经济成功打下了基础（见下文）。

要在市场体制框架内取得良好的经济表现，有赖于创建各种体制，不仅要保证市场更好地运转，还要保证社会凝聚力。就本章而言，施政或称公共体制被视为是通过处理两个主要领域——市场机能和社会凝聚力领域来促进公共利益的手段。¹以社会凝聚力为代价获得的经济增长不可能长期存在，而市场机能的提高和社会凝聚力的加强应当是相辅相成的。

我们不可能严格区分“施政”因素和“体制”因素。如果“体制”中含有正式或非正式“限制因素”，包括各种规章和条例时，“体制”概念一般会更广泛，它不仅支配着国家的职能，还控制着私营实体的活动（见联合国，2000年，第八章）。

较低的交易成本、公共物品供给、产业规划和长期增长战略都能改善市场机能

虽然在创建市场和加强社会凝聚力这两个治理因素之间存在某些职能重叠，我们还是能够运用 Ocampo（2006年）建议的方法有效地对它们进行细分。可以将创建和改善市场的治理因素分为以下几类：（a）帮助创建市场，

¹ 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类似方式定义（2006年，第二部分）公共部门治理，但主要是强调政治体制和管理机制在创建良好的国家施政体系方面的开放性和透明性。

方式是减少交易成本，赋予财产权并予以保护；(b) 提供公共物品（以传统观点衡量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物品）以及那些产生积极外在效应的物品，减少供应那些产生消极外在效应的物品；(c) 帮助调节产业水平，尤其是与非竞争性市场实践有关的产业水平；并且(d) 制定规章，避免短期宏观经济不平衡，设计结构性战略政策，通过扩大恰当的诱因，促进财政改革，帮助积累人力资本和促进投资等措施为长期经济增长创造条件。

促使市场运转与社会凝聚力保持一致的其他治理因素可分为：(a) 适当分配特定社会认为应当提供给所有成员的产品和服务；(b) 通过再分配政策，改变财富所有权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从而确立社会可接受的（或可容忍的）再分配等级；(c) 管理市场运行造成的冲突；并且(d) 决定参与决策程序，不但要参与有关分配结果的决策，还要参与有关市场运转的决策，因为如果不影响市场的运转方式就不可能实现预期的分配结果。

适当分配产品和服务，财富再分配和参与性的决策程序都可以加强社会凝聚力

最初的显著趋异以及大西洋贸易的重要性

方框五. 1

大西洋贸易对经济增长方面最初的显著趋异起到了重要作用，与不从事贸易的东欧和西欧国家相比，从事贸易的西欧国家的城市化比率更快，国内总产值增长比率也更快（见 Acemoglu、Johnson 和 Robinson 的合著，2005 年）。

大西洋贸易、殖民活动以及奴隶贸易带来的利润是直接导致这些西欧国家的经济更快增长的原因之一。但是，另一个间接因素比这一直接因素更重要，即在从事贸易的西欧国家里，权力从人数较少的贵族阶层转移到成员更多的商人阶层、奴隶贩子和殖民地种植园主手中。这些从大西洋贸易中获利的人们要求进行重大的体制改革以保护他们的财产权，而且他们也做到了这一点，在早已存在君主统治的英国和荷兰两国，他们成功地确保了对其财产权的额外保护。

在英国，由于英王詹姆士二世授予的各种垄断特权，大部分商业利润被转化了，用于支持诺曼征服和支助荷兰总督，1688 年英国“光荣革命”的成果就是新君主接受了君主立宪和议会至上两项原则，1689 年《权利法案》确认了这两项原则。与其说“光荣革命”推翻了当时的体制，不如说它恢复了受到斯图亚特王朝专制主义倾向威胁的“法律和特权”。

与英国相似，荷兰商人是迫切要求从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中获得独立，更广泛地保护其财产权的主要群体。通过商人们刚刚获得的财产权，“英国和荷兰这两个商业国家进行了更多投资和更多贸易，推动了经济增长”（Acemoglu、Johnson 和 Robinson 的合著，2005 年，第 572 页）。就荷兰而言，可以得出以下

方框五.1 (续)

结论:

荷兰的体制有利于经济增长。宗教方面的宽容使技术性移民受到鼓励。财产权利明晰,而且地籍登记制度鼓励进行财产转让。建立了有利于经济企业的高效法律体系和可靠的金融机构。税收很高,但主要征收消费税而不是收入税,这种税收制度鼓励储蓄和节俭,鼓励勤奋工作。因此荷兰成为经济效率方面的典范,有很多地方值得英国政府学习(Maddison, 2001年,第80页)。

与荷兰和英国相比,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政治体制更为专制。与皇室有关系的人垄断了大西洋贸易,成为跨洋贸易和抢掠行为的主要受益人,他们拒绝变革体制。随着体制的衰败,经济增长明显放缓:到1700年时,荷兰和英国的人均收入已经分别达到2110美元和1405美元,而葡萄牙仅为854美元,西班牙仅为900美元(Maddison, 2001年,第90页,表2-22a)。

这些机制充分反映了社会内部在特定时期对某些问题的看法,即社会内部财富和收入适当再分配方面的公平与公正、政府在供给公共物品方面的适当职能以及所有公民均应获得的物品和服务等问题。在应当建立怎样的体制这一问题上,即使是发达国家之间也存在着迥然不同的意见,比如北欧国家运用税收体系实现收入再分配的效果就大于美国。此外,历史经验表明,成功的社会总是在两个方面取得进展,即完善市场经济的职能和实现社会凝聚力,而不是仅仅简单地追求某个特定的抽象概念,如“保护财产权”或“释放市场职能”等。正如Karl Polanyi在1944年所指出的,排斥政府与社会的参与而寻求建立完全自我约束的市场的行为反映了一种危险的幻想(Polanyi, 1944年)。成功往往缘于扩大参与范围和不断进行变革,这样才能以稳健的方式管理社会内部变化的各种关系。

普遍共享经济增长带来的利益的做法培养了人民的公平和公正意识

由此产生的体制安排会影响到人们进行投资、工作、学习并开展研究和开发的愿望。在很大程度上,体制的有效性取决于其促进经济增长、提高收入水平和社会总体福利以及实现社会凝聚力的能力,总而言之,取决于体制创造一个被公认为是公平、公正的社会的能力(Rawls, 1999年)。东亚国家和非洲高成就国家,如博茨瓦纳和毛里求斯等国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均建立在普遍共享经济增长带来的利益的基础上,这种做法在这些国家的人民中间培养了公平和公正意识。本章随后将讨论这一点。

建立机构体制的方式决定了决策的框架,并且往往会通过引进某些措施,如平衡预算法或者货币发行局制度等措施来约束政策判断,以便稳定

宏观经济。(Glaeser 等人, 2004 年)。如果在经济和社会管理的其他领域, 这种自我支配的约束措施能够与政策弹性保持平衡, 那么整体政策框架的可靠性和可持续性就会在将来为主管当局开辟可利用的政策空间。如第四章所述, 东亚某些国家的平衡预算法限制了赤字财政的需求, 这是稳定宏观经济状况的关键, 因此财政主管当局能够积极地为教育、医疗和基础设施提供资金。

施政结构和经济增长的变化

过去几十年里在发展政策模式方面的转变使得这些政策赖以实施的体制框架发生了巨变。依据 1980 年前后取得的有限的经济增长经验, 发展政策主要侧重于取消对国内市场的价格管制, 消除贸易障碍, 解除对金融市场的控制并对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 以此来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人们推论, 降低国家的作用就能使发展中国家获得更高、持续时间更长的经济增长。如上文所述, 自从开始广泛执行这些改革措施以来, 各发展中国家的增长效益就各有不同: 某些国家(尤其是东亚和南亚国家)的表现一直好于其他国家, 而且已经迅速赶上了富裕国家; 但其他国家的增长效益要么因为多少存在的长期性问题(如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许多地方), 要么因为经历了繁荣和萧条的交替(如拉丁美洲)而一个比一个差。

仅仅关注 1980 年代和 1990 年代改革政策的特点, 并据此认为主要是改革速度和改革思路的不同造成了增长方式差异, 这种想法很有诱惑力。但是人们现在认识到, 施政结构的差异是解释增长方式差异的深层次依据之一, 当施政结构的变革不能促使改革政策产生预期效果时, 施政结构的差异就成为质疑某些改革措施适当性的基础。

最近的文献中出现了两个方法, 用以剖析施政结构在决定经济增长和发展方面的重要性: (a) 新比较经济学, 其中个人的法律权利(包括财产权)、反腐败措施和其他与施政有关的因素均被视为关键因素, 往往运用跨国分析来评估其重要性; 和 (b) 多样化的施政体系办法, 承认各机构的差异随时间和空间而不同, 并研究经济机构如何在不同的环境中对制约市场的特定规章制度做出反应。

跨国分析方法力图在施政品质 and 经济增长之间建立明确的因果联系。但是, 正如本文随后将讨论的, 试图衡量施政品质将面临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挑战。另一方面, 认识到施政体系能够变化到何种程度, 也有助于部分解释第

发展政策模式方面的转变导致了体制框架的巨变

出现了两个剖析施政结构在经济增长和发展方面的重要性的方法

试图衡量施政品质将面临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挑战

一章所讨论的区域“趋同俱乐部”和差异模式。如果某国发展了自己独特的施政体系，那么他国很难（或不可能）移植这种体系；但是，社会经济条件相似的邻国可能会对这一施政体系略加改动，然后予以采纳。

新比较经济学

跨国增长回归分析法受到某些经济学家的青睐，成为评估经济发展中施政体制的重要性的工具。人均收入或增长比率已经重新进入某些施政品质指标，如法治、（反）腐败措施、政治稳定和施政有效性。回归分析法还运用了其他与施政无关的变量，如地理和历史特性。

跨国增长回归分析法的特点是运用人均收入和施政品质措施之间的相关性，如法治，来表示良好的施政能够对经济状况施加有利影响。举例而言，法治指标就用于衡量公民对法律的信任程度和受法律约束程度，并包含了公民对犯罪发生率、司法机关的有效性以及合同可执行性的看法（Kaufmann、Kraay 和Mastruzzi，2004年，第4页）。法治指标揭示了施政品质（即公平和法律的可预测性）与收入水平之间的密切联系。要想知道施政体制的不同方面，可以在相似的跨国框架中建构并适用一项由多种施政指标（如政府有效性、调整质量和反腐败措施）组成的综合指标。已经有许多研究运用了生态、地理、地质以及历史数据，²力图确定影响施政品质的因素。

跨国回归分析法表明
施政会对收益产生影
响……

文献表明，即使在排除了非经济因素之后，施政也会对收益产生重大影响。发达国家的生活标准较高，因为在这些国家里，法治盛行，合同可以得到实施，腐败的官员会被依法逮捕和惩处，进入新行业的门槛较低，实行谨慎的货币和财政政策，而且适当的社会保障网络已经就位，可以减少不可预测的风险。最重要的是，当收入或财富分配与公共物品的供应相冲突时，这些发达国家可以依靠施政体制，通过民主程序做出不同的安排。另一方面，不完善的施政体制会打消生产活动和长期投资的积极性，从而抑制潜在的增长机会。不完善的施政体制会通过教育机制阻碍对人力资源的投资，导致持续增长机会进一步减少。不完善的施政往往无法防止社会动荡，也无法消除动荡发生之后产生的不利社会影响。

……但是这些发现也
传递了一种悲观主义
和宿命论的观点

但是，这些发现也传递了一个悲观主义和宿命论的观点（Dixit，2005年，第5页）。这种观点是悲观主义的，因为它表明，如果一国在开始发展时没有

² Acemoglu、Johnson 和 Robinson 在 2001 年合著的论文可能是该领域最有影响的文章。

制定适当的施政体制，那么该国注定会失败。这种观点还具有宿命论色彩，因为鉴于地理、地质和历史因素都是预定的，如果它们果真能够极大地影响施政或者收入水平，那么我们对此无能为力。自然资源诅咒理论（随后予以讨论）认为消耗了大量自然资源的国家将遭遇不幸，这种理论的产生充分体现了这种悲观主义和宿命论观点。

但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东亚的发展中国家，设法度过了施政结构改革带来的重大经济变化，从而对跨国回归研究方法的悲观主义和宿命论观点提出了质疑。由于这些研究方法只看到了经济产出和施政发展，因此对这些国家建立的良好施政体制视而不见。正因为如此，跨国回归研究方法无法解释这些国家获得成功的原因。但这种研究框架更适于用来表明改善施政体制如何带来更好的经济状况。

这种研究不能解释施政体制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带来更高的经济增长

对施政措施和跨国分析的批评

严格地说，跨国分析用以证明经济增长与施政品质相关性的证据是主观的，其衡量指标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研究人员或者接受问卷调查者的主观判断基础上。鉴于这些评估具有主观性、施政本身具有复杂性而且难以找到衡量施政品质的客观指标，因此将经济状况与施政结构联系起来进行研究的方法受到了严厉批评。此外，依据不明确的主观办法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可能无法达到预期的效果。

人们常常运用基于主观判断的指标来衡量施政品质

第一类批评意见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经济状况和施政体制之间存在着双向关系，它们相互影响，相互决定。在这种情况下，跨国回归分析法就是不全面的。³无论是施政还是施政品质都是不可见的。人们对于施政品质的看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国家经济状况的影响；如果国家面临经济或财政危机，人们就倾向于认为国家的施政品质在下降。文献中广泛使用的法治指标可以再次证明这种情况。2002年1月阿根廷放弃货币局制度之后，分配给该国的法治指标急剧下降，从相当于典型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如2000年的埃及或土耳其）下降到低收入国家水平（如2002年的孟加拉国或几内亚）。⁴难以想象一个国家的司法效率会在两年内下降到如此之低的水平。实际上，被估算

经济状况极大地影响着对施政品质的感知

³ 技术性探讨见 Brock 和 Durlauf 在 2001 年的合著。有人认为，如果体制（包括施政在内）是特定产出（如经济状况）的内在原因，那么体制就无法影响增长，因为体制不是能够影响产出的因素（Przeworski, 2003 年）。

⁴ 关于各国在不同时期的施政指标的分析，见 Kaufmann、Kraay 和 Mastruzzi 在 2005 年的合著。

跨国回归分析无法为决策提供有用的提示

的并不是法治本身，而是人们所感知的法治品质，而且经济状况的兴衰极大地影响了这种感知；以阿根廷在 2002 年遇到的情况为例，当局取消货币局制度和货币可兑换性造成的混乱导致了经济危机。⁵

第二类批评意见着重指出跨国回归分析法得出的结论对实际决策并无助益。人们普遍运用一项名为“工具变量”估算法的技术来确定施政品质（或感知品质）与经济状况之间的因果关系。目前发现的一些有效的工具变量包括国家殖民史（事例见 Acemoglu、Johnson 和 Robinson, 2001 年）、地理资源（事例见 Gallup、Sachs 和 Mellinger, 1998 年）以及自然资源（事例见 Sachs 和 Warner, 1995 年）。尽管这些变量在技术上是恰当的，但是它们无法为决策提供有用的提示。

例如，以历史为分析基础的方法就提出，在欧洲殖民者遭遇重大疾病灾害——因而导致殖民者高死亡率的地区，不太可能以欧洲为榜样建立类似的施政体制，包括保护财产权免受独裁干涉等制度，而是更有可能建立旨在短期内劫掠该地区自然资源的体制。最典型的“消耗性国家”莫过于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统治下的“刚果自由邦”，这个被悲剧性地错误命名的国度实施的就是这种掠夺式体制。（Ascherson, 1963 年；Hochschild, 1999 年）。因此，人们运用几个世纪以前的殖民者死亡率来确定获得高施政品质的国家，并决定死亡率能在多大程度上帮助预测今天的收入水平。北美洲国家、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死亡率较低，因此人均收入较高，而在非洲很多地区以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的某些地区，欧洲殖民者的死亡率较高，因此这些地区不能建立高品质的施政结构，从而无法逐步获得较高的人均收入。这些研究认为，前殖民地的人均收入水平在今天各有不同，这实际上是由施政品质（通过投资者对国家征收风险的看法来衡量）决定的。

但是，这种结论并不意味着殖民主义（以殖民者的死亡率为特征）是经济状况巨大趋异的根源。过去的两到三个世纪里，未被殖民的各国之间的差异与被殖民国家之间的差异一样大。前者包括阿根廷、埃塞俄比亚、日本、泰国和土耳其。死亡率确实可以抓住造成经济趋异现象的潜在原因，但却无法提供令人信服的解释。因此在目前的情况下，找到衡量施政品质的适当工具与提供适当的经济趋异解释截然不同。以地理和自然资源为分析基础的方法运用了类似的分析思路，也使用了生态或地质变量。

⁵ Rodrik 在 2005 年提出经济增长和经济政策之间也存在类似联系。

第三类批评意见指出，跨国回归分析法衡量并研究的施政或施政品质与设想的施政概念并不相符。按照设想，施政是所有经济体制中较为持久的要素之一，但是，正如上文所分析的，阿根廷的法治指标在货币局制度崩溃前后的变化巨大。Glaeser 和其他学者于 2004 年证明，文献中使用的大多数机构品质措施都缺乏稳定性，而具备稳定性的措施却和经济状况关系不大。他们和其他专家一起质疑施政指标的相关性，主张人力资本是经济发展和机构品质的基本决定因素，认为殖民者自身具有一定的教育与技术程度，并且希望通过继续学习来改善生活，因此殖民者带来的人力资本要远远大于他们带来的体制。在这一点上，人们注意到，在新大陆殖民地中，加拿大和美国都极为重视教育问题，因此到 1800 年，美国已成为世界上文盲最少的国家（Sokoloff 和 Engerman，2000 年）。

施政指标的相关性受到质疑

最后一种批评意见侧重于捐助国和国际金融机构运用跨国回归分析法的成果实际分配援助的问题（Herman，2005 年）。鉴于施政品质和经济增长之间明显具有高相关性，因此捐助国认为，如果援助接受国“使其施政走上正轨”，那么就能创造一个有益于发展的环境，从而更有力、更有效地利用获得的援助。

在利用限制改进施政方面，确实存在着许多争议。正如上文所述，目前用来衡量援助接收国的机构品质或施政的各项指标都不过是“窥探不明朗的局部发展图景的窗口”（Herman，2005 年，第 282 页）。在估量这些指标和分析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切实了解施政品质及其对发展的重要性时，我们应当谨慎。如果这些指标在不同国家都具有相似性，并成为全球性的施政措施，那么采取谨慎的态度就尤为重要。世界银行最近的分析似乎同意这一看法，并表示这些指标“更适于表明长期的发展趋势”（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06 年，第 14 页）。

跨国分析几乎不能为定义援助分配中的施政条件提供指导

施政结构的类型

另一种分析施政和经济状况之间的关系的方法就是按各国国情分析经济体制的职能。这种方法的显著特征在于，它明确地接受了这一事实，即各国均发展了自己特有的机构结构，各国的政府、企业和家庭都在其中实现个人或社会目标。现有的施政结构是多个机构长期以来相互作用的结果，在相互作用的过程中，现有施政结构不断地被重塑（Young，1998 年）。

没有任何施政因素是普遍适用的“最佳”因素

结果是，没有任何施政因素是普遍适用的“最佳”因素。⁶每个国家都必须通过尝试和汲取经验来找到自己的施政体制——在现有情况下最适用的施政体制。这也表明，可以通过多种施政结构来解决经济增长障碍问题（Haggard，2004年）。在施政体制中，各项施政因素之间以及施政因素与非施政因素（如“常识”、社会规范、公司内部劳资关系甚至文化）之间相互依赖，因此很难将某个国家的施政体制移植到另一个国家。

各项市政因素之间存在着相互依赖性

有些政策建议提出，只需改善那些确保市场效率所必需的施政能力，但是各项施政因素之间存在的相互依赖性（通常被称为互补性）使这些政策建议的有效性受到质疑。这些政策建议往往设想政府能够通过保护财产权、实行法治、减少腐败和放弃征用等措施来确保市场效率，随后私营部门的活动将推动经济的发展。但是，为了保证生产性增长，⁷为了使市场的运转与社会凝聚力保持一致，国家施政能力必须对市场职能进行补充。

在政策改革的不同领域也存在着各种重大补充，它们要么造成恶性循环要么造成良性循环。由于存在着不理想的施政，政府很难在不影响其他施政因素的情况下着手进行变革。因为缺乏人力和资金，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遇到了障碍，无法进行多层面的改革，而且即使这些政府设法启动了改革措施，也会因人力和资金不足不能在改革措施完全生效所必需的较长时期内持续采取相关措施。除非法律体系正在运行，而且人们相信它的强制执行能力，否则只引进减少交易成本的市场增强机制并不能引发经济活动。与此类似，贸易和行业政策的调整往往也会成为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难题（见第三章的讨论）。

一旦政府在规划和执行改革方面取得其民众的信任，各种施政因素之间的互补性就可以引发良性循环

各种施政因素之间存在的互补性似乎至少可以部分解释趋异模式以及第一章提到的区域趋同俱乐部的动态。施政因素之间的互补性就会产生良性循环。同样，只有当政府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遵守诺言，让民众共享经济增长带来的利益时，政府才能获得民众的信任。这种增长共享培养了社会凝聚力，它是东亚国家追求的政策带来的成果之一。虽然并非该地区的所有国家都允许其国民平等地参与政治体制，但事实上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可以依赖相当的社会凝聚力、共同的价值观以及相对较高的经济平等来确立他们的改革政策

⁶ 此处的分析基于联合国资料，2000年，第八章。

⁷ Khan（2006年）区分了两种实现持续增长所必需的施政能力：增强市场的施政和提高增长的施政。前者包括确保市场效率的各项施政因素，如保护财产权和实施法治。后者包括执行市场活动的各项国家能力，如将资产加快转让到更能创造经济价值的产业中去的能力以及促进吸收和学习新技术的能力。

的合法性。这种框架也可以解释博茨瓦纳的成功发展：由于习惯于通过民主进程建立共识，博茨瓦纳创建了一条增长共享之路。

施政成功转型的国家

某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在过去三、四十年里持续增长，缩小了它们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这些国家在施政方面的成功转型给我们带来两方面的启示。首先，它证明了解除现有的增长限制、重视施政转型的重要性。这些国家的成功转型并非建立在全面改革施政结构的基础上。相反，逐步、渐进地消除增长限制可以收到显著效果。其次，这些国家的经验表明，如果一项施政改革（如贸易改革）致使大量的收入从一个群体流向另一个群体，那么将市场运作与社会凝聚力统一起来就具有重大意义。这些成功的事例表明，我们不但要解决各项经济改革之间的互补性问题，而且要解决经济和社会管理之间的互补性问题，两者都很重要。

下文分析的土地改革、贸易和财政改革的事例以及中国进行的渐进式改革进程都强调了以上观点。这些事实表明，逐步变革施政结构足以触发经济增长。这些经验验证的经验同时表明，不同国家可以采取不同形式进行施政变革。亚洲的土地改革充分体现了这一点。已经证明中国经济的成功增长建立在渐进式的施政改革基础上，中国取得成功的道路独树一帜，与华盛顿共识开出的所有政策处方都截然不同。

逐步变革施政结构足以触发经济增长

土地改革

对那些大多数国民都从事自给农业的国家而言，引发长期持续增长的关键是提高农业部门的生产力。更高的农业生产力不仅能带来较低的食品价格，而且可以增强人民的营养（从而提高整体经济中的劳动生产力），创造对制成品和服务的需求，并且可以通过与非农产业联系的渠道促进非农产业的发展。

在许多情况下，农业生产力不高是限制持续增长的主要因素。土地改革可以有效地减轻这种限制，方法是将土地所有权交给耕种土地的农民，或者采取普遍使用的办法，即确保农民有权适当分享他们在土地上劳作获得的收益。韩国和中国台湾省是最近首先实现工业化的两个经济体，它们将土地从大地主手中收回，重新分配给小地主或佃农，并且保证私人持有土地财产权的权利（联合国，2000年，第五章）。保证私人持有土地财产权可以在经济上刺激农民生产农作物，维护土地并向土地投资。

土地改革是减轻生产力增长限制的有效手段

彻底的所有权转让并不是土地改革的唯一途径

中国、越南和印度的例子表明不必将土地所有权完全交给农民

这种彻底的所有权转让并不是土地改革的唯一途径。实际上，只有在这两个经济体当时当地的社会经济条件下才有可能成功地施行这种改革。韩国和中国台湾省的政府将以往由日本人或日本公司拥有的土地分配给土地上的佃农。从中国大陆流入中国台湾省的大量移民进一步增加了全面土地改革的必要性。

如果因政治或社会经济原因无法彻底转让土地所有权，那么只需通过加强租佃法律或者保证农民种地有回报，就能实现更高的农业生产率。实际上，中国、印度和越南的土地改革都没有将土地所有权完全交给农民。不同的施政变革形式可以减轻许多低收入发展中国家在持续经济增长进程中面临的一个主要限制，即农业上的低生产率。

1978年，中国启动的多项主要改革措施之一就是家庭承包责任制，这种制度使家庭在较长的承包期内（最初为5年，后来延长到30年）对集体所有的土地享有使用权。作为交换，农民有义务按预定的配额向集体上缴农产品，但可以在自由市场销售剩余的农产品，或者按议价卖给政府。⁸中国还放松了对农村私营市场交易的限制以及对农民从事非农业活动的限制，从而完善了这一改革措施。

在越南，家庭农庄在1980年代的革新政策（doi moi）期间取代了集体农庄。这种新体制允许农民与政府签订为期15年的土地合同——实际上是土地租赁合同，农民因此可以按自己的意愿自由地销售农产品。中国在进行土地改革的同时还实施了其他改革措施，包括引进基于市场的农产品与非农产品交易，允许进行与贸易有关的活动及外国直接投资。

印度的情况有所不同，有效的土地改革仅限于更严格地执行现有的租佃法律。印度在1955年制定了《土地改革法》，但并未得到广泛执行，这主要是因为缺乏行政和法律资源。但是在1970年代，西孟加拉邦制定了一项名为“Barga行动”的新计划，该计划的目的在于执行租佃法律，从而规范出租行为并保障小佃农对土地的使用权（Banerjee、Gertler和Ghatak，2002年）。

印度1955年《土地改革法》及其后续的修正案保证，只要小佃农支付法律规定的租金，他们就可以对登记的土地永久享有可继承的附加义务权利。但是法律本身存在着漏洞，而且小佃户们往往没受过教育，也几乎得不到政府的支助，因此事实上很少有人去政府进行土地登记。“Barga行动”鼓励这些小佃户前往土地税收部进行登记，政府也支持这种做法。只要已经登记

⁸ 配额已经减少，强制性生产计划也于1985年取消。

的小佃农向地主支付最少 25%的土地产出作为租金，政府就授予他们对租佃土地的永久可继承使用权。由于“Barga 行动”的成功实施，截止到 1993 年，印度的分成制农民已经有 65%进行了土地登记，相比而言，在开展该行动之前仅有 15%的农民进行了登记。⁹

改革的成果是，西孟加拉邦的稻米产生增长率显著提高，从 1960-1980 年期间的 1.8%猛增到 1977-1994 年期间的 4.7%（Raychaudhuri, 2004 年）。这种增长可与中国台湾省的增长相媲美，在土地改革之后，台湾在 1950 年代和 1960 年代的农业产值年增长率为 4.2%（联合国，2000 年，第五章）。根据获得的可比较数据，在 1973 年至 1999 年期间，印度农村的贫困率（即按照 1973-1974 年的价格，农村地区处于每月人均 49 卢比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比例）从 73.2%降为 31.7%。

这些改革措施的共同之处在于将有限的财产权转让给佃农（与韩国和中国台湾省全面转让土地所有权的做法不同），以此作为减少农业生产限制的手段。这种财产权转让使农民有权要求适当分享土地的产出，并且获得长期的（或永久的）土地使用权。尽管转让的财产权有限，但是农业产出显著增长，并在数年后引发了经济的全面持续增长。土地改革是施政体制变革的一部分，它无疑激发了农民努力工作，改良土壤、投资新工具、新种子和新技术的兴趣。

但是这些国家采用的政策设计并不相同。制定改革政策的基础是各经济体的主要社会经济体制。因此，不同的施政重构会带来相同的结果——对土地改革而言，就是农业生产力的提高。¹⁰

贸易政策改革

进行贸易政策改革的困难在于它只是整体经济改革措施的一部分。正如第三章所述，生产部门通过鼓励私营部门的参与来促进新经济活动的产生，这是对贸易改革的补充。同样，较低的关税会减少计税基础，应当通过提高现有税率或者开设新的计税基础予以补充（Aizenman 和 Jinjarak, 2006 年）。此外，

尽管只进行了有限的农村体制改革，中国、越南和西孟加拉邦的农业产出仍然显著增长，并在数年后引发了经济的全面持续增长

⁹ 印度在独立后形成了分散的政治体制，因此西孟加拉邦的经验没有在全国推广（见 Kochhar 等人，2006 年）。

¹⁰ 并非所有的土地改革都会成功，当土地再分配涉及到农民的安置问题时尤其如此。在非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安置问题普遍存在，农民的选择往往成为土地改革的障碍（见联合国，2000 年，第五章）。

相互冲突的管理机构，包括社会保险体系（或社会保障体系）在内，均应当到位，以便为受到新贸易制度不利影响的人提供保障，至少在短期内提供保障。同时，必须为宏观经济的稳定建立新机构或新法律，以避免经济体在进一步进入全球经济发展时受到外来冲击。

通过采取渐进的办法或者双轨制措施，建立适应国内框架的进口机制，那些在整体发展战略中成功地结合了贸易政策改革措施的国家避免了过度的行政负担的出现。虽然能够实施这种生产部门政策的范围日益缩小（见第三章），但是中国、毛里求斯和东亚各国取得的显著成功表明，必须为发展中国家创造一些开展新的经济活动的政策空间，这样这些国家才能从更加自由的贸易制度中获益。

毛里求斯利用出口促进战略来增强社会凝聚力

毛里求斯在1970年进行了贸易改革，在出口加工区（EPZ）建立了自由贸易。直到1980年代中期，鉴于毛里求斯脆弱的社会结构和种族构成情况，出口加工区以外的国内部门仍然受到高度保护，以维持社会凝聚力。出口工业区为扩展外向型贸易机会、创造就业机会尤其是妇女的就业机会提供了一条路子，而且国家也不用承担引发社会不安定的风险（联合国，2000年，第八章）。毛里求斯因而建立了一个既能维持社会凝聚力，又能共享经济增长的体制。该国政府利用了这一情况，即通过鼓励民间社会参与决策，该国出现了大量民间社会团体；这样做的结果是产生了以出口加工区为基础的出口促进战略。

但是其他许多国家的出口加工区都未获得成功

毛里求斯的成功并没有在撒南非洲国家重演。尽管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多（Subramanian和Roy，2001年），但是两项与施政有关的因素尤为重要。首先，毛里求斯民主选举产生的三届不同政府虽然政治理念不同，但是都一致追求宏观经济的调整和稳定；在民主政治体制框架下，透明的决策程序能够揭示经济问题，并且尽早予以解决。其次，毛里求斯拥有合格的公务员，而且（同等重要的是）公务员的待遇很好，这种公务员制度使寻租行为降到最低程度。¹¹该地区许多国家的出口加工区都未获成功，因为这些国家的施政体制无法打击寻租行为，也无法消除其他必须采取选择性干预手段才能予以控制的低效率现象。¹²

¹¹ 毛里求斯一直支持糖业的发展，而不是对其课税，该国的贸易伙伴也为毛里求斯的糖进入其市场给予优惠。这一事实反映了政策的另一个重要方面。

¹² 发展中世界其他地区的出口工业区面临类似的相关施政限制（事例见 Willmore，1994年）。

另一方面，东亚的各经济体则运用行政系统和各公共部门之间的相互作用网络来实现出口导向型增长。以日本为例，这种相互作用不仅是克服市场信息（价格、生产与销售数量、生产瓶颈和投入短缺）流动不足的手段，而且是管理因产业不同造成的巨大收入差异的方法。日本的情况为其邻国的出口导向型增长树立了榜样。这种相互作用极大地减少了“协调不足”现象出现的机会，并且有助于这些经济体在其发展战略中确定适当的国家重点。国内金融市场的不完全发展也迫使政府将资金疏导到重点行业中去。

东亚各经济体运用行政体系与各公共部门之间的互动网络来实现出口导向型增长

中央政府一级在分配商品、服务和经费方面的协调努力确保了公众能够分享经济成功带来的利益，进一步加强了社会凝聚力，使人民大众更深入地参与了发展战略所取得的成就。这种努力也有助于在东亚建立一致的贸易和产业政策。政府对重工业的干预可能会扭曲资源的分配，并因而导致市场的“静态”低效率，然而很少有人怀疑这种干预措施在加速发展方面的作用。换句话说，在动态意义上，这些干预措施是有效的。鉴于这种增长共享之路的成功，政府政策的可信度也得到加强。

在更实际的层面上，上述实例之间的共同点在于各经济体都认识到各自面临的限制，并采取创新措施消除或削弱这些限制（Hausmann、Rodrik 和 Velasco，2005 年）。这些国家取得成功有赖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它们都依据不断演变的国内外形势逐步施行了补充性政策。实际上，从 1960 年代中期到 1970 年代早期，为了解决国内需求不足问题，迫使国内公司参与全球市场竞争，这些国家就已经将政策从进口型调整为出口型，成为首批调整政策的发展中国家。正如第三章中提到的，在结合传统与非传统贸易改革方面以及关于在不同行业间分配资源的保护性政策方面，当时推行的《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关贸总协定》）各项规定赋予各国的自由远远大于现行世贸组织规则所赋予的自由。

渐进式措施：中国

中国是正在成功进行机构转变的典范。自 1970 年代末期中国启动改革政策以来，中国经济一直保持快速增长。尽管某些社会和经济政策反复无常，但是在过去 20 年里，中国取得的经济成就使上千万中国人摆脱了赤贫状况。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挫败了悲观主义论调，驳斥了许多传统观念，特别是那种认为市场经济的主要机制必须在施行重大改革之前到位才有可能带来积极成果的说法。相反，中国在改革进程中采取的渐进式措施与许多转型经济体使用的方法

中国经济的成功增长一直以注重实效的渐进式机构改革为基础

截然不同。为了对抗不利的世界经济环境、消除僵死的官僚体制带来的限制并处理缺乏良好的市场基础的问题，渐进式改革进程赋予经济更大的弹性。

正如邓小平所说，中国的经济改革是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没有任何现成经验可供借鉴。中国的机构改革从实际出发，不考虑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而将经济发展作为最重要的目标（Qian 和 Wu，2000 年；Qian，2003 年）。

经济改革分三个阶段进行

中国机构改革进程的主要改革方向整体经济的效率，办法是为个人提供奖励，鼓励不同类型的市场参与者相互竞争，并确保人数不断增长的接受者能够分享改革带来的经济富裕。这使得改革进程得到更广泛支持。改革试验既涉及刺激农业部门、鼓励小城镇企业发展的措施，也涉及改革财政部门的措施和最近施行的改革国有企业和银行业的措施。总而言之，中国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是一个分三个阶段进行的渐进式经济改革过程。

1978 年至 1993 年为第一阶段。改革力度逐渐加大，以提高奖励并扩大市场分配资源的范围。第二阶段开始于 1994 年，当时中国政府决定将最终建立现代市场体制作为改革的目标。最近开始的第三阶段改革更注重经济增长进程加速带来的必须处理的区域差距和收入差距问题。

第一阶段改革的特点是成功的农业改革和双轨定价制

第一阶段改革的特点是上文提到的成功的农业改革和双轨定价机制。由于改革使大多数农民获益匪浅，因此农民欢迎这种定价机制，改革的施行相对容易。某些企业和官员也从这次改革中获益。但是，与其他涉及同一产品两种价格的制度一样，双轨定价制也导致了一定程度的腐败，特别是与关键生产资料的分配有关的腐败，因而在公众中激起了较大的不满情绪。

在改革第二阶段逐步淘汰了双轨定价制

第二阶段改革的更具挑战性，因为它触动了中央规划体制的基础。双轨定价制被逐步淘汰，市场力量在资源分配方面充分发挥作用，解除了许多关键部门的行政权力。从 1994 年到 2000 年，中国执行了几项基础性改革，即实行统一的公务员制度和交换汇率制，改革税制和财政制度，全面认可央行在维持价格稳定和促进经济增长方面的作用，开展小型国企私有化试点以及建立社会保障体系。

第三阶段改革更加注重让各地区、社会各阶层更平等地享受经济增长带来的利益的必要性问题。中国的基尼系数（一项衡量收入平等性的指标，其中“零”表示最大的平等，而 1 表示最大的不平等）在近几十年来一直在上升，预计下一个十五年里将继续上升（世界银行，2003 年）。区域收入差距，

尤其是城市与农村地区的收入差距是导致收入不平等现象上升的主要原因。归功于第一阶段改革的成功，农村地区的收入到 1984 年上升为城市收入的 55%，但在 1990 年代又下降到城市收入的 40%左右。为解决收入不平等的问题，中国政府于 2006 年宣布计划执行四种提高农村收入的改革措施：农村税制改革和农村行政收费制度改革；水土保持项目和增强农业生产力的技术支持；在教育和其他社会基础设施方面增加对农村人口的公共投资；以及乡镇自治方面的政治改革。

除了如何分配经济增长带来的利益的问题以外，中国的改革还存在其他问题，农业部门和大型国企尤其需要深入改革。到目前为止，改革进程取得的最大成就一直限于 1990 年代中期对小型国企的私有化，而这一过程导致大量工人下岗。大型国企仍然是改革的主要难点，特别是它们威胁到了大型国有商业银行的正常运转，而且为中国的财政带来了潜在的沉重负担。大型国企的未来最终将依赖于改善企业的治理，首先必须砍断行政与经营之间的关系，并建立一个自由竞争的企业体制。此外，在进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承诺全面遵守市场经济规则，包括保护知识产权在内，这使得中国必须深入改革。

中国的经验表明，并非一定要建立某些分析家认为是“最佳实践”的机制才能启动改革进程。即使某些机制在这些分析家看来是“不完善”的，但是只要改革措施符合现行的经济政治现实，就能够取得有利的成果。中国经验强调必须将机制改革视为一个过程，而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务，必须确保在改革努力和经济发展两方面都取得进展。

中国的经历向所有国家清楚地表明，在实现经济增长方面要面临各种困难，同时也有多种方法解决困难（或最大程度地减少困难）。那些已经取得成功的国家在启动各自的改革进程时往往会仔细地评估现有的困难，然后再逐步消除这些障碍。以上对各种施政体制的分析表明，一国的成功经验不能直接输出给其他国家。为了启动自己的改革进程，各国的决策者可以把对本国国情的了解和从其他已经成功进行机构改革的国家学得的经验结合起来。这种方法与适用以往推荐的全面改革一揽子建议的方法截然不同。¹³

以上分析的事例提供了具有一定乐观主义气息的信息，这些经验清楚地表明，在持续经济增长启动之前，并不要求所有的必要善政因素都到位。各国不需要先经历长期的体制改革才能看到经济增长的成果。改革甚至可以不

第三阶段改革更为注重让各地区、社会各阶层更平等地享受经济增长带来的利益的必要性问题

中国的改革进程仍然面临挑战，尤其是在农业部门和大型国企的深入改革方面

中国经验强调必须将机构改革视为一个过程，而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务

在持续经济增长启动之前，并不要求所有的必要善政因素都到位

¹³ 世界银行（2005 年 b）强调政策多样性、选择多样性以及适度改革的重要性。

具备全面性，但是改革必须能够解放以往被不适当的规章制度所压抑的经济潜力。

经济增长失败的原因

过去 50 年里增长的失败：概览

鉴于本出版物其他章节已经分析了宏观经济以及各经济体中可以影响其缓慢增长的结构特点，本章将侧重于施政和机构在解释经济增长失败方面的作用。为了阐明社会失败对经济增长失败的影响，表五.1 列出了长期生活标准下降（即实际人均收入在七个或七个以上连续年度均呈下降趋势）的国家的

数据。

面临增长失败问题的国家一般为穷国，集中在撒南非洲和拉丁美洲，正在经受冲突的折磨和/或依赖于初级商品的出口

本表显示，遭受经济增长失败之苦的国家处于不同的发展水平，其中某些国家是石油出产国，收入水平相对较高。许多富油和富矿国家均无法将这种自然财富转变为包括人力资本在内的资产，后者本可以成为补充性增长来源或者另一种长期增长来源。但是正如第一章的分析，在总体上，面临增长失败问题的国家一般为穷国，位于世界的某个特定区域（特别是撒南非洲和拉丁美洲），正在经受冲突的折磨和/或依赖于初级商品的出口。¹⁴ 别的区域也有增长失败现象，但是那些更加多样化的经济体通常并不会以全面的增长失败而终结（见第一章和第三章的讨论）。在这方面应当注意的是，有些严重依赖初级商品的经济体仍然会具有高度多样性，而且遭遇增长失败的可能性较小。如采矿部门和农业部门同样重要的巴西、智利、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

许多高度依赖初级商品的国家出现的经济增长失败现象使人们开始相信“自然资源诅咒”理论

许多高度依赖初级商品的国家出现的经济增长失败使人们开始相信“自然资源诅咒”理论，该理论断言那些严重依赖自然资源的国家很可能比其他国家发展缓慢。某些原因促使了增长失败现象的发生——如商品贸易相对于产品的衰落；商品价格不稳定造成的风险和成本滞留增加了投资规划的难度，打击了投资；荷兰病，即用某个资源部门的飞速发展来补偿其他产业的盈利不足；以及寻租行为，即经济行为主体不对产业的长期未来进行投资，而是追求短期经济目标以榨取最大化的利润。如果商品是一种“定向型资源”（即位于某个特定地区的商品如矿井或油井）而不是“分散型资源”（即广大地区均能生产的商品，如小麦），那么更容易出现寻租行为。

¹⁴ 另见 Reddy 和 Minoiu（2005 年）的类似发现。

表五.1.
1950-2001 年实际人均收入在至少七个连续年度中下降的国家

区域和国家	下降期间	第一个下降年 度的实际人均 国内总产值	最后一个下降 年度的实际人 均国内总产值	下降期间的下 降百分比	1950-2001 年期 间出现负增长 总年数 ^a
		(1990 年国际 Geary-Khamis 定值美元)			
非洲					
喀麦隆	1986-1994	1 695	978	42.3	11
科特迪瓦	1985-1994	1 798	1 214	32.5	23
刚果民主主义共和国	1974-1983	842	587	30.2	32
	1986-2001	598	202	66.2	
吉布提	1984-1998	1 802	1 092	39.4	29
利比里亚	1979-1989	1 230	889	27.7	26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1979-1995	7 565	2 321	69.3	25
马达加斯加	1971-1978	1 246	1 007	19.2	26
	1979-1988	1 076	784	27.2	
纳米比亚	1981-1988	4 159	3 478	16.4	14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1985-2000	1 486	1 226	17.5	25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1976-1985	620	519	16.3	24
乌干达	1971-1980	871	577	33.7	21
拉丁美洲					
玻利瓦尔	1978-1986	2 715	2 074	23.6	17
古巴	1957-1965	2 406	1 988	17.4	20
海地	1980-1994	1 304	753	42.3	29
牙买加	1973-1980	4 130	3 121	24.4	17
尼加拉瓜	1983-1993	2 169	1 308	39.7	22
委内瑞拉	1977-1985	11 251	8 521	24.3	23
西亚					
伊拉克	1979-1986	6 756	3 759	44.4	22
卡塔尔	1980-1991	29 552	6 467	78.1	30

资料来源：联合国/经社部，基于 Maddison（2001 年）。

^a 系指人均收入少于前一年的总年数，因此并不代表一段持续的下降期。

最近对初级商品的需求猛增，尤其是中国经济的扩展对燃料的需求为初级商品的生产者带来了巨大利润（见第一章），对此，很有必要确定是否可以通过适当转变政策和机制、帮助拥有丰富自然资源的国家实现快速和可持续

但是，如果有一套适当的政策到位，自然资源未必是“诅咒”，它也可以成为财富之源

的经济增长等手段来避免自然资源诅咒。非洲委员会（2005年）的报告认为可以避免自然资源诅咒的出现，该报告强调：

但是，对拥有丰富自然资源的发展中国家而言，缓慢的经济增长并非不可避免的结果。博茨瓦纳和南非的经历表明，如果有一套适当的政策到位，自然资源未必是“诅咒”，它也可以成为财富之源。非洲其他富有自然资源的国家谨慎地管理资源流动，它们也能取得类似的成功。南非和拉丁美洲国家的经历表明，如果制定适当的政策，具有商品依赖性的非洲国家也可以像这两个国家一样拥有使其农业多样化和提升的潜力，从而实现快速增长。这些国家可以发展基于商品的出口导向型产业（如印度尼西亚或马来西亚的例子）或者在自身的初级部门内部实现多样化（如智利、哥斯达黎加或哥伦比亚的例子）。

此外，在19世纪，由于农业、林业和矿业的繁荣发展，拥有丰富资源的国家如美国和澳大利亚以及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各国均实现了持续增长，由于并极大地提高了生活标准。

增长失败在体制方面的原因

避免出现自然资源诅咒的最有效方式之一就是防止出现寻租行为

避免出现自然资源诅咒的最有效方式之一就是防止出现寻租行为，方法是确保由有效率、有信誉的经营者来生产所涉资源，将其转变为财富，以纳税和红利的方式增加生产者和政府（如果政府参与了经营）应得的收入。此外，应当以透明的方式监督政府税收的增长，并明智地将其用于国家的长期利益中去。在这方面，采掘行业透明度行动计划和“付款公布”活动的目的在于鼓励讨论，更好地分配采矿行业带来的财富，以培养社会凝聚力，避免出现冲突。

政府有兴趣与那些可以有利、有效地开发该国自然资源的商业性企业建立互惠关系

有效率的生产者开发自然资源可以带来高额利润，极大地拉开成本和价格之间的差距（见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005年a，第124页-126页）。因此政府有兴趣与那些可以有利、有效地开发该国自然资源的商业性企业建立互惠关系。这一过程可能会困难重重，它往往要求政府具有相当的行政能力，但是政府和企业双方都能从中受益，德比尔斯公司和博茨瓦纳政府的合作关系就证明了这一点。

在开发矿藏或石油与天然气资源时，许多国家倾向于维持国有企业（有时与私营企业联营或并存）的强势地位。其中包括那些被普遍视为是高度自

由化的经济体，如智利，智利的 CODELCO 公司是效率极高的国有铜业公司，是世界铜业公司中的佼佼者，它也是与私营铜业公司并存的公司。因此，建立机构规则，允许国有企业以高技术标准和独立的管理来进行运营是至关重要的。

对其他商品行业尤其是农业而言，向现有生产者提供充分的刺激和支助要比吸引新进入者更具有必要性。许多穷国，尤其是非洲穷国不能实现经济增长的原因就在于没有充分重视其农业资源的发展(Collier 和 Gunning, 1999 年)。人们往往认为，如果农产品销售部门获得独立，而且没有将收益再投资于增加农民收入或改善农业部门，那么就可以把从这些部门获得的资金用于推动工业化进程，特别是通过研究和发展的方法。不重视农业意味着忽略这样一个事实，即当今许多发达国家和较早实现全球化的国家(如上所述)之所以能够实现工业化有可能仅仅因为它们拥有坚实的农业基础。

即使由效率最高的生产者开发发展中国家的自然资源，即使给予生产者充分的刺激，也难以消除矿业和农业商品价格市场的一个共同特征：它们极不稳定，一年的价格波动超过 30%。由于采矿产业，尤其是燃料产业是资本高度密集型产业，其盈利依赖于固定资产和相对较少的雇员，因此该产业成为一国的应纳税收入的主要来源。然而对于多元经济体而言，采掘产业只能为政府提供相对较少的税收，在某些发展中国家，其政府收入有 50%以上至 90%来自农业(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005 年 a，表 3.5)。

鉴于政府收入和出口收入高度依赖于某个产业的收益，有效地规划政府开支就成为减轻价格波动后果的关键，如第四章所述。此外，资金的稳定性可用来理顺政府的收入流：经济繁荣时期积累的资金可用来支助经济低迷时期的施政计划。但是，穷国的行政能力有限，难以实施这种反循环政策。的确，成功地稳定资金要求具有强大的施政和机构安排(Davis 和 Tilton, 2005 年，第 238 页)。人们普遍认为，机构运行良好的国家如博茨瓦纳(见第四章)才能成功地运用这种资金。这种谨慎的反循环政策比较容易在机构强大的国家得到施行，这些国家的主管当局可以在经济繁荣时期留出一些资金。而在那些机构较弱的国家，国家领导人和国民之间缺乏联系，因此不会对谨慎管理收入的必要性达成共识，这些国家倾向于用尽从经济繁荣时期获得的收入，然后在繁荣期结束后借钱维持开支，这通常会导导致这些国家难以偿还债务(关于反循环政策的全面讨论，见第四章)。

许多穷国，尤其是非洲穷国不能实现经济增长的原因就在于没有充分重视其农业资源的发展

矿业和农业商品价格市场的一个共同特征是极不稳定

成功地稳定资金要求具有强大的施政和机构安排

施政、内乱和冲突管理

在那些冲突爆发引发内战的国家，最明显的特征是机构无法适当运转，无法解决波及社会各个层面的国内非暴力冲突。在这种情况下，与为创立市场而设立的机构相比，促进社会凝聚力的机构更有可能失败。

大多数战争是发生在穷国的国内冲突，它们直接或间接地严重消耗了经济成本

1946年以后，武装冲突的数量在1991-1992年达到高峰，此后有所下降，许多长期存在的冲突结束。但是，自1989年冷战结束以来，在80个地点发生了118起冲突，因此冲突仍然是影响国家和区域经济状况的主要原因（Murshed，2006年，第11页）。大多数战争是发生在穷国的国内冲突。这些冲突长期延续，直接或间接地严重消耗了经济成本。例如，在战争期间，经济增长比率通常会降低2%左右。由于预见到未来极有可能发生冲突，人们会将钱财转移出国，因此战争结束后损失还会继续（Collier，2006年，第10页）。在战后的头一个五年里，约有一半冲突会死灰复燃。在冲突中，要么因为直接军事行动，要么因为缺少维护，大部分基础设施，包括公路、铁路、学校、医院和电厂在内都会被摧毁。在冲突中死亡的人数通常要远远超过直接的军事伤亡人数，其中包括了因饥饿或无法发放医疗服务而早逝的人数。此外，战争会摧毁社会资本，而社会资本比实物资本更难恢复。战争还会使放在生产性经济活动上的努力转移到寻租行为、暴力和非法行为（包括非法贩毒）等用来资助某些冲突的行为中去。在冲突中，正常的经济行为崩溃了，这种情况往往糟糕到甚至无法保证为下一年的收获播种足够的种子。受过教育的人士将离开家园，许多儿童将无法上学。的确，冲突的后果进一步加深了冲突国家的贫困，冲突是助长现有招工制度的温床，为了服务于那些从冲突中牟利的所谓冲突企业家，甚至招募童工。

某个国家爆发的战争必然会影响到其他国家，导致经济增长比率集中下降

此外，在某个国家爆发的战争必然会影响到其他国家，难民流离失所、国内生产和出口所必需的基础设施遭到破坏（例如在安哥拉冲突期间，中非共和国用于采矿产业的本格拉铁路被迫关闭）以及国内外投资者因判断整体局势不利于签订合同而放弃投资都会对其他国家带来影响。这些区域性作用会导致增长率集中下降。包括欧洲在内的所有区域都经历过冲突，但是最近冲突最明显的区域是非洲，非洲的经济增长率直到最近还在下降，外国投资者也缺乏对非洲投资的兴趣，这方面的明证是，在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中，非洲仅占极小的比例，非洲的存款约有40%保存在非洲以外地区，相比而言，西亚的存款仅有6%而南亚仅有3%保存在其他地区（非洲委员会，2005年，第26页）。由于以上原因，很难评估内战对经济造成的全面影响，但是无论

如何高估都不为过（Murshed，2002年，第388页）。

衡量冲突后果的方法之一就是计算国内流离失所者的人数，这也是衡量国内侵犯人权行为的方法。2005年12月，据估计全球流离失所者的人数达到2370万（挪威难民理事会，2006年）。2005年，非洲、美洲、亚洲、欧洲和中东地区约有50个国家受到冲突造成的国内流离失所现象的影响。流离失所现象导致了巨大的人类痛苦，造成无法计算的纯经济损失（因为如果流离失所者拥有稳定、安全和固定的生活，那么他们可以被雇佣，并获得报酬，但事实上这一点无法实现）。

以17个陷入冲突的国家为例，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具备制造业或扩散型商品基础的国家会逐渐取得稳定的经济增长，但是那些只具备定向型资源，如钻石冲击层或木材的国家的生产会逐渐下降（Murshed，2006年，表4）。生产下降会导致贫穷现象上升，加深社会内部的不平等，滋生不满情绪并扩大横向不平等。社会内部的横向不平等一直被认为是引发冲突的温床。增长失败、冲突和资源之间存在着联系，而施政和机构安排有助于将天赋的自然资源转变为长期增长源泉，从而可以切断这种联系。

增长失败、冲突和资源之间存在着诸多联系，而施政和机构安排有助于将天赋的自然资源转变为长期增长源泉，从而可以切断这种联系

稳定地建立冲突管理机构巩固了所谓的社会合同，并将有助于减少发生冲突的风险，有助于为更多的持续增长铺平道路。如果一国拥有广泛议定的规则框架（正式和非正式），能够支配包括资源租金在内的资源的分配并和平解决不满情绪，那么暴力冲突就不可能控制这个国家。这种可行的社会契约即使不能根除，也足以抑制投机行为，如大规模盗窃资源租金和暴力压制不满情绪。

在冲突后情况中运用的各项原则与和平解决冲突后运用的原则类似。必须建立这类机制并采取施政举措，使人民相信能够公平地分享增长和财富创造活动带来的利益，从而保证长期投资切实可行。对所有冲突后的情况而言，减贫是重要任务之一；在许多穷国，复兴农业是完成这一任务的最有效手段。应当制定补贴生产部门的选择性政策，以鼓励长期投资并借此再次激发增长进程（Murshed，2001年）。

经济增长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帮助降低冲突风险。通过减贫和提供就业机会，冲突企业家随意进行招募的情况会减少。通过在各种经济行为主体之间建立更密切的相互交往，经济增长创造了一种局面，这种局面有助于改善机构职能，有助于为和平解决冲突创造更好的机会，甚至可能会导致高品质的

经济增长有助于降低冲突风险

内部民主出现。在那些从冲突中产生、并向着持续增长和建立健康的民主体制前进的非洲国家中，经济增长带来的利益体现得尤为明显。

但是，只有经济增长还不够：应当实施积极的政策提高社会凝聚力

但是，只有经济增长还不够，应当实施积极的政策增进所有群体之间的社会凝聚力，特别要减少不平等，尤其是横向不平等。为了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应当指引投资进入人力资本和基础建设领域。对于那些大量政府收入来源于自然资源租金的国家，应当公开财政和预算体制，并使其透明化，以此确保统治阶层不会转移政府收入，从中大发横财。总之，只有通过改善体制和施政才能防止自然资源诅咒，并将自然资源转变为实现增长、减少贫困和防止冲突的工具。

结 论

善政和健全的体制为经济增长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善政和健全的体制能够为经济增长所必需的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两方面的长期投资决策提供良好的环境。随着时间的推移，发达国家已经发展出有助于实现经济增长的复杂的施政与体制结构，以此建立了具有凝聚力的强大社会。正如本章所述，这种体制必须植根于共同的公正概念：所有公民都必须相信能够受到平等待遇，必须相信法律法规会发生变化、能够消除被视为不公正的现象，必须相信国家正在向正确的方向发展。这种信心将会鼓励经济活动，尤其是投资活动。

现有施政结构的小规模变化有时也能使人们感觉正在向正确的方向转变。只要这种感觉存在，就能产生影响深远的结果，从而促使进一步向着同一方向发生转变，上文所述中国的情况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在培养了正在向正确方向前进的感觉之后，各国还可以在施政结构方面启动多项变革措施。

在最初并不完善的体制中进行小规模的施政改革可以带来持续增长

因此，那种认为某个国家将永远受困于低经济增长，永远受到阻止其经济增长的体制的桎梏的悲观主义言论是没有道理的。确实有可能在最初体制并不完善时就实现持续增长；重要的是政府自身必须信守承诺，实施各种变革，消除限制经济增长的体制障碍（Johnson、Ostry 和 Subramanian，2006年）。

许多资料在描述穷国，尤其是非洲穷国增长失败的根源时都强调了体制因素，这不仅解释了导致经济下滑的原因，而且提供了实现持续经济增长的指导方针。可以通过谨慎的体制改革来实现持续经济增长，以此来创造一个公正的社会——一个人民感到能够公平地分享增长带来的利益、鼓励合法的经济活动、消除了寻租行为的社会。这是一项复杂艰巨的工作：尽管制定了

一些普遍原则，但是还没有一套体制能被轻易地采纳以确保出现这种社会。社会各部门都必须参与到建设富有活力的新体制的努力中去。目前人们普遍认为，这项工作太复杂、范围太广泛，无法由一个主管当局独自进行。

如何使共享体制到位是许多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挑战，共享体制能够使社会各阶层都感觉到国家财富以及公民经营的产业都用到了实处，而且这种财富收益得到了适当分配。

对那些体制不健全但又发现了重要的燃料和矿产资源的穷国而言，这种挑战具有双重重要性。资源开发在短期内带来的巨大财富会加剧冲突，而且这种财富的分配——尤其是中央政府和资源所在地的地方政府之间的财富分配可能会造成争议。如果在开发资源时没有一个健全的体制来解决这些问题，就会爆发分离主义暴力行为，如果人们感到没有公正地分配财富，社会内部现有的分歧就会扩大。一项重要的研究发现，如果各国具有健全的体制，就能够避免自然资源诅咒出现。

对国际社会而言，这一发现尤其适合那些正从冲突中脱身或者已经陷于崩溃的国家的情况。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国家考虑的重点在于鼓励经济活动的复苏，这通常意味着农业部门的复苏。如本章所阐明的，由于可靠的农业部门会促进对该部门的进一步投资，还能提高农民收入，增加农民对经济体其他部门的需求，因此坚实的农业通常对随后的经济发展很重要。繁荣的农业部门可以表明经济增长确实实现了共享，从而有助于创建一个稳定公正的社会。经济增长带来了调整体制、改善施政的良机，从而创造了一个良性循环。

国际社会也将改善施政作为其实现千年发展目标努力的重心。施政问题在双边和多边贷款计划中越来越重要，人们越来越关注如何对发展进行监督的问题。改善施政的努力被视为发展合作伙伴之间长期合作的必要条件。例如，如果某个国家决心建设一个“足够好”的管理预算体系，那么它就可以做到，但是这要花费5到10年的时间（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06年，第21页）。

各国都承认在建设更广泛的相互问责制时代价高昂，它们也确信相互问责进程有益于改善施政，能够帮助相应地提高官方发展援助（ODA）的灵活性，从而实现千年发展目标。在这一提高过程中，应当努力改善施政，方法是开展旨在补救特定不足的活动，而不是根据全球施政措施来提供附加条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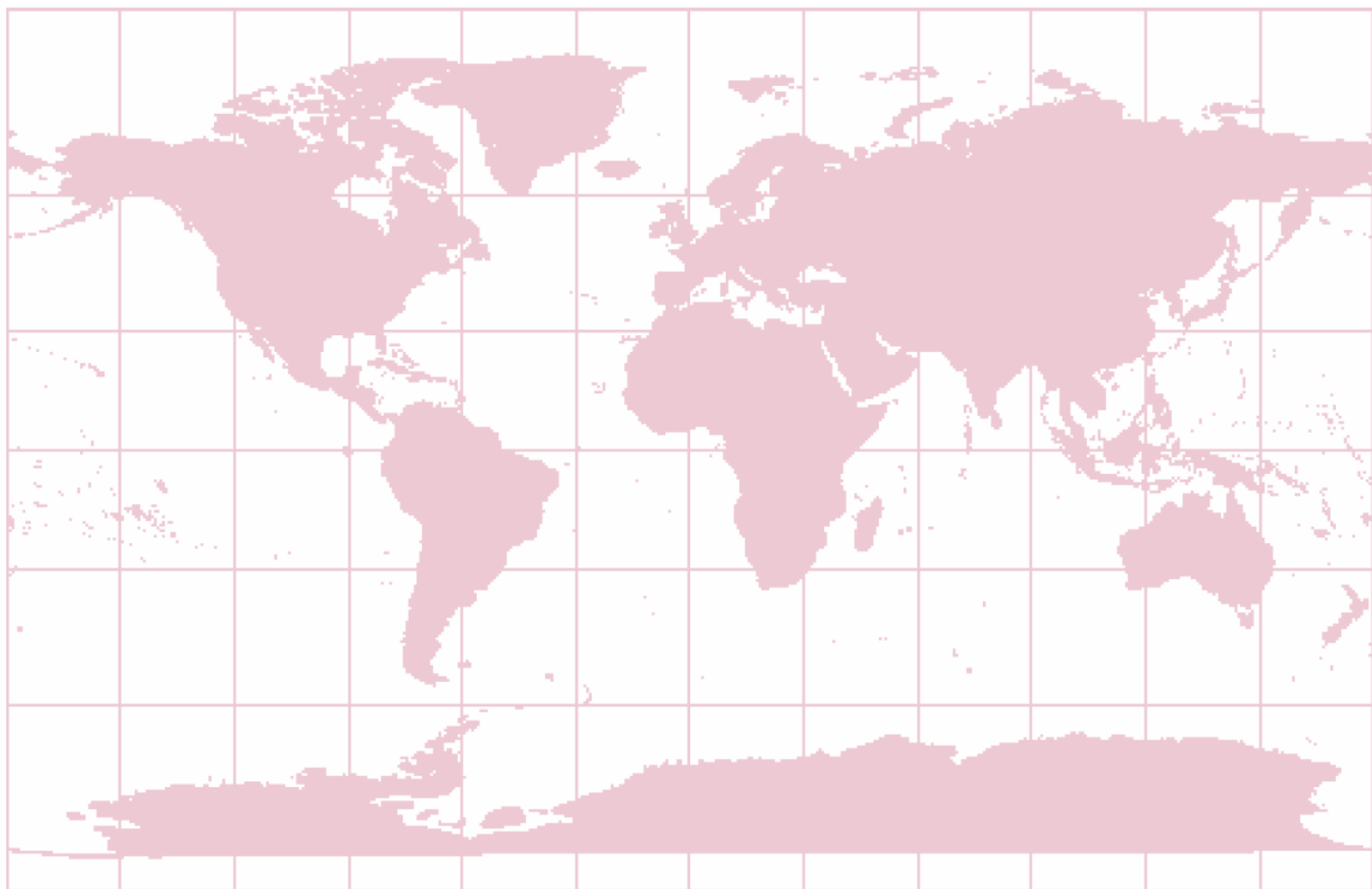
对大多数冲突后国家或已经陷于崩溃的国家考虑的重点是鼓励经济活动的复苏

施政问题在双边和多边贷款计划中越来越重要

国际支助应当集中于改善特定领域的施政弱点，而不是实现全面改革

的援助，因为正如上文所述，全球施政措施具有高度的主观性，而且存在许多严重的概念性问题。在这一领域的国际支助应当集中于改善特定领域的施政弱点，如公共预算和行政管理体制问题。还应当提供援助来支助或发展各种体制，以创建和支持公平市场、扩大经济增长、管理增长利益分配冲突尤其是自然资源方面的分配冲突，并在整体上提高社会凝聚力。应当避免在全球施政措施的基础上将范围广泛的限制强加给援助受援国。

附件 统计表



表格目录

A.1.	1960年、1980年和2000年按区域分解的国际收入不平等（Theil 系数）	175
A.2.	1960年、1980年和2000年按区域分解的发展中世界收入不平等（Theil 系数）	177
A.3.	1962-1965年和1995-2000年按产品类别列示的特定国家分组在发展中国家出口中所占的份额	178
A.4.	1962-1980年和1980-2000年世界市场出口快速增长的产品种类	180
A.5.	1962-1980年和1980-2000年特定经济体的贸易专业化	184
A.6.	1980-2003年按部门和分部门分列的发展中国家和世界服务出口情况	192
A.7.	2000-2004年特定经济体的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出口情况	194

附件表 A.1.

1960 年、1980 年和 2000 年按区域分解的国际收入不平等 (Theil 系数)

	所有经济体			所有经济体 (不包括中国)		
	在 1960 年总体收入不平等中所占份额			在 1960 年总体收入不平等中所占份额		
	区域间	区域内	共计	区域间	区域内	共计
发展中国家	0.61	0.04	0.65	0.52	0.04	0.57
东欧	0.04	0.00	0.04	0.01	0.00	0.01
拉丁美洲	0.01	0.01	0.02	-0.01	0.01	0.00
东亚 (15 个较大的经济体) ^a	-0.17	0.00	-0.16	-0.11	0.00	-0.11
东亚其他国家	-0.01	0.00	-0.01	-0.01	0.00	-0.01
西亚	0.00	0.00	0.00	-0.01	0.00	0.00
非洲	-0.03	0.01	-0.03	-0.04	0.01	-0.04
前苏联
不平等总值	0.45	0.07	0.51	0.35	0.07	0.42
	在 1980 年总体收入不平等中所占份额			在 1980 年总体收入不平等中所占份额		
发展中国家	0.67	0.01	0.69	0.60	0.01	0.61
东欧	0.04	0.00	0.04	0.02	0.00	0.02
拉丁美洲	0.01	0.01	0.02	0.00	0.01	0.00
东亚 (15 个较大的经济体) ^a	-0.18	0.02	-0.16	-0.13	0.02	-0.11
东亚其他国家	-0.01	0.00	-0.01	-0.01	0.00	-0.01
西亚	0.01	0.01	0.01	0.00	0.01	0.01
非洲	-0.04	0.01	-0.03	-0.05	0.01	-0.04
前苏联
不平等总值	0.51	0.05	0.56	0.42	0.05	0.48
	在 2000 年总体收入不平等中所占份额			在 2000 年总体收入不平等中所占份额		
发展中国家	0.69	0.01	0.70	0.72	0.01	0.73
东欧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拉丁美洲	0.00	0.01	0.00	-0.01	0.01	-0.01
东亚 (15 个较大的经济体) ^a	-0.17	0.05	-0.13	-0.14	0.05	-0.09
东亚其他国家	-0.01	0.00	-0.01	-0.01	0.00	-0.01
西亚	0.00	0.00	0.00	-0.01	0.01	0.00

	所有经济体			所有经济体（不包括中国）		
	在1960年总体收入不平等中所占份额			在1960年总体收入不平等中所占份额		
	区域间	区域内	共计	区域间	区域内	共计
非洲	-0.05	0.01	-0.04	-0.06	0.01	-0.05
前苏联	-0.01	0.00	-0.01	-0.02	0.00	-0.02
不平等总值	0.45	0.08	0.53	0.48	0.09	0.56

资料来源：联合国/经社部，基于 Maddison（2001年）。

注：为避免将最后一年排除在外，国内总产值和人口统计均使用五年期平均数，即对1960年而言，取1958—1962年的平均数，对1980年而言，取1978—1982年的平均数，对2000年而言，取1998—2001年的平均数（2001年是最后一个可供观察的年份）。

按 Maddison 的具体说明进行的国家分组（2001年）。

^a 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大韩民国、中国台湾省、泰国、孟加拉国、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马来西亚、缅甸、尼泊尔、巴基斯坦、新加坡和斯里兰卡。

方法说明：用1990年 Geary-Khamis 定值美元表示收入（国内总产值）。Theil 系数是基于“一般”信息理论来衡量收入不平等的方法。如果所有国家（或个人）的人均收入相同，则 Theil 系数为零。Theil 系数将一国或某人的收入份额与该国的人口份额相比较。如果一国（或个人）获得全部收入，则 Theil 系数为对数值 N，N 值即为该国或该人的编号。和其他衡量收入不平等的系数（如 Gini 系数）相比，Theil 系数的优点在于易于分解，能够显示不同的国家亚群或个人亚群在总体收入不平等方面所占比例，还附加于可归因于群体间差异和群体内部差异的组成要素。以上分解仅分析了国际收入不平等，即国家分组之间和国家分组内部的收入不平等，并没有分析一国内部的收入不平等的问题。

本表中的数字进一步证明，尽管发达国家的人口仅占世界人口的14%，但是世界收入的绝大部分来自发达国家（1998—2000年期间平均为52%）。因此，虽然发达区域的人口在世界人口中所占比例缩小，但是发达区域与世界其他区域的收入不平等是造成全球收入不平等的主要原因，对增长的全球收入不平等的影响一直在上升。区域间收入不平等大体上对国际收入不平等的影响不大。由于占有巨大的收入份额，因此从1980年起，发达国家和亚洲较大的发展中国家就是影响世界收入不平等的主要的区域内收入不平等因素。在发达国家区域内部，较低的区域内部收入趋异产生了趋同现象。相比而言，东亚和南亚一些较大的国家显示了某些趋异的趋势，尽管这些国家对国际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用 Theil 系数衡量）仍然较小。

附件表 A.2.

1960 年、1980 年和 2000 年按区域分解的发展中世界收入不平等 (Theil 系数)

	所有发展中经济体			所有发展中经济体 (不包括中国)		
	在 1960 年总体收入不平等中 所占份额			在 1960 年总体收入不平等中 所占份额		
	区域间	区域内	共计	区域间	区域内	共计
东欧	0.31	0.01	0.32	0.24	0.01	0.25
拉丁美洲	0.15	0.02	0.17	0.10	0.03	0.13
东亚 (15 个较大的经济体) ^a	-0.20	0.01	-0.19	-0.10	0.01	-0.09
东亚其他国家	-0.01	0.00	-0.01	-0.02	0.00	-0.02
西亚	0.03	0.01	0.04	0.01	0.01	0.02
非洲	-0.03	0.01	-0.01	-0.07	0.02	-0.06
前苏联
不平等总值	0.25	0.06	0.32	0.17	0.07	0.24
	在 1980 年总体收入不平等中 所占份额			在 1980 年总体收入不平等中 所占份额		
东欧	0.27	0.00	0.27	0.20	0.00	0.20
拉丁美洲	0.17	0.01	0.19	0.11	0.02	0.13
东亚 (15 个较大的经济体) ^a	-0.20	0.05	-0.15	-0.09	0.04	-0.05
东亚其他国家	-0.01	0.00	-0.01	-0.02	0.00	-0.02
西亚	0.07	0.01	0.08	0.05	0.01	0.06
非洲	-0.04	0.02	-0.02	-0.08	0.02	-0.06
前苏联
不平等总值	0.26	0.09	0.36	0.17	0.10	0.27
	在 2000 年总体收入不平等中 所占份额			在 2000 年总体收入不平等中 所占份额		
东欧	0.02	0.00	0.03	0.03	0.01	0.03
拉丁美洲	0.11	0.01	0.12	0.13	0.02	0.14
东亚 (15 个较大的经济体) ^a	-0.04	0.10	0.05	0.02	0.12	0.14
东亚其他国家	-0.01	0.00	-0.01	-0.02	0.00	-0.02
西亚	0.04	0.01	0.05	0.05	0.01	0.07
非洲	-0.05	0.02	-0.04	-0.10	0.03	-0.07
前苏联	0.02	0.00	0.02	0.01	0.01	0.02
不平等总值	0.08	0.15	0.23	0.12	0.19	0.31

资料来源：联合国/经社部，基于 Maddison (2001 年)。

注：为避免将最后一年排除在外，国内总产值和人口统计均使用五年期平均数，即对 1960 年而言，取 1958—1962 年的平均数，对 1980 年而言，取 1978—1982 年的平均数，对 2000 年而言，取 1998—2001 年的平均数 (2001 年是最后一个可供观察的年份)。

按 Maddison 的具体说明进行的国家分组 (2001 年)。

a 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大韩民国、中国台湾省、泰国、孟加拉国、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马来西亚、缅甸、尼泊尔、巴基斯坦、新加坡和斯里兰卡。

附件表 A.3.

1962-1965 年和 1995-2000 年按产品类别列示的特定国家分组在发展中国家出口中所占的份额

百分比									
	产品类别	1962-1965	1965-1970	1970-1975	1975-1980	1980-1985	1985-1990	1990-1995	1995-2000
撒南非洲	初级产品	9.6	9.7	9.6	10.1	7.7	6.2	5.1	5.2
	基于自然资源的产品	9.0	7.8	6.6	5.3	3.7	3.1	2.9	2.2
	低技术含量产品	0.5	0.8	0.8	0.8	0.5	0.6	0.5	0.4
	中等技术含量产品	1.5	1.3	1.1	0.8	0.6	0.4	0.2	0.1
	高技术含量产品	1.8	1.2	0.6	0.8	0.4	0.2	0.1	0.1
拉丁美洲	初级产品	37.6	37.5	35.9	38.9	39.8	36.4	35.6	36.4
	基于自然资源的产品	29.5	28.6	30.9	29.5	29.9	24.7	23.4	23.6
	低技术含量产品	6.4	8.2	10.4	10.7	10.0	8.6	8.5	10.2
	中等技术含量产品	9.6	9.9	15.6	18.3	19.6	18.6	18.6	20.8
	高技术含量产品	26.8	30.4	25.5	18.7	14.0	9.4	7.3	8.6
南亚	初级产品	8.5	6.3	5.8	5.3	5.2	5.4	4.9	5.5
	基于自然资源的产品	7.3	6.2	4.6	4.3	4.3	5.6	5.8	6.0
	低技术含量产品	29.1	20.8	12.3	8.2	6.5	6.2	6.2	6.1
	中等技术含量产品	4.5	6.1	4.4	3.1	1.6	1.4	1.6	1.6
	高技术含量产品	5.0	3.7	1.9	1.1	0.7	1.0	0.5	0.5
中国	初级产品	3.1	4.1	4.8	4.1	6.7	10.2	10.0	9.2
	基于自然资源的产品	1.9	2.5	2.5	2.5	4.4	6.4	8.2	10.2
	低技术含量产品	9.1	9.3	8.4	7.7	12.4	19.6	32.3	37.7
	中等技术含量产品	5.0	5.0	4.6	3.2	5.4	8.6	13.2	16.3
	高技术含量产品	2.8	3.1	2.2	1.5	2.2	4.9	10.0	15.1
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和东南亚	初级产品	16.8	15.1	16.0	20.7	21.3	22.1	23.4	20.4
	基于自然资源的产品	21.5	23.1	27.3	32.5	32.8	34.2	36.6	32.2
	低技术含量产品	31.4	36.7	44.4	54.6	58.0	54.7	41.5	32.4
	中等技术含量产品	15.3	17.5	25.9	40.3	42.5	46.1	50.8	42.6
	高技术含量产品	24.2	35.6	52.2	59.8	66.1	72.3	76.7	69.4
中东和北非	初级产品	7.6	8.6	9.4	7.0	6.5	6.4	6.1	5.9
	基于自然资源的产品	9.0	6.9	6.6	7.1	7.6	9.5	8.3	8.9
	低技术含量产品	7.0	7.9	8.2	6.8	4.8	3.9	3.8	3.8
	中等技术含量产品	6.9	8.4	10.9	9.5	6.9	6.1	4.7	4.3
	高技术含量产品	6.9	5.6	4.8	5.0	4.6	3.3	2.6	2.4

附件表 A.3. (续)									
	产品类别	1962-1965	1965-1970	1970-1975	1975-1980	1980-1985	1985-1990	1990-1995	1995-2000
中欧和东欧	初级产品	3.0	4.2	4.9	4.1	4.1	4.6	4.8	4.7
	基于自然资源的产品	8.4	8.2	7.6	6.8	6.6	6.3	6.8	7.9
	低技术含量产品	12.1	12.5	12.7	9.5	6.7	5.1	5.5	6.9
	中等技术含量产品	26.1	28.9	23.2	16.1	15.4	11.4	6.5	9.6
	高技术含量产品	18.1	12.9	7.0	4.4	5.4	4.6	1.6	2.8
独联体	初级产品	2.6	3.7	4.2	3.2	3.3	4.2	6.6	9.8
	基于自然资源的产品	6.6	8.5	7.2	7.0	6.7	6.9	5.4	7.2
	低技术含量产品	3.1	2.6	1.8	0.8	0.5	0.5	0.8	1.7
	中等技术含量产品	27.1	20.4	11.9	6.6	5.5	5.7	4.1	4.3
	高技术含量产品	12.6	5.8	4.5	6.7	3.6	2.7	0.8	0.9
上栏中未包括的最不发达国家	初级产品	11.0	10.7	9.1	6.2	4.8	4.1	3.3	2.6
	基于自然资源的产品	6.7	8.0	6.4	4.5	3.7	3.2	2.4	1.8
	低技术含量产品	1.0	0.8	0.6	0.7	0.6	0.4	0.3	0.5
	中等技术含量产品	3.3	1.5	1.5	0.9	0.8	0.7	0.2	0.2
	高技术含量产品	1.0	0.5	0.5	1.3	1.2	0.5	0.1	0.1
备忘项目： 所有产品									
撒南非洲		8.1	7.4	6.1	5.3	3.2	2.1	1.3	1.0
拉丁美洲		30.9	29.4	27.9	26.9	24.3	19.1	16.5	16.8
南非		10.2	8.2	6.4	5.2	4.3	4.3	3.9	3.5
中国		3.4	4.4	4.7	4.3	7.2	11.5	17.4	20.2
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和东南亚		19.7	20.8	26.4	35.6	40.8	45.3	46.9	43.1
中东和北非		7.9	8.0	8.4	7.2	6.2	5.7	4.8	4.4
中欧和东欧		6.5	7.9	8.7	7.4	7.4	6.5	5.1	6.3
独联体		4.8	5.8	5.3	4.2	3.7	3.7	3.0	3.7
上栏中未包括最不发达的国家		8.4	8.0	5.8	3.7	2.5	1.7	1.0	0.7

资料来源：联合国/经社部，基于 Feenstra 等人（2005 年）。

缩略语：NRB 系指基于自然资源；LT 系指低技术含量；MT 系指中等技术含量；HT 系指高技术含量。

附件表 A.4.

1962-1980 年和 1980-2000 年世界市场上出口快速增长的产品种类

A. 1962-1980		
国贸分类 ^a	产品	年度平均增长率 (百分比)
初级产品		
681	银、铂等	29.1
36	贝类, 新鲜、冷冻	18.7
271	化肥, 天然	18.3
684	铝	17.6
274	硫磺、未经焙烧的黄铁矿	17.3
685	铅	17.2
44	玉米, 未碾磨	16.7
34	鱼, 新鲜、冷藏、冷冻	16.3
245	燃料用木材, n.e.s., 木炭	16.0
11	肉, 新鲜、冷藏、冷冻	15.6
	平均值(以上各项)	18.3
基于自然资源的产品		
689	有色碱金属, n.e.s.	41.2
688	铀、钍、合金	40.2
289	贵金属、矿石、废渣, n.e.s.	30.4
511	碳氢化合物, n.e.s., 衍生物	28.2
111	不含酒精饮料, n.e.s.	23.1
667	珍珠、珍贵宝石、半珍贵宝石	22.6
515	有机-无机化合物, 等	22.3
514	氮类化合物	21.9
288	有色金属及废料, n.e.s.	21.7
61	糖和蜂蜜	20.8
	平均值(以上各项)	27.2
低技术含量产品		
893	各类塑料, n.e.s.	48.1
843	非编织类妇女外套	31.1
844	非编织类内衣	24.7
821	家具、家具组件	23.0
898	乐器和乐器组件	21.0
691	机构和组件, n.e.s.	20.9
848	头饰、无纺布	20.8
842	非编织类男性外套	20.6
831	旅游用品, 手提袋	20.5
851	鞋类	19.6
	平均值(以上各项)	25.0

附件表 A.4 (续)		
国贸分类 ^a	产品	年度平均增长率 (百分比)
中等技术含量产品		
714	引擎和发动机, n.e.s.	40.2
742	液体泵	36.5
583	聚合产品等	22.8
786	拖车、无发动机车辆, n.e.s.	22.5
512	酒精、酚等	21.7
513	羧酸等	21.4
884	光学产品、n.e.s.	21.0
582	浓缩产品	20.7
872	医疗器械、n.e.s.	20.6
266	人造纺织纤维	20.6
	平均值(以上各项)	24.8
高技术含量产品		
716	旋转式发电机	924.4
524	放射性物质和材料等	44.0
771	电力机械, n.e.s.	33.4
759	办公设备、ADP 机械部件、辅助设备	30.1
752	ADP 设备	28.5
761	电视接收机	23.8
776	晶体管、电子管等	23.4
718	其他发电机械	23.3
774	电子医疗设备、X 射线设备、n.e.s.	20.7
881	摄影装置和设备、n.e.s.	20.5
	平均值(以上各项, 包括 SITC716 在内)	27.5
备忘项目:		
世界商品贸易年度平均增长率		
1962-1980		15.7
1980-2000		5.8

附件表 A.4 (续)		B. 1980-2000 年
国贸分类 ^a	产品	年度平均增长率 (百分比)
246	纸浆用木材、木屑、废木渣	10.3
683	镍	9.0
686	锌	8.4
34	鱼, 新鲜、冷藏、冷冻	8.1
36	贝类, 新鲜、冷冻	7.9
684	铝	7.7
245	燃料用木, n.e.s., 木炭	7.2
273	石头、砂和砾石	6.5
681	银、铂等	6.2
244	软木, 自然状态、原料和废料	5.7
	平均值 (以上各项)	7.7
688	铀、钍、合金	66.7
286	铀、钍矿石、浓缩	32.1
689	有色碱金属, n.e.s.	26.9
111	不含酒精饮料, n.e.s.	10.5
514	氮类化合物	10.4
98	可食用产品、配制品 n.e.s.	9.5
515	有机-无机化合物等	9.1
592	淀粉、胰岛素、麦麸等	9.1
664	玻璃	8.8
628	橡胶制品, n.e.s.	8.7
	平均值 (以上各项)	11.6
893	各类塑料, n.e.s.	38.6
845	编织类外套, 无弹性	36.0
843	非编织类妇女外套	23.1
846	编织类内衣	22.0
844	非编制类内衣	21.4
898	乐器及零配件	11.0
894	玩具、运动用品等	10.5
831	旅游用品、手提包	10.4
655	编织类, 等。纺织品	9.8
821	家具、家具组件	9.7
	平均值 (以上各项)	19.3

附件表 A.4 (续)		
国贸分类 ^a	产品	年度平均增长率 (百分比)
742	液体泵	32.7
714	引擎和发动机, n.e.s.	17.1
728	其他特殊产业使用的机械	12.7
553	香水、化妆品等	12.2
872	医疗器械, n.e.s.	11.2
772	开关设备等, 零配件, n.e.s.	10.5
773	电力输送设备	10.3
812	管道设备、供暖设备、照明设备	9.4
783	公路用机动车辆, n.e.s.	9.4
533	颜料、涂料等	9.0
	平均值(以上各项)	13.4
771	电力机械, n.e.s.	37.3
716	旋转式发电机	35.7
759	办公设备、ADP 机械部件、辅助设备	35.7
776	晶体管、电子管等	17.0
871	光学设备	16.2
752	ADP 设备	15.4
764	通讯设备、组件、附件, n.e.s.	14.0
874	测量、控制工具	13.5
541	药学、制药产品	10.8
778	电力机械, n.e.s.	9.6
	平均值(以上各项)	20.5
备忘项目:		
世界商品贸易年平均增长比率		
1962-1980		15.7
1980-2000		5.8

资料来源: 联合国/经社部, 基于 Feenstra 等人 (2005 年)。

注: 当前值。

缩略语: n.e.s. 系指未在别处指明或包括; ADP 系指自动数据处理。

^a 标准国际贸易分类。

附件表 A.5.

1962-1980 年和 1980-2000 年特定经济体的贸易专业化

A. 1962-1980 年						
	初级产品	基于自然资源的产品	低技术含量产品	中等技术含量产品	高技术含量产品	1962-1980 年人均国内总产值平均年增长率 (百分比)
高技术含量产品输出国						2.8
新加坡	-0.5161	-0.0790	0.0521	0.9227	2.7744	7.4
以色列	-0.0897	-0.0802	0.0648	0.0461	0.0951	4.2
墨西哥	-0.9119	-0.0670	0.1255	0.3871	1.4068	3.8
俄罗斯联邦	-0.0816	0.0095	-0.0149	-0.1345	0.3472	2.5
菲律宾	-0.0338	-0.6468	0.0912	0.0157	0.1153	2.4
加蓬	0.0005	-0.0599	0.0000	0.0001	0.0120	2.0
萨尔瓦多	-0.0584	0.0025	-0.0038	0.0013	0.0335	1.1
尼日尔	-0.0272	0.0507	0.0000	0.0000	0.4989	-0.9
中等技术含量产品输出国						3.1
阿曼	-0.0106	0.0000	0.0003	0.0536	0.0345	7.6
沙特阿拉伯	-0.0306	0.0036	0.0078	0.4342	-0.0374	6.3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0.0045	-0.0007	-0.0001	0.0531	0.0001	6.2
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a	0.0012	-0.0250	-1.4322	0.6432	0.1929	6.0
阿尔及利亚	-0.0016	-0.0393	0.0012	0.0147	0.0005	4.5
伊拉克	-0.0209	-0.0004	0.0005	0.0201	0.0002	4.2
巴西	-2.1565	0.5868	0.2397	0.8342	0.0648	4.1
罗马尼亚	-0.1334	-0.2075	0.4226	0.4255	0.0026	4.1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0.0024	-0.0278	0.0066	0.0111	0.0005	3.6
巴拿马	-0.0650	0.0284	0.0116	0.1068	-0.0764	3.6
保加利亚	-0.0795	-0.0058	0.0293	0.1274	0.0055	3.4
哥斯达黎加	-0.0473	-0.0011	0.0054	0.0062	0.0022	3.2
波兰	-0.0097	-0.3303	0.1318	0.4869	0.0290	3.1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0.1394	0.0025	0.0186	0.1664	0.0016	3.0
约旦	-0.0483	0.0047	0.0048	0.0138	0.0038	3.0
多米尼加共和国	-0.0164	-0.1481	0.0095	0.0751	0.0004	3.0
刚果	-0.0025	-0.0118	0.0000	0.0069	0.0001	2.4

附件表 A.5. (续)						
	初级产品	基于自然资源的产品	低技术含量产品	中等技术含量产品	高技术含量产品	1962-1980 年人均国内总产值平均年增长率(百分比)
阿根廷	-0.9621	0.0350	0.1083	0.1632	0.0151	2.1
黎巴嫩	-0.0700	0.0151	0.0457	0.1140	-0.0041	1.9
南非	-0.2897	-0.0625	0.0465	0.0750	0.0196	1.8
津巴布韦	-0.0108	-0.0017	-0.0003	0.0380	0.0000	1.8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	0.0250	-0.1509	0.0011	0.0159	0.0018	0.6
利比里亚	-0.0034	-0.0679	0.0000	0.0451	0.0000	-0.3
科威特	-0.0223	-0.0036	0.0521	0.2684	-0.0037	-3.8
低技术含量产品输出国						3.2
大韩民国	-0.1883	-0.2637	1.0627	0.8899	0.5204	7.5
中国台湾省	-0.1824	-0.7865	2.7668	0.8594	1.0397	7.4
泰国	-0.5591	0.0135	0.0796	0.0226	0.0347	4.5
突尼斯	-0.0535	-0.0489	0.1661	0.0146	0.0001	4.3
中国	-0.5081	-0.0081	0.9342	0.0000	0.0170	3.7
埃及	-0.1598	0.0062	0.0814	0.0043	0.0005	3.7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0.0756	-0.0024	0.1344	0.0073	0.0008	3.2
土耳其	-0.4577	0.0089	0.1580	0.0084	0.0001	3.2
摩洛哥	-0.0706	-0.0500	0.0372	0.0054	0.0003	2.9
巴基斯坦	0.1078	-0.0569	0.3190	0.0050	0.0000	2.9
哥伦比亚	-0.2820	0.0125	0.0319	0.0051	0.0003	2.8
匈牙利	-0.0582	0.0040	0.0629	0.0144	0.0205	2.6
捷克共和国	-0.0072	-0.0215	0.1352	-0.0381	-0.0031	2.3
乌拉圭	-0.1063	0.0016	0.0934	0.0068	0.0000	1.7
毛里求斯	0.0001	-0.1101	0.0190	0.0003	0.0027	1.7
海地	-0.0181	-0.0203	0.0776	0.0019	0.0216	1.1
阿富汗	-0.0266	-0.0004	0.0167	0.0002	0.0001	-0.2
基于自然资源的产品输出国						1.7
马来西亚	-1.1617	0.8100	0.0198	0.0195	0.6442	4.6
印度尼西亚	-0.6577	0.9411	-0.0028	0.0010	0.0053	3.3
厄瓜多尔	-0.0974	0.0163	0.0005	0.0006	0.0000	3.2

附件表 A.5. (续)						
	初级产品	基于自然资源的产品	低技术含量产品	中等技术含量产品	高技术含量产品	1962-1980年人均国内总产值平均年增长率(百分比)
危地马拉	-0.0736	0.0105	0.0015	0.0037	0.0084	2.6
阿尔巴尼亚	-0.0096	0.0090	0.0043	0.0008	0.0001	2.5
喀麦隆	-0.0756	0.0249	0.0004	0.0000	0.0000	2.0
斯里兰卡	-0.0925	0.0086	0.0069	0.0002	0.0000	2.0
洪都拉斯	-0.0457	0.0140	0.0006	0.0007	0.0000	1.7
缅甸	-0.0603	0.0641	0.0001	0.0001	0.0000	1.7
古巴	-0.0052	0.1295	0.0000	-0.0002	0.0000	1.4
几内亚	-0.0027	0.0860	0.0000	0.0000	0.0000	1.3
智利	-0.2673	0.1695	0.0005	0.0024	0.0000	1.3
秘鲁	-0.1385	0.0352	0.0084	0.0029	0.0001	1.3
印度	-0.2309	0.2093	-0.2026	0.1113	0.0077	1.2
牙买加	-0.0052	0.0747	-0.0007	0.0009	0.0002	0.8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0.0374	0.0119	0.0086	0.0008	0.0044	0.7
塞内加尔	-0.0184	0.0125	-0.0003	0.0016	0.0002	-0.7
越南	-0.0165	0.0056	0.0013	-0.0001	0.0000	-0.9
初级产品输出国						1.5
巴拉圭	0.1304	-0.0755	0.0004	0.0000	0.0000	3.9
科特迪瓦	0.0774	-0.0814	0.0009	0.0013	0.0001	2.6
尼日利亚	0.0542	-0.0166	0.0020	0.0008	0.0008	2.6
布隆迪	0.0102	-0.0009	0.0000	0.0000	0.0000	2.6
玻利瓦尔	0.0439	-0.1431	0.0002	0.0001	0.0000	2.5
巴林	0.0162	-0.0038	0.0033	0.0021	-0.0022	2.3
卢旺达	0.0588	-0.0147	0.0000	0.0000	0.0000	1.8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0.1175	-0.0475	0.0028	0.0000	0.0000	1.3
塞拉利昂	0.0086	-0.0280	0.0000	0.0000	0.0000	1.3
马达加斯加	0.0267	-0.0113	0.0011	0.0000	0.0000	-0.4
加纳	0.0969	-0.0284	0.0000	0.0000	0.0000	-1.1
安哥拉	0.0313	-0.0251	0.0000	0.0001	0.0001	-1.8

附件表 A.5. (续)						
	初级产品	基于自然资源的产品	低技术含量产品	中等技术含量产品	高技术含量产品	1962-1980 年人均国内总产值平均年增长率(百分比)
不明显的多样化倾向						1.0
也门	-0.0049	-0.0003	0.0002	0.0010	0.0016	4.9
塞舌尔	0.0013	-0.0028	0.0000	0.0000	0.0000	3.5
蒙古	-0.0030	0.0002	0.0002	0.0001	0.0000	3.0
赤道几内亚	0.0044	-0.0007	0.0000	0.0000	0.0000	2.9
马拉维	-0.0310	0.0045	0.0003	0.0001	0.0000	2.8
肯尼亚	-0.0291	-0.0050	0.0045	0.0008	0.0004	2.1
毛里塔尼亚	0.0010	-0.0176	0.0000	0.0000	0.0000	2.1
多哥	-0.002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2.0
马里	0.0037	-0.0006	0.0000	0.0000	0.0000	1.9
埃塞俄比亚	-0.0130	0.0007	0.0001	0.0000	0.0000	1.9
几内亚比绍共和国	-0.001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1.6
冈比亚	-0.0008	0.0007	0.0000	0.0000	0.0000	1.6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0.0008	0.0019	0.0004	0.0000	0.0000	1.3
贝宁	0.0019	-0.0022	0.0001	0.0001	0.0000	1.1
柬埔寨	-0.0026	0.0006	0.0001	0.0002	0.0000	1.0
尼泊尔	0.0020	-0.0014	0.0004	-0.0001	0.0000	0.2
布基纳法索	-0.0008	0.0000	0.0001	0.0000	0.0000	0.1
赞比亚	-0.0283	0.0021	0.0000	0.0000	0.0000	0.0
尼加拉瓜	-0.0255	-0.0020	0.0012	0.0045	0.0003	-0.2
吉布提	-0.0041	0.0006	0.0004	0.0010	0.0000	-0.3
苏丹	-0.0298	0.0020	0.0000	0.0000	0.0001	-0.6
莫桑比克	-0.0104	-0.0084	0.0024	0.0015	0.0000	-0.8
中非共和国	-0.0013	0.0026	0.0000	0.0000	0.0000	-0.9
乌干达	-0.0052	0.0000	0.0000	0.0000	0.0013	-1.0
索马里	-0.0058	0.0003	0.0000	0.0001	0.0000	-1.4
乍得	-0.0040	0.0000	0.0002	0.0000	0.0000	-3.0

附件表 A.5. (续)		B. 1980-2000 年					1980-2000 年人均国内总产值平均年增长率 (百分比)
	初级产品	基于自然资源的产品	低技术含量产品	中等技术含量产品	高技术含量产品		
高技术含量产品输出国						3.8	
大韩民国	-0.0352	-0.0007	-1.5603	1.0785	1.9362	6.4	
中国	-1.4143	-0.3516	-0.2903	1.2522	1.6077	6.0	
中国台湾省	-0.0458	-0.0876	-1.5764	0.5384	2.5494	5.3	
泰国	-1.3038	-0.2161	-0.0212	0.2251	1.1304	4.6	
新加坡	-0.0563	-0.1249	-0.0679	-0.3213	3.0904	4.6	
马来西亚	-0.3625	-1.3909	0.0596	0.3097	3.2395	3.9	
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a	-0.0010	0.0213	-0.6424	-0.1129	0.5967	3.6	
以色列	-0.0502	-0.1001	-0.0236	-0.0009	0.2050	1.9	
哥斯达黎加	-0.2958	0.0017	0.0147	0.0015	0.0330	1.2	
菲律宾	-0.1276	-0.3013	-0.0638	0.0116	1.8225	0.0	
中等技术含量产品输出国						0.0	
墨西哥	-0.4989	-0.1397	0.1371	1.0430	0.3755	0.7	
巴拿马	-0.0106	-0.0052	0.0015	0.0128	0.0006	0.6	
匈牙利	-0.1341	-0.0725	-0.0253	0.1874	0.1185	0.6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0.0001	-0.0309	0.0011	0.0103	0.0000	0.5	
阿根廷	-0.6848	0.0657	0.0015	0.0977	0.0005	0.2	
南非	-0.3654	-0.1239	0.0228	0.1415	-0.0012	-0.3	
约旦	-0.0277	-0.0005	0.0003	0.0106	0.0010	-0.5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	-0.1041	0.0102	-0.0029	0.0532	0.0004	-0.9	
科威特	-0.0007	-0.0039	-0.0013	0.0159	0.0003	-1.3	
利比里亚	-0.0015	-0.0068	0.0000	0.0133	0.0000	-1.5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0.0686	-0.0021	0.0103	0.0174	0.0054	-2.5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0.0004	-0.0062	0.0004	0.0103	-0.0002	-5.5	
低技术含量产品输出国							
毛里求斯	0.0001	-0.0353	0.0373	-0.0002	0.0000	4.6	
越南	-0.4771	-0.0195	0.2942	0.0113	0.0006	4.4	
印度	-0.2572	-0.0288	0.1113	0.0397	0.0039	3.6	
斯里兰卡	-0.1107	-0.0076	0.1716	0.0003	0.0008	3.5	

附件表 A.5. (续)						
	初级产品	基于自然资源的产品	低技术含量产品	中等技术含量产品	高技术含量产品	1962-1980 年人均国内总产值平均年增长率 (百分比)
印度尼西亚	-1.0284	-0.5122	0.5319	0.1515	0.0910	2.7
巴基斯坦	-0.1221	-0.0008	0.2596	0.0053	0.0000	2.5
缅甸	-0.0063	-0.0431	0.0125	0.0000	0.0000	2.5
土耳其	-0.4061	0.0178	0.2589	0.0644	0.0075	2.5
尼泊尔	-0.0009	-0.0002	0.0051	0.0001	0.0000	2.3
多米尼加共和国	-0.0317	-0.0260	0.1621	0.0034	0.0005	2.2
突尼斯	-0.0123	-0.0228	0.1104	-0.0115	0.0011	2.2
埃及	-0.1319	0.0036	0.0590	0.0063	0.0008	1.7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0.0005	-0.0168	0.0097	0.0000	0.0000	1.5
波兰	-0.2157	0.0199	0.2472	0.0269	-0.0142	1.2
柬埔寨	-0.0194	-0.0048	0.0666	0.0000	0.0000	1.1
哥伦比亚	-0.5507	0.0271	0.0295	0.0284	0.0010	0.9
墨西哥	-0.2085	-0.0298	0.1037	0.0022	0.0080	0.8
厄瓜多尔	-0.1214	0.0001	0.1183	0.0000	-0.0009	0.7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0.0232	-0.0005	0.0052	-0.0001	0.0000	0.7
牙买加	0.0001	-0.0957	0.0175	0.0014	0.0000	0.6
阿尔巴尼亚	-0.0023	-0.0040	0.0157	-0.0003	0.0000	0.6
捷克共和国	0.0037	0.0878	0.2209	-0.4605	-0.0083	0.4
洪都拉斯	-0.2374	-0.0066	0.1850	0.0000	0.0000	0.1
危地马拉	-0.2191	0.0003	0.0770	-0.0001	0.0000	-0.4
保加利亚	0.0130	0.0069	0.0415	-0.0318	-0.0051	-0.6
罗马尼亚	-0.0026	-0.0075	0.1240	-0.0612	0.0004	-1.6
尼加拉瓜	-0.0587	0.0007	0.0119	0.0000	0.0000	-1.6
俄罗斯联邦	-0.2930	-0.1573	0.1433	0.1237	-0.0257	-1.9
马达加斯加	-0.0483	0.0001	0.0119	0.0000	0.0000	-2.0
海地	-0.0007	0.0000	0.0094	-0.0002	-0.0001	-2.3
沙特阿拉伯	-0.0121	-0.0141	0.0085	0.0009	0.0014	-2.5
基于自然资源的产品输出国						
赤道几内亚	-0.0033	0.0097	0.0000	0.0000	0.0000	8.8

附件表 A.5. (续)						
	初级产品	基于自然资源的产品	低技术含量产品	中等技术含量产品	高技术含量产品	1962-1980年人均国内总产值平均年增长率(百分比)
智利	-0.5230	0.1379	0.0023	0.0072	0.0001	2.7
阿曼	-0.0092	0.0086	0.0049	-0.0061	-0.0020	2.7
塞舌尔	-0.0093	0.0105	0.0000	0.0000	0.0000	2.0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0.0333	0.0219	-0.0286	0.0083	0.0001	0.9
乌拉圭	-0.0346	0.0144	-0.0155	0.0068	0.0003	0.9
巴林	0.0157	0.0065	-0.0017	-0.0008	-0.0006	0.7
加纳	-0.1081	0.0482	0.0000	0.0000	0.0006	0.5
巴西	-0.5208	0.1645	-0.0046	0.1424	0.0146	0.3
蒙古	-0.0194	0.0287	-0.0001	0.0000	0.0000	0.1
黎巴嫩	-0.0116	0.0103	0.0026	0.0001	0.0000	-0.2
喀麦隆	-0.0812	0.0571	0.0000	0.0000	0.0000	-0.3
刚果	-0.0007	0.0189	0.0000	0.0000	0.0000	-0.4
古巴	-0.0108	0.0394	0.0000	0.0001	0.0002	-0.5
巴拉圭	-0.0508	0.0075	0.0007	0.0000	0.0000	-0.5
赞比亚	-0.0088	0.0192	0.0000	0.0000	0.0000	-0.7
中非共和国	-0.0050	0.0183	0.0000	0.0000	0.0000	-0.9
安哥拉	-0.0050	0.0429	0.0000	0.0000	0.0000	-1.0
厄瓜多尔	-0.1123	0.0071	0.0006	0.0006	0.0000	-1.4
赞比亚	-0.0712	0.0113	0.0002	0.0000	0.0000	-1.5
加蓬	-0.0004	0.0526	0.0000	0.0000	-0.0010	-2.7
初级产品输出国						-0.1
莫桑比克	0.0228	-0.0011	-0.0006	-0.0005	0.0000	0.8
贝宁	0.0126	-0.0004	0.0000	0.0000	0.0000	0.8
塞内加尔	0.0081	-0.0030	0.0000	0.0000	0.0000	0.5
毛里塔尼亚	0.0106	-0.0099	0.0000	0.0000	0.0000	0.1
津巴布韦	0.0183	-0.0001	0.0026	-0.0057	0.0000	-0.1
秘鲁	0.0569	-0.0422	0.0047	-0.0002	0.0000	-0.7
科特迪瓦	0.0473	-0.0098	-0.0001	0.0000	0.0000	-2.3
不明显的多样化趋势						0.0
乌干达	-0.0037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1.6

附件表 A.5. (续)						
	初级产品	基于自然资源的产品	低技术含量产品	中等技术含量产品	高技术含量产品	1962-1980 年人均国内总产值平均年增长率 (百分比)
布基纳法索	-0.0043	0.0001	0.0001	0.0000	0.0000	1.3
乍得	0.0009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1.1
马里	-0.0029	-0.0001	0.0000	0.0000	0.0002	0.7
也门	-0.0023	0.0003	0.0000	0.0001	0.0000	0.6
苏丹	-0.0126	0.0009	0.0001	0.0000	0.0000	0.3
马拉维	-0.0008	-0.0008	0.0005	0.0000	0.0000	0.3
几内亚	0.0013	-0.0113	0.0000	0.0000	0.0000	0.2
玻利瓦尔	-0.0084	-0.0120	0.0033	0.0000	0.0000	0.0
肯尼亚	-0.0156	0.0006	0.0003	0.0000	0.0000	0.0
埃塞俄比亚	-0.0123	0.0000	0.0002	0.0001	0.0001	-0.1
布隆迪	0.0016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4
几内亚比绍	-0.0032	0.0000	0.0001	0.0000	0.0000	-0.5
阿尔及利亚	0.0023	0.0034	0.0000	-0.0032	0.0000	-0.6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0.0076	0.0006	0.0001	0.0000	0.0000	-0.6
卢旺达	-0.0028	0.0002	0.0000	0.0000	0.0000	-0.7
索马里	-0.0019	0.0000	0.0000	0.0001	0.0000	-0.9
尼日利亚	-0.0481	0.0044	0.0041	0.0001	0.0000	-1.0
阿富汗	0.0015	0.0002	-0.0006	0.0000	0.0000	-1.4
吉布提	-0.0003	0.0001	0.0000	0.0001	0.0000	-2.0
尼日尔	-0.0001	0.0001	0.0000	0.0000	-0.0003	-2.7
多哥	-0.0064	0.0001	0.0000	0.0001	0.0000	-3.0
塞拉利昂	-0.0024	-0.0008	0.0001	0.0003	0.0000	-5.3
伊拉克	-0.0003	0.0002	0.0000	0.0000	0.0000	-7.9

资料来源：联合国/经社部，基于 2005 年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和 Feenstra 等人（2005 年）。

注：定义和使用方法见第三章附件。

缩略语：NRB 系指基于自然资源；LT 系指低等技术；MT 系指中等技术；HT 系指高技术含量；PP 系指初级产品。

^a 中国特别行政区。

附件表 A.6. (续)										
		百万美元						平均年增长率 (百分比)		
	发展中 国家 ^a	87	3 517	7 937	8 861
版税和 许可费	世界 总值	27 444	54 243	79 725	94 231
	发展中 国家 ^a	398	1 068	2 267	3 300
其他商业 服务	世界 总值	178 448	270 779	348 104	451 484
	发展中 国家 ^a	36 082	66 040	90 978	103 998
个人、文化和 娱乐服务	世界 总值	3 266	10 557	20 708	24 637
	发展中 国家 ^a	18	2 466	3 609	3 995
政府服务 n.i.e.	世界 总值	45 346	46 136	40 309	52 500
	发展中 国家 ^a	7 334	7 324	7 785	11 353
备忘项目： 商业服务	世界 总值	758 401	1 149 365	1 486 956	1 784 362
	发展中 国家 ^a	127 812	247 131	351 474	412 333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光盘统计手册》(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F.05.II.D.30)；和联合国/经社部。

注：由于在本期间提交的信息缺乏一致性，因此本表格未能反映出其他服务部门组成部分的平均年增长率。

^a 包括转型中的不发达国家。

附件表 A.7.

2000-2004 年特定经济体的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出口情况

美元 (百万)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印度	4 727.4	7 407.4	8 889.3	11 365.7	..
以色列	4 246.1	3 470.8	3 143.3	3 656.5	4 321.8
中国	355.9	461.0	638.2	1 102.2	..
新加坡	247.2	311.6	315.7	318.6	..
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a	59.7	154.0	297.6	245.4	..
马来西亚	81.6	176.3	181.6	216.0	..
俄罗斯联邦	59.0	128.0	137.3	175.0	255.8
哥斯达黎加	59.7	124.7	153.4	166.8	200.3
阿根廷	138.4	188.8	115.6	153.2	176.9
中国台湾省	117.0	154.0	115.0	110.0	110.0
罗马尼亚	44.0	50.0	78.0	108.0	143.0
塞浦路斯	57.8	86.8	104.0	92.1	249.8
斯洛文尼亚	53.9	64.1	79.8	88.4	97.5
智利	33.4	42.8	62.9	81.4	70.5
斯里兰卡	..	66.0	50.0	80.0	..
克罗地亚	33.5	43.8	45.7	62.2	65.0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50.0	1.0
牙买加	40.4	36.6	34.1	36.0	..
巴基斯坦	22.0	19.0	21.0	34.0	37.7
拉脱维亚	20.2	21.9	24.8	32.7	43.6
爱沙尼亚	21.2	23.3	24.3	31.1	38.8
大韩民国	10.6	16.1	19.5	29.7	23.3
巴西	34.0	27.0	36.4	29.1	53.4
立陶宛	15.5	24.2	18.8	28.6	31.0
菲律宾	76.0	22.0	21.0	28.0	33.0
备忘项目:					
爱尔兰	7 489.7	8 925.7	10 447.1	14 372.4	18 316.5
联合王国	4 321.5	4 682.8	5 770.1	7 892.5	10 549.9
德国	3 798.2	4 805.0	5 491.3	6 679.9	7 877.5
美国	5 622.0	5 457.0	5 431.0	5 431.0	5 436.0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光盘统计手册》（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F.05.II.D.30）；和联合国/经社部。

^a 中国特别行政区。

书 目

- Acemoglu, Daron, Simon Johnson and James A. Robinson (2001). The colonial origins of comparative development: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91, No. 5 (December), pp. 1,369 – 1,401.
- _____ (2003). An African success story: Botswana. In *In Search of Prosperity. Analytic Narratives on Economic Growth*, D. Rodrik ed.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_____ (2005). The rise of Europe: Atlantic trade, institutional trade and economic growth.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95, No. 3 (June), pp.546-579.
- Addison, Tony, Basuser Guha-Khasnabis and George Mavrotas (2006). Introduction and overview. *The World Economy*, vol. 29, No. 1 (January), pp. 1-8.
- Agénor, Pierre-Richard (1991). Output, devaluation and the real exchange rate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Weltwirtschaftliches Archiv*, vol. 127, pp. 18-41.
- Aghion, Philippe, and Peter Howitt (2005). Appropriate growth policy: a unifying framework. The 2005 Joseph Schumpeter Lecture at the Twentieth Annual Congress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Amsterdam, 25 August, 2005.
- _____, Robert Barro and Ioana Marinescu (2006). Cyclical budgetary policies: their determinants and effects on growth. Work in progress.
- Agosin, Manuel R., and Ricardo J. Mayer和里卡多·J.梅尔(2000年)。“发展中国家的外国投资：是否挤进了国内投资？”贸发会议《讨论文件》，第146号。日内瓦：贸发会议。UNCTAD/OSG/DP/146。2月。
- Aitken, B., and A. Harrison (1999). Do domestic firms benefit from foreign investment? evidence from Venezuela.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89, No. 3 (June).
- Aizenman, Joshua, and Yothin Jinjark (2006). Globalization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a shrinking tax base? NBER Working Paper, No. 11933.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January.
- Akyuz, Yilmaz (2004). Trade growth and industrialization: issues, experience and policy challenges. Geneva: Third World Network. Mimeo. December.
- _____ (2005). The WTO negotiations on industrial tariffs: what is at stake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Geneva: Third World Network. May. Available from www.twinside.org.sg/title2/akyuz_papers>NamaIndFin.pdf (accessed 16 March 2006).

- Akyuz, Yilmaz编辑 (2003年)。《发展中国家和世界贸易：现状与前景》。日内瓦：贸发会议；槟榔屿：第三世界网；伦敦：Zed出版社。
- Ascherson, Neal (1963). *The King Incorporated: Leopold the Second and the Congo*.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 Azam, Jean-Paul (1998). Politiques macro-économiques et réduction de la pauvreté. Paper presented in the African Economic Research Consortium (AERC) seminar on “Poverty,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issues related to labour market”, held in Abidjan, 8-13 October.
- Banerjee, Abhijit, Paul J. Gertler and Maitreesh Ghatak (2002). Empowerment and efficiency: tenancy reform in West Bengal.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110, No. 2 (April), pp. 239-280.
- Barro, Robert J. (1999). Human capital and growth in cross-country regressions. *Swedish Economic Policy Review*, vol. 6, No. 2, pp. 237-277.
- _____, and Xavier Sala-i-Martin (1992). Convergenc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Chicago, Illinois)*, vol. 100, No. 2 (April), pp. 223-251.
- Ben-David, Dan (1995). Convergence clubs and diverging economies. Foerder Institute for Economic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 40-95 (November). Tel-Aviv University, Israel.
- Blomström M., R. Lipsey and M. Zejan (1992). What explains developing country growth? NBER Working Paper, No. 4132.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August.
- _____, and A. Kokko (2003). Human Capital and Inward FDI, CEPR Working Paper, No. 167, London: Centre for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
- Bloom, David, David Canning and Jaypee Sevilla (2004). The effect of health on economic growth: a production function approach. *World Development*, vol. 32, No. 1, pp. 1-13.
- Bonaglia, Federico和Kichiro Fukasaku (2003年)，《低收入国家的出口多样化：多哈回合谈判后面临的国际挑战》，经合组织发展中心，《工作文件》第209号。巴黎：经合组织，6月。
- Borensztein E., J. De Gregorio and W. Lee (1995). How doe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ffect economic growth? NBER Working Paper, No. 5057.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March.
- Borjas, George J., and Lawrence F. Katz (2005). The evolution of the Mexican born workforce in the United States. NBER Working Paper, No. 11281.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April.

- Bourguignon, François, and Christian Morrisson (2002). Inequality among world citizens, 1820-1992.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92, No. 4 (September), pp. 727-744.
- Braunstein, E., and G. Epstein (2004). Bargaining power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China: can 1.3 billion consumers tame the multinationals? In *Labor and the Globalization of Production: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Industrial Upgrading*, W. Milberg, ed. London: Palgrave.
- Briault, C. (1995). The costs of inflation. *Quarterly Bulletin* (Bank of England), vol. 8 (February), pp. 33-45.
- Brock, William A., and Steven N. Durlauf (2001). Growth empirics and reality. *World Bank Economic Research*, vol. 15, No. 2, pp. 229 – 272.
- Calderón, César, and Luis Servén (2003). Latin America's infrastructure in the era of macroeconomic crises. In *The Limits of Stabilization: Infrastructure, Public Deficits, and Growth in Latin America*, William Easterly and Luis Servén, eds., Palo Alto, California, and Washington, D.C.: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and World Bank, pp. 21-94.
- Calderón, César, William Easterly and Luis Servén (2003). Infrastructure compression and public sector solvency in Latin America. In *The Limits of Stabilization: Infrastructure, Public Deficits, and Growth in Latin America*, William Easterly and Luis Servén, eds. Palo Alto, California, and Washington, D.C.: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and World Bank, pp. 119-138.
- Calderón, César, Norman Loayza and Klaus Schmidt-Hebbel (2005). Does openness imply greater exposure?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 3733.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October.
- Canning, David (1999). Infrastructure's contribution to aggregate output,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 2246.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Carkovic, Maria, and Ross Levine (2002). Doe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ccelerate economic growth? Minneapolis, Minnesota: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Mimeo. May.
- Carmel, Erran (2003). Taxonomy of new software exporting nations. *The Electronic Journal on Information System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vol. 13, No. 2 (May), pp. 1-6. Available from <http://www.ejisdc.org/ojs/viewissue.php?id=66> (accessed 22 March 2006).
- Chang, Ha-Joon (1999). Industrial policy and East Asia: the miracle, the crisis, and the future. Revised version of paper presented at the World Bank workshop on

- “Re-thinking the East Asian miracle” , San Francisco, California, 16 and 17 February 1999. May.
- _____ (2003). Kicking away the ladder: the “real” history of free trade. Foreign Policy In Focus special report. December. Available from <http://www.fpif.org/pdf/papers/SRtrade2003.pdf> (accessed 14 March 2006).
- Chang, Roberto, L. Kaltani and N. Loayza (2005). Openness can be good for growth: the role of policy complementarities. NBER Working Paper, No. 11787.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November.
- Chenery, Hollis B. (1979). *Structural Change and Development Polic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_____, and Lance Taylor (1968). Development patterns among countries and over time: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vol. 50, No. 4, pp. 391-416.
- Cimoli, Mario, and Jorge Katz (2002). *Structural Reforms, Technological Gap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 Latin American Perspective*. Desarrollo Productivo Series, No. 129. Sales No. E.02.II.G.89. Santiago: ECLAC. August.
- Claessens, S., and others (1995). Portfolio capital flows: hot or cold?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vol. 9, No. 1, pp. 153-174.
- Collier, Paul (2006). War and military expenditure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their consequences for development. *The Economics of Peace and Security Journal*, vol. 1 No. 1, pp. 1-4.
- _____, and Jan Willem Gunning (1999). Explaining African economic performance.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Vol. XXXVII, No. 1 (March), pp. 64-111.
- Commission for Africa (2005). *Our Common Interest: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for Africa*. Available from <http://www.commissionforafrica.org/english/home/newsstories.html>.
- Cooper, Richard (1971). Currency devalu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Government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Gustav Ranis, ed. New Haven, Connecticut: Yale University Press.
- Cosbey, Aaron, and others (2004). The rush to regionalism: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regional/ bilateral approaches to trade and investment liberalization. Scoping paper prepared for 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re (IDRC), Canada. Winnipeg, Manitoba: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November.
- Dasgupta, Sukti, and Ajit Singh (2005). Manufacturing, services, jobless growth and

- the informal economy: will services be the new engine of Indian economic growth? Paper presented at the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World Institute for Development Economics Research (WIDER) Jubilee Conference, Helsinki, 17 and 18 June 2005.
- Davis, Graham A., and John E. Tilton (2005). The resource curse. *Natural Resources Forum: A United Nation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Journal*, vol. 29, Issue 3 (August), pp. 233-242. Oxford, United Kingdom: Blackwell Publishing.
- De Ferranti, David, and others (2003). *Closing the Gap in Education and Technology*. World Bank Latin American and Caribbean Studies.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de Mello, L. (1997).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growth: a selective survey.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vol. 34, No. 1, pp. 1-34.
- Demetriades, Panicos O., and Theofanis P. Mamuneas (2000). Intertemporal output and employment effects of public infrastructure capital: evidence from 12 OECD economies. *Economic Journal* (Royal Economic Society), vol. 110, No. 465 (July), pp. 687-712.
- Dixit, Avinash (2005). Evaluating recipes for development success.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1 June.
- Dollar, David (1992). Outward-oriented developing economies really do grow more rapidly: evidence from 95 LDCs, 1976-1985.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vol. 40, No. 3, pp. 523-544.
- Dornbusch, Rudiger, and Stanley Fischer (1993). Moderate inflation.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vol. 7, No. 1 (January), pp 1-44.
- Dowrick Steve, and Jane Golley (2004). Trade openness and growth: who benefits? *Oxford Review of Economic Policy*, vol. 20, No. 1, pp. 38-56.
- Driffield, Nigel, and James H. Love (2005). Intra-industry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uneven development and globalisation: the legacy of Stephan Hymer. *Contributions to Political Economy*, vol. No. 24, pp. 55-78.
- Driffield, Nigel, and K. Taylor (2002). Spillovers from FDI and skill structures of host-country firms. Discussion Papers in Economics, No. 02/4. Leicester, United Kingdom: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Leicester.
- Easterly, William (2001). The lost decades: developing countries' stagnation in spite of policy reform 1980-1998.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vol. 6, No. 2, pp. 135-157.
- _____ (2005). How to assess the needs for aid? the answer: don't ask. Paper

- prepared for the Third Agence Française de Développement/European Development Research Network (AFD/EUDN) Conference on “Financing Development: What Are the Challenges in Expanding Aid Flows?” , Paris, 14 December 2005.
- _____, and Sergio Rebelo (1993). Fiscal policy and economic growth: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vol. 32, pp. 417-458.
- _____, Roumeen Islam, and Joseph E. Stiglitz (2001). Shaken and stirred: volatility and macroeconomic paradigms for rich and poor countries. In *Annual World Bank Conference on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00*, Boris Pleskovic and Nicholas Stern eds.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pp. 191-212.
- Edwards, Sebastian (1986). Are devaluations contractionary?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vol. 68, No. 3 (August), pp. 501-508.
- Eichengreen, Barry (2004). Financial instability. Paper written for the Copenhagen Consensus, and presented in Copenhagen on 25-28 May 2004.
- Evans, P. (1979). *Dependent Development: The Alliance of Multinationals, State and Local Capital in Brazil*.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Feenstra, Robert C., and others (2005). World trade flows: 1962-2000. NBER Working Paper, No. 11040.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January. Available from <http://www.nber.org/papers/w11040> (accessed 15 February 2006).
- Feld, Serge (2005). Labour force trends and immigration in Europe.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vol. 39, issue 3 (fall), pp. 637-662. New York: Center for Migration Studies.
- Ffrench-Davis, Ricardo (2006). *Reforming Latin America's Economies: After Market Fundamentalism*. London: Palgrave/Macmillan.
- Fiess, Norbert (2002). Chile's new fiscal rule.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Mimeo. May.
- Fischer, Stanley, and Franco Modigliani (1978). Towards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real effects and costs of inflation. *Weltwirtschaftliches Archiv*, vol. 114, No. 4, pp. 810-833.
- FitzGerald, Valpy (2006).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a critical survey. Background paper prepared for the World Economic and Social Survey 2006: Diverging Growth and Development. February. Available from <http://www.un.org/esa/policy/wess/index.html>.
- Gabriele, Alberto (2004年)。发展中国家的服务出口与经济增长。日内瓦：贸发

- 会议。UNCTAD/DITC/TNCD/MISC/2003/6。6月3日。资料可查阅网站 http://www.unctad.org/en/docs//ditctnadmisc20036_en.pdf (2006年3月22日之前有效)
- Gala, Paulo, and Claudio R. Lucinda (2006). Exchange rate misalignment and growth: old and new econometric evidence. São Paulo, Brazil: São Paulo 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and São Paulo School of Economics. Mimeo.
- Gallup, John Luke, Jeffrey D. Sachs and Andrew D. Mellinger (1998). Geograph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NBER Working Paper, No. 6849.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December.
- Gates, Scott, and Anke Hoeffler (2004). Global Aid Allocation: Are Nordic Donors Different? Centre for the Study of African Economies Working paper Series, No.234. Oxford University, Oxford.
- Ghose, Ajit K. (2004年), 《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流入和投资情况》。劳工局《就业战略文件》, 第2004/11期。日内瓦: 国际劳工局, 11月。
- Gillson, Ian, Adrian Hewitt and Sheila Page (2004). Forthcoming changes in the EU banana/sugar markets: a menu of options for an effective EU transitional package: report. London: Overseas Development Institute. Available from http://www.odi.org.uk/iedg/Projects/EU_banana_sugar_markets/SUGARreport.pdf (accessed 13 March 2006).
- Glaeser, Edward L., and others (2004). Do institutions cause growth? NBER Working Paper, No. 10568.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June.
- Gorg, Holger, and D. Greenaway (2001).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intra-industry spillovers. Paper prepared for the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Europe/European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regional expert meeting on “Finance for Development: enhancing the benefits of FDI and improving the flow of corporate finance in the transition economies” , Geneva, 3 December 2001.
- Gottschalk, Ricardo (2005). The macro content of PRSP: assessing the need for a more flexible macroeconomic policy framework. *Development Policy Review*, vol. 23, No. 4, pp. 419-442.
- Griffith-Jones, Stephany, Miguel Angel Segoviano and Stephen Spratt (2003). Submission to the Basel Committee on Banking Supervision: CP3 and the developing world.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 University of Sussex, Brighton, United Kingdom. Available from <http://www.stephanygj.com>.
- Grilli, Enzo R., and Maw Cheng Yang (1988). Primary commodity prices,

- manufactured goods prices, and the terms of trade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what the long run shows.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vol. 2, No. 1, pp. 1-47.
- Guillaumont, Patrick (2005). Macro vulnerability in low income countries and aid response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World Bank Conference on Development Economics. Amsterdam, 24 and 25 May.
- Gupta, Poonam, Deepak Mishra和Ratna Sahay (2003年),《货币危机的产出对策》。货币基金组织《工作文件》第03/230号。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3月。
- Gupta, Sanjeev, Robert Powell and Yongzheng Yang (2006). Macroeconomic Challenges of Scaling Up Aid to Africa: A checklist for Practitioners. Washington, D.C.: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March.
- Hadjimichael, Michael T.和Michel Galy (1997年),《非洲金融共同体法郎区和欧洲货币联盟》。货币基金组织《工作文件》第97/156号。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1月。
- Haggard, Stephan (2004). Institutions and growth in East Asia. *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vol. 38, No. 4 (winter), pp. 53 - 81.
- Hanson, Gordon H., Raymond J. Mataloni, Jr., and Matthew J. Slaughter (2001). Expansion Strategies of U.S. multinational firms. In *Brookings Trade Forum 2001*, Susan M. Collins and Dani Rodrik, eds.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pp. 245-282.
- Harrison, Ann E., and Margaret S. McMillan (2002). Does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 affect domestic firms credit constraints? Berkeley,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Mimeo. January.
- Hausmann, Ricardo, Jason Hwang and Dani Rodrik (2006). What you export matters. NBER Working Paper, No. 11905. March.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 Hausmann, Ricardo, Lant Pritchett and Dani Rodrik (2004). Growth accelerations. NBER, Working Paper, No. 10566, June.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 Hausmann, Ricardo, Dani Rodrik and Andrés Velasco (2005). Growth diagnostics (revised).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Kennedy School of Government. March. Available from <http://ksghome.harvard.edu/~drodrik/barcelonafinal march2005.pdf>.
- Helleiner, Gerald K. (1973). Manufacturing exports from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multinational firms. *Economic Journal*, vol. 83, No. 329, pp. 21-47.

- Herman, Barry (2005). How well do measurements of an enabling domestic environment for development stand up? In *The IMF and the World Bank at Sixty*, Ariel Buira, ed. London: Anthem Press, pp. 281 – 310.
- Hochschild, Adam (1999). *King Leopold's Ghost*. New York: Mariner Books.
- Houde M.和K. Yannaca-Small (2004年),《国际投资协议间的关系》。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关于国际投资的《工作文件》第2004/1号。巴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出版社。
- Hummels, David, Jun Ishii and Kei-Mu Yi (1998). Vertical specialization and the changing nature of world trade. *Economic Policy Review*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New York), pp. 79-99, June.
- Hymer, Stephen H. (1976). *The International Operations of National Firms: A Study of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The MIT Press.
- Imbs, Jean, and Romain Wacziarg (2003). Stages of diversific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93, No. 1 (March), pp. 63-86.
-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1998年)。《世界经济展望》: 1998年5月。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 _____ (2005年)。《管理更多援助流入额的宏观经济学: 低收入国家的经历和所涉政策问题》。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政策制定和审查部, 8月8日。
- _____ (2006年)。《金融与发展》, 第43卷, 第1期 (3月)。
- Jenkins, Rhys, and Chris Edwards (2004). How does China's growth affect poverty reduction in Asia, Africa and Latin America? Overseas Development Group, University of East Anglia, Norwich, United Kingdom. Expanded report for the 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United Kingdom. 10 December.
- Johnson, Simon, Jonathan D. Ostry and Arvind Subramanian (2006). Levers for growth. *Finance and Development*, vol. 43, No. 1 (March).
- Kaldor, Nicholas (1957). A model of economic growth. *Economic Journal*, vol. 67, pp. 591-624.
- _____ (1978). Causes of the slow rate of growth of the United Kingdom. In *Further Essays on Economic Theory*. London: Duckworth.
- Kamaly, A. (2003).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the forgotten facet of FDI. Cairo: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Cairo. Mimeo. September.
- Kaminsky, Graciela, Carmen M. Reinhart and Carlos A. Végh (2004). When it rains, it pours: procyclical capital flows and macroeconomic policies. NBER Working

- Paper, No. 10780.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September.
- Kapur, Devesh, and John McHale (2005). *Give Us Your Best and Brightest: The Global Hunt for Talent and its Impact on the Developing World*.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Global Development.
- Kaufmann, Daniel, Aart Kraay and Massimo Mastruzzi (2004). Governance matters III: governance indicators for 1996 – 2002. World Bank. 5 April (revised).
- _____ (2005). Measuring governance using cross-country perceptions data. World Bank. August.
- Keck、Alexander和Patrick Low (2004年),《世界贸易组织中的特殊和差别待遇:原因、时间和方式》。世界贸易组织《工作人员工作文件》,第ERSD-2004-03号。日内瓦:世界贸易组织经济研究和统计司,5月。
- Khan, Mushtaq H. (2006). Governance, economic growth and development since the 1960s. Background paper prepared for the World Economic and Social Survey 2006: Diverging Growth and Development. Available from <http://www.un.org/esa/policy/wess/index.html>.
- King, Robert. G., and Ross Levine (1993). Finance, entrepreneurship, and growth: theory and evidence.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vol.32, No. 3, pp. 513-542.
- Klinger, Bailey, and D. Lederman (2004). Discovery and development: an empirical exploration of “new” products,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 3450.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November.
- Kochhar, Kalpana, and others (2006). India’s pattern of development: what happened, what follows? IMF Working Paper, No. WP/06/22. January. Available from <http://www.imf.org/external/pubs/ft/wp/2006/wp0622.pdf> (accessed 22 March 2006).
- Kornai Janos (1993). Transformational recession: a general phenomenon examined through the example of Hungary’s development. *Economie Appliquée*, vol. 46, No. 2, pp. 181- 227.
- _____ (1994). Transformational recession: the main causes.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vol.19, No.1, pp. 39-63.
- Kose M. Ayhan、Eswar S. Prasad和Marco E. Terrones (2005年),《全球化时代的增长与波动》。货币基金组织《工作人员文件》,第52卷,特刊,第31-63页。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 Kozul-Wright, Richard, and Paul Rayment (2006). *The Resistable Rise of Market Fundamentalism*. London: Zed Press.

- Kregel, J. (1996年)。金融全球化给国策自治带来的某种风险和影响。《联合国贸易和发展审查》(日内瓦), 第55-62页。
- Krugman, Paul (1995). Growing world trade: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In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No.1. Washington, D.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 _____, and Lance Taylor (1978). The contractionary effects of devaluatio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vol. 8, pp. 445-458.
- Kumar, Nagesh and Jaya Prakash Pradhan (2002).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externalities and economic growth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some empirical explorations and implications for WTO negotiations on investment. RIS Discussion Paper, No. RIS-DP27/2002. New Delhi: Research and Information System for the Non-Aligned and Other Developing Countries.
- Kuznets, Simon (1966). *Modern Economic Growth: Rate, Structure, and Spread*. New Haven, Connecticut: Yale University Press.
- Lall, Sanjaya (2000). Selective industrial and trade policie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issues. QEH Working Paper, No.48. Oxford, United Kingdom: Queen Elizabeth House, University of Oxford. August.
- _____. (2001). *Competitiveness, Technology and Skills*. Cheltenham, United Kingdom: Edward Elgar.
- _____. (2003). Reinventing industrial strategy: the role of government policy in building industrial competitiveness. Working paper prepared for the Intergovernmental Group on Monetary Affairs and Development (G-24). Second draft. September.
- Lee, Jong-Wha (1997年)。大韩民国的经济增长和人类发展, 1945-1992年。《专题文件》, 第24号。纽约: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 Lim, Ewe-Ghee (2001年), 《外国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和相互关系: 近期文献汇编》。货币基金组织《工作文件》第01/175号。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 Lucas, Robert E., Jr. (2000). Some macroeconomics for the 21st century.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Nashville, Tennessee), vol.14, No.1 (winter), pp. 159-168.
- Lucas, Robert E.B. (2001). Diaspora and development: highly skilled migrants from East Asia. Report prepared for the World Bank. November.
- _____. (1988). On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vol. 22, No. 1 (February), pp. 3-42.

- Maddison, Angus (1995年), 《监测世界经济: 1820-1992年》。发展中心研究报告。巴黎: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展中心。
- _____ (2001年), 《世界经济: 千年展望》。发展中心研究报告。巴黎: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展中心。
- McGillivray, Mark, and Oliver Morrissey (2001). A review of the evidence on the fiscal effects of aid. CREDIT Research Paper, No.01/13. Nottingham, United Kingdom: University of Nottingham.
- Milanovic, Branko (2005). *Worlds Apart: Measuring International and Global Inequality*.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_____, and Shlomo Yitzhaki (2001). Decomposing world income distribution: does the world have a middle class?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 2562.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Poverty and Human Resources, Development Research Group. 31 March.
- Milberg, William (2004). Globalized production: structural challenges for developing country workers. In *Labour and the Globalization of Production;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Industrial Upgrading*, William Milberg, ed.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Mody, Ashoka (2004). Is FDI integrating the world economy? Paper presented at the Thirteenth World Congress of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Association, Lisbon, September 2002. Forthcoming in *World Economy*.
- Mosley, Paul, (1999). "Micro-macro linkages in financial markets: the impact of financial liberalisation on access to rural credit in four African countries. Finance and Development Research Programme Working Paper No.4. Manchester, United Kingdom: Institute for Development Policy and Management,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March.
- Murshed, S. Mansoob (2001). Short-run models of natural resource endowment. In *Resource Abundanc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Richard Auty ed. Oxford, United Kingdo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_____ (2002). Civil war, conflict and underdevelopment.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34, No. 4, pp.387-393.
- _____ (2006年)。把利剑变为犁铧, 让小橡树变成大树: 冲突与增长之间的关系以及各国的贫穷状况。为2006年世界经济和社会概览编写的背景文件: 趋异的生长和发展。资料可查阅网站 <http://www.un.org/esa/policy/wess/index.html> (1月)。
- Myrdal, Gunnar (1957). *Economic Theory and Underdeveloped Regions*. London:

Duckworth.

Nielson, Julia, and Daria Taglioni (2004). Services trade liberalisation: identifying opportunities and gains. OECD Trade Policy Working Paper, No.1. Paris: Working Party of the Trade Committee,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TD/TC/WP(2003)23/FINAL. February. Available from [http://www.oalis.oecd.org/olis/2003doc.nsf/LinkTo/td-tc-wp\(2003\)23-final](http://www.oalis.oecd.org/olis/2003doc.nsf/LinkTo/td-tc-wp(2003)23-final) (accessed 20 March 2006).

Norwegian Refugee Council (2006). Internal displacement: global overview of trends and developments in 2005, Geneva: International Displacement Monitoring Centre and Norwegian Refugee Council. March.

Nunnenkamp, Peter, and Julius Spatz (2004). FDI and economic growth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how relevant are host-economy and industry characteristics?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New York and Geneva), vol.13, No. 3 (December), pp. 53-83.

Ocampo, José Antonio (2003). Capital-account and counter-cyclical prudential regulation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From Capital Surges to Drought: Seeking Stability for Emerging Markets*, Ricardo Ffrench-Davis and Stephany Griffith-Jones, eds. London: Palgrave-Macmillan, pp. 217-244.

_____ (2004). Latin America's growth and equity frustration during structural reform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vol. 18, No. 2 (Spring), pp. 67-88.

_____ (2005a)。宏观经济总览。经社部《工作文件》，第1号。纽约，10月。资料可查阅网站<http://www.un.org.esa/desa/papers>。

_____ (2005b). The quest for dynamic efficiency: structural dynamics and economic growth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Beyond Reforms: Structural Dynamics and Macroeconomic Vulnerability*, José Antonio Ocampo, ed. Palo Alto, California, and Washington, D.C.: Stanford Economics and Finance,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and World Bank.

_____ (2006a)。市场、社会凝聚力和民主。经社部《工作文件》，第9号。2月。资料可查阅网站<http://www.un.org/esa/desa/papers>。

Ocampo, José Antonio和Stephany Griffith-Jones (2006年)。有利于发展国际金融体系的反循环框架。在关于“国际金融体系、宏观经济不稳定性和体制”的国际发展研究中心讲习班上提交的文件，联合国总部，纽约，2006年4月17日至18日。

Ocampo, José Antonio, and María Ángela Parra (2003). The terms of trade for

commoditie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CEPAL Review* (Santiago), No. 79. (April), pp. 7-35. LC/ G.2200-P.

_____ (2005年)。双重趋异：自1980年以来发展中世界的经济增长成功与失败。在拉加经委会于智利圣地亚哥举行的题为“公平经济增长：拉丁美洲面临的挑战”的讨论会上提交的文件，第1期和第2期。2005年9月，圣地亚哥。里卡多·弗兰齐-戴维斯和乔瑟·路易斯·米歇尔编辑，《公平经济增长：拉丁美洲面临的挑战》，帕尔格雷夫，伦敦。经社部《工作文件》，第24号。2006年5月。资料可查阅网站<http://www.un.org/esa/desa/papers>。

Okita, Saburo (1985). Special presentation: prospects of Pacific economies. *Pacific Cooperation: Issues and Opportunities: Report of the Fourth 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Conference, Seoul, April 29-May 1, 1985*. Seoul: Korea Development Institute.

Palma, Gabriel (2003). The three routes to financial crises: Chile, Mexico and Argentina [1]; Brazil [2], and Korea, Malaysia and Thailand [3]. In *Rethinking Development Economics*, Ha-Joon Chang, ed., London: Anthem Press.

_____ (2004). Flying-geese and lame ducks: regional powers and the different capabilities of Latin America and East Asia to “demand-adapt” and “supply-upgrade” their export productive capacity. Unpublished. August.

_____ (2006年)。全球化后的增长：一个Kaldorian式结构主义者的抢椅子游戏。为《2006年世界经济和社会概览》编写的背景文件：《趋异增长和发展》，2月。可查阅网站<http://www.un.org/esa/policy/wess/index.html>。

Pang, Tikki, Mary Ann Lansang and Andy Haines (2002). Brain drain and health professionals: a global problem needs global solutions.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vol. 324, pp. 499-500. 2 March.

Passinetti, Luigi (1981). *Structural Change and Economic Growth: A Theoretical Essay on the Dynamic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Cambridge, United Kingdo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erry, Guillermo E., and others (2006). *Poverty Reduction and Growth: Virtuous and Vicious Circles*.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Plender, J. (2003). *Going off the Rails: Global Capital and the Crisis of Legitimacy*. Chichester, United Kingdom: John Wiley and Sons, Ltd.

Podkaminer, Leon (2006). External liberalization, growth and distribution: the Polish experience. In *External Liberalization in Asia, Post-Socialist Europe, and Brazil*, Lance Taylor, e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olak, Jacques J. (1957). Monetary analysis of income formation and payments

- problems. *IMF Staff Papers*, vol. 6 (November), pp.50.
- Polanyi, Karl (1944).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Boston, Massachusetts: Beacon Press.
- Prasad, Eswar S.和其他人 (2003年), 《金融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 实验证据》。货币基金组织不定期刊物, 第220号。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 Przeworski, Adam (2003). Institutions matter?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Politics. Paper prepared for the meeting on Institutions, Behavior and Outcomes, Centro Brasileiro de Analise e Planejamento (CEBRAP), São Paulo, Brazil, 12 March 2003.
- Qian, Yingyi (2003). How Reform Worked in China. *In Search of Prosperity: Analytic Narratives on Economic Growth*, Dani Rodrik, ed.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p. 297-333.
- _____, and Wu, Jinglian (2000). China's transition to a market economy: how far across the river? Paper prepared for the conference on Policy Reform in China at the Center for Research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licy Reform (CEDPR), Stanford University, Palo Alto, California, 18-20 November 1999.
- Quah, Danny T. (1996). Twin peaks: growth and convergence in models of distribution dynamics. *The Economic Journal*, vol.106, No.437 (July), pp. 1045-1055.
- Rada, Codrina和兰斯·泰勒 (2006年)。20世纪晚期的发展中经济体和转型经济体: 趋异增长比率、经济结构和需求源。为《2006年世界经济和社会概览》编写的背景文件:《增长趋异和发展》, 2月。资料可查阅网站 <http://www.un.org/esa/policy/wess/index.html>。
- Rajan, Raghuram G和Arvind Subramanian (2005年), 《是什么破坏了援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货币基金组织《工作文件》第05/126号。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 Ramey, Garey, and Valerie Ramey (1995). Cross-country evidence on the link between volatility and growth.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85, No.5 (December), pp. 1138-1151.
- Ranis, Gustav和Frances Stewart (2005年)。经济和人类发展之间的动态联系。经社部《工作文件》, 第8号。11月。资料查阅网站<http://www.un.org/esa/desa/papers>。
- Rawls, John (1999). *A theory of Justice*, revised ed.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Raychaudhuri, Ajitava (2004). Lessons from the land reform movement in West

Bengal, India. Paper presented at Scaling Up Poverty Reduction: A Global Learning Process and Conference, Shanghai, China, 25 - 27 May 2004.

Reddy, Sanjay G和Camelia Minoiu (2005年)。各国的真实收入停滞, 1960-2001年。哥伦比亚大学巴纳德学院经济系和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 纽约。为《2006年世界经济和社会概览》编写的背景文件:《增长趋异和发展》, 2月。资料查阅网站<http://www.un.org/esa/policy/wess/index.html>。

Rodriguez, Francisco (2006年a)。清理洗碗槽: 跨国经济增长经验主义线性假定的后果。卫斯理大学国内《工作文件》, 第2006-004号。康涅狄格州米德尔顿: 卫斯理大学经济系。1月19日。为《2006年世界经济和社会概览》编写的背景文件:《增长趋异和发展》。2月。资料可查阅网站<http://www.un.org/esa/policy/wess/index.html>。

_____ (2006年b)。基础设施开支的崩溃是否造成了人均国内总产值的跨国趋异? 为《2006年世界经济和社会概览》编写的背景文件:《增长趋异和发展》。资料可查阅网站<http://www.un.org/esa/policy/wess/index.html>。

_____ (2006年c) 开放与增长: 我们学到了什么? 卫斯理经济《工作文件》, 第2006-11号。康涅狄格州米德尔顿: 卫斯理大学经济系。为《2006年世界经济和社会概览》编写的背景文件:《增长趋异和发展》。资料可查阅网站<http://www.un.org/esa/policy/wess/index.html>。

Rodrik, Dani (1999). *The New Global Economy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Making Openness Work*. Washington, D.C.: Overseas Development Council.

_____ (2000a). Exchange rate regimes and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in the shadow of capital flow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n Central Banking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held in Kuala Lumpur, 28-30 August, in honour of Tun Ismail Mohamed Ali.

_____ (2000b). Trade policy reform as institutional reform.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August.

_____ (2004a). Getting institutions right.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April.

_____ (2004年b), 《二十一世纪的工业政策》。为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编写的文件, 9月。

_____ (2004c). Growth Strategies. A paper for the *Handbook of Economic Growth*, Philippe Aghion and Steven Durlauf, eds. Amsterdam: North-Holland. Revised October 2004.

_____ (2005). Why we learn nothing from regressing economic growth on policie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25 March.

- _____ (2006a). Goodbye Washington Consensus, hello Washington Confusion?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January.
- _____ (2006b). What's so special about China's exports? NBER Working Paper, No. 11947.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January.
- Rodrik, Dani, ed. (2003). *In Search of Prosperity: Analytic Narratives on Economic Growth*,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Roller, Lars-Hendrik, and Leonard Waverman (2001). Telecommunications infrastructur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 simultaneous approach.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91, No. 4, pp. 909-923.
- Roodman, D. (2004). The anarchy of numbers: aid, development and cross-country empirics.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Global Development. Mimeo.
- Ros, Jaime (2000). *Development Theory and the Economics of Growth*. Ann Arbor, Michigan: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Rowthorn, R. E. (1992). Intra-industry trade under oligopoly: the role of market size. *Economic Journal*, vol. 102, issue 411, pp. 402-414.
- Sachs, Jeffrey, and Andrew Warner (1995). Economic reform and the process of global integration.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No.1, pp.1-118.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 Sánchez, Marco V. (2005年), 《经济改革、汇率制度和外部冲击: 对哥斯达黎加、萨尔瓦多和洪都拉斯的经济发展、不平等和贫穷现象的影响》, 《研究和展望丛书》, 第36期, 墨西哥。联合国,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
- Sanchez-Robles, B. (1998).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and growth: some empirical evidence. *Contemporary Economic Policy*, vol. 16, No. 1 (January), pp. 98-108.
- Schady, Norbert (2005). Changes in the global distribution of life expectancy and health.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Mimeo.
- Schmidt-Hebbel, Klaus, Luis Servén and Andrés Solimano (1996). Saving and investment: paradigms, puzzles, policies. *World Bank Research Observer*, vol. 11, No. 1, pp. 87- 117.
- Schultz, Theodore W. (1961). Investment in human capital.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LI (March), pp. 1-17.
- Shapiro, Helen (2005年)。产业政策 and 增长。为《2006年世界经济和社会概览》编写的背景文件:《增长趋异和发展》, 资料可查阅网站<http://www.un.org/esa/policy/wess/index.html>。

- Singh, Nirvikar (2003). India'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ector: what contribution to broader economic development? OECD Development Centre Working Paper, No. 207. Paris: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Development Centre. DEV/DOC(2003)05. March. Available from <http://www.oecd.org/dataoecd/59/12/2503442.pdf> (accessed 22 March 2006).
- Slaughter, Matthew J. (1998).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per capita income convergence: a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analysis. NBER Working Paper, No. 6557.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May.
- Sokoloff, Kenneth, and Stanley Engerman (2000). Institutions, factor endowments, and paths of development in the New World.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Vol. 14, No. 3. (summer), pp. 217-232.
- Spiezia, V. (2004). Trade,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employment: some empirical evidence. In *Understanding Globalization, Employment and Poverty Reduction*, E. Lee and M. Vivarelli, eds, London: Macmillan.
- Stallings, Barbara和Jürgen Weller (2001年), 《1990年代拉丁美洲创造就业机会的情况: 社会政策的基础》。《宏观经济发展系列》, 第5期, 出售品编号: E.01.II.G.15。圣地亚哥: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 经济发展司。
- Stiglitz, Joseph E., and Andrew Charlton (2004). The development round of trade negotiations in the aftermath of Cancún. Report prepared for the Commonwealth Secretariat with the Initiative for Policy Dialogue.
- _____ (2006). Aid for trade: a report for the Commonwealth Secretariat, London. March.
- Stiglitz, Joseph, and others (2006). *Stability with Growth*. Oxford, United Kingdo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ubramanian, Arvind, and Devesh Roy (2001). Who can explain the Mauritian miracle: Meade, Romer, Sachs or Rodrik? Available from <http://ksghome.harvard.edu/~drodrik/Growth%20volume/Subramanian-Mauritius.doc> (accessed 16 March 2006).
- Syrquin, Moshe (1986). Productivity growth and factor reallocation. In *Industrialization and Growth*, Hollis B. Chenery, Sherman Robinson and Moshe Syrquin, ed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UN Millennium Project (2005). *Investing in Development: Practical Plan to Achieve the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London: Earthscan.
- 联合国 (1975年)。《标准国际贸易分类, 修订本2》。《统计丛书》, 第34/Rev.2号, 出售品编号: E.75.XVII.6。

- _____ (2000年)。《2000年世界经济和社会概览》。出售品编号：E.00.II.C.1。
- _____ (2002年a)。《发展筹资问题国际会议报告，墨西哥蒙特雷，2002年3月18日-22日。出售品编号：E.02.II.A.7. 第一章，第1号决议，附件。
- _____ (2002年b)。《2002年世界经济和社会概览》。出售品编号：E.02.II.C.1。
- _____ (2004年a)。《2003年国际贸易统计年鉴》，第二卷，《商品贸易》。出售品编号：E/F.05.XVII.2, 第二卷。
- _____ (2004年b)。《2004年世界经济和社会概览：国际移徙》。出售品编号：E.04.II.C.3。
- _____ (2005年a)。《不平等困境：2005年世界社会状况报告》。出售品编号：E.05.IV.5。
- _____ (2005年b)。《2005年世界经济和社会概览：发展筹资问题》。出售品编号：E.05.II.C.1。
- _____ (2006年)。《2006年世界经济现状和前景》。出售品编号：E.06.II.C.2。
- 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2001年）。《改变非洲的经济体：概览》。亚的斯亚贝巴。资料可查阅网站http://www.uneca.org/eca_resources/Publications/books/transforming_africas_economies/index.htm。
- 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经济委员会（2000年）。《公平、发展和公民身份》。圣地亚哥：拉加经委员会。LC/G.2071 (SES.28/3)，3月。
- _____ (2003年)。《十年光影：1990年代的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出售品编号：E.03.II.G.79. 圣地亚哥：拉加经委员会，7月。
- _____ (2004年)。开放经济的生产性发展。圣地亚哥：拉加经委员会。LC/G.2234 (SES.30/3)，6月。
-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1992年）。《1992年贸易和发展报告》。出售品编号：E.92.II.D.7。
- _____ (1996年)。《1996年贸易和发展报告》。出售品编号：E.96.II.D.6。
- _____ (1999年)。《1999年贸易和发展报告：易碎的复苏和风险：贸易、金融和增长》。出售品编号：E.99.II.D.1。
- _____ (2000年)。《2000年世界投资报告：跨国合并和收购以及发展问题》。出售品编号：E.00.II.D.20。
- _____ (2002年)。《2002年贸易和发展报告：世界贸易中的发展中国家》。出售品编号：E.02.II.D.2。
- _____ (2003年)。《2003年贸易和发展报告：资本累积，增长和结构变革》。出售品编号：03.II.07。

- _____ (2005年a)。《2005年贸易和发展报告：全球相互依赖的新特点》。出售品编号：E.05.II.D.13。
- _____ (2005年b)。《2005年联合国贸发会议统计手册》。出售品编号：F./F.05.II.D.29。
- _____ (2006年)。服务贸易与发展问题：联合国贸发会议秘书处的记录。TD/B/COM.1/77。日内瓦，1月16日。资料还可查阅网站http://www.unctad.org/en/docs/c1d77_en.pdf。(2006年3月22日前有效)。
-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2005年)。《2005年人类发展报告。十字路口上的国际合作：不平等世界的援助、贸易和安全问题》。纽约：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 (2005年)。《2005年工业发展报告：为“赶上去”进行能力建设：历史、经验和政策等方面的问题》。维也纳：联合国工发组织。
- van Pottelsberghe de la Potterie, Bruno, and Frank Lichtenberg (2001). Doe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transfer technology across borders?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vol. 83, No. 3 (1 August), pp. 490-497.
- Verdoorn, P. J. (1949). Fattori che regolano lo sviluppo della produttività del lavoro. *L'Industria*, vol. 1, pp. 3-10.
- Villanueva, D., and A. Mirakhor (1990). Strategies for financial reforms. *IMF Staff Papers*, vol. 37, No. 3, pp. 509-536.
- Vos, Rob (1994). *Debt and Adjustment in the World Economy*. London: Macmillan.
- _____, and Samuel Morley (2006). Bad luck or wrong policies? external shocks, domestic adjustment, and the growth slowdown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In: *Who Gains from Free Trade? Export-led Growth, Inequality and Poverty in Latin America*, Rov Vos and others, eds. London: Routledge.
- Wade, Robert Hunter (2004). *Governing the Market: Economic Theory and the Role of Government in East Asian Industrialization*, 2nd paperback ed.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_____ (2005). Escaping the squeeze: lessons from East Asia on how middle-income countries can grow faster. Available from <http://www.lse.ac.uk/collections/DESTIN/pdf/Galbraithvolume.nov04.pdf> (accessed 8 March 2006).
- White, Howard, ed. (1998). *Aid and Macroeconomic Performance: Theory, Empirical Evidence and Four Country Cases*. London: Macmillan.
- Willmore, Larry (1994). Export processing in the Caribbean: the Jamaican experience. *CEPAL Review*, vol. 52 (April), pp. 91 - 104.
- Winters, Alan L. (2002). The economic implications of liberalising Mode 4 trade.

- Paper prepared for the Joint WTO-World Bank Symposium on the Movement of Natural Persons (Mode 4) under the GATS,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Geneva, 11-12 April 2002. London: Centre for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 and Centre for Economic Performanc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 World Bank (1993). *The East Asia Miracle: Economic Growth and Public Policy*.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Repor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_____ (1999). *Global Economic Prospects 1998/99: Beyond Financial Crisis*.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_____ (2003). China: promoting growth with equity: country economic memorandum. Poverty Reduction and Economic Management Unit, East Asia and Pacific Region. Report No. 24169-CHA. 15 October.
- _____ (2004年)《马拉喀什统计行动计划：更好的数据，更好的结果》。一项改善发展数据的行动计划。文件由世界银行发展数据小组成员编写，并提交给第二届发展成果管理国际圆桌会议，摩洛哥马拉喀什，2004年2月4日至5日。资料可查阅网站http://unstats.un.org/unsd/statcom/doc04_marrakech.pdf。
- _____ (2005a).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06: Equity and Development*. Washington, D. C.: World Bank;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_____ (2005b). *Economic Growth in the 1990s: Learning from a Decade of Reforms*,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April. Also available from <http://www1.worldbank.org/prem/lessons1990s/> (accessed 9 March 2006).
- _____ (2005c). *Global Development Finance, 2005: Mobilizing Finance and Managing Vulnerability*.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_____ (2006). *Global Economic Prospects. Economic Implications of Remittances and Migration*.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_____ and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2006). *Global Monitoring Report 2006: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Strengthening Mutual Accountability—Aid, Trade and Governance*.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2005). Doha work programme: draft ministerial declaration: revision. Agreed at the Sixth Ministerial Conference of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Hong Kong, 13-18 December 2005. WT/MIN(05)/W/3/Rev.2, 18 December 2005.
- _____ (2006). Measuring trade in services. Training module produced by the Economic Research and Statistics Division. March.
- _____, Committee on Subsidies and Countervailing Measures (2001). Procedures for extensions under article 27.4 for certain developing country members.

G/SCM/39. 20 November.

Young, Alwyn A. (1928). 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progress. *The Economic Journal*, vol. 38, pp. 527-542.

Young, H. Peyton (1998). *Individual Strategy and Social Structure: An Evolutionary Theory of Institutions*.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كيفية الحصول على منشورات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يمكن الحصول على منشورات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من المكتبات ودور التوزيع في جميع أنحاء العالم . استعلم عنها من المكتبة التي تتعامل معها أو اكتب إلى :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 قسم البيع في نيويورك أو في جنيف .

如何购取联合国出版物

联合国出版物在全世界各地的书店和经售处均有发售。请向书店询问或写信到纽约或日内瓦的联合国销售组。

HOW TO OBTAIN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may be obtained from bookstores and distributors throughout the world. Consult your bookstore or write to: United Nations, Sales Section, New York or Geneva.

COMMENT SE PROCURER LES PUBLICATIONS DES NATIONS UNIES

Les publications des Nations Unies sont en vente dans les librairies et les agences dépositaires du monde entier. Informez-vous auprès de votre libraire ou adressez-vous à : Nations Unies, Section des ventes, New York ou Genève.

КАК ПОЛУЧИТЬ ИЗДАНИЯ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Издания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можно купить в книжных магазинах и агентствах во всех районах мира. Наводите справки об изданиях в вашем книжном магазине или пишите по адресу: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Секция по продаже изданий, Нью-Йорк или Женева.

COMO CONSEGUIR PUBLICACIONES DE LAS NACIONES UNIDAS

Las publicaciones de las Naciones Unidas están en venta en librerías y casas distribuidoras en todas partes del mundo. Consulte a su librero o diríjase a: Naciones Unidas, Sección de Ventas, Nueva York o Ginebra.
